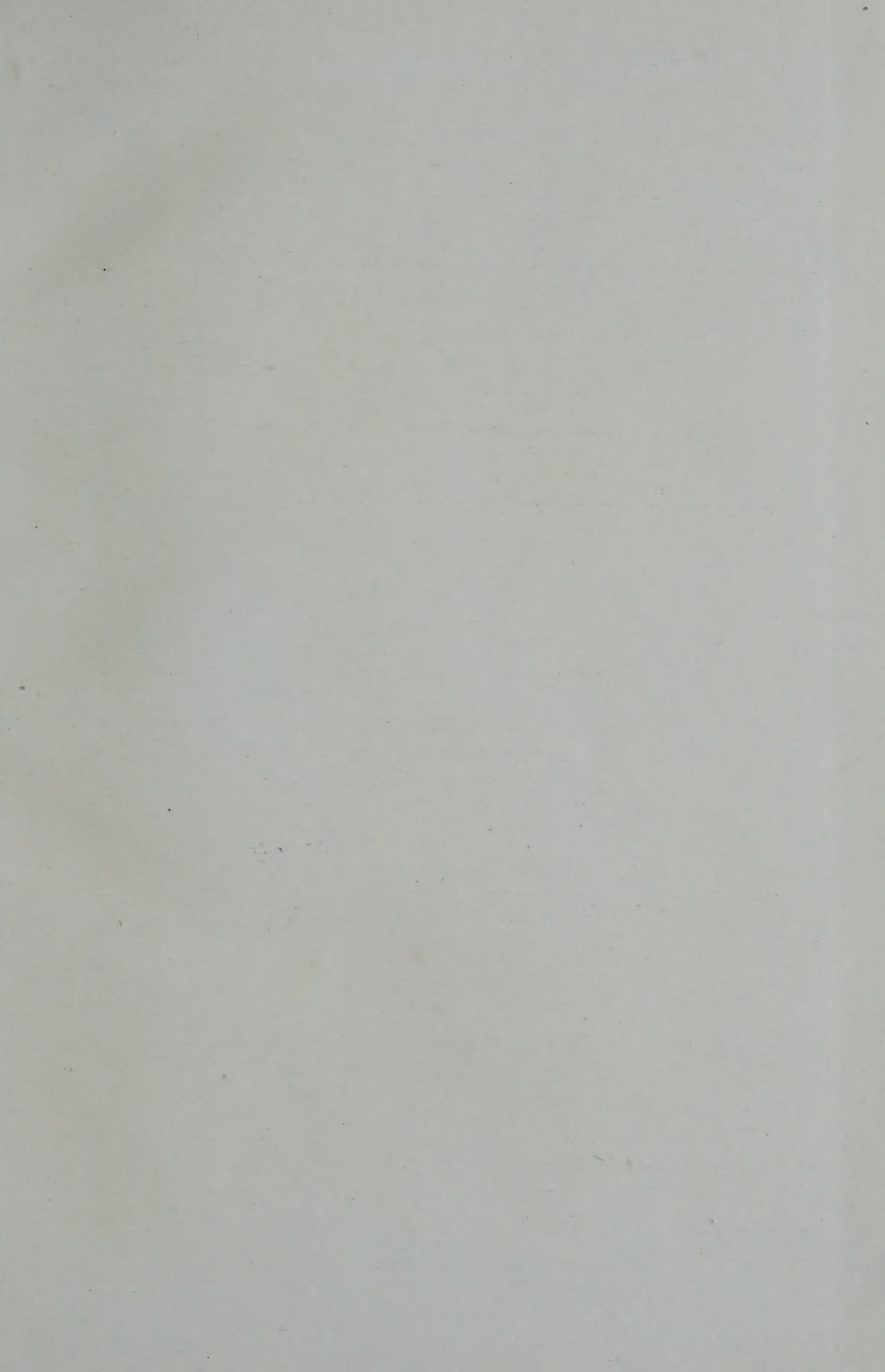








解放军将领传

第十一集

解放军出版社











解放军将领传

星火燎原编辑部　编

11

解放军出版社

1989·北京

解放军将领传
（十一）

星火燎原编辑部 编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125印张 315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ISBN7-5065-1032-4／E·539
定 价：7.00元

目　　录

王　良 …… 3
毛泽覃 …… 23
邓乾元 …… 57
古大存 …… 91
冯仲云 …… 129
李　涛 …… 167
肖　华 …… 217
何长工 …… 281
何正文 …… 325
张纯清 …… 377
徐　洪 …… 403
高厚良 …… 423
曾　生 …… 459
傅连暲 …… 485





王　良



王　良

一

王良（1905-1932），原名化陔，字傅良，四川省綦江县永丰乡人。一九〇五年八月五日生于一个封建家庭。

一九一一年上半年至一九一七年上半年，王良在綦江县立小学读书。一九一七年下半年，考入重庆市华英中学学习。王良在中学学习阶段，正是五四运动时期。当时在重庆、成都读书的部分綦江青年学生，受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的影响，纷纷回綦发起组织了“綦江青年砥砺会”。这是一个进步的群众性的青年组织。其宗旨是：团结青年，增进友谊，砥砺学业，改革社会。青年砥砺会开办了图书阅览室，订有《新青年》、《新思潮》、《中国青年》、《少年中国》、《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向导》以及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著作。王良经常与同乡同学一起阅读革命书刊，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不满封建社会的罪恶和黑暗。一九二三年下半年，王良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考入上海持志大学。在上海学习

期间，他经常与同乡同学聚会，交谈理想和志向，探讨革命真理。王良有个叔父叫王奇岳，当时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王良受到王奇岳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志献身革命事业。

一九二六年夏天，中国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招生，大学还没有毕业的王良，毅然离开持志大学，奔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开始为步科学员，不久转到骑科。一九二七年初，军校随广东革命政府迁到武汉，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军校。王良继续在军校学习。这一年，王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四月十三日，武汉军校学生在武昌阅马厂召开讨蒋大会。王良参加了大会。会上，他和大家一起高唱："蒋逆介石，蒋逆介石，新军阀，新军阀，唯一总理叛徒，屠杀工农群众，勾结帝国主义，破坏三大政策，打倒他，打倒他。"此后，他又与军校全体学员一起，发出了《为蒋介石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械致上海总工会电》，指出："今蒋介石率领党军，进驻上海，不但不爱护民众，充实民众武装，反而压迫民众，解除民众武装，其背叛总理，甘为帝国主义之新工具，已昭然若揭。"宣言号召：誓与上海工

友及全国民众共同讨蒋。

五月十七日，驻湖北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勾结四川军阀杨森，打到距武昌四十里的纸坊。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要部队正在河南作战，武汉防备空虚，形势十分危急。王良参加了中央独立师，与叶挺部队配合作战，打垮了叛军。

六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事教导团。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周恩来等在江西南昌发动国民革命军三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八月二日，教导团的中共党组织得到南昌起义消息后，决定脱离张发奎，响应南昌起义。八月四日，教导团乘船沿长江而下，船至九江靠岸时被张发奎的部队包围缴械。面对白色恐怖，王良立场坚定，毫不动摇。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与游雪程、靳梦修、陈伯钧、徐彦刚、吕赤等六人，连夜逃出九江，沿瑞昌、德安、永修向南昌方向兼程赶路。此时，起义部队已于八月五日撤离南昌，朝抚州方向进发。张发奎的部队已进驻永修、南昌等地，并截断了通往抚州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王良等立即转道高安，时遇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王良等便毅然加入了这支部队。不久，独立团从高安出发，沿途与少数土匪部队进行了一些战斗，经上高、宜丰到达铜鼓。在铜鼓休整近一个月，并与共产党人卢德铭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

团取得联系。不久，王良随独立团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九月九日，秋收起义胜利爆发。王良所在的第三团，从铜鼓出发，按原定计划，与第二团会攻浏阳，再夺取长沙。第三团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首战白沙市，但因不明敌情，部队遭受一些损失，夺取长沙已不可能。九月十四日晚，毛泽东在上坪召开第三团连以上干部会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提出了放弃攻打长沙的打算，退兵萍乡，与第二团会合。九月十九日，王良随起义部队沿罗霄山脉中段转移，在经过萍乡芦溪时，遭到江西敌军朱培德部两个团以及地主武装的伏击，损失了数百人，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一些人动摇了，有的甚至离开了革命队伍。王良立场坚定，勇往直前，跟随毛泽东闹革命。

一九二七年九月底，起义部队经过艰苦转战，进驻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王良被编在第三营九连，任连长。

三

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以后，毛泽东曾考虑向永新发展。后来，了解到驻永新敌军较强，而遂川没有多少驻军。于是决定先打遂川，待条件成熟时再向永新发展。一

九二八年一月五日，毛泽东亲率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城。由于群众受反动宣传的蒙骗，一时还不了解工农革命军，纷纷躲了起来。王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一个连分成若干小分队，逐家逐户地进行宣传，还在墙上写了“工农革命军是保护穷人的军队！”“欢迎遂川工农起来参加革命！”等多幅大标语。在宣传群众的基础上，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浮财。一开始，群众顾虑重重，怕豪绅地主阶级报复，不敢接受分给的浮财。王良又带领全连指战员，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将浮财送到群众家里，深深感动了群众。没过几天，群众兴高采烈地跟着工农革命军参加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工作局面很快就打开了。正当遂川的革命形势迅猛向前发展的时候，驻江西国民党军增调第七十二师七十九团一个营至宁冈新城，企图会同该地靖卫团，伺机进犯革命根据地。为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打败敌人的进犯，毛泽东决定攻打新城。为使攻城出奇不意，红四军前委决定采取奇袭的战术。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晚，王良率领全连指战员冒着严寒，隐蔽向新城前进，十八日拂晓将新城敌军四面包围。王良所在的第一团三营主力攻击南门。驻在南门外巽峰书院的敌军，清早照常到南门外的草坪上出操。当敌人架好枪支，取下子弹袋，准备做徒手体操时，王良率九连会同七、八连突然向草坪上的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缴枪三十余支，并乘势发起了对南门守敌的攻击。攻下南门后，王良又会同攻克东门

的一营和攻克北门的教导队，驱敌于西门之外，将敌人全部消灭。王良为新城战斗全歼敌军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击毙敌营长王国桢和靖卫团团长李树益，立下战功。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后组成的地方武装，在宁冈的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会师后，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时，王良编在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第一连任连长。

红四军的成立，增强了湘赣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力量，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五月二日，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省政府“克日会剿”。王良所在的三十一团，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在新老七溪岭阻击赣敌七十九团，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并配合朱德率领的二十八团取得了五斗江战斗的胜利，首次解放了永新县城。接着，王良率领连队跟随毛泽东深入永新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五月中旬，赣敌杨如轩第二十七师进攻永新。为粉碎敌人的进攻，王良所在的三十一团一营奉命袭击茶陵，摆出红军主力西出湖南的架势，以迷惑敌人。三十一团一营进占茶陵的高陇后，派出三连向腰陂方向侦察。三连在高陇桥和敌人遭遇，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三连且战且退。战斗中，机枪手和连长先后牺牲了。敌人正想一口吃掉三连。正在这紧急时刻，王良率领一连增援上来，埋伏在三连撤退路线的一侧，接应三连。当追赶三连的敌人进入伏

击圈时，王良高喊一声："打！"密集的子弹射向敌人，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追击的敌人在一连阵地前留下了一批尸体。接着，朱德也率领部队增援上来，歼敌近一个营，将余敌击退。高陇战斗后，永新的敌人准备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宁冈。朱德接到毛泽东关于敌情和破敌的来信，决定奔袭永新县城。王良率领全连与兄弟连队一起，一天行军一百三十里，赶回永新浬田。这时，赣敌七十九团出城向浬田方向搜索前进。王良按军部的部署，率领连队投入了草市坳伏击战。接着，他又率领连队乘胜追击，直捣永新城。红四军全歼了赣敌七十九团，敌团长刘华安被击毙，敌师长杨如轩的左手被击伤。永新追歼战获胜后，红四军又发起了龙源口战斗。敌人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吼叫着向七溪岭阵地冲击，二连连长和副连长先后负伤，二连阵地危在旦夕。这时，王良率领一连增援上来，与二连共同抗敌，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使敌陈尸遍野，始终未能冲破阵地。为掌握歼敌的主动权，按照军部的命令，王良从全连挑选出一批勇敢强悍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准备向敌人发起突击。一连班长马奕富利用地形隐蔽接近敌机枪手，他突然跃起，双手抱住敌人的机枪不放，在这一刹那间，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喊着杀声，向敌人冲去。起初，敌人还拼命挣扎。后来，红二十八团抄了敌人的后路，敌军顿时大乱，顾不得寻路，往稻田里争相逃命。此役，歼敌一个多团，击溃敌两个多团。龙源口大捷后，红四军军威

大振。

黄洋界保卫战是井冈山斗争时期著名的一战。王良率领一连配置在黄洋界哨口的两侧，担负在主要防御阵地阻击由源头方向进犯之敌的战斗任务。为保卫井冈山，扼守黄洋界，王良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士兵委员会和全连军人大会，传达了战斗任务，进行了充分的战斗动员。经过动员，连队的士气十分高涨，在王良率领下进驻黄洋界。一到黄洋界，王良便一面带领各排长观察地形，分配任务；一面发动军民插竹钉，抬木头，挖战壕，在阵地前修筑了五道工事。第一道是竹钉阵，分别在小路两旁的草丛里布下了几里路长的竹钉防线；第二道是竹篱障碍；第三道是滚木礌石；第四道防线是四五尺深的堑壕；第五道是石头筑成的射击掩体，掩体前沿的草丛里也插满了竹钉。临战前王良又进行了动员，他号召全连指战员团结一心，英勇杀敌，与阵地共存亡，誓死保卫井冈山。井冈山广大军民动员起来了，黄洋界森严壁垒。

八月三十日清晨，湘敌以两个营的兵力从源头方向对黄洋界发起进攻。为近战歼敌，待敌人进到离阵地只有几十米时，王良下令开火。顿时，密集的子弹射向敌人，礌石滚木象木石流直冲山下，敌人躲闪不及，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丢下大批尸体败退下去。

败退的敌人并不甘心，又用密集的炮火轰击一连阵地，打得黄洋界上硝烟滚滚，碎石乱飞。敌人在火力掩护

下连续两次发起进攻，都被一连打了下去。茅坪方向进攻之敌，也被三连打下去了。

当日下午，敌人孤注一掷，集中全部炮火，向黄洋界轰击，大批的敌人排着密集的队形拥挤于山下，准备往上冲。这时，在茨坪修理好的一门迫击炮架到黄洋界瞭望哨。这门炮只有三发炮弹，前两发没有打响，第三发终于在敌群中爆炸开花。随着炮声轰鸣，王良一声令下，隐蔽在各个山头后面的赤卫队员和一连的指战员一齐呐喊，响起了震天的喊杀声，与此同时，猛烈地射击声和煤油筒里的鞭炮声也交织响了起来。敌人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连夜撤退。红军以两个连的兵力打退了大批敌军的多次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九月间，王良率他所领导的连队参加了遂川、宁冈、坳头垅、龙源口、新城等战斗，为恢复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九二九年一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重组二十一个团的兵力，约三万余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三次联合“会剿”。为了粉碎敌人的“会剿”，一月四日，在宁冈的白露村召开了前委、特委、红四军、红五军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以解井冈山之围。根据会议决定，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彭德怀率红五军八百余人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守卫井冈山。

四

一月十四日，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余人从小行州、茨坪出发，向赣南游击。此时，国民党军加紧了“会剿”的步子，红四军沿途受敌追扰。为了消灭尾追之敌，扭转被动局面，红四军到达瑞金境内进行了大柏地伏击战，三十一团担任右翼侧击敌人的任务。王良率领全连迅速占领了四二八高地南侧，居高临下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与兄弟连队协同进行围歼。敌人凭借优良的装备和较强的火力坚守顽抗，敌我双方激战相持了一天。王良率领全连与兄弟连队一起，勇敢出击，全力拼杀，终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敌人，取得大柏地伏击战的胜利。

大柏地伏击战的胜利，使红四军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取得了行动的主动权，然后经宁都、永丰向东固进军，于二月十七日与江西红二、四团胜利会合。在东固休整期间，着手进行部队的改编。这时，屡立战功的王良被提升为三十一团一营营长。

红四军经过东固休整，部队恢复了疲劳，进行了必要的补充，继续向长汀进攻。盘踞在长汀的是土著军阀、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王良率领三十一团一营参加了解放长汀的战斗。这一仗一营担任自左翼侧击敌人的任务。为了占据有利地势，王良率领一营攀登悬崖峭壁，同

敌人争时间，抢先登上了长岭寨主峰，并与二、三营一起，居高临下，击溃了刚爬到半山腰的敌人。接着，三十一团三个营并肩作战，又打垮了敌人的两次反扑，并乘势冲击山下敌阵，打得敌人四处败逃。王良率领的第一营在围歼敌旅部的战斗中，为解放汀洲城击毙敌旅长郭凤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便于游击行动和开展群众工作，红四军在长汀期间完成了组织系统的正式改编。部队由团的建制改为纵队。三十一团一营改编为第三纵队第五支队，王良任支队长。在汀洲期间，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就地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根据会议的决定，王良率领五支队在汀州附近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一九二九年三月，蒋桂军阀爆发混战，赣南国民党驻军被调去参加混战。红四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回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王良率领五支队进到兴国古龙冈、良村一带，与当地党组织相结合，在乡镇和农村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充分发动群众，没收豪绅地主的不义之财，收缴借约地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革命政权。与此同时，他们深入调查研究，为制订《兴国土地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兴国土地法》颁布后，王良又组织全支队指战员，分散到群众中去，宣传《兴国土地法》。

五月中旬，闽西、闽南军阀入粤讨伐桂系军阀，原赣

南国民党驻军回防赣南。闽西、闽南空虚，红四军再次入闽。在红四军二次入闽作战中，王良率五支队参加了三打龙岩的战斗。红四军第三次攻克龙岩后，消灭了土著军阀陈国辉部，扩大了闽西革命根据地。

七月中旬，闽粤赣三省敌人对红军的“会剿”基本形成，并开始向闽西移动。为打破敌人的“会剿”，红四军前委决定二、三纵队出击闽中，从外线打击敌人背部。王良率领五支队与三、四、六支队一起，进占宁洋，攻下漳平。九月上旬，再克龙岩，胜利返回闽西。

红四军粉碎敌人三省“会剿”后，上杭仍被军阀郭凤鸣残部、自任旅长的卢新铭所盘踞。上杭，易守难攻，闽西各县被红军打败的反动民团、逃亡地主和土豪劣绅，大都潜躲在这里。九月十九日，红四军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消灭卢新铭残匪。五支队的作战任务是攻打北门。王良率领五支队与兄弟支队密切配合，架桥攻城。经过浴血奋战，五支队首先攻破北门，上杭很快就被红四军攻占。是役，除卢新铭只身逃脱外，一千余守敌全被消灭。至此，红四军这次入闽作战，创造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的闽西工农武装割据区域。

红四军攻占上杭后，各纵队由原来两个支队扩编为三个支队，王良的五支队改为七支队。随着红四军军事斗争的胜利，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土地革命也得到迅速而广泛地开展。到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闽西有约六十多万农民得

到了土地。在这期间，王良率领七支队深入到永定、上杭一带活动，配合地方党组织，在群众的支援下，开展消灭地主武装、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王良和七支队受到闽西人民的热烈拥护，被亲切地称为王良支队。

十一月十八日，红四军前委在汀州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进行整训，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十二月三日，王良率领七支队离汀州，前往连城新泉参加整训。在新泉王良出席了毛泽东在望云草室召开的各级干部座谈会和小型调查会。这些会议，采取座谈、讨论的办法，揭露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各种错误思想的原因，研究纠正的办法。王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在会上积极发言。

十二月中旬，蒋介石调动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会剿"。金汉鼎部再占汀州，进逼连城。为了保证开好中共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红四军主力移驻上杭古田。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党的"九大"在古田召开。王良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聆听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的报告，并和与会代表一起，讨论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一结束，红四军前委即做出决定，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直捣金汉鼎的后方，迫其回援赣南，保卫闽西根据地。王良奉命率领七支队与兄弟部队一起，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初，自古田出发赣南游击，经过十三个州县，

发动了数十万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打通了几千里赤色区域，在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五

一九三〇年五月，红四军各纵队按照三月前委楼梯岭会议的预定计划，会师闽西。这时，闽西的革命斗争更加扩大，也更加深入了。六月，红四军在汀州整编，成立红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下辖三、四、十二军。王良升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红一军团成立后，受到了中共中央李立三盲动主义的严重干扰。红一军团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把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一方面服从中央决定，发布《向牛行车站进军的命令》；另一方面又在具体部署中，抵制了攻打大城市的冒险主张。王良坚决听从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七月三十日他率领一纵队进占生米街和牛行车站。八月一日在牛行车站鸣枪向南昌城内敌人示威后，立即从牛行车站撤离，转向安义、奉新休息整顿。一纵队刚进入休整，为援助红五军，又随红一军团出击浏阳。

八月五日，红三军团退出长沙，湖南军阀何键的心腹戴斗垣率四十七旅尾追至文家市。为解红三军团之危，八月二十日，王良率领一纵队按军团部的部署，进到预定地

点，同兄弟部队一起，发动了对戴斗垣四十七旅的猛烈攻击，将戴斗垣击毙，戴旅受歼灭性打击。

八月二十四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胜利会师。当日即召开了两个军团前委会议，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导路线，发布了《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四军一纵队奉命在王良率领下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久攻不克，伤亡较大，方面军总前委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作出了从长沙撤围和红一军团攻占吉安的决定。十月三日，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发布了《总攻吉安的命令》。红四军为左翼，王良率一纵队在军建制内向螺子山、真君山敌阵地攻击。四日拂晓发起攻城战斗，当晚即全部占领吉安城。在吉安，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纵队改称师，第一纵队改为第十师，王良任师长。

十月底，蒋介石调集七个师约十万人的兵力，以鲁滁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王良坚定地按照毛泽东在罗坊会议上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率红十师东渡赣江，撤至根据地内，待机歼敌。在接着进行的龙冈战斗中，第十师做为参战主力之一担任主攻龙冈西北敌阵地的重要任务。为断敌退路，王良分兵一部，迂回到敌之侧后。战斗打响后，王良指挥十师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向敌人发起猛攻，取得全胜，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整旅，活捉了前敌总指挥

张辉瓒。为表彰王良和第十师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作战中的卓著功绩，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毛泽东，把缴获张辉瓒的怀表奖给了王良。

一九三一年五月，为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的第二次“围剿”，按照“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王良率领第十师投入了富田大会战，紧接着又进行了白沙、中村、广昌、建宁的战斗，十五天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万余，淋漓痛快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六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王良指挥第十师，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先后在永丰莲塘、兴国良村、宁都黄陂歼灭了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郝梦龄、毛炳文三个师。此后，王良又率领部队投入了高兴圩激战，重创敌军，为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部队进行调整，王良调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为了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一、三军团在根据地内进行消灭白色据点的战斗。十一月初，王良奉命率领第十一师围歼石城县红石寨反动据点。针对地形不利的情况，王良采取了长围久困的战术，迫使敌人弹尽粮绝。经五十多天的围困战，一九三二年新年第一天的拂晓，总攻红石寨的战斗打响了。王良亲临阵地指挥，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乘军部猛烈炮火之威，第十一师一

举突入山寨，拔掉了这个反动据点。

二月，为掩护红三军团攻打赣州，王良率领第十一师奔赴赣南新城独立作战，阻击来自广东的国民党余汉谋所属增援部队。敌人抢先占领了新城。王良指挥部队前赴后继，英勇攻城，歼敌近一个团，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三月，红一方面军进行编制调整，王良升任红一军团第四军军长。

为粉碎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扩大中共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筹集物资补给部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红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东征。王良率领的红四军为东路军主力。东路军入闽作战的部署是，第一步攻占龙岩，消灭国民党军张贞部的前锋部队。为实现这一目标，四月十日，王良指挥红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取龙门考塘。当天下午，红四军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从西门和北门发起了攻城战斗，胜利地攻占了龙岩城，歼张贞部杨逢年旅一个多团。攻下龙岩，王良又率领红四军以闪电般的速度，进抵漳州城外要隘天宝山下。敌张贞部主力部署在天宝山一线，据险顽抗。四月十九日，红军东路军发起了对张贞部的攻击，十二岭为主攻目标，红四军担任主攻十二岭的任务。上午九时，王良指挥红四军一举突破十二岭一线敌人的阵地，并乘胜追歼敌王祖清旅，攻占了天宝圩。与此同时，兄弟部队也发起了对张贞部的攻击。张贞见大势已去，率领残部仓皇逃出漳州。四

月二十日，红军东路军占领漳州城。漳州之役，歼敌二千六百余人，缴获两架飞机、大量枪支弹药及成批军用物资。红四军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在王良率领下追歼逃敌，解放了石码以东大片地区，并且威逼了厦门。

五月一日，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国民党军企图在东江桥海岸登陆反扑。王良指挥红四军痛击反扑之敌，狠狠地教训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

在驻漳州期间，根据方面军总前委的指示，王良组织红四军深入石码、海澄、浦南、长泰、美角等城乡，发动群众，消灭残敌，建立革命政权，还筹集了十四万元军款和大批军用物资，扩大红军五百人，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作了物资准备。不久，王良奉命率领红四军返回赣南革命根据地。六月十三日，红四军的部队经武宁县太禾圩继续前进。当地顽匪兰启观派股匪拦击红军。王良接到前锋部队前进受阻的报告，立即与罗瑞卿政委一起，赶到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指挥战斗。不幸，在交战中，王良被射来的密集子弹击中，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王良牺牲后，红军指战员和当地群众怀着悲愤的心情，在会昌县永隆镇举行了庄严简朴的葬礼。为了缅怀革命先烈，一九七〇年人民政府在王良墓地修建了革命烈士纪念塔。

（刘受初　黄仲芳）



毛 泽 覃



毛　泽　覃

一

毛泽覃（1905-1935），号润菊，是毛泽东的胞弟，一九〇五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毛泽覃自幼聪明，六岁即到清溪寺读书，以后又转到瓦子坪和湘乡的东山读书。他在校学习用功，在家热爱劳动，经常跟随大人下田干农活。大哥毛泽东所讲的历史故事，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和长沙饥民暴动的故事，在他少时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逐渐养成了喜欢打抱不平的倔强性格。一九一八年春，他随大哥毛泽东来到长沙，入第一师范学校附小高十四班学习。在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下，在毛泽东的直接教育启发下，他懂得了一些国家大事，并且关心起国家的兴衰和荣辱。他经常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议论反对列强侵略中国，批评军阀政府腐败无能。他遇不平事或违反公德的强权，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报打不平。后来他考入长沙一所中学读书。毛泽覃随着自己思想觉悟的提

高，迅速成长起来，他立志要象大哥一样为求祖国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一九二一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秋，毛泽覃进入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他在认真学好中学课程提高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还积极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著作，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补习学校实行"革新社会"造就人才的办学方针，经常组织学生深入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和革命实践。毛泽覃曾去长沙码头办过工人夜校，还到一个矿山参加为时一个多月的罢工斗争。有段时间他住在清水塘，他的哥嫂毛泽东和杨开慧对他严格要求，热心教导，经常同他谈形势，谈前途，谈理想。一个夜晚，毛泽东向他讲述了当年夏天去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亲眼看到发生的冒顶事故，有七个工人被压得粉身碎骨，死者家属悲痛欲绝。毛泽覃听了这悲惨的遭遇，愤慨地泪流满面，他强烈要求投身到矿山，决心为求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战斗。

一九二三年三月，毛泽覃被中共湘区区委派往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大哥毛泽东送他上船时，再三叮嘱他要好好锻炼，努力改造自己，学习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到水口山矿后，毛泽覃担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兼工人学校教员，并负责青年团的工作。他直接联系矿山机械科的工人和团员，经常深入到敲砂工棚、机器间和矿井去参加劳

动，和工人们谈话，体验工人艰苦的劳动生活。他很快与机械科工人积极分子宋乔生、陈梅生等交上朋友，在一起干活、谈心、学习过程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毛泽覃对工人学校的教学工作非常认真，白天，他给小学部授课，对工人们的子女耐心教导。晚上，他给补习部工人们讲课，一边传授文化科学知识，一边热情地宣传革命思想。他还同教育股同事一起举办了工人骨干训练班，向经过罢工斗争考验的工人积极分子进行阶级斗争、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基本知识的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在水口山矿党支部书记蒋先云的直接领导教育下，在毛泽东经常来信和经常邮寄党刊的鼓励下，他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虚心学习工人阶级坚定勇敢、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思想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一九二三年十月，毛泽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一场严峻的考验摆在他面前。这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阀赵恒惕派反动军队突然包围水口山矿工人俱乐部，逮捕和屠杀工人。在蒋先云领导下，毛泽覃临危不惧，与战友迅速转移党的文件，率领广大工人同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斗争。水口山矿的工人运动惨遭反动军阀的镇压而转入低潮时，他被宋乔生等工友巧妙地保护起来。

一九二四年春，毛泽覃被调回长沙，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一场全国性的大革命的风暴正

在酝酿和兴起。在中共湖南区委领导下，毛泽覃同湖南著名的青年团领导人肖述凡、肖子暲、田波扬等一起工作、学习和战斗，积极宣传组织广大学生和工农青年，发展扩大长沙团的组织。他们公开发表宣言声称：青年乃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一生的理想和事业皆须于青年时代树立深固基础。号召青年们："凡社会恶习，概行屏绝"，以求"立身之不苟"。"科学所以启人理智，艺术所以表现感情，体育所以强健身躯，皆人生之需要，尤青年所当为"。这种针对青年特点进行的宣传，引导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毛泽覃主持长沙团地委工作时，还成立了青年妇女学艺社，出版了《青年妇女》，动员广大青年妇女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和杨开慧从上海回韶山，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农民运动。毛泽覃亦随兄嫂回乡，曾在银田镇白庙开办农民夜校，参加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进行平粜阻禁斗争。他给农民讲课采取讲故事的方式，借古谈今，形象生动，大家都喜欢听。

一九二五年秋，由于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毛泽东，毛泽覃便随大哥毛泽东到广州从事革命活动。他先后在黄埔军官学校、中共广东区委、广东省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过。当时的广州是全国革命的中心，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在顺利发展，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已经成立，上海"五卅"运动发生后继而掀起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开展得轰轰烈烈。年仅二十岁血气方刚的毛泽覃，为这大好

的革命形势所激励，他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入紧张的革命工作。这年秋冬他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秘书。广东区委组织部，只有一个部长和十七八个工作人员，秘书实际上相当于负责日常事务的副部长。年轻的毛泽覃勇敢地担起这一重任，努力协助刚从法国归来的部长穆青进行工作。他不仅指导广东省各地先后成立了地委、县委组织，而且他还兼管广西、福建等地党的组织建设。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等的言行，对毛泽覃的成长起着榜样的作用。特别是全国开展最早的广东农民运动和规模空前、持续时间最长的省港工人大罢工，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九二六年先后发生的国民党右派制造的排斥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使周恩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被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国民党中央排挤出来。这使毛泽覃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党右派猖狂破坏大革命的行为决不会就此罢手。

一九二七年四月，继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被屠杀。历经血雨腥风使毛泽覃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对国民党右派更加仇恨。根据党的指示，他同在广州结婚的爱人周文楠乘船经上海转赴武汉。在江轮上他碰见了二哥毛泽民，为防意外，兄弟俩坐在一起，装作互不认识，声称是做生意的商人，互相交谈了各自的情况。船到汉口，他们很快赶到武昌都府堤找到大哥毛泽东。根

据毛泽覃的要求，他被党组织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任上尉书记官。五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幸免于难逃到武汉的中共湖南省委成员，向毛泽东汇报了国民党新军阀屠杀工农的惨状。六月下旬，毛泽东向中共中央要求出任湖南省委书记。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毛泽东回到长沙，领导和发动全省革命力量，准备对屠杀工农的国民党新军阀进行反击，但十天后又被陈独秀召回。武汉的汪精卫，这时也正与南京的蒋介石加紧勾结，准备公开叛变。一天比一天紧张的革命形势，引起了毛泽覃的焦虑不安和深思，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少回家看看怀孕的妻子。一天，毛泽东特意把毛泽民、毛泽覃找来都府堤住处，一家人围坐方桌以打麻将为掩护，交谈当前形势和今后去向。毛泽东严肃地向弟弟和弟妹们指出，汪精卫很快就会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别人屠戮；要赶快转移。或跟部队走，或回湖南去，一定要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毛泽覃表示要随部队开赴江西。他们兄弟三人商定，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们奔赴自己的战斗岗位，刚生了第三个孩子的杨开慧和即将临产的周文楠，返回湖南长沙，坚持斗争。毛泽覃送走妻子、别离兄嫂不久，他就离开武汉前往南昌，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毛泽覃的妻子周文楠于同年九月八日生下儿子毛楚雄，夫妻从此再未见面。毛楚雄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牺牲于赴延安途中的河南镇安文家庙。）

二

一九二七年七月，毛泽覃随第四军到达江西九江。“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后，又在庐山同张发奎召开反共的军事会议，决定在第二方面军中“清党”，立即逮捕共产党员。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迅速将这一阴谋计划转告了该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廖乾五，廖立即通知有关人员转去南昌。毛泽覃负责处理党内有关工作，稍晚些离开九江赶往南昌。由于南浔路沿途到处驻有张发奎的部队，中途受阻未能赶上南昌八一起义。当他赶到南昌城时，起义军已经南下，他在城门口被反动军警扣押。军警们见他身着长衫，又藏有一个第四军军部上尉书记官符号，便带他去见上司。毛泽覃神色自若，镇静地说：我是奉军部命令来此，负有重要任务，谁敢扣留将会受到严厉处分。那位上司军官见他对答如流，恐怕抓错了人，就客气地释放了他。毛泽覃机智地脱险后，匆匆向南追赶起义军大队。一路上，他不顾疲劳，脚走烂了，钱花光了，只好将身上的长衫卖得几块钱继续赶路。接近临川时，他被起义军哨兵发现，怀疑他是敌人派来的奸细，把他押往临川。恰好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临川，周恩来认识毛泽覃，问明情况后便派他到叶挺为军长聂荣臻为党代表的第十一军政治部工作。起义军在临川经

过休整继续南下，毛泽覃随第十一军参加会昌激战，攻占福建汀州，转战至广东潮汕地区。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起义军主力攻占潮州、汕头，毛泽覃留潮汕做宣传工作。九月三十日，驻潮汕的起义军，遭国民党军攻击受挫撤出潮汕，毛泽覃随第二十军三师一部分部队转移至饶平。这时，由朱德指挥的起义军第二十五师从三河坝撤退下来向江西方向转移，接近茂芝时获悉毛泽覃他们几百人正在饶平，便派师部军需主任周廷恩骑马去把毛泽覃接到师部。第二十五师党代表李硕勋委派毛泽覃在师政治部工作，任宣传科科长。从这时起，毛泽覃结识了忠厚的长者朱德和侃侃善谈的陈毅。

十月中旬，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二千五百余人，在武平击退尾追的国民党军一个师。由于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这支部队在武平战斗后尚存一千五百余人。当时的给养特别困难，部队思想混乱，师党代表李硕勋去找中共中央联系和请示工作走后，少数干部乘机离队。在此困难时刻，毛泽覃坚定地跟朱德、陈毅继续战斗。他在安远天心圩整顿部队的大会上，听了朱德的讲话，相信黑暗是暂时的，只要坚持斗争，革命力量一定能够发展起来。在随后转战湘、粤、赣边的艰苦斗争中，毛泽覃积极协助朱德、陈毅做部队的思想工作。十一月中旬，朱德率部队在上犹县营前同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三营取得联系。朱德听说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已经上

了井冈山，当即决定派毛泽覃前往联络。为便于行动，毛泽覃穿上了朱德同国民党军范石生部搞统战时获得的军服，带着团部副官的证件，化名覃泽，前去茶陵。

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已攻占茶陵，成立了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毛泽覃身着国民党军军官服装，持着第十六军军部副官证件，顺利通过国民党部队的一道道关卡，到达茶陵坑口。他机智地同地方反动民团团长周旋，打听到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有一个连驻在附近。他便去找到该连连长陈伯钧说明了情况，陈伯钧立即派人把他送到井冈山。毛泽覃在井冈山见到了经常想念的大哥毛泽东，向他汇报了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艰苦转战到湘南的情况。此后，他便留在井冈山根据地工作。十二月初，毛泽东带毛泽覃和几个随从人员下山，由陈伯钧带一个班护送去茶陵城。抵至离茶陵城五六里时天黑了，派人打听方知县城已被敌军占领，工农革命军已撤往水口方向。毛泽东等迅速乘船南行赶到水口，一路收集失散人员。在水口毛泽东召开会议，毛泽覃、陈伯钧虽未参加会议，但听到会上争论得很激烈，会后毛泽东率第一团主力返回井冈山。事后才知道，原来张子清营长率第三营从桂东转到茶陵，刚同驻茶陵的第一营会合，敌军就突然进攻，部队向南撤退。团长陈皓等企图乘机把队伍拉到国民党第十三军方鼎英部，被毛泽东追回后将部队带回宁冈砻市。前委在宁冈砻市做出决定，立即处决了图谋投敌的陈

皓等四人。这件事使毛泽覃深刻认识到，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里巩固革命部队的重要性。

不久，毛泽覃被前委派到乔林乡开展革命工作。毛泽东向他及另外两名干部讲了如何开展工作的方法和要求。毛泽覃带两个干部到乔林后，深入到贫苦农民中访贫问苦，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详细调查当地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接着他便开办农民夜校，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发现培养积极分子。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他及时地领导贫苦贫民斗争了陈家泉村的土豪和地主，发展了十几个积极分子入党，成立了宁冈最早的一个农村党支部，经上级组织批准，由毛泽覃担任第一任支部书记。在此基础上，他又组织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和暴动队，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一次，他带乔林暴动队到邻县九都，捉到当县官的大土豪尹子樵等三十几个土豪劣绅，筹款一万余元。乔林乡苏维埃政府和暴动队获得红旗奖励。

一九二八年一月，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攻占了遂川县城，毛泽覃参加了这次战斗。随后他担任了一团政治处代理主任兼遂川县游击大队党代表，并当选为中共遂川县委委员。他曾深入到西庄，发动贫苦农民群众打土豪，挖出农民自卫军埋藏的六支枪，找回共产党员王次楼，组成西庄游击队。之后，他率领县游击大队，在坑口、白樟、上坑、草林圩等村镇，打击土豪劣绅，发动群众。二月中旬，毛泽覃指挥遂川游击大队，协助主力第一

团和新成立的由袁文才、王佐领导的第二团攻打宁冈新城。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机智勇敢，率游击队员和部分战士冲到城墙底下，一边堆起柴火浇上煤油燃起熊熊烈火，一边迅速架梯登城，首先攻破东门杀入城内。攻入城内后，毛泽覃又带游击大队攻占了县政府，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政治犯"，抓到了反动县长。二月二十一日，在宁冈砻市召开的万人审判大会上，毛泽覃代表全县人民亲手处决了这个反动县长。大会后毛泽覃兼任中共宁冈县委宣传部部长。经短短三四个月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在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教诲下，毛泽覃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迅速成长起来。

三月的一天，毛泽东派毛泽覃去找朱德、陈毅，请他们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毛泽覃十分高兴地带特务连奔向湘南，在耒阳县城找到了久别的朱德和陈毅，向他们介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鉴于湘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大举围攻，湘南难以坚持，朱德、陈毅决定并立即动身率部队向井冈山地区转移。四月中旬，在酃县十都，朱德、陈毅同前来迎接的毛泽东会面。随后南昌起义军余部及湘南起义农军与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五月四日，正式宣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原秋收起义的第一团改为第三十一团，毛泽覃任该团第三营党代表。毛泽覃同营长伍中豪率全营参加了五

斗江和草市坳两次战斗。战前，毛泽覃抓紧政治动员，向战士们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战斗打响后，他积极开展战场鼓动，鼓舞了部队的斗志，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龙源口大捷中，毛泽覃表现得既勇猛又机智。当他带一部分红军战士夺取一个敌占山头时，遭到了敌人密集火力的射击。这时他机智灵活地找到两位煤炭工人带路，抄小道从敌人背后冲上山头，一阵猛冲猛杀，夺取了敌人的机枪阵地。红军战士们抓起敌人丢下的四挺机枪向逃敌猛扫，毛泽覃高减“冲啊！”带部队飞快冲下山，全歼逃敌。

毛泽覃不仅能参与指挥作战，而且带领部队坚决执行工作队的任务。他同伍中豪率全营曾从永新转战至吉安敖城一带，进行游击活动。他们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建立了一百余人的赤卫大队，打击了反动势力。在赤卫大队成立的仪式上，毛泽覃代表红军赠枪，并赠送“工农先锋”锦旗一面。这个赤卫大队后来发展为拥有五百余人枪的红军游击队。在坚持井冈山斗争过程中，毛泽覃逐渐树立起“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他坚信革命红旗能够永远打下去，工农革命一定能够胜利发展。

三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

山挺进赣南。时任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农运科科长的毛泽覃，也同前委机关一起随军行动，沿途做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张贴由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联名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全军经上犹营前抵崇义，进入大庾。一月二十日，红四军在大庾同国民党军李文彬旅相遇，因情况不明作战失利。这一仗打得很激烈，毛泽覃在战斗中受伤。红四军随即撤出大庾，转战至广东南雄，然后返回江西安远、寻邬一带。二月十日，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山区全歼国民党军刘士毅旅。十七日，红四军到达吉安东固，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部队经过休整，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挺进闽西，毛泽覃和周子昆、李天柱等因伤病被留在东固地区。毛泽覃担任了中共东固区委书记，他一边养伤，一边工作，参加了创建赣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把"朱毛红军"在井冈山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向工作在赣南地区的同志们传播，并运用于开辟赣南的实际工作中去。他主持区委，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了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普遍地建立和健全了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扩大了地方武装。五月中下旬，他化装成算命先生前去永南，对地方反动武装头目做说服争取工作。后来该部有四百余人携枪向红军投诚，扩大了地方红军。不久，毛泽覃当选为中共赣西特委委员。

一九三〇年一月，由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同赣西永新、莲花、宁冈赤卫总队合编成立了中国工农

红军第六军（后改称红三军），毛泽覃任军政治部主任。由于军政委是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兼任，继任政委陈毅到任不久又被调任红二十二军军长，红三军便由毛泽覃代理政委。毛泽覃运用红四军的建军经验，积极协助军长黄公略，全面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建立和健全军、纵队和支队的政治工作系统，配备了政工干部。为克服部队干部地方观念和本位主义，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红三军分兵三路活动，发动群众，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巩固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期间，毛泽覃当选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同时兼任了赣西南中路行委书记。他的革命热情很高，领导吉安、泰和及吉水地区广大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建设，发展了地方红军和赤卫队。在毛泽覃积极而得力的协助下，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威名远扬，把赣西南打出了一派大好局面。六月，红三军编入红一军团建制后，毛泽覃担任了由赣南地方武装新组成的红二十二军特派员。他在军长陈毅、政委邱达三的领导下，负责全军的保卫工作。不久成立红一方面军，红二十二军划归方面军建制。在方面军主力进行第二次长沙战役期间，红二十二军留在赣西南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毛泽覃随陈毅军长和邱达三政委率部分部队打回遂川西庄，找到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王佐农。在王佐农的帮助下，红二十二军发动群众，扩大地方武装，并且重占遂川县城，重建了县苏维埃政府。毛泽覃代表军部

向遂川地方武装赠枪，他还直接帮助成立了遂川县特务连，后来这个连发展成为红军独立团。十月初，红二十二军配合红一军团攻克吉安后，方面军成立了后方委员会和驻吉安后方办事处，调毛泽覃担任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兵站、医院、兵工厂、被服厂和特务连，同时担负军工生产、筹集军需物资和兵源补充等项工作，积极为红军主力进行第一、二次反“围剿”作战，提供后勤保障。他曾亲自带领特务连，跋山涉水，披星戴月，将重要物资送给前方作战部队。据统计，在红军占领吉安的一个半月内，在他的领导下，筹款十三万余元，缝制了上万套军服、军被，而且都及时运送到前方，保证了作战部队的需要。十一月中旬，毛泽覃率红一方面军后方办事处撤离吉安城，转入山区。他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兵站处和吉安交通总站等单位密切协同，积极筹集物资，组织担架队，有力地支援了开往黄陂、小布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的反“围剿”作战。

一九三一年六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成立永（丰）吉（安）泰（和）特委（后改称中心县委），由毛泽覃任特委书记。与此同时，将地方红军独立团扩编成红军独立第五师，红四军十二师师长肖克调任该师师长，由毛泽覃兼任师政委。特委机关和独立五师成立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剿”。七月初，毛泽覃同肖克奉临时总前委命令，立即指挥全师及地方武装阻止和袭扰从吉安方

向向根据地中心进攻的敌军。当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在福建建宁，敌右翼集团军共七个师，沿吉安、永丰、乐安、宜黄一线“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刚组建的独立五师，面对到处烧杀抢掠的敌军，同仇敌忾英勇战斗，在肖克、毛泽覃的指挥下，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迟滞了敌军的推进，为方面军千里回师兴国地区迎敌争取了时间。八月初，毛泽覃同肖克率全师在富田一带牵制敌陈诚、罗卓英两师行动，掩护方面军主力东进转到莲塘歼敌。当敌军主力各路纷纷向东开去后，他们指挥部队在西线积极出击，打击敌人，扰乱其后方，策应红军主力集中兵力歼敌。九月六日，毛泽覃同肖克奉命率独立五师协同红三军抢占老营盘，截断敌军从兴国北撤退路。九月七日，独立五师阻击敌增援的陈诚、罗卓英各一部，经过激烈战斗，杀伤了一批敌军，缴枪一百余支，使援敌不能前进一步，从而保证了红三军取得歼敌蒋鼎文师第九独立旅的重大胜利。在这个期间，毛泽覃同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结婚。贺怡当时任中共吉安县（后改称公略县）县委妇女部部长，他们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共同战斗。

毛泽覃在担任领导工作中，曾经暴露出忽冷忽热，怕负责任的弱点，在团结犯过错误同志一道工作和分配胜利果实等方面，也出现过失误。机关的同志向苏区中央局领导人毛泽东如实做了反映，毛泽东将这些意见转告毛泽覃时，他一时不能接受，感到很委屈。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

他，要求他掌握原则，注意影响，不要以为是兄弟关系就指望得到庇护，不讲党性，并以严厉的口气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从此，毛泽覃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克服存在的缺点，改进工作作风。永、吉、泰一带由于国民党军不断"围剿"，遭到严重破坏。毛泽覃主持特委，领导发动群众，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他几次亲自率机关干部、医生和战士，带着大批粮食、衣服、耕牛、救济款，到受敌人残害最严重的东固等地慰问，把共产党和红军的温暖带给广大贫苦工农。他走访一位姓张的贫农，见他家里极为贫困，没被子盖，便把从敌人手里缴来分配给自己盖的一床鹅绒被子送给这位素不相识的贫农。一次上级拨给东固区一笔救济款，区苏维埃政府领导干部没有发放给群众，却用来修了一栋楼房。毛泽覃知道这件事后，严肃地批评了区苏维埃的主要负责干部。

毛泽覃牢记大哥毛泽东对他的教诲：要做好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他在处理东固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上，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一九三一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密令崇贤靖卫团长罗焕南用假投诚的办法，钻到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破坏。四月，罗焕南率部"投降"红军，窃取了中共东固区委书记职务。不久，罗焕南就以打"AB 团"、肃反为名，大肆捕人杀人，采取残酷手段严刑逼供，诬杀许多党团员和贫雇农。这一情况被中共苏区中央局了解后，立即责令毛泽覃调查处理。毛泽覃来到东

固，首先深入到基本群众中，调查被杀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出身、经历和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做到了心中有数。然后组织群众，在东固区政府召开大会，发动党员和可靠群众，揭发、批判罗焕南的罪行，并当场责令罗焕南检查交代。会后，他亲自释放了那些被无辜关押的党员和群众，向他们讲明党的正确政策，被释放的同志一个个热泪盈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由于对罗焕南的底细没有搞清，上级党委为慎重起见，决定将罗调离，派罗到永丰县潭头区委任书记。罗焕南到新的工作岗位不久，又大肆捕人杀人。潭头共青团区委书记熊桂山召集二十余名区乡干部开会，联名签写揭发报告，并由熊桂山亲自找到特委驻地交给了贺怡。毛泽覃看到揭发罗焕南罪行的报告非常气愤，立即召开特委会议，决定严厉镇压这个钻进革命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毛泽覃因急于去瑞金开会，他派特委组织部部长余泽鸿具体执行这一任务。同年十一月，特委在潭头沙洲召开四千余人参加的审判大会，公开审判并当场处决了罗焕南这个反革命刽子手。毛泽覃从瑞金回来后，还亲自到潭头慰问、抚恤被诬害者的家属。他从罗焕南反革命事件中深深认识到，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关系到党能否取得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大问题。

在以毛泽覃为书记的特委的正确领导下，永吉泰地区的土地革命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革命政权得到健全与巩

固，党的组织、工会和农会都得到发展。地方红军和赤卫队进一步扩大，到一九三一年冬，先后成立了万泰独立团，永丰独立团，公略独立团，万泰县（由万安、泰和各一部组成）成立了八个警卫连，公略县（为纪念黄公略将吉安县改称）成立了六个警卫连。由毛泽覃重点抓的东固，各项工作都搞得非常出色，被评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模范区。

四

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之后，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完全形成。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成立了由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一九三二年一月，刚到瑞金不久的周恩来，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任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顾作霖任宣传部部长。毛泽覃被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秘书处和中央局日常行政事务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注意调查了解情况，对毛泽东一向敬佩和尊重，对毛泽覃也是器重和信任的。一月七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根据闽西发生的肃"社会民主党"扩大化的情况和毛泽覃等提供的打"AB团"扩大化的倾向，决议案批评了"乱打AB团"、"斗争方法不仅是简单化，而且

是恶化了”的错误，随后于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局决定给予原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以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二月十九日苏区中央局发出《致闽粤赣省委并转省代表大会的信》，强调要认真纠正肃“社会民主党”的错误。

毛泽覃不仅在肃反问题上敢于坚持正确原则，而且他对“左”倾的领导者错误地否定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也旗帜鲜明地进行了抵制和反对。早在赣南会议上，他同古柏、邓小平、谢维俊一起，对错误地批判和排斥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公开地表示了反对意见。在随后发生的红军打赣州引起的军事行动方针的争论，毛泽覃从战争实践中懂得了在红军还弱小敌军还强大的情况下，不应该去强攻中心城市，因而他表示了反对打赣州的意见。一九三二年秋，毛泽覃重新担任中共永（丰）公（略）泰（和）中心县委书记，并当选为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十月二十八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重新划分作战地域，将兴（国）永（丰）吉（安）泰（和）列为一个单独作战区，将后方指挥部设于东固、龙冈一带，由周子昆任总指挥，毛泽覃兼政委。毛泽覃仍然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正确方针实施领导，没有执行“左”倾的“积极进攻路线”。毛泽覃同当时担任中共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江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谢维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等同志不谋而

合；他们都坚决拥护并在实际工作中继续贯彻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都对“左”倾领导者推行的冒险主义方针表示了反对意见，因而也都被批判为反对苏区中央局领导。一九三三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等从上海来到江西瑞金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推行“左”倾的错误方针和政策。不久，在福建省委内部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二月，开始在江西省委内部开展了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党内斗争，实际上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者全面否定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强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的斗争。邓、毛、谢、古等同“左”倾领导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左”倾领导者主张夺取中心城市和向交通要道发展；邓、毛、谢、古认为“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应该向广大农村即高山深沟地区、穷乡僻壤和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

第二、“左”倾领导者主张红军打出去，到白区去作战，对反“围剿”作战则主张把敌人挡在根据地以外，批判诱敌深入是“退却逃跑”；邓、毛、谢、古主张红军不应攻打坚固设防的赣州，而应肃清根据地内的“土围子”，巩固根据地，对进攻敌军应实行“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不赞成死拚硬打。

第三、“左”倾领导者脱离实际地提出“扩大百万铁的

红军”，不求质量单纯强调数量去扩大红军武装；邓、毛、谢、古认为，在根据地边缘区扩大红军数量大了是不可能完成的，单纯从数量上扩大地方武装是不妥当的。

第四、“左”倾领导者在“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的口号下，提出向农民借二十万担谷子和号召群众购买大量公债以及无偿退还公债票；邓、毛、谢、古则认为，由于根据地地瘠民穷，连年作战，群众负担太重，主张红军着重“打土豪筹款子”解决给养。

第五、“左”倾领导者在土地革命方针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政策；邓、毛、谢、古一直坚持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

第六、“左”倾领导者讥讽地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歪曲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狭隘的经验主义”；邓、毛、谢、古明确反对这种指责，他们说：“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批评从上海来的博古等领导人为“洋房子先生”。

对此，“左”倾领导者十分恼火，指责邓、毛、谢、古反对中央局的领导，并把他们在相互间谈话和书信来往中所谈对“左”倾的一套作法的不同意见，说成是“反对中央局的活动”，“公开的反党活动”，是“内部已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组织和小集团”，等等。

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五月，“左”倾领导者采取了多种形式对邓、毛、谢、古进行错误的斗争。毛泽覃身处逆境，革命立场毫不动摇。他敢于坚持原则，他能正确对待党内斗争。三月十二日，中共江西省委和少共省委，根据临时中央领导的意图，发表了《关于公布对永公泰工作决议和给会寻安三县委指示信的决议》，指责毛泽覃任书记的永公泰中心县委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同时召开公略（吉安）、万泰两县县委扩大会议，揭发所谓“永、公、泰的单纯防御路线”，说这就是永公泰执行“罗明路线”的主要内容。毛泽覃在受批判过程中，对自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失误作了认真检查，但对错误的指责不畏缩、不回避，继续坚持正确的意见。他针对“左”倾领导者在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排斥大批红军和党政优秀领导干部的种种所为，尖锐地指出：你们这些“洋房子先生”到苏区来到处“找岔子”，不过表明你们是“一派的领袖”并不能代表党，而只是代表派的“派别的首领”。谢唯俊和古柏支持毛泽覃，也发表过与他相同的意见。“左”倾领导者便指责他们“形成一种秘密的结合”，点名责令他们作出检查和申明。五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由临时中央派人直接主持，对邓、毛、谢、古展开进一步批判，并通过决议，勒令他们“立即解散”所谓的“小组织”，提出“要将这一斗争开

展到全体党员中去”。博古当时对江西省委领导人讲，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毛泽覃在受到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不动摇，不放弃原则，在被迫作检查时仍为自己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言行进行申辩，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毛泽覃在回答所谓“小组织行为”的指责时说，那是因为有许多意见“不敢向党提出，仅只秘密地谈论”。因此，这次会议的决议仍指责毛泽覃等只说出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个人的关系，企图掩护他们反党的小组织和政纲，始终是不愿意向党赤裸裸承认的。“对省委的决议和谈话，只是以外交方式来接受。”这次会议最后竟然错误地撤销了毛泽覃在地方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派他到农村劳动，到基层去“改造”。但是，在六月召开的中共万泰县委扩大会议上，下面一些县和区的干部对批判毛泽覃思想不通，发言中公开赞扬“毛泽覃同志政治上很强”，比新任的领导人高明，明确表示对批判邓、毛、谢、古的不满。

一九三三年秋，毛泽覃被调到中共中央局机关工作。他虽然受到“左”倾领导者的排斥和打击，但仍然认真完成党组织给予的任务，遵守纪律，在自己的工作中坚持按照正确方针办事。十月，毛泽覃随毛泽东到兴国县长冈乡调查研究，他住在乡干部谢采标家里，白天和群众一道参加田间劳动，晚上走门串房，和群众促膝谈心，召开座谈会。他每次调查回来，便在昏暗的灯光下翻看材料，归纳

整理，一直工作到深夜。第二天刚蒙蒙亮，他又爬起来和群众一道下田或上山去了。他在这次调查中，为毛泽东写《长冈乡调查》提供了不少好素材。毛泽覃不仅深入做调查研究，并且热情地帮助指导乡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他曾给乡干部们讲中国革命的特点，斗争的形势，红军的战略战术，号召干部们积极做好工作，扩大红军，搞好生产，支援反“围剿”战争。后来长冈乡女共产党员李玉英带头学会犁田，解决了因大部分男青壮年参加红军劳力不足的问题，毛泽覃听说她的先进事迹后特意来到长冈乡进行调查。他亲到田间考察，看到李玉英赶牛犁田的动作很熟练，很稳健，心中非常满意，连声称赞：“好！呱呱叫！”他回到瑞金向毛泽东如实做汇报，毛泽东十分赞赏。在瑞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以中央政府名义奖给长冈乡两头耕牛，奖给李玉英一条蓝色围裙，上边镶着红五星。毛泽覃向来参加会议的李玉英表示热烈祝贺，并在会后亲自将两头耕牛送到长冈乡。乡亲们看见两头逗人喜爱的牛，高兴得赞不绝口，那头大水牛干起活来走得快，耐得久，被群众称为“模范牛”，人们还编山歌赞道：

我们有条模范牛，搞好春耕保丰收，

多打粮食送红军，消灭豪绅乐悠悠。

毛泽覃在中央组织局工作期间，经常参加中央工作团出去完成中心工作的突击任务。但他并不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他善于结合工作的实际，抵制和反对“左”倾的错

误做法。他针对空谈马列词句、脱离革命实际的不良作风，曾明确地讲：如果空谈一顿，随你讲得起花也还是老样子，宣传教育一定要联系到实际工作，讲的要能够马上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转变其工作。他针对“左”倾领导者大搞过火斗争及惩办主义的错误作法，在《下肖区支部流动训练班工作的检查》的文章中指出：把凡是对上面的作法有不同看法或贯彻不力的，一律给予“惩办”，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倾向”，“这种倾向是非常有害的”。他在《为全部完成粮食突击计划而斗争》一文中，更以锐利的笔锋批评了那种企图取消各个组织的工作、一概集中在一个部门之下、一项工作之中，形成一种立三路线时代的“行动委员会”的方式是非常错误的。他在参加瑞金中央突击队进行扩大红军工作时，在一次会议上耐心地教育区乡干部：扩大红军不能用强迫命令，要尽量宣传和解释，一定要使青壮年自动报名自愿参加红军，要帮助参军者解决家里的困难。他还叮嘱，对于红军家属的困难，一定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我们的红军。由于他既采取了正确方法，又完成了扩大红军任务，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的《红色中华》，在“红匾送给瑞金突击队的优胜者”的报道中，点名表扬了毛泽覃，并给予“登光荣红榜”的表彰。

五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长征北上。当时，毛泽覃在中共中央组织局工作，组织局局长李维汉曾问过博古，是否让毛泽覃随军走，作为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不同意。于是，毛泽覃奉命留在原地坚持斗争，担任了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中央军区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送别了大哥毛泽东和大嫂贺子珍，收留了他们远行不便带走的儿子毛毛。不久后，由组织上安排赣南省工会委员长王贤选将毛泽覃怀孕的妻子贺怡及其父母与毛毛疏散转移，乘船至赣州七里隐蔽居住，并从事地下工作。同年冬，红色首都瑞金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被敌人占领和控制，国民党军从四面八方对留下的红军和中央分局等机关实行重重包围和封锁。严峻的形势使毛泽覃清醒地意识到，今后斗争将是极其艰苦、激烈和曲折的，但他坚定地相信，人民革命力量一定会继续发展，眼前的黑暗终将被光明的未来所代替，他勇敢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红军部队，只有独立第二十四师和刚组建不久的三个独立团。毛泽覃任师长的独立师，实际上并未来得及组建师指挥机关，而是直接指挥各独立团作战。十一月下旬，中央军区

为了迟滞敌人前进，争取时间，策应红军主力在湘西胜利展开，决定放弃阵地防御，采取运动战集中兵力打击敌军。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覃指挥各独立团协助红二十四师，在瑞金县谢坊湾塘岗伏击，一举歼敌东路第三师冒进的半个旅，击溃其半个旅。在这次战斗中，毛泽覃直接指挥的部队，在谢坊游击队配合下，当场击毙敌军团长一名，毙伤敌军一百多人，缴枪一百余支。然而，由于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中央军区主要领导人项英不从实际出发，仍然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命令红军部队进行消极防御的阻击战，致使数量很少的红军不断受到损失。特别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红二十四师同独立三团、独立十一团进攻驻守赣县牛岭敌军，遭到严重的失败。至此，留在根据地的红军兵力已折损过半，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和部队，被敌军十二个师包围在于都县仁凤山区西江、宽田、黄龙（今黄麟）等狭长地带。

一九三五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多次开会讨论行动方针，毛泽覃参加了会议。会议最后决定，同时得到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后发来的指示，中央分局等机关人员分到各地各部队中，分散开展游击战争。毛泽覃被派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以加强福建省委的领导。在农历正月元宵节的前几天，毛泽覃带领一百余人的小部队，经过黄龙井塘村，转向福建方向突围。在日夜艰苦转战的行

军途中，毛泽覃经常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要大家坚定立场，增强信心，继续战斗，渡过难关。一次，他率领队伍在山区同一支地方游击队相遇，便要他们坐下来休息，亲切地对他们说：打游击不要慌张，立场要坚定，斗争要灵活，遇着敌人要摸清虚实，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覃自己就是这样机动灵活地指挥小部队，转到福建长汀的四都，同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福建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率领的机关部队会合的。当时福建省党政机关和部队被敌军围困于四都山上狭小的圈子里，处境十分危险。毛泽覃建议："放弃四都，将部队编成几个支队，四出袭击敌人，领导中心退到闽粤赣边深山中去。"省委书记万永诚拒绝了这个正确建议，仍然命令部队埋伏山头，等待敌人进攻，企图打个歼灭战扭转不利形势。不久，敌军大举进攻，毛泽覃等指挥部队顽强抗击，终因兵力薄弱被敌军打散。毛泽覃找到省委和军区主要领导人，他对省委书记真诚恳切地说："永诚同志，你带同志们突围，我在后边掩护。"万永诚注视着忠诚、坚定、毫不顾己的毛泽覃，紧握他的双手，眼泪夺眶而出，说了声："请多保重！"便同司令员龙腾云率大部分队伍向东突围。

毛泽覃率领部分队伍担任掩护，经过与敌军激烈战斗，终于掩护万永诚等突围转移至梅子坝山中。然后，他带部队向西突围转至田心一带。四月十日晚，万永诚、龙腾云率部在梅子坝山中被敌军一团兵力包围，部队被打

散，万永诚和龙腾云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毛泽覃立即继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闽粤军区司令员。他迅速收集起一部分被打散的干部战士，摆脱尾追的敌人，经过艰苦转战，来到长汀和瑞金边界的一片大山之中。这里山高林密，寒风呼啸。毛泽覃身边只有十几个战士。严峻的考验摆在面前，敌人“象梳辫子一样”地搜山，而他带领十几个战士在山里到处打圈圈，找不到吃的东西。为摆脱险境，毛泽覃派三个战士去找老乡，设法买点吃的。三个战士找到一个老乡住处，可是没有人，他们便拿走一些芋头和蔬菜，留下一些钱放在菜地里。毛泽覃和战士们一起烧芋头吃，吃得很香。作为领导者的毛泽覃，他在思考如何把斗争坚持下去，他想设法同中央分局领导的队伍会合。他揣摩着战士们的情绪，在晚间露宿山崖时，问大家：目前形势十分严重，今后该怎么办？战士们表示要继续坚持斗争。他深情地说：对！目前严重的形势只是暂时现象，国民党反动派注定要灭亡，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大家一定要看到光明的前途，经受住困难的考验，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战斗到底。在毛泽覃的鼓舞和带动下，战士们继续跟着他坚持战斗。一天，他们转移到另一地方，找到一个单家独户的老乡。这家老乡看到是红军来了，就象见到亲人一样，把仅有的一头小猪送给了战士们。那位老乡牵着猪，领着战士们钻进茅草棚里把猪杀了，然后在他家煮熟，请战士们饱食了一顿。毛泽覃很受感动，他给老乡一

叠银元，作为报酬。饭后，老乡又领毛泽覃等到一个叫跌死猫的高崖上隐蔽休息。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覃率这支小游击队穿山越岭，跳涧涉溪，来到瑞金县黄膳口附近名叫“红林”的大山中。傍晚，他们来到山上一座小村黄田坑，找到一位只有父子俩的老乡家。老乡家里很穷，被国民党兵多次抢掠，但仍尽力弄了一餐晚饭给他们吃。饭后，老汉又叫儿子送他们到山顶一个纸槽小屋过夜。毛泽覃和战士们在这个僻静的地方休息，商量着如何冲出敌人的包围，找到中央分局的队伍。深夜，毛泽覃把一个姓杨的战士叫到跟前，对他说：你到杉背坑去找陶古游击队，请他们明天到这儿来，一起打国民党的黎子岗炮楼，我们好从那儿冲出去。姓杨的战士走后，毛泽覃躺在干软的稻草上，静听着四处的动静，思索着明天的战斗方案。二十六日凌晨，他又叫醒一个姓何的战士，派他到山下村子边侦察一下，发现情况立即回来报告。姓何的战士胆怯害怕，走不多远就钻进茅草丛里睡觉。这时，国民党军毛炳文的二十四师一个排长带兵路过，偶然发现姓何的战士。这个贪生怕死的家伙不仅没有鸣枪报警，反而叛变投敌，供出山上纸槽小屋有红军十几人枪，还有一个姓毛的师长。敌人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派一个排带着机枪，很快包围了纸槽小屋。毛泽覃听到枪声，立即机警地冲到左边门口，命令战士们突围，由他担任掩护。当部分战士冲出后，毛泽覃正要冲

出，忽然一个国民党兵端着枪猫着腰窜进屋里来，他举手扣动扳机，敌兵应声倒地。不料这时又一个敌兵绕到后门，朝毛泽覃开了一枪，子弹打进了他的胸膛。

英勇无畏的红军优秀指挥员毛泽覃壮烈牺牲了！他为了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无私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时年仅三十岁。毛泽覃牺牲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还有共产党员党证。这照片和党证上沾满烈士的鲜血，素白的粗纸，透出一片殷红。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为纪念烈士，把毛泽覃牺牲的地方改名泽覃公社（现称乡）、泽覃大队。前几年，人们在纸槽小屋前的草丛深处捡到一枚红星奖章，那染着血迹的红星，是毛泽覃烈士光辉一生的象征。毛泽覃的英名就象一颗闪闪的红星，将永远在人民军队光荣史册上放射光芒。

（王 健 英）



邓 乾 元



邓　乾　元

一

邓乾元（1904–1934），字兴坤，化名董清，一九〇四年五月生于湖南省溆浦县新坪乡车头村。邓乾元的父亲邓绍燕，别号迎丰，略识文字，精明能干；其母为一农家妇女，为人淳厚朴实，善施乐助，为乡邻所称道。他家以种田为主，亦农亦商，开一爿“迎丰商号”，常年磨豆腐，兼营小本生意。由于经营有方，渐渐发迹，二十年代初，已有田地三十余亩，成了一个小康之家。邓绍燕有三子，邓乾元居大，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父母对他寄望甚厚。

一九二二年秋，邓乾元从溆浦二区高级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常德隽德中学。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办的基督教教会学校，对学生管教极严，一律不准参加校外的一切社会活动。邓乾元学习勤奋，对英语很感兴趣，特别舍得下功夫，憧憬着将来当一名出色的翻译。学了不到两年，他就能口译笔译，堪称全校的高材生。

常德是湘西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湘西的革命摇

篮。一九二二年，这里就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学生爱国运动从此蓬勃地开展起来。一九二三年上学期，邓乾元在旅常读书的溆浦籍团员同学的帮助和启发下，冲破学校当局的重重阻挠，应邀参加了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团组织主持成立的宣传队，以演话剧的形式，向贫苦群众和青年学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基督教的革命宣传。他中等身材，长得眉清目秀，红润的脸上透出一股英气，戴一副咖啡色眼镜，显得文雅大方，风姿俊逸，且又思路敏捷，能歌善舞，能说会道。他的演技甚佳，常常扮演女主角，演得惟妙惟肖，活龙活现，深得观众和同学的好评。他和其他同学还自编自演了一些节目，把千疮百孔的旧中国的现实和帝国主义欺侮、凌辱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揭露无遗，以此激发广大民众为拯救中华而奋起抗争的民族精神。这期间，他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及其他进步书刊，逐渐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是紧密相联的，不改变军阀混战、列强横行、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局面，不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自己的美好愿望终将化为泡影。在斗争实践中，他从一个一心想当翻译的书生，变成一个热心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立志投身于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

一九二四年夏，邓乾元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委为隽德中学团支部书记。这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常德特委作出一项决定：为了更加有力地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必须在下学期开学之前瓦解隽德中学，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邓乾元。隽德中学是美帝国主义者苦心经营多年的反动据点，要摧毁它，谈何容易！而邓乾元二话没说，满口答应。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与学校团支部的同志们一道，利用暑假期间学校教师大都回家度假的有利时机，日夜奔走于同学家中，做同学及家长的思想工作。他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揭露帝国主义者利用教堂和教会学校等工具，疯狂地进行文化侵略以及麻痹、毒害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为了解除同学的失学之忧，他又以常德学生联合会的名义，请省学联出面，把退出隽德中学的学生全部转到其它学校去。邓乾元的爱国行动，使许多学生和家长深受感动。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努力，隽德中学这个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的顽固堡垒，终于土崩瓦解了。

随后，邓乾元转入湖南省立高等工业学校（湖南大学前身）学习。不久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选为省学联负责人之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以后，常德的国民党右派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青年学生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在青年学生中，受中共影响的进步学生与反动学生之间的矛盾也异常尖锐，这集中表现在争夺对常德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权问题上。这种斗争，又以省立常德第二师范尤为突出。该校的

反动学生，自从在一次学联代表大会上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争夺学联领导权失败以后，经常采用打架斗殴等手段，丧心病狂地破坏青年团的组织及其对学联的领导，双方的斗争日趋白热化。一九二六年三月的一天晚上，省立常德二师国民党右派的一伙爪牙，趁该校青年团支部秘密开会之际，手持刀棒，闯入会场，打伤并抓走了四位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同学。在反动校长张伯良的操纵和策划下，四位同学被送到常德地方法院关押，蓄意制造了震惊全省的“二师事件”。

事发之后，学校当局又借故开除了滕代远等三十多名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及一批进步学生的学籍。接着，常德地方法院电告省长叶开鑫，说被他们关押的四位学生是“过激党”、“聚众闹事”、“伤害人命”。反动省长叶开鑫复电：就地处决。与此同时，常德共青团组织以常德学联的名义派代表赴长沙请愿。中共湖南区委闻讯后，立即派邓乾元以省学联和济难会的名义出面，前往常德进行营救。情况危急，刻不容缓。邓乾元到常德后，不避艰险，奔走呼号，搞演讲，发传单，揭露敌人的阴谋，造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迫使法院不敢轻率判决，驻军亦不敢贸然行动。时值北伐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常德的反动统治者慌恐不安，迫不及待地强迫法院对四位学生作出极刑处置。为了争取时间，邓乾元废寝忘食地与党团员们商量对策，研究营救方法。他们商定，请律师出庭辩

护。可是，对于这样一件生命攸关的案子，地方上那些挂牌的律师都不敢接手，唯恐引火烧身，招致祸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出庭辩护的姚律师，他却提出必须先交二百元大洋，否则不出庭。为了把四位革命学生尽快救出虎口，邓乾元四处奔波，辗转往返于常德与长沙之间，终于凑足了这笔钱，如数交给姚律师。姚律师根据当时的法律条文和案情，对法官强加在四位同学头上的罪名一一予以辩驳，弄得法官哑口无言，尴尬不堪。在众目睽睽之下，法官情知理屈词穷，只好暂缓判决。是年八月，北伐军攻克长沙，贺龙率师逼近常德，政治形势为之一变。常德国民党驻军师长贺耀祖迫于形势，看风使舵，表示同情被捕的四位学生；法官见势不妙，也顺水推舟，只好宣布将被囚四个多月的四名革命学生无罪释放。这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终于以革命者的胜利而告结束。

邓乾元十分注意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斗争。一九二六年初，他在长沙邀集四百多名旅省溆浦籍学生组织了"溆浦学友会"，以学友会的名义把他们团结在中共周围，引导他们参加变革社会的革命斗争，他被推选为总务主任（即会长）。与此同时，他还以"非基督教大同盟"宣传委员和学友会筹备员的身份，领导溆浦学友会会员一并加入了反帝组织"非基督教大同盟"，并代表学友会撰写了《本会加入非基督教大同盟宣言》，刊载于溆浦学友会主办的《溆浦月刊》第一期之首，把帝国主义利用传教、办

学等手段残酷地毒害和摧残中国人民的卑劣行径揭露得淋漓尽致。他写道：“最狡猾最残暴之帝国主义者即利用其先锋队侦察系——基督教，插足其间，以自由实行其反革命之奴隶教育，既假借名流，恐吓官吏，以遂其武断乡曲、包揽词讼之兽欲；复罗致娼妓，利用金钱以成其引诱良民、收买教徒之目的……对此民族革命前途之障碍物，禁止爱国之帝国主义的宣传品，自不能不奋全力排诸于太平洋之外。”他号召广大群众一律加入非基督教大同盟，掀起“反基督教大运动”，“驱彼伧奴”；对于那些“奉迎洋人，狼狈为奸以欺吾父兄，以残我兄弟姐妹者，誓与溆民共诛之”。他还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现状和当时青年学生苦闷、彷徨的思想状况，写了《解决“前途茫茫”的两条汽车路》一文，明确地提出了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才能拯救濒临危亡的祖国，中国人民才能从受剥削受压迫的绝境中解放出来，知识分子才有光明的前途。他写道：“学生的使命是要替社会谋利益的，单只为解决个人生活而求学的人，便不是真的学生，是人类的米虫。”“学生最宜注意的就是看社会上需要什么，然后给他们找起来，才是学生应尽的责任。那么，现在社会到底需要什么呢？若果我们放眼一看，便可见整千整万的饥民正在惨风凄雨中嗷嗷待哺。再看乡村中不知觉的极困苦极可怜的农民，虽日夜不辍的耕作，也是朝不保夕的，所以妻离子散。更有工厂里一日做近二十点钟工作的工人，等

到血汗出尽，便被驱出工厂以外，绝不会有人顾恤的。”“中国处此半殖民地位，事事被外国人奴视，而我国的军阀，由是甘心受人指挥，干他继续不断的压民政策，‘二七’、‘五卅’便是两个实例。由以上种种的情形看来，我们纵少已经看见社会上的需要是打不平了。”“到底怎样才能使经济问题解决呢？据我的意思，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条路。”他的精辟论断，象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块巨石激起层层涟漪一样，打动了青年学生的心，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是年暑假期间，旅省的溆浦学生和党、团员纷纷回县，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开展农民运动。沉静的山乡沸腾了！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觉醒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天主堂！”等口号震撼大地。随即，天主堂被捣毁，神甫被赶走，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的革命烈火迅速燃遍溆浦城乡。

一九二六年冬，邓乾元与刘英等一道赴武昌中共两湖党校学习。结业后他又回到长沙，由湖南区委派往汉寿，以省委特派员和中共汉寿特支书记的双重身份，负责筹建中共汉寿县委，指导以农运为中心的各项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一月，以詹乐贫为书记的中共汉寿县委和县总工会、农民协会相继成立，邓乾元继续以省委特派员及特支书记的身份指导汉寿县委的工作。四月，詹乐贫出任常（德）桃（源）汉（寿）沅（江）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邓乾元继任汉寿县委书记。

为了迅速打开全县工作的局面，邓乾元经常与詹乐贫、帅孟奇等县委负责人开会研究，他们决定从加强党的领导入手，调整和充实县委及革命团体的领导班子；县委成员中原在其他组织兼任职务的，一律退出，专抓党的工作；县总工会和县农协主要负责人兼有双重职务的，也只任一种职务，集中精力专抓本职工作；工作不力或力量薄弱的，则予以调换和充实。这样，各个领导成员任务明确，精力集中，既分工，又协作，大家拧成一股绳。在以他为首的县委领导下，党团组织及工会、农协等各种群众团体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以农民协会的发展最快，遍布全县各个角落，斗争土豪劣绅，阻止粮食出境，不准打牌赌博，扫除封建迷信，减租退押，清理公产，封仓平粜，严防盗匪及禁吸鸦片等活动，在全县城乡普遍地开展起来，农村大革命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农运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与此同时在城镇建立了工人纠察队。新建的工农武装先后打垮了鸭子港团防局和镇龙庵团防局，赶走了反动的县团防局长，缴获长、短枪一百多支，还制造了上千把梭镖、大刀。经过半年的斗争，工人纠察队发展到三百多人，农民自卫军多达四五千人，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到处呈现出一派蓬蓬勃勃的革命景象。

在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中，邓乾元时刻不忘把群众的利益挂在心上。他一面领导全县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

动，从政治上引导广大农民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斗争；一面带领全县各阶层的人民群众从事经济建设，兴修水利，造福人民。

汉寿县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大乡。东乡北乡为地形较高的河床地带，每逢汛期，河水倒灌，把西、南乡的十余万亩良田淹成一片汪洋，给数十万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西、南两乡的农民早就有修筑沧港驿护堤的打算，并筹集了部分资金，只因遭到东、北乡以郭尔豪为首的反动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加之群龙无首，筑堤工程迟迟不能动工。邓乾元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当即召集县委会议，研究筑堤的有关事宜，决定修筑沧港驿护堤。在县委的领导下，筑堤工程很快动工了。然而，阶级敌人贼心不死。郭尔豪纠集在农运中被镇压的大恶霸梅梦侨的干儿子、土匪头子马绍武等土豪劣绅，在东、北乡的洲口、毛家铺一带，大肆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一天，县委委员杨明带领十多个农民自卫队员前往东北乡巡视工作，途经郭家渡时，郭尔豪竟唆使一些人将农民自卫队员的十几支枪尽数缴去。邓乾元闻悉后，立即派西南乡农运特派员姚靖国与民警队长前往处理，他叮嘱道："此事情况复杂，关系重大，肯定有反革命分子从中捣鬼。你要依靠群众，多做思想工作，妥善处理这一事件。"当姚靖国赶到郭家渡时，有人竟逼迫他炸毁沧港驿护堤，否则就要杀死他。在当地农协骨干的帮助下，姚靖国经过耐心的说服教育，终

于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如数取回了枪支。但由于郭尔豪等人没有受到严厉打击，反动气焰更是甚嚣尘上。一天，他们打着“炮轰沧港驿护堤，保护东北乡堤垸”的口号，公然煽动千余不明真相的农民，图谋围攻县城，杀害县委负责人，妄图把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压下去。这一情况，引起了邓乾元的高度注意。他考虑到这一事端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挑起的，如果处理不当，不仅达不到惩罚坏人的目的，还会使一些无辜的群众受到伤害；一旦护堤被炸毁，不仅西、南乡的农民将会遭受巨大的灾难,而且还将导致东、北乡与西、南乡农民之间的矛盾激化，对革命、对人民都是不利的。事不宜迟，他当即派人前往劝阻，说明修堤的好处，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平息这一事端。可是，郭尔豪等人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竟于当晚驱使千余农民手持武器攻打县城。剑拔弩张，情况危急，眼看一场无谓的流血事件就要发生。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邓乾元沉着冷静，一面与县委其他同志率领城内的全部工农武装固守城池，严阵以待，以防万一；一面组织人员对外喊话，揭露敌人阴谋，劝告受蒙蔽的农民兄弟速速回去。一些农民在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渐渐离去，有的却在郭尔豪等人的操纵下，继续蜂拥而上。在这种情况下，邓乾元当机立断，命令农民自卫队员朝天鸣枪警告。郭尔豪等人听到枪声，吓得魂不附体，抱头鼠窜。流血事件避免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从此，修堤工程顺利

进行，一座造福人类的沧港驿护堤矗立在洞庭湖畔。同时，县委还领导人民修复了鸭子港的大障废垸，流落他乡的数万灾民喜气洋洋地重返家园，安居乐业。修堤复垸，象一座不朽的丰碑，铭刻着邓乾元的功绩，巍然屹立在汉寿人民的心中。

一九二七年五月，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汉寿县委与省委的联系随之中断。继而谣言四起，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邓乾元当即召开县委会议，研究应变措施，决定：全体党员和干部立即下乡，发动群众，坚持斗争；詹乐贫等率领工农武装撤往笑腾港、云台山一带，加紧扩大农民自卫军，开展武装斗争；帅孟奇去武汉与中央取得联系；他自己赴长沙，打听省委的消息。各项工作安排停当以后，他匆匆离开汉寿，踏上了新的征途。

二

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邓乾元扮成商人，来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长沙。他不知费了多少周折，经历了多少艰险，才找到了中共湖南省委。他被安排在省委组织部，负责全省地下党、团组织的秘密联络工作。尽管这里的环境异常险恶，他却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为党的事业顽强地战斗着。

马日事变后，湖南各地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衡阳女师共青团员董彩云、董彩霞姐妹因被反动当局通缉而辗转到长沙，接上了组织关系。随后，董彩云被分配到省委组织部，与邓乾元一道工作。他们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相互之间产生了纯真的爱情。不久，这一对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结成了革命伴侣。

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湖南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派邓乾元夫妇赴株洲、醴陵、萍乡、安源一带，组织工农武装斗争，发动秋收起义。翌年夏，董彩云在株洲工作时不幸被捕，解到衡山监狱关押，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她临产前夕，反动当局才允其亲属保出分娩。董彩云出狱两天后，生下一男孩。邓乾元曾与董彩云在临别时嘱咐说：“今后我俩可能很难见面了，也许只有梦中相见。你生下的不管是儿是女，叫‘梦莲’好了，愿他（她）象莲花那样纯洁无瑕，出于污泥而不染。”所以将这孩子取名梦莲。随后，董彩云逃亡他乡，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几年以后，因贫病交加，离开人间。邓乾元与儿子梦莲始终未曾见过一面。解放前夕，梦莲已成长为一个英俊彪悍的小伙子。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安新邵溆边区游击

队，走上了革命道路。

为了组织和部署湘赣两省的秋收起义，毛泽东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回到长沙，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会上讨论了秋收起义的有关问题，制定了起义计划，确定长沙周围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安源、岳阳等县于九月十一日同时起义，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同时指派邓乾元为中共醴陵县委书记。

九月初，邓乾元参加了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上部署了秋收起义，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第二团由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和党掌握的部分矿警队及萍乡、醴陵、安源、莲花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王新亚任团长，邓乾元兼政委。会上还指定二团自安源一带出发，经东门市进攻萍乡、醴陵，向浏阳前进，然后逼近长沙。

会后，邓乾元回到醴陵，立即决定在西一区雷钵山召开区委书记及各区、乡农运特派员会议，传达省委决定，部署秋收起义。由于开会通知被交通员不慎丢失，只得改为个别传达。但是，这时的醴陵，革命运动正处于低潮，要在短时间内组织武装起义，绝非易事。马日事变后，许克祥反动部队窜到醴陵，“大杀特杀，杀得醴陵成了一个血县，比较革命的人及家庭，无一免于难者，死者一千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工农革命团体被封闭，党的组织遭

到极其严重的摧残。然而，邓乾元并未因此而退缩。他紧紧依靠原有的五百多名共产党员，深入群众，秘密串连，层层发动，很快发展了六百多名新党员，全县有十三个区先后恢复、建立了党团组织和农民武装。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指示传达后，各区乡立即着手筹集武器，侦察敌情，部署武装力量，仅几天时间，就搜集到梭镖七百多支，驳壳枪七支，步枪三十多支，机枪一挺。与此同时，他们摸清了敌军在醴陵的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的情况；他们还派人深入敌巢，进行策反，争取到敌警备队在起义时保持中立。为了配合工农革命军合攻醴陵县城，他们还组织了二百余名共产党员和武装农民，做好了攻城的各项准备，并计划于部队攻城时劫狱，组织出狱的同志参加战斗。

九月九日晚，城区工作的同志秘密处决了马日事变后在醴陵疯狂清乡的刽子手、清乡委员彭成美，陈尸于渌江桥上，从而拉开了秋收起义的序幕。翌日清晨，消息传开，全城轰动。这天巧逢中秋节，群众高兴得拍手称道："打虎过中秋，胜过吃鱼肉！"

十一日晚上八时许，全县四乡农村掀起总起义。含悲忍愤的人民群众揭竿而聚，奋起暴动，杀土豪，毙劣绅，围剿团防武装，攻打反动驻军，势如破竹，锐不可当。有个同志见此情景，兴奋不已，挥笔在半山亭的石壁上书写了一首激情奔放的诗，其中写道："半山亭，半山亭，半山亭下出英雄；工农起来坐天下，打倒土豪享太平！"

十二日下午，农民武装紧密配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向守城顽敌发起猛烈进攻，一举攻克醴陵城。当天晚上，邓乾元与县委其他领导人同部队一道，着手建立红色政权——“中国革命委员会湘南醴陵分会”。紧接着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公布了有关政策和军队纪律，号召市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秩序。成立了公开的工、农、商、青、妇革命群众组织。县农协及时发出通令：恢复各级农协组织，征调武装农民保卫县城。县总工会召开各行业工会联席会议，决定重新建立工人纠察队。同时还成立了宣传队和慰劳队，广泛宣传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慰劳工农革命军，散发县革命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土地革命和反对国民党的行动大纲，张贴号召革命的标语。一时，“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建立革命委员会！”“暴动！农民夺取土地！”“暴动胜利万岁！”等标语口号，贴满全城，蔚为壮观，到处是热气腾腾的场面，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们！昔日死气沉沉的醴陵，经过这一番革命的洗礼，气氛全变了！

秋收起义极大地震惊了湘赣两省的反动派。工农革命军攻克醴陵后，湖南省反动当局急忙派重兵分四路前往镇压，致使湖南的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遭到破坏。

邓乾元不愧为一个勇敢无畏的革命者。面对反动派的疯狂屠杀，他满怀悲愤，“在醴陵整整默守五天”，期待着各地暴动的佳音，准备重整旗鼓，迎接更大的革命风暴的

到来。他对那些贪生怕死、蜕化变质的投机分子极其厌恶、痛恨。他在《对于醴陵暴动经过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马日事变后，党内分化最明显，投机分子及没斗争性的小资产阶级，实有清除的必要，不然党会腐化变成为国民党同样的东西。现在应即定出清党条例，毫不客气地洗去无用的分子。"

秋收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锻炼了党和人民，重新唤起了人民的革命热情，使党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断然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转移，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开辟新的革命道路。

一九二八年春，邓乾元离开醴陵不久，中共湖南省委派他到井冈山工作。他的气质、人品和才学深得毛泽东的赏识，被任命为前敌委员会秘书长。在毛泽东身边，他更加勤于思考，发奋工作，思想水平、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得到进一步升华。同年十二月，湘赣边界特委改组，组成了以邓乾元为书记，滕代远、陈正人、宛希先、朱昌偕为常委的湘赣边界特委。邓乾元担任边界特委书记期间，正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向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转变时期，也是湘赣边界特委开展活动最困难的时期。在这段艰难的岁月

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和超人的胆略，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领导和发动边界军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使其发展成为湘赣革命根据地，协助毛泽东寻求和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出生入死，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恐惧和仇视。邓乾元担任特委书记以后不久，一九二九年一月初，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达到其彻底摧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消灭红军的罪恶目的，纠集湘赣两省十八个团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会剿”。

为了粉碎敌人的“会剿”，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开辟和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在宁冈柏露主持召开了前委、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及各县县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赣南进军，以调动进攻井冈山之敌，达到“围魏救赵”的目的；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在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下坚守井冈山，领导和发动根据地军民作好反“会剿”斗争的准备工作，以便打破敌人的“会剿”，巩固边界政权。

一月十三日，红四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率领下离开井冈山。这时，敌我力量更加悬殊了。邓乾元作为留守井冈山的主要领导人，深感肩负责任的重大。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的第二天，他就召集边界特委和红五军

负责人在下庄开会，具体研究如何坚守井冈山、巩固根据地的问题。会议通过对紧迫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分析，认为，虽然这次“会剿”之敌兵力和武器装备都占绝对优势，五井有被攻破的可能，但敌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各自为了保存实力，互不协调，加之敌人远道而来，人生地疏，补给困难。我们留守井冈山的正规红军人数虽少，但经过训练，战斗力已有明显提高，地方武装也已组织起来，加上有各县赤卫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可以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只要全体军民团结一心，守住井冈山是有希望的。因此，决定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提出“一切为了保卫井冈山”的口号，积极组织军民在五大哨口修筑工事，布设竹钉，严阵以待；另一方面，如果五井被敌人攻破，在军事上，红五军应冲出五井，取道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再往赣南与红四军联络；各县地方武装则应尽可能地坚持在本地开展游击战争；党组织方面，特委及各县县委均留在边界，领导地方武装和群众坚持斗争。

会后，大家立即分头投入了紧张的备战工作。在特委的领导下，全体军民齐动员，早上操练，上午挖工事，下午下山挑粮，晚上削竹钉。经过几天夜以继日的紧张努力，粮食备足了，工事修好了，五大哨口周围构成了一道几十里长的竹钉防线。

一月二十五日，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第三次“会剿”开始了。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及地方武装同仇敌忾，凭借各处天险，英勇顽强地抗击着进犯之敌，炮声隆隆，杀声震天，激战三昼夜，最后，终因敌众我寡，黄洋界、八面山等阵地被敌人攻破。敌人占领井冈山后，采取了极其阴险恶毒的手法，软硬兼施，一方面用自首的政策引诱和欺骗党内外的不坚定分子反水；另一方面，则采取残酷的烧杀政策，狂叫：“石头过刀，茅草过火，人要换种”，到处搜捕湘赣根据地的党政领导人，疯狂地进行烧杀掳掠，将大小五井、茨坪、九陇、大亚山等处的房屋焚烧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只得撤离井冈山。特委人员在随红五军撤退到遂川边境时，被敌人冲散。邓乾元被迫转移到酃县大院，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在湘赣两省敌军的“会剿”中，不仅特委本身被冲散，而且有的县委也完全被破坏，党员有的被捕，有的被杀，有的叛变，只剩下二千人左右，整个党的组织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但是，反动派的残酷和屠杀吓不倒英勇的共产党人。四月，邓乾元满怀悲愤，冒着腥风血雨，毅然返回边界，继续领导湘赣边界军民进行斗争。

邓乾元回到根据地之后，立即与陈正人、朱昌偕、宛希先等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原特委恢复工作，着手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地深入地宣传发动群众

和组织群众，加紧领导群众做日常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工作”；同时决定从各县抽调部分地方武装，成立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由特委直接指挥，以便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尽快收复失地。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成立后，立即兵分两路，在边界各县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各县赤卫队的配合下，打垮了各县的保安队和挨户团等反动武装，粉碎了茶（陵）永（新）酃（县）宁（冈）四县联军对九陇山军事根据地的“会剿”，先后收复了宁冈、莲花等县，打开了边界大部分地区的工作局面，促进了边界形势的迅速好转。

邓乾元身先士卒，积极带领特委全体常委分别深入各县，帮助整顿各级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洗刷一切投机动摇分子。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过程中，根据边界文化落后、工人很少、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着重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自觉性；一方面严密党的组织，认真执行党的章程，对不按党章参加支部会议、不缴纳党费及不努力工作者进行严格清洗。这样，不仅纯洁和巩固了党的组织，而且使边界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壮大，党的战斗力也大大提高了。在以邓乾元为首的特委的领导下，边界各县相继建立了党的领导机关，到一九二九年八月，永新、莲花、宁冈、酃县、遂川、茶陵等县都相继成立县委或临

时县委　区委、特别区委，党员发展到五千人左右。这不仅为整个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领导骨干，而且为以后湘赣省委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邓乾元先后几次以特委的名义指示各级党组织：赤卫队集中指挥，以打击分散之敌；“尽可能地武装赤色区域的群众”，领导他们开展游击战争，并尽量进行黑夜游击，扰乱敌人，使其不能驻扎。同时他还采取了一些灵活的策略，能够灰色的区域，在不失掉群众的原则下允许其尽量灰色；不能灰色的区域尽量武装，积极备战，准备敌人搜山时四面打击敌人。虽然敌人乘根据地兵力空虚之机占据了边界大部分地区，但邓乾元总是临危不惧，领导边界军民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顽强地坚持斗争，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逐步地恢复和发展了边界各县的红色政权。边界特委所辖七县，除攸县外，永新、宁冈都有公开的苏维埃政权存在；莲花、茶陵、酃县、遂川有公开的割据区域；永新还有秘密的苏维埃政权。湘赣边界在没有正规红军的情况下，经过艰苦奋战，先后收复了井冈山、九陇山两个重要军事根据地。地方武装在斗争中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一九二九年八月，除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的四百多人枪编入红五军之外，边界各县的地方武装还拥有七百余支枪。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这批地方武装后来成了红六军团诞生的基础。

红五军奉前委命令重返湘赣边界，边界的力量顿增。为了加强和壮大主力红军，有利于革命斗争，特委将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编入红五军。为了重新布置边界的全盘工作，改变边界的工作方式，边界特委与红五军共同担负恢复边界政权的重大任务。邓乾元在宁冈古城文昌宫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全面分析了边界的政治、军事、土地问题及特委本身的工作，讨论了前委给特委的信，根据东固根据地的经验和边界斗争的实际，决定对边界的工作采取由公开割据转为秘密割据的方式；对地方武装采取集中统一指挥和分散游击的战略战术；制定了游击工作大纲，规定了游击政策，划分了游击工作区域；并根据客观形势和实际斗争的需要，决定把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由宁冈转到永新，从此大力经营永新。以邓乾元为首的边界特委，为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制定的行动纲领，具体体现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建立湘赣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会议作出的集兵政策，不仅适应当时的时局，而且充分再现了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在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中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会上制订的游击工作大纲及划分的游击区域，解决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必须具有坚实牢固的中心区域作为斗争的依托，并将这个问题从理论的角度变成具体的条文付诸实施，从而统一了党内对这

一问题的认识，对根据地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次会议作出的建立以永新为政治区域指挥中心的决定，是邓乾元等通过对边界的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之后，为适应这种形势和长期革命斗争的需要所作出的重要而明智的决策，解决了湘赣边界特委当时面临的根据地的中心放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并且得到了中共江西省委的认定，为以后湘赣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得以不断发展创造了条件。在邓乾元主持下湘赣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所做出的建设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充分显示了邓乾元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

这次湘赣边界特委执委扩大会议刚刚结束，由于敌人继续进攻，特委命令红五军退往酃县牵制敌人，使敌人疲于奔命，然后待机歼灭之，再迁回永新。但红五军退至酃县时，闻悉遂川、茶陵均有敌军前来堵截，遂向湘南转移，使边界的武装力量受到削弱。待红五军返回边界时，邓乾元又在永新召开特委和红五军联席会议。为了使永新和莲花之敌更加孤立，同时解决给养问题，决定红五军开往安福一带活动，筹集粮款，扫除永新外围之敌，开辟新的根据地。不久，盘踞在根据地的敌军主力基本上被驱逐出境，武装割据区域有了新的发展。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邓乾元领导湘赣边界军民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牵制和打击了大量的敌人，为红四军主力顺利地进入赣南，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使其

发展成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战略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策应和配合的作用。

一九二九年八月，邓乾元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途经汉口时，向湖南省委写了《湘赣边界工作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界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等情况和经验教训，为湖南省委于同年九月六日作出的《湖南省委关于湘赣边界工作决议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在报告中，根据湘赣边界党的现状，就如何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提出了鲜明的、很有见地的看法。他指出："如欲改造边界党走向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其基本工作有两项：第一是加强党的无产阶级之意识领导，……第二是要严密党的组织，认真执行列宁党的章程，不按选举程序参加支部会议、不交纳党费及不努力工作者，应严格清洗。"这些见解，是很有意义的。

三

一九二九年十月，邓乾元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与柯庆施、石仲伟一道，风尘仆仆地奔赴鄂西，寻找宜昌起义的部队，将该部编为工农红军第七军，由他们三人组成该军前敌委员会，负责七军的军事行动。但到宜昌后，由于当地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无法联系，又找不到起义部

队，只得返回汉口，请示中央军委。军委复电改派以柯庆施为书记，邓乾元、石仲伟为委员，组成武汉军委，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领导湖北、湘北、豫南地区的军事组织工作，开展游击斗争。

武汉军委成立不久，即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秘密交通站设在武昌北郊的一所小学里，共产党员赵品三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负责党的通讯联络工作。十一月的一天，赵品三同程子华在汉口的一个旅馆里会见柯庆施、邓乾元、石仲伟等人。程子华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军独立十五旅任排长，全旅有三十多名共产党员，他是负责人。程子华汇报说，独立十五旅奉命将开往大冶、阳新一带去打红军，他们准备趁机在大冶举行兵暴，组织前线起义。柯、邓、石听了，立即表示完全赞成，并决定派石仲伟回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和请示兵暴的有关问题；邓乾元随部队前往，负责沟通鄂东南特委和红军同起义部队的联系。

邓乾元经过许多周折，打通了同中共鄂东南特委和红五军第五纵队的联系。红五军第五纵队随即开到沣源湖南岸兴隆铺、曹家院一带。中共大冶中心县委与红五军第五纵队负责人召开了扩大联席会议，讨论并制定兵暴的战斗部署，决定程子华率起义部队在城内暴动，第五纵队在外面攻城。恰在兵暴的各项工作准备就绪的时候，中央军委同意兵暴的指示也到了。十二月十四日晚，大冶兵暴的枪声打响了！程子华带领五、六两个连队的共产党员，按照

预定的计划，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连里的一些反动军官，喊出了“兵暴！当红军去”的响亮口号。红五军第五纵队紧密配合，向城内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里应外合，很快打垮了敌人的反抗，一举攻克大冶城，胜利实现了兵暴计划。这一仗，红军歼敌数百人，俘敌千余名，活捉敌营长和反动县长，缴枪九百多支。随后，大冶兵暴部队与红军会合，编为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二支队，程子华任支队长。当时红五军第五纵队的领导人是，李灿担任纵队司令员，何长工为政委，邓乾元为政治部主任，柯庆施为政治部秘书长。部队也由一千多人很快扩大到六千余人。从此，邓乾元开始了戎马生涯。他先后与李灿、何长工等同志一道，指挥红军指战员艰苦转战于湘赣广大地区，打了许多恶仗、硬仗、胜仗，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开辟了湘赣革命根据地。他在戎马倥偬之中，经常注意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纪律性，教育指战员们克服单纯的军事观点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深入群众，多做群众工作，密切军民关系。在他的努力下，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加强了红军与群众的联系，提高了战斗力。

大冶兵暴是南昌起义、湘赣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平江起义的继续。大冶兵暴的胜利，使得敌独立十五旅进剿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扩大了红军队伍，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

一九三〇年前后，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日益激化，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和支持下，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不断发生混战。它一方面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另一方面，却使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反革命力量空虚，在客观上造成了革命力量发展的有利形势。在党的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武装的号召下，在朱德、毛泽东式和方志敏式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引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都获得发展，全国革命形势日趋好转。但就在这时，党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竭力在党内和军内推行其“左”倾政策，并且制定了一个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各路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不切实际地向各路红军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六月十六日，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在大冶刘仁八召开，传达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和鄂省党的代表会议的精神。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李灿为军长，何长工为政委。七月，何长工改任红八军军长，邓乾元出任红八军政委兼军委书记。这次会议还将红五军和红八军编成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兼红五军军长，滕代远为军团总政治委员兼红五军政委。旋即挥师南下。七月三日，红五、八军紧密配合，一举攻克湘北重镇岳阳，切断了长沙与武汉的水陆交通。中旬，红三军团开抵平

江，在这里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命令，决定红三军团与湘鄂赣边境地方武装配合攻打长沙。会上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大多数同志认为，眼下蒋、冯、阎、张（发奎）等军阀混战打得正烈，长沙城内兵力薄弱，且杂牌部队多，战斗力不强；而红军人数虽少，但士气旺盛，打下岳阳后，武器弹药又得到了补充。因此，纷纷要求乘虚攻打长沙城。邓乾元力排众议，认为，尽管客观形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但就全国政局而言，大革命失败后所形成的敌强我弱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国民党控制了全国政权和经济，又与各帝国主义相勾结；各大中城市都有国民党的重兵把守，其部队人数众多，武器装备先进。在这种情况下，攻打长沙是徒劳无益的，是军事冒险主义的行动，是英雄式的拼命主义。他同时认为，要夺取武汉，红军的力量也不够，倒不如在广大农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力量，积极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准备。他的意见未能被多数同志所接受，因此，他只得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保留个人意见。

七月二十二日，红三军团在平江天岳书院草坪举行攻打长沙誓师大会，二十五日离开平江城，向长沙挺进。经过激烈的战斗，冲破了敌人的层层防线和阻截，于二十八日攻占长沙城。八月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向长沙疯狂反扑，形势顿时逆转。红三军团退出长沙，转战浏阳、平江一带。

英勇的红军一举攻克湘军何键盘踞的老巢长沙城，威震湘鄂赣，影响到全国各地，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大长了红军的志气。但是，正如何长工在《难忘的岁月》中说的那样："攻打长沙，虽然不是按照立三同志的直接命令去打的，但却不容否认，是在上海会议'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产物；它的胜利，在客观上又助长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毛泽东在回忆攻打长沙时也指出："如果把第一次占领作为一种暂时行动，并不企图守住城市，建立国家政权，那末这种行为也许可以认为是有益的，因为这在革命运动上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苏维埃政权在后面还没有稳定的时期，企图把长沙当作一个根据地，这是一个军事和战略上的错误。"如果按照邓乾元的意见，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利用军阀混战之机，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巩固扩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那将对革命更加有利。很可惜，他的这一正确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一些同志的误解和不满。

红八军退出长沙撤到浏阳县城的当天晚上，军团部和红五军也赶到浏阳。军团领导同志要红八军继续前进三十里，让红五军在浏阳城宿营。由于连日作战，指战员们非常疲劳，都已就地宿营。于是，何长工要邓乾元去军团部请示，让部队休息至拂晓再走。经请示后，未获同意。由于何长工坚持要休息到翌日拂晓，因而红八军当晚没有行

动。军团领导人认为邓乾元不执行命令，第二天，突然下令撤销了他的红八军政委和军委书记职务，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并派保卫队缴了他的枪，牵走了他的马。消息传开，部队议论哗然。何长工找到军团领导，坚决反对撤邓乾元的职，并主动承担责任说："要部队休息的命令是我下的，与邓政委无关。"但军团领导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何长工后来在《红三军团的建立与两战长沙》一文中说："邓乾元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县级干部，后任湘赣特委书记，工作和思想都很有水平，到八军任政委后，在维护军团领导和五、八军团结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虽然那天晚上和军团领导吵了几句嘴，未坚决执行命令，是不对的。但军团部当时也没有开什么会，把问题讲讲清楚，就撤销他的职务，并缴枪牵马，此事处理得过于草率。以后又说八军当晚开会要与五军分家等，我和健在的八军几位老战友都不知道有这个会。"

邓乾元被撤职后，虽经受了无数次批评，忍受了不少委屈，但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从不懈怠。八月十五日，红三军团在平江长寿街召开五、八、十六各军党的代表大会改选前委。邓乾元在被取消参加大会资格的情况下，毅然致信，肯定了攻打长沙在扩大红军等方面的成绩，同时陈述了自己反对攻打长沙的种种理由，仍然坚持攻打长沙是军事冒险的拼命主义。他因此而受到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并令其脱离红军，交给特委训练。

邓乾元反对攻打长沙的意见，经受了历史的检验。他在那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力排众议，独树一帜，充分体现了他异乎寻常的胆略和真知灼见。他在受到一系列错误的处分和打击之后，始终敢于坚持真理，更加显示了他那种威武不屈的坚强性格和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

一九三二年初，邓乾元调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教。他忍辱负重，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一直以乐观的精神、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积极工作，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他干一行爱一行，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培养红军和地方军事指挥人才上。

作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战将，邓乾元多么希望重上战场，跃马横枪，杀敌立功。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红七军团正式成立，邓乾元被任命为军团政治部主任。他抖擞精神，与肖劲光等同志指挥英勇的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与红一、三军团协同，驰聘疆场，千里转战闽浙赣，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进行殊死的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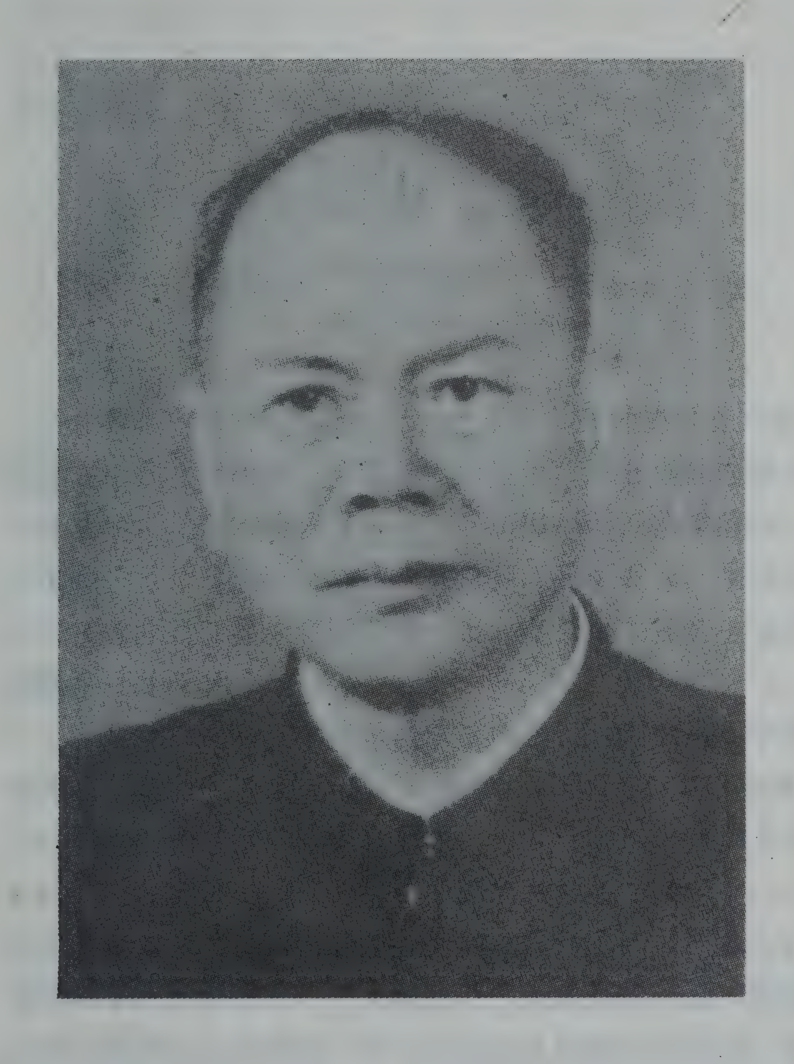
作为一名参与过创建红军和根据地的革命者，邓乾元多么希望用自己的浴血奋战，来壮大红军，扩大根据地，换取人民的幸福。然而，一九三四年一月，正当他与战友们为党的事业加倍努力忘我工作的时候，党内军内却掀起了所谓清查“AB 团”分子的高潮，多少优秀的革命同志被错抓错杀！邓乾元，这位对党忠心耿耿、德才兼备、能文

能武的无产阶级优秀战士，竟被平白无故地打成“AB 团”分子，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在红军长征前夕，他被迫害致死。年仅三十岁。邓乾元没有倒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也没有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却成了“左”倾路线的牺牲品，真是千古奇冤!

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作出决定：凡被当作“AB团”误杀的，一律平反昭雪，作为革命烈士看待。从而推倒了“左”倾路线强加于邓乾元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在中共“七大”的大会上，毛泽东对曾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表示了深切的怀念之情，他说：“邓乾元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太可惜了！”

邓乾元对党忠诚，始终不渝，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无论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或是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地下斗争时期，还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临危不惧，一身正气，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模范执行党的决议，勇于同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倾向进行理直气壮和不屈不挠的斗争。“邓乾元是个好同志”，这就是历史对他革命的一生的公正评价。

（严 延 桃）



古 大 存



古　大　存

一

古大存（1896–1966），乳名子尚，字永鑫，别号斛咸，一八九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广东五华县梅林乡优行径村。父亲古情芳（古化），初做小贩，家境清贫，后在梅林圩开“恒昌”杂货店，兼杀猪，逐渐发家，生活富裕，共有商店二间，肥田二十一亩，雇长短工几名，每年收租谷四百多担。

古大存六岁时在本村私塾读书，稍长，到梅岗寺学堂初等小学就读。他勤奋学习，作文、算术考试，常列第一。他的父亲逝世后，家庭穷困。一九〇七年，他初小毕业后，无钱升学，便在梅林墟中药店做学徒。两年后，得六兄古大同（柳春）的帮助，他到三江高小读书。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古大存接受了新思想的传播，在校内率先剪掉头上的长辫，并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到街道、农村，发动群众剪去辫子，形成一个剪辫运动。

高小毕业后，古大存无钱升学，在家务农。一九一四

年，他在故乡一间初级小学当教员，和童养媳徐妙娇结为夫妻，翌年到梅县，在广东省立梅州中学读书。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于一九一七年爆发，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古大存初闻俄国有“过激派”，领导被压迫群众起来闹革命，非常羡慕。下课后，他有时到梅城接近纺织业工人与五华籍的船工，接触社会实际，对劳动人民的艰苦，有初步的了解。

中学毕业后，古大存于一九一九年在五华县安流三江高等小学当教师。“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席卷中华。他虽在穷乡山区，但“位卑未敢忘忧国”，遂与进步师生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

一九二〇年，古大存在广州进入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读法律。翌年，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曾到该校作演讲三次，题目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有几种社会主义？”“应该讲何种社会主义？”古大存听了这些新思想后，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景仰。从此，他认真阅读《新青年》、《劳动者》、《广东群报》等革命报刊，希望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由于家贫，为筹集读书费，古大存在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预科学习后，重返五华安流三江中学当教员一年，一九二二年春，再到法政专门学校法律本科读书。

法政专门学校每周开办假设法庭一次，将社会上的案件给学生按法律审判。有一天，假设法庭受理一案：一群

贫苦农民上山砍柴，抢了一个经商者的一些食品，构成强盗案。古大存认为：农民因饿才抢食，在生存权利上不应称为犯罪行为。他的辩护虽然没有得到胜诉，但他的独特新颖的认识，引起同学们的钦佩。共产党员沈春雨认为他有正义感，有民主思想，嗣后多与他联系，并指导他阅读了《向导》、《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 ABC》、《唯物史观》等革命书籍。他读后思想上更要求进步。

一九二四年四月，中共党组织派古大存到广州市内的“五华同乡会”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了五华青年同志会，并担任《春雷》杂志主编，宣传革命道理。同年夏，经黄国梁、宋青介绍，古大存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更加奋发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二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古大存在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被学校推荐到南雄县任推事法官。他不愿为官，矢志献身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一九二五年二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陆海军大元帅府（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招收东征军战地宣传员。中共广东区委委员杨匏安，通过沈春雨，发动古大存报名，结果被录取。那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命古大存为中央政治

宣传队领导人，随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部出发东征。东征军占领惠阳淡水，乘弥漫硝烟，古大存率领队员们到该镇，召开军民联欢会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号召群众援助东征军。东征途中，他还协助各县建立农会、工会、商会，发动群众为东征革命军作向导，输送枪支、弹药等军用品。到梅县城，他向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军事部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黄埔军校党代表兼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廖仲恺汇报了战地宣传概况。

中共两广区委，于七月派古大存以广东省农民协会特派员名义到五华。他回到故乡，和魏宗元、宋青等联系，迅速在上山、十约等地建立九十多个乡农会，组建了农民自卫军，实行“二五减租”，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利益，并伺机打击了陈炯明部华振中旅。十月，广东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古大存在农村组织侦察队、救护队、运输队、宣传队，援助东征军战斗，使东征革命军在葵岭利塘径、大峰岗附近，击败陈炯明主力。

第二次东征告捷后，古大存担任中共五华特支组织委员、五华县农民协会副会长兼军事部长。他大力扩大农会的核心组织大同会，建立农民自卫军第一大队，开展减租斗争。

一九二六年二月，古大存在安流主持召开五华县农民代表大会，他诗兴勃发，即席吟哦，以当地地名赋诗一

首，寓意甚深。诗无题，全文如下：

剑门走过果绿坑，口吃糖梨味真甜，

横径迷途观北斗，指南西是借罗庚。

这年春，五华春荒严重。土豪劣绅，不法商人，垄断稻谷市场，把大批谷米运往外地，牟取暴利。古大存带领农军同奸商作斗争，使粮价降低。五月，古大存到广州，参加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听了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报告，受到很好的启发。会后，他回五华深入开展农民运动。豪绅张谷山号称“土皇帝”，横行霸道，成立了“资本团”，以劣绅李树眉为团长，反对农民运动。他们网罗陈炯明部的败兵，组织了一支一千多人的反动武装，由张九华指挥，为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武装收租，到农村抢劫烧杀。古大存建立了农军县常备大队、区常备中队，有二千余人。十一月，他带领农军五百余人在五华击溃“县警卫基干大队长”张九华率领的反动武装，声威大振。他就此情况写报告给彭湃。彭湃复信给古大存，认为全国从未见“资本团”，可见五华地主恐怕是最反动的了，接着在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人民周刊》上发表了《为五华农友哭一声》一文，揭发恶霸劣绅阴谋，声援古大存等在五华开展的反封建斗争。一九二七年三月，古大存率领农军，智擒反动的“资本团”、“新农会”、“县警卫基干大队”的总后台、大恶霸、当地“土皇帝”张谷山，依法予以处决，并歼灭了罗径坝反革命地主武装，人心大快，军威大振。他总

结了这次获胜的经验，劝勉农军仍须提高警惕。他在欢庆之际，诗兴顿起，因作七绝：

犁却大田并湖田，
罗径坝内凯歌旋，
必须斩草连根拔，
莫使萌芽再蔓延。

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月十五日，古大存在横陂召开五华县农民代表大会。当天，国民党反动军队团长宋世科，带领士兵八百余人，会同张九华部合计千余人，围困横陂，声言逮捕古大存。形势险恶，危急。古大存力持镇静，马上通知代表疏散离开险境。他率领一个班农军转移到“益和”当铺。敌人进攻楼高墙坚的当铺，古大存开枪打死敌排长一名。敌恼羞成怒，搬柴草到当铺四周，准备用火攻。古大存情急智生，决定以缓兵计，伺机行事，于是请当铺的帐房人员与敌对话，拖了两个小时。此时，四周农民、农军万余人得知古大存被困，手持武器对横陂进行反包围。宋世科眼见农民人多，迅速带队撤退，古大存指挥农军，乘势追击，又获胜利。

三

大革命失败后，古大存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指示

精神和上级意见，在五华农村继续开展斗争。一九二七年九月，他任五华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他率领的五华农军改称工农革命军。敌人悬赏五万大洋要捉古大存。古大存毫不动摇，坚持斗争，带领革命武装，攻入反动堡垒对镜窝，生擒“资本团”团长李寿眉。李寿眉是古大存侄女的家翁，有亲戚关系。当地土豪绅士愿以三箩光洋赎回李寿眉。古大存的母亲也出来讲情。古大存不徇私情，不为钱币引诱，坚持原则，依法处决李寿眉，为民除了害。他大义灭亲的高尚品德，深受群众赞颂。

那时，古大存的爱人也带着儿子古关贤参加了秘密的农民赤卫队。古大存曾对农军和赤卫队干部、战士说：“我们工农大众好比是黄鳝，地主好比是泥鳅。黄鳝比泥鳅对截也赢它。”古大存的黄鳝、泥鳅哲理教育，大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使大家树立了必胜的信念，也成为革命同志、游击队员对群众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

彭湃于十一月领导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兴、梅各县先后建立了工农革命军五个团，古大存担任第七团团长，曾赴海丰向彭湃汇报请示工作，受到彭湃赞扬并赠大马刀一把作纪念。

塘湖劣绅钟向陶率反动武装“讨赤团”，下战书给古大存挑战，说：决定“与你决一胜负。你若不来，我去解决你农会的武装”。古大存收到战书后，遂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指挥农军分三路猛攻塘湖，激战两天，打得反动的

“讨赤团”惨败。钟向陶寅夜逃跑。古大存率农军追击，消灭四十多名敌人，给农军和农民以很大鼓舞。

国民党反动军队一个师于二月进攻五华，建立了“灭古委员会”，大肆屠杀古姓群众和当地人民三千多人，焚烧了许多农民房屋。古大存带领农军转移到琴口。敌人三次血洗古大存故乡。古大存带警卫员刘竞环化装突出重围，到安流与双头交界的大双径路头店，草成一诗，挥写墙头：

一日离家一日心，
犹如孤雁宿寒林，
他年振起凌云志，
依旧高飞压众禽。

敌人进入古大存故乡，先后杀死他的亲人十名。但是，敌人的屠刀只能使古大存更加坚定。他深入到各村，准备扩大农军。就在他离开部队期间，中共五华县委书记宋青竟擅自宣布解散农军，把公款拿走，逃往别地。古大存返到部队驻地，目睹几乎跑光的农军，毫不灰心，他对同志们说：“队伍解散了还有广大群众，一定要同敌人干到底！”

为了反抗敌人的血腥屠杀，古大存于一九二八年五月，率领在血战中幸存的二十多个坚定的战士，转移到反动派势力比较薄弱的八乡山。这个延绵的高山，地跨五华、揭阳、丰顺三县边区。他在这个山区，开辟农村革命

根据地。为便于开展革命斗争，他先后改名为张炳、陈德炎，在观音山、栋下、马屋山、滩下，黄砾附近一带农村，开展活动。他安排战士们到石厂打石，或到富农家当长工，或做散工，把每日得到的工资，除解决吃饭外，余下部分作为革命活动经费。古大存起带头作用，他白天做工，除吃饭外，每天只能挣五分钱，全部作党费交给组织，或买纸写标语作宣传。五月，他又带领部分战士到南溪村，建立地下"交通站"，不久又到苦竹溜等村，发动贫穷农民二十七人，在烧炭棚里建立了贫农自救会。这是首次建立的自救会。为什么不用农会？因为古大存考虑过，用农会易引起敌人镇压，改用别的组织名称容易立足。接着，他又不辞辛劳，东奔西走，帮助和发动了黄竹坪、小溪、贵人村等几十个村庄贫农和雇农，参加贫农自救会。

鉴于农民参加贫农自救会人数增多，古大存引导该会由秘密转为公开活动。为了吸引中农、富裕中农也投入革命斗争，他又及时地改会名为农民协会。于是，苦竹溜、马屋山、雷公墓等许多村庄的中农、富裕中农纷纷加入农会。他带领广大农会会员实行抗租斗争，使农民政治上经济上都得到利益。广大农民喜气洋洋。为了保卫革命斗争的开展，他又在各乡农民协会中建农民赤卫队，吸收自愿报名的十八岁至五十岁的男性农民参加，还招收自愿报名的妇女参加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把寂静的山村，搞得热气腾腾。五华等地农民编了山歌，回顾过去，展望将

来，高兴地唱道：

几多流泪无人知，
人民痛苦真惨悽。
尽喊天来天不应，
尽喊地来地不理。
你莫苦来你莫愁，
还有张炳（古大存）农民头。
革命自有恢复日，
老屋烧了住洋楼。

广大贫苦农民怀着对敌人恨对农军爱的心情，期望着革命斗争发展。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古大存于六月派一些同志到五华、丰顺、梅县等地开展斗争，准备建立以八乡山为中心的东江革命根据地。这批同志出发前，他部署了几件工作：一，了解老百姓被反动派迫害情况；二，党团员、干部、积极分子、群众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表现；三，鉴于救党会发生叛徒，公布取消该会，建立贫农自救会；四，在斗争中表现好的党团员、干部，一律恢复原先工作，注意吸收忠于革命、工作积极、斗争坚决的优秀分子入党入团，成立党团支部；五，建立交通站，找专人担负情报工作。他谈话后，同志们即奔赴各地。

为联络各地指导斗争，古大存在马屋山观音坐莲的地方建起“总交通站”，与五华、丰顺、梅县、兴宁，大埔等

五县党组织联系。七月，中共五县党组织领导人到梅县、丰顺边区的九龙嶂开会，讨论扩大游击队和打击敌人等问题，并成立五县暴动委员会，古大存任书记。八月，五县暴动委员会和古大存等在梅县畲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取得成功，给当地人民以很大鼓舞。反动派对此十分仇视，在《岭东民国日报》发表了消息，报道畲坑暴动情况。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看到该报，迅即派员同古大存联系。饱受敌人镇压的劳苦大众，闻古大存在九龙嶂领导武装暴动，非常高兴，奔走相告。自此，八乡山农村根据地成为一面胜利的旗帜，吸引了许多革命者，贫苦劳动人民纷纷投奔，武装队伍很快扩大起来。稍后，中共揭阳、潮安两县党委领导人亦派人到九龙嶂，经过讨论，决定把五县暴动委员会扩大，建立了中共"七县联合委员会"，古大存任书记。

在七县联委和古大存等同志领导下，五华，梅县、丰顺等县中共组织逐渐壮大。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古大存在八乡山石崀坑主持召开中共五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作工作报告，会议还邀请了中共东江特委书记陈魁亚、委员卢笃茂、青年团东江区委员会书记卢伟良参加，决定在各地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实行分配封建地主土地，开展土地革命。

熊熊革命烈火在八乡山燃烧起来了。敌人心惊胆跳，坐卧不宁，于三月纠集五华、丰顺、揭阳三县反动武装二

千余人，分五路疯狂围攻八乡山。敌人在人数和装备上都远超农军。古大存提出，要抓紧各路敌军出发时间不一，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先歼其第一、二两路，并派干部到各村发动农民援助农军作战。三月三十日夜，丰顺反动民团在团长黄夺标率领下兵分两路，第一次攻打八乡山小溪。根据古大存的部署，埋伏在当地的三路农军突然跃出反击，打得民团昏头转向，狼狈逃窜。古大存率领农民赤卫队乘胜追击，边追边打，经两天一夜激战，打败优势的敌人，先后打死反动民团团长黄夺标以下官兵四十八人，缴获长枪二十多支。其他各路农军也将进犯敌人击败。这就是威震敌胆的“八乡山第一仗”。

国民党军郭师演部等反动武装于四月六日，第二次“围剿”八乡山。郭部由河西、水口、双头三路，疯狂地向八乡山中心区进攻。古大存事先已部署农军搞好备战。当各路反动军队上山行至伏击圈之际，农军一闻号令，马上斩断捆绑大石堆的木藤，巨石突然由山上翻滚冲下，当场压死一批敌兵。与此同时，附近四周锣声大响，声震云天，号角齐鸣。反动军队不知农军有多少人，顿时乱作一团，纷纷溃逃。埋伏在草丛中的农军手执长枪、大刀，勇猛冲击，以锐不可当之势冲向逃敌，大部分逃敌被打死，少数残兵，四散奔逃。敌第二次“围剿”被农军粉碎。

反动军队不甘心失败，又于四月九日第三次“围剿”八乡山。古大存和五华县党组织领导人带领严阵以待的农军

节节抗击，经十几天激战，终于击败敌军的“围剿”，胜利地保卫了八乡山根据地。

古大存等带领农军战胜反动派的三次“围剿”后，大力加强八乡山根据地的建设，使赤卫队员增到四千多人，拥有长短枪九百多支，先后成立了九个区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使世世代代没有田地的贫苦农民分得了耕地，还建立了贫民学校、医疗所、合作社、供销站、缝衣社和小型兵工厂。

四

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八乡山革命根据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成为粤东地区革命运动的中心。根据上级指示，东江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八日在丰顺县八乡山黄砾召开。五华、丰顺等十一个县三十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会上，古大存报告了有关武装斗争等问题，并当选为中共东江特委常委、军委书记。为了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共东江特委在梅县梅南区顺里村又建立了东江工农武装总指挥部，古大存任总指挥。此后，古大存大力领导东江各县农军的整顿和筹建正规红军的工作。当时正是夏收，他又领导五华、丰顺、兴宁、梅县等地农民和农军开展抗租斗争，使农民收入增加，生活得到改善，更加拥护农军。为了保卫革命根据地，他还扩大农

民赤卫队，五华、丰顺、梅县的农民武装常备队发展到三百多人。他把农军壮大情况向上级汇报后，中共中央军委计划在东江地区建立一个军。不久，按上级命令，古大存把五华、丰顺，梅县的农军改编为东江红军第四十六团，以李斌为团长，龚介池为政委。同年秋收期间，他又把潮阳、普宁、惠来的农民赤卫队模范队三百多人，编为红军第四十七团，以何石为团长；陈开勤为政委。

这一年的六月，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到达八乡山根据地，与东江红军联系。古大存获悉陈毅到来，主动去拜访，向陈毅汇报了东江地区工农武装斗争的情况。十月一日，按照陈毅和有关领导的建议，古大存与大埔、蕉岭、丰顺、五华、兴宁、潮阳、普宁、揭阳、惠来、潮安、澄海、饶平等县农军领导人开会，议决了有关在秋收斗争中壮大农军等问题。会后，他分配人员赴五华、兴宁聘请了一批铁匠、技工，在根据地中心建立了新兵工厂，请了一百多工人，夜以继日地造五响枪等简单枪支和弹药。为了培养武装部队骨干，他在梅县水尾创办了军事学校，派教官短期轮训军事干部，以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

同年十月二十五日，红四军军长朱德，率领部队八千余人挺进东江。古大存得知后，迅即下令农军集中，以配合红四军战斗。他离开指挥部，步行十几公里，抵梅江边，乘木船赴梅州，到湾下村时，获悉朱德率领的部队已由梅城撤出。他分析去向，知道红四军必到梅南，于是他

立即转告农民要热情欢迎朱德率领红军的到来。是夜，广大农民高擎火把，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迎接红四军。翌日，古大存率领农军和农民数百人来见朱德，在丰顺县马图村向朱德报告了东江农军和红军发展概况，并深入讨论议定了今后斗争方针，研究了东江红军的建设，确定在巩固东江革命根据地后，东江红军向赣南挺进，与江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十月三十一日，红四军进攻梅城，古大存等带领农军支援红四军在梅城作战，以后随红四军转移到寻邬。

红四军与古大存指挥的红军第四十六团在丰顺县马图会师时，曾在丰顺留下红四军一个大队和百余名伤病员，交给东江军委。朱德在离开梅县前，从红四军中又抽调了部分武装和政工干部谭汉卿等，给古大存，作为建立东江红军的骨干。古大存把红四军留在东江的武装改编为第四十六团特务连，把红四军留下的三十多名政工干部分配到东江红军各部队担任领导干部。由于武装队伍的壮大，古大存按照东江军委的指示，把饶平起义的蒋光鼐教导队一百四十人和大埔农军编为东江红军第四十八团，以冯子林为团长，李明光为政委；海丰、陆丰、惠阳、紫金的农民赤卫队模范队共一千多人，改编为第四十九团，以彭桂为团长，黄强为政委；以寻邬的二十一纵队和兴宁农军编为第五十团，以刘光夏为团长，唐天际为政委。他还建立了东江教导团，古宜权为团长。古大存出任东江红军总指

挥。

朱德率领红四军在梅县时，建立了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有毛泽东、朱德、古大存、刘光夏、朱子干、陈魁亚、陈海云。他们七人签署的《关于公布执行土地政纲的布告》中规定："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农民使用"。古大存经常对战士们强调，要进一步地把东江的农民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以巩固和发展东江革命根据地。他还对红军干部说，要坚决执行《土地政纲》，准备创建苏维埃政权。为此，他指导帮助东江一些县建立了县区乡革命政权。

这一年的冬季，东江红军总指挥部准备打通与江西革命根据地的通道。古大存亲率第四十六、四十七团征战至五华县坪上，与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展开激战，四十七团团长何石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古大存也受了伤，他坚持带领两个团的红军队伍退回八乡山。那时，中共东江特委个别领导人，认为革命根据地应向汕头发展，应建立以大南山为中心的东江根据地。古大存则认为，汕头一带是平原，大南山三面靠平原，一面近海，是一座孤山，进行武装斗争回旋余地不大，主张仍以八乡山为中心，与江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为此，他指挥东江红军向西北方向峰峦重叠、连绵伸延的山区挺进，帮助梅县、大埔、丰顺、寻邬等广袤地区建立和扩大赤卫队，实行土地革命，推动粤东地区十几个县区很快建立了革命政权，各县不脱产的赤卫

队发展到二万余人。部分县还有模范赤卫队一千五百人。海丰、陆丰、惠阳、紫金的赤卫队，分为调动队、预备队，其中调动队有十五个中队，六百余人。古大存在东江先后建立了六个红军团，使东江地区形成了有主力红军、县赤卫模范队和区乡赤卫队的三级武装体系。

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至十二日，东江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丰顺县八乡山滩下村庄屋坪召开。到会者有东江地区十九个县的三百二十六名代表。广州、粤北、琼崖（海南）等地六个县也派代表来列席参加。大会由中共东江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古大存主持。会上古大存作了有关军事斗争问题的发言，同代表们一起通过了关于组织东江地方暴动问题等决议，庄严宣告了东江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古大存被推选为东江苏维埃政府副委员长。中共广东省委代表林道文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在东江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的决定，任命古大存为军长，颜汉章为政委（后由吴炳泰继任）。古大存与东江苏维埃政府委员长陈魁亚等商议后，又宣布龚楷为红十一军参谋长，罗欣然为政治部主任。红十一军下辖六个团：四十六团，团长李斌，政委吴学哲；四十七团，团长洪楚才，政委陈开芹；四十八团，团长罗时彦，政委温仰春；四十九团，团长彭桂，政委黄强；五十团，团长刘光夏，政委张大白；教导团，团长古宜权，政委李明光。全军共三千人，军部设在八乡山的岳潭。

红十一军的成立，凝结着古大存的无数心血，标志着中共领导下的广东的军事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三十年代，毛泽东与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指出：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失败后，“它的一部分军队，在古大存指挥之下，离开了那区域，与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系，后来成了红军第十一军的基本队伍”。

红十一军建立后，古大存迅即指挥各团开展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各县反动武装。正当东江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时候，由于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东江特委、团委、军委合并为东江行动委员会，颜汉章为主席，古大存为前敌总指挥。东江行委的领导人命令古大存攻打强敌驻扎的潮安、揭阳。古大存不同意，但仍率领红军在梅县丙村打了一次胜仗，歼敌一个连。为此，古大存受到领导的批评，说他“专找弱的打”，于是连续三次命令古大存强攻潮安。古大存只好执行命令，第一次率领红军进攻，经过浴血苦战，消灭敌人一个营，但仍无法攻进城，牺牲了干部战士二百余名，不得不转移。古大存曾向东江行委领导反映过实际情况，他说：驻潮安敌军有两个团，在附近的枫溪和隘隍还有敌军两个师，红十一军只有五个团，且分散各地，能集中的最多不超过二千人，不宜硬攻。但是，东江行委领导人仍下令强攻。古大存深感硬攻强敌驻守的城市确实无胜利希望，但他又不能违抗行委的命令，于是他率领所属红军部队发动进攻，由于兵力少

无法歼灭守敌，只好转移。行委第三次下令强攻。古大存再次向上级建议取消强攻计划，但被领导批评为“右倾”、“攻坚不力”。他被迫又第三次带领红军部队进攻，同优势的敌人硬拚，使东江红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他率部撤兵，转移到八乡山坚持武装斗争。不久，国民党军队陈济棠部派两个新编师二万余人进攻八乡山，敌众我寡，古大存率领红军部队在猫坑、峯平、双头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正当八乡山反围攻斗争激烈进行之际，东江行委不顾古大存的劝告，奉命迁到交通较方便、靠近潮汕的敌人必争之腹地大南山。古大存则率领第四十六团和赤卫队继续坚持在八乡山附近进行武装斗争。他们以森林山区为依托，伺机打击敌人，打了一些胜仗，牵制了大批敌人，有力地支援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大南山红军的抗敌斗争。

古大存担任红十一军军长期间，大力加强部队的建设。他提出红军的任务“决不只是完成土地革命，或做地方游击队”，“它的任务除帮助地方暴动以外，更应用它的力量同群众工作的配合，成为实现一省数省革命政权的主要动力”。他提出红军的纲领是，“以党的十大纲领为纲领”，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及政治工作制度，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红军中的党直接受中央军部的指挥，而与地方党部发生兄弟的关系，一切工作的进行，地方党部可与红军中的党组织开联席会议讨论决定，要“用党的

组织力量去影响士兵群众，使每个士兵群众都在党的领导之下成为一个忠实勇敢的无产阶级的战士”。

国民党反动派于一九三一年纠集万余兵力进攻八乡山。古大存率领红军部队转移，在转战途中，他的爱人徐妙娇被反动军队逮捕，壮烈牺牲。他部署各路红军部队迎击敌人。梅县联队在南口战斗中，战斗到最后剩十多个战士，弹尽援绝而英勇投江，全部牺牲。梅西区联队仅存四十二人枪，在向九龙嶂转移时又遭敌袭击，三十八人牺牲。丰顺农军与敌激战，一次就牺牲一百余人。那时，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人受坏人挑拨，命令古大存到大南山。古大存应令到大南山后，东江特委领导人向他宣布特委的决定，免去他红十一军军长职务，改任东江军委参谋长，并把他软禁在一间房内。古大存回顾红十一军政委吴炳泰在数月前被通知到大南山，以后下落不明，传说已被杀害，于是他询问东江特委领导人：吴炳泰等人到哪里去了？他还严肃地说：“如果你是共产党员，就不应该这样对待革命同志；如果你是反革命请立即把我杀掉，死而无怨！”后来，特委开会，公开说古大存是立三“左”倾错误思想在东江的代表，除撤军长职外还给予党内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古大存据理坦率地谈了个人看法，他说，开始时对“立三路线”认识不够清楚，奉命攻打城市，后来遇到挫折，就没有强攻。东江特委领导人认为古大存承认错误的态度不好，处分应加重，为此把党内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三

个月。

五

古大存受处分后，被分配到陆（丰）惠（来）县工作。他对党忠心耿耿，一如既往地积极为革命事业而奋斗。陆惠县于一九三一年前，曾在各区乡建立红色政权，后因肃反扩大化，不少干部被杀害。古大存不怕艰苦，深入到区乡，落实党的政策，任用新人，建立了一个有二百多人的独立营，接着恢复各区乡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成绩卓著。中共东江特委提前撤销了对他的处分，委派他为中共陆惠县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古大存虽没有参加大会，但因他工作出色，业绩卓著，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员。

国民党反动军队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对大南山实行疯狂的“围剿”、“驻剿”，采取派强兵驻在大南山四周，再遣重兵进入山内各村驻扎，阴谋全歼山内红军部队。当时，大南山仅有红军一百七十多人。在这危急关头，中共东江特委为粉碎敌人的新进攻，把古大存调到大南山，任命他为东江红军第一路总指挥。古大存到达大南山后，分析敌情，总结历次作战的经验教训，对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人建议：若采取强攻硬打，南山被围无法解除；惟有在南山邻

近地区进行武装斗争，调虎离山，使敌人由南山撤出重兵，方能解南山之围。特委采纳了他的建议。他迅即率领红军十二人，深夜突出重围，转移到大北山，在梅县、丰顺、揭阳一带，神出鬼没地进行游击活动，牵制了部分敌军。他率领这个红军小分队，还在区乡到处张贴布告，揭发反动派的种种罪行，号召群众团结起来，保卫苏维埃。在一次伏击战中，他率领红军小分队和农军，击毙敌团长及其部下三十多人。这次胜仗，震惊了敌人。为了吸引敌人，古大存还采用虚张声势的办法，每到一地，必布置部队散发传单，传给广大农民，使四处皆知。在传单布告后面都署名："东江红军第一路总指挥古大存。"反动派也拾获传单，纷纷议论说："古大存过去是红十一军军长，现在是红军第一路总指挥，是军长大还是总指挥大？"敌军官见到传单，犹疑不决。正在此时，古大存又布置打入敌人内部伪联防的农民马运，向伪联防密报红军军情说：古大存已率领红军数百名在八乡山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反动军队接到这个情报，联想到一些据点被袭，以为红军主力确已转到八乡山，古大存已在八乡山重建红军军部，遂对大南山的"围剿"、"驻剿"大大放松，调动重兵赴丰顺、梅县围攻八乡山古大存部。于是，大南山之围迎刃而解。当敌军开到八乡山时，古大存率红军小分队又转回大南山，进攻的敌军扑了空。

手中拥有十五万军队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未能实现他

消灭古大存部红军的美梦，气急败坏，于是发出《陈济棠2730号训令》说："照得共匪首古大存及著匪彭桂，勾结扰乱，播毒东江"，"本部前往迭饬地方军警严予缉剿。无如匪首出没无常，窜扰无定，一时尚未成擒"。"兹特订定赏格。无论军警人民，如有能将该匪首古大存一名生擒解送官厅，验明属实者，赏银二万元。倘若将该匪首击毙或杀死"，"证明无讹者，赏银一万元"。从这篇反面资料证明，古大存率领的红军，"出没无常"，扰得敌人坐卧不宁，重兵"缉剿"徒劳。反动派只好使出以两万元巨银悬赏捉拿一个古大存。但是，古大存率领的红军，不仅没有被歼，反而由少到多，由弱变强，发展壮大。

不久，古大存指挥东江红军部队，在丰顺、揭阳、梅县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与敌人周旋，拖得大量反动军队精疲力尽。一九三三年，广东军阀部队，为配合蒋介石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再度集结重兵，阴谋一举铲除古大存的东江"红患"。敌人出于反革命"围剿"的需要，修筑了丰顺县汤坑至丰良的公路。国民党反动派的丰顺县长林彬，天天乘汽车赴工地巡查。古大存得到这个情报，于五月三十一日，分配陈华带领红军战士十二人在路上伏击，击毙了林彬。当地广大农民拍手称庆，兴高采烈。敌人则垂头丧气，大为震惊。

在东江根据地武装斗争向前发展的基础上，经上级批准，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成立了东江红军游击总队，由中

央派来的周友初任总队长，古大存为政委，卢笃茂为参谋长。在周友初、古大存率领下，这支四百多人的游击队，出没于粤东山区，歼灭了一些敌军，牵制了数以万计的反动军队，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红军第一方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后，广东反动军队倾巢而出，阴谋以数百倍的兵力，灭绝东江地区红军部队。古大存率领红军灵活机动地抗击敌人。在著名的鲈鳗洞伏击战中，东江红军第二中队埋伏在南山鲈鳗洞，居高临下，出敌不意，毙伤敌四十多人，俘敌三十多人，红军只牺牲一人。在袭击九斗埔的战斗中，摧毁反动堡垒四个。

一九三四年底，东江革命根据地仅剩下大南山一块立足地。这时古大存出任中共东江特委常委、政治保卫局局长。他深入到农村调查，重新审查被关押坐牢的红军干部和共产党员，纠正了错案，使二百多名无辜者被释放出狱。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反动军队第三军第九师以及地方反动武装十四个中队的兵力“围剿”大南山，在葵潭、流沙、司马浦等地联成一线，联营七十里，密布岗哨，把山区农民赶下山来，以断绝群众供应粮食给红军，阴谋全歼东江红军。这时，坚持在山上战斗的红军仅有二百多人。鉴于形势险恶，中共东江特委在大流石洞召开了最后一次

会议。古大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古大存建议，根据新形势采取新的斗争策略，把一百多名机关干部分成小组到平原从事地下斗争，红军也分成几个小组，开展游击战争。会议决定：除留下少数同志继续在山上进行隐蔽斗争外，武装人员一律冲出重围，分散战斗；东江特委负责人李崇三带工作组下平原；古大存率领红军部队下山。

那时，反动军队常常到大南山搜索。古大存率领红军部队在深山老林转移，昼伏夜出，有把握打胜的仗就打，求得消灭小股敌人；没有打胜希望的仗就不打，避开强敌，赶快下山，弄得敌人摸不到红军的去向。于是，反动派四出张贴标语，散发劝降书，妄图以此分化瓦解红军和游击队。古大存立场坚定，誓不投降，他把敌人的劝降书作反面教材，启发红军指战员对革命事业要忠贞不二，坚持到底。有一天，他来到一座山，发现青石上刻有劝降诗。他诗兴顿起，微笑吟诗，随手拣了块木炭在青石旁边“奉答”，写诗一首：

“幼习兵戎未习诗，
诸君何必强留题？
江南美味你先食，
塞北寒风我自知。
解带结缰牵战马，
扯袍割袖补红旗。
雄师百万临城下，

且看先生拱手时!”

这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诗歌，表达了古大存忠于党，忠于红军，忠于革命事业的豪迈胸怀，显示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性和高尚的情操，有力地鼓舞了红军和游击队的斗志。

因反动军队的严密封锁，大南山的红军弹尽粮绝。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古大存率领红军部队转移，向着敌人防守薄弱地方，晚上不发一弹突出重围。反动军队以为古大存仍在山上，还大声呼喊“活捉古大存”。

突出敌重围后，古大存把红军部队分成十六个小分队，分散在各地活动。他率领一支小分队，转移到丰顺、梅县等地传达中共东江第五次党代会精神。十月，新任的中共东江特委书记李崇三，被敌人逮捕后贪生怕死叛变了革命，并为反动派引路，破坏了各地党组织，使十几支红军小分队被敌人打散。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古大存以无畏的气概，带领十几个红军战士转移到丰顺县桐梓洋，同丰（顺）梅（县）游击队会合，在当地坚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残酷的斗争环境，对每一个红军战士来说，都是一个考验。在革命低潮时，个别人吃不了苦，脱离了红军。古大存再次经受了这一考验，又经过一段艰苦的斗争之后，他同上级失去了联系，在桐梓洋孤军作战。在患难之中，古大存与红军女战士曾思文结婚。就在那时，古大存的后脑长了一个大毒疮，流脓不止。为减轻痛苦，天天

由曾思文把里面的脓血挤出来，每次要挤出半口盅。古大存毫不介意，他忍受着巨疼，仍然坚持战斗。有时，他给红军战士讲故事，与红军战士一起下象棋，和红军战士们打成一片。他在处境困难的时刻，仍一再鼓励战士们说："现在跟党组织失去联系是暂时的，只要党还在，我们就一定要联系上。"他又说："革命好比炼钢炉，杂质跑掉了，剩下来的就是好钢材。只要大家团结战斗，革命一定能成功。"他这种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对红军战士们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为了摆脱困境和争取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古大存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率领幸存的张观亮、张六、陈华、曾思文等十七个红军战士，转移到大埔县塘卜里村，高举红旗，坚持战斗到抗日战争爆发。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东有两个地方始终红旗不倒。一是海南岛冯白驹率领二十多个红军战士在毋瑞山坚持斗争；一是东江地区古大存带领十七个红军战士坚持战斗。

在此期间，古大存曾打算到闽西去，寻上级党组织，但因脑后毒疮剧痛，未能成行，改派战士去，未能联系上。古大存带领红军战士开展群众工作，他语重心长地对战士们说："我们要同老百姓建立鱼水关系，有群众的支持，我们就能存在下去，就能发展。我们一定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他还派红军战士与群众一起上山，以烧炭、做

陶瓷为掩护，帮助深山农民建立贫民团、陶瓷工会，同土豪劣绅作斗争。在提高群众觉悟基础上，他建立了农民武装队伍，同反动武装作斗争。有一天，他们奇袭了一支反动武装的炊事班，缴枪十多支，随后散发署名东江苏维埃政府的传单，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发现了这些传单，派人到大埔联络，但由于古大存等隐蔽在群众中，未能接上头。

一九三六年冬，古大存派游击队员找到他的儿子古关贤。翌年春，古关贤步行一百多公里到大埔县高陂山区见到古大存。古大存高兴地说：你来到武装队伍，使我们游击队“又多一个人了”。

古大存在戎马倥偬中，很重视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他曾问古关贤喜爱读什么进步书籍。古关贤说，对鲁迅很崇拜，经常阅读鲁迅纪念柔石、殷夫等人的诗。古大存叫古关贤迅速抄录了出来。古大存对鲁迅的诗赞叹不已，说这是前无古人的绝唱。他特别称赞“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诗句。他对鲁迅著作也很喜欢阅读，并常对红军游击队员们说，不要有“阿Q精神”。因此，在红军游击队的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对“阿Q精神”的嘲弄。这是古大存善于运用鲁迅著作来教育部队的结果。

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古大存率领红军战士渡过了两年多的战斗生活，在广东东江地区先后建立了中共地下支

部十三个，保存了一批革命的种子，使粤东大地始终高矗着不倒的红旗。

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古大存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不知道已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了解新形势，仍在大埔县深山农村，团结农民，反抗国民党统治。一九三八年四月，他看到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日报》，获悉国共第二次合作与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以及廖承志在香港进行革命活动的信息，非常高兴。他化装穿便服到香港，经过许多波折，才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取得联系，汇报了近两年来东江红军在大埔农村坚持斗争的情况。经廖承志写信介绍，古大存改名为叶怀华，到武汉法租界，见到了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周恩来、泰邦宪、叶剑英等，汇报了东江红军的斗争情况和请示今后工作方针。周恩来看到古大存脑后长的大毒疮，十分关心，叫他快医治。古大存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党，明确了今后要国共合作抗日的斗争大方向。

经长江局批准，古大存重返大埔，以合法身份，组建抗日武装，投入新的斗争。他途中到达大埔县隘隍住宿时，被顽固派发现，于是他迅速折返广州，在八路军驻广

州办事处安排下，他改名黄坚城，被送到市立医院，由著名医生兼院长古鸿烈给他动手术，切除大毒痈。十月二十一日，广州被日军侵入，古大存尚未痊愈即离开医院，步行到佛山，找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尹林平和省委宣传部长饶彰风，向他们汇报了在东江坚持斗争的情况，后随省委机关到韶关。在粤北，古大存见到了首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朋友、南雄县县长莫雄，他鼓励莫雄多动员群众投入抗日。莫雄声明要与红军联系，组建游击队，还给了古大存一份密电码，愿意同中共合作抗日。古大存再到武汉，对中共长江局组织部长秦邦宪汇报了莫雄要求抗日的情况。长江局决定由秦邦宪宣布任命古大存为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要他抓好统战工作，开展抗日斗争。

古大存回到广东，按照省委指示，利用莫雄的关系，在南雄开办了两期共产党员干部训练班，吸收四百多人来学习。

一九三九年冬，古大存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并担任南方代表团团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率领代表团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等与古大存等代表团成员会餐，并进行了意义深长的谈话。古大存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了广东革命斗争情况。随后古大存任高级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组组长。由于“七大”延期召开，古大存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任第一部主任。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时，他原则

性强，敢于深刻地批评自己，也敢于批评别的同志，使同志们对他十分钦佩。毛泽东主席当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曾在公开会议上赞扬古大存是“带刺的玫瑰花”，“一面斗争的旗帜”，“模范共产党员”。

一九四五年四月，古大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广东党在开展武装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的发言，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古大存奉中共中央指示赴东北，跋涉数千里，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达齐齐哈尔，担任中共西满分局常委、秘书长，以后他到肇州县领导土地改革运动和参加清剿土匪的斗争。一九四七年九月，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他到沈阳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长。一九四九年九月，他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

七

新中国成立后，古大存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回到广东，出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那时，广东有十多万土匪。古大存除了协助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做好各项全局

性工作外，他正确执行“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密切结合的方针，组织领导了清剿土匪的斗争，布置各级政府“安置自新土匪的生活”。经过八个月的剿匪斗争，在广东境内消灭了土匪、特务十二万四千多人。一九五二年，古大存兼任华南分局统战部长。他坚决落实党的统战政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争取了一批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稳定和巩固广东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五四年七月，古大存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副书记.一九五五年六月他又改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他努力领导了广东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组织了生产的发展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显著成绩。他还赋诗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广东肇庆市鼎湖山教工疗养所于一九五四年落成时，古大存赋诗:

咏鼎湖山

(一)

始是名山气象新，
鼎湖有主属人民；
教工新厦落成早，
群众欢声意味亲。
山涌瑞云迎日出，
云浮绿海接天青；

红光照彻人间世，
仙佛玄谈次第清。

(二)

顾盼西江矗嶂屏，
星岩羚峡侍山灵；
抛空崖势凌风雨，
放眼胸怀耀日星。
寒翠尽消炎暑焰，
庆云长护茂林春；
环听远近讴歌起，
山水同声唱太平。

咏流溪大湖

成功端在断流溪，
群力翻天事不奇；
湖水汪洋涵日月，
江水有主始扬眉。

登　山

卑尔群丘小，

城南万户低。
今朝凌绝顶，
来与彩云栖。

江　行

风起云头恶，
江波阵阵喧。
风流三两子，
击楫在云端。
漫道逢摇落，
心期浪与花。
秋云不待桨，
星火照寒沙。

解放后，古大存长期兼任广东省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主任。他亲自率领慰问团、工作组，踏遍粤东、海南、粤北等革命老根据地。在广东省政府的会议上，他反复强调："要认真考虑老根据地"，"重点放在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他的关怀支持下，广东老根据地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古大存对广东一千三百万侨胞、侨眷非常关心。土地改革时，他要求对华侨房屋、财产处理持慎重态度，土地改革后他又坚持做好善后工作。他注意安排华侨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他还十分注意安

排华侨子女的升学与就业。通过执行党的华侨政策，古大存燃起海外侨胞思乡爱国的炽热感情，发动了广大侨居异域的赤子投资建设祖国，还动员了一批华侨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古大存关心教育事业，积极促成一大批工农补习学校的建立，支持了华南师范学院的创办，并热心地兼任当时中南六省唯一的广州中医学院筹委会主任，推动了这所大学迅速建成，并培养了成千上万名中医人才，救死扶伤，治愈了无数伤病员。

一九五六年九月，古大存出席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刚结束，广东又开展“反地方主义”斗争。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一批干部受到处分，古大存受到撤销省委书记的错误处理。一九五八年，古大存被下放到县，担任中共增城县委书记。一九六二年，古大存又以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到各地视察，对怎样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了许多宝贵建议。一九六四年十月，古大存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

由于长期坚持艰苦斗争，古大存的身体受到损害。一九六六年七月，他的病情恶化。当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人到达医院看望他时，他已无法说话，只用笔书写了他的遗言：“感谢组织，感谢党和毛主席。”他在弥留之际，还用

颤抖的手写下了:“感谢党的关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古大存与世长辞。十一月八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银河殡仪馆举行古大存追悼会。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主持追悼会。广东省省长陈郁致悼词。悼词指出:古大存同志,四十多年来,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决定对古大存撤销处分,恢复名誉,再度肯定了古大存同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对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

古大存同志毕生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永远铭刻在广大人民心中,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

(何 锦 洲)



冯 仲 云



冯　仲　云

一

冯仲云（1908–1968），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余巷镇一个小职员的家庭。父亲冯德选在湘西洪江镇官钱局当职员，薪水微薄，入不敷出。

一九一四年，年仅六岁的冯仲云，随全家逃难到洪江，在洪江他进了私塾。在逃难的路上，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以及他目睹几个袁（世凯）军追赶一个姑娘，逼得姑娘跳江自杀。这使幼时的冯仲云，产生了对贫穷的怨恨和对强暴的愤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影响到洪江这个小山城，青年学生们成群结队，打着旗帜，高呼口号，在大街上游行讲演，慷慨悲愤地声讨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封建军阀的媚外卖国勾当。冯仲云看到了这一切新鲜事，更使他对黑暗的旧社会憎恨和对人民反抗运动的同情，同时也激励他起而奋争的念头。

一九二〇年秋，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并能继续求学，冯仲云随舅父回故乡余巷镇，就读于余巷小学高小班。

一九二三年春，冯仲云考入杭州蕙兰中学。这所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学生，通常是要入教的，冯仲云也接受了洗礼。但是，他并不相信地狱和天堂那一套说教，虽然参加了一些宗教活动，却觉得很可笑。这时对他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杭州图书馆里宣传新思想的报纸和杂志。他阅读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和《向导》周报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产生了报效国家的爱国思想，而且开始产生了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

一九二三年十月，直系军阀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大总统。曹锟的丑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慨，杭州爆发了反对曹锟和“猪仔”议员的斗争。冯仲云激于义愤，不顾学校禁令，参加了在西湖举行的声讨“猪仔”议员大会，并和群众一起冲进当地一个“猪仔”议员的家中，当面痛斥他的无耻行径。

一九二五年，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和游行群众，造成“五卅”惨案。杭州的工人、学生相继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冯仲云和一些进步学生，冲破了学校当局的阻挠，走上街头，参加了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西湖断桥附近的日本领事馆时，他拿起话筒在街头讲演，愤怒声讨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罪行。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仲云怀着科学救国的热望，考进

了清华大学数学系。

北大、清华是五四运动后北京和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阵地。李大钊经常到清华大学讲演，他宣讲的科学与民主两大口号和他宣传的马列主义，获得了广大同学的倾心。就在这时，冯仲云在清华大学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冯仲云除了认真、刻苦地攻读专业书籍外，尤其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报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冯仲云路过东郊民巷外国使馆区，看到安国军派兵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不久，他得知这是张作霖派兵闯入苏联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六十余人，并在二十八日杀害了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者。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牺牲，使冯仲云万分悲痛。他冷静地观察和思索了许多问题，他把一时得势的国民党右派头子蒋介石和坚持真理、坚持革命、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英勇就义的共产党人李大钊作了对比，在这鲜明的对比中。他认识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认识到自己曾笃信追求的“科学救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他真正觉悟了，坚信“只有共产党方能救中国”。因此，冯仲云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置生死于度外，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右派分子张达昌拉他参加国民党的“劝说”，在李大钊牺牲后的第三天，经朱理治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征途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北京处于腥风血雨之中。严峻的斗争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员。清华大学原有党员三十多名，这时只剩下朱理治、冯仲云等七人。一九二八年三月，由于叛徒出卖，党支部书记朱理治身份暴露，不得不离开北京。在此险恶的形势下，冯仲云被选为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共产党员坚持斗争，经常深入到工人之中，或往返于各高等学校之间，揭露蒋、汪合流背叛革命和屠杀共产党人的滔天罪行。他还经常利用夜晚，在清华园的草丛中，召开党支部会议，分析政治形势，研究对敌斗争策略。在冯仲云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党支部经受住了大革命失败后艰苦斗争的考验，而且党的力量逐步发展起来，共产党员发展到二十余人。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三日，冯仲云在参加北平东单“五一”劳动节筹备会时，被当时占据北平的阎锡山军队逮捕。在狱中，反动军阀以各种刑罚折磨他，甚至把他拉到刑场陪榜恐吓他。但是，敌人的恫吓始终没有动摇他坚定的革命意志。他不仅没有泄露党的机密，而且还在狱中想方设法开展对敌斗争。九月底，乘阎、奉两军换守之机，冯仲云等在监外党组织的配合下，砸开镣铐，逃出监狱。五个月的监狱生活，使冯仲云经受了考验和锻炼，丰富了斗争经验，抛弃了当“红色博士”的思想，而彻底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二

冯仲云出狱后，由于身份已经公开，不能继续在北平工作，于一九三〇年十月，受党组织的派遣，经清华大学教授郑洞荪的介绍，到哈尔滨负责各大学知识分子的工作。他的公开职业是商船学校数学教授。

商船学校是东北军海军司令为培养和训练海军军官而办的学校。学校对学生要求只读书、训练，不许谈国事。

冯仲云以他渊博的知识、和蔼的态度和诙谐的语言，博得了学生们的好感。为了在学生中开展工作，他把在北平念书的未婚妻薛雯接到哈尔滨，在松花江边一个叫“牛甸子”的地方住下。白天，在课堂上，他有意联系社会现实，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晚上，他对聚集在家里的学生进行反帝爱国教育。不久，冯仲云被当时有名的哈尔滨一中聘请为兼职数学教师。从此，他来往于商船学校、哈一中、哈工大、哈医专等学校。他以讲课、探讨学问为由，秘密地在这些学校建立“读书会”和“反帝会”，领导学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阅读左翼作家的作品，讨论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及青年学生的责任。并在学生中发展了共产党员，在工大建立了共产党支部。

为了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冯仲云经常去松花江边的牵牛房。这里是哈尔滨知识分子经常聚集的场所。到这里来的不仅有萧红、萧军、罗锋等进步作家，还有诗人、

记者、教员以及爱国的警察。冯仲云团结了这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和他们一起吟诗作赋，评论文学作品，撰文著书，大造反日舆论，启发民众的抗日觉悟。在这里，冯仲云同萧军、萧红、罗锋等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通过各种集会活动，了解知识界的思想动态，也利用合法的教授身份为掩护，与中共地下党接头，传递情报，布置工作。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三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东北三省。冯仲云目睹国土沦丧、人民生命涂炭的惨景，决心“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与东北人民战斗在一起”。他没有随同商船学校迁往青岛，而与东北同胞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渡过了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斗生活。

中共满洲省委派冯仲云担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反日会，是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下的抗日群众组织，开始在哈尔滨等中心城市建立，后来逐步发展到农村。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爱国群众开展反日斗争，动员各阶层人民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东北各地的反日军队。

冯仲云和杨靖宇、赵尚志等经常去电车厂、老巴夺烟厂、哈尔滨工业大学、医学专科等厂校，动员工人、学生参加反日斗争。他还组织哈一中的学生，以暑假旅游的名义，乘船去松花江下游地区，进行反日宣传活动，在木兰、通河、富锦、佳木斯等地产生很大影响。为了支持各

地的抗日军队，冯仲云通过各地反日会动员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去参加马占山的抗日义勇军和李杜的自卫军，直接对日作战。他同时还在哈尔滨募捐，购买军用物资和药品，送到前线，有力地支援了各地抗日军队的反日斗争。

三

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日军进入哈尔滨。当天晚上，冯仲云和赵尚志两人，来到松花江北呼海铁路修理厂，参加工人集会，发表讲演，散发传单，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号召工人武装起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由于突然发生日本侵占事件，许多县委同满洲省委失去了联系，党的活动经费也发生了很大困难。冯仲云以省委外部交通的身份，前往各地，积极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和联络工作，他还把自己的工资交给党组织做活动经费。

在松花江桥头一个叫牛甸子的岛上，冯仲云租用的一所洋房，名义是冯仲云的家，实际是中共满洲省委的一个联络站。一九三二年五月，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哈尔滨一个伪警备队哗变。为了配合这次行动，需要赶制大量的宣传品。一天夜里，省委几位领导人，在冯仲云家里，亲自动手，省委书记罗登贤用毛笔蘸着阿姆尼亚药水在蜡纸上书写，军委书记赵尚志和省委内部交通员薛雯负责印刷，冯仲云一边放哨，一边准备纸张。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石印机的嗒嗒声显得格外响。为了防止敌人巡逻队听到响声，冯仲云让薛雯故意把刚刚满月的女儿“囡囡”弄得大声

哭叫，一边使劲地脚踏地板，哼着歌曲，装做哄孩子。印好的宣传品，除省委几位领导人带走一部分，其余全由薛雯藏在女儿的襁褓中，她抱着女儿镇静地送到各联络站。

三

一九三二年十月，冯仲云受中共满洲省委派遣，以中共满洲省委驻松花江下游代表的身份前往汤原县，去创建汤原反日游击队。

汤原是汉族和朝鲜族集居的地区，也是伪满三江省统治的中心。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早已进行了抗日工作，并建立了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冯仲云来到汤原，落脚在汤原中心县委所在地——鹤立河南岸的七号屯后，立刻召集中心县委会议，分析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布置了工作，他特别强调了民族团结和建立反日武装的重要性，并着手组建汤原游击队。他深入到鹤立岗煤矿，在矿工中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在附近几个矿区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由于日本特务、汉奸的挑拨离间，汉族和朝鲜族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隔阂。为粉碎敌人制造民族分裂的阴谋，促进汉鲜两族人民的团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冯仲云动员共产党员去做汉、鲜两族群众的团结工作，以日本侵略者压迫、奴役汉、鲜两族人民的大量事实，揭露敌人的阴谋，说明团结抗日的重要。经过宣传、教育，汉鲜两族

群众逐渐消除了隔阂，出现了团结抗日的大好局面。

为了解决游击队的干部问题，冯仲云在汤原办了一个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抗日游击队的骨干。著名的抗联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就是训练班的学员之一，他经冯仲云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汤原，冯仲云患了克山病，高烧四十度，全身浮肿，中心县委的同志秘密送他到县城医院治疗，他没等浮肿消退，就返回了工作岗位。由于冯仲云忘我的工作，建立反日游击队的工作进展很迅速。十月中旬，汤原中心县委在七号屯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汤原人民第一支反日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汤原游击队，共有队员四十余人，李福臣任队长，赵瑞华任党支部书记。在成立大会上，冯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讲了话，他愤怒声讨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杀人放火、奸淫掠夺的罪行；他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拿起武器，参加游击队，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战斗。他的讲话，鼓舞了游击队战士们的士气，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

汤原游击队成立后，由于装备不好，缺乏战斗经验，不久就被土匪缴械而失败。冯仲云和中心县委总结了第一次建队失败的教训，积极创造条件，着手第二次建队。

十二月，冯仲云和中心县委领导七号屯一带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抗租运动。他们提出“不向汉奸、地主交粮”、“开展抗日斗争”等口号。这场抗租

运动使广大人民进一步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同时也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反动气焰，推动了汤原地区反日斗争的发展，群众纷纷捐粮、捐款支援游击队。不久，在七号屯第二次建立了以反日会员为骨干的汤原反日游击队，由夏云杰任队长，共有队员五十八人。这支游击队，神出鬼没地战斗在松花江两岸。汤原游击队后来虽又遭到挫折，但是冯仲云在这里播下的反日武装斗争的种子，终于发芽生根，战功卓著的抗联第六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东北出现了抗日斗争的大好局面。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继续推行错误政策。一九三二年六月，在上海召开的北方五省会议，否定东北地区斗争的特点，大反“北方落后论”、“北方特殊论”，要求处于日军占领下的东北与关内一样，建立红军，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种“左”的错误指导，脱离了民族解放斗争日益高涨的东北的实际，给东北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带来了非常有害的影响。

在松花江下游地区，冯仲云自觉与不自觉地贯彻了北方五省会议的精神，他派游击队到罗北县去缴地主的武装，在数百里荒无人烟的沼泽中，在仅有二三百户人家的村庄里，建立离群独居的苏维埃。广大群众要求开展抗日斗争，而领导却要建立工农红军。在反日策略上，没有很

好地去团结、聚集一切反日力量，向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走狗作斗争，反而在抗日军中执行哗变政策，排斥和分化其它抗日武装，使自己孤立起来。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葬送了我们不少的同志。后来冯仲云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我回忆这段笨事，深感政治上的幼稚。”斗争的实践，特别是遭受挫折之后，使冯仲云认识到北方五省会议的精神是行不通的。为了使上级党组织对抗日斗争中出现的问题有全面的了解，冯仲云和汤原中心县委负责同志研究决定，由他回满洲省委汇报。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冯仲云和交通员李升步行十多天，走了六百多里路，回到了哈尔滨。

四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共满洲省委接到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指示信分析了满洲的形势，要求满洲党组织，尽可能结成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并在统一战线中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指示信虽然仍受到王明“左”倾的影响，但却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针，这对于长期实行关门主义策略深受其害的东北党组织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为了尽快让中共磐石、海龙县委和杨靖宇、李红光领

导的南满游击队，了解“‘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中共满洲省委派刚从汤原回来的冯仲云，立即以省委南满巡视员的身份，去南满传达中央的指示信。

当时，日伪军正在向磐石游击区发动进攻，形势非常严峻，要想经过敌占区进入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这对于人地两生、操着一口南方话、一眼就能看出是知识分子的冯仲云来说，困难和危险就更大了。五月一日下午，冯仲云身着青布长衫，脚穿胶鞋，戴着旧礼帽，打扮成乡村教师的模样，冒着濛濛细雨，在警戒森严的哈尔滨车站搭上了南去的列车，前往吉林。按照联络路线，他找到了中共吉林特支书记李维民。他们商定由省委巡视员傅天飞和吉林特支的金景送冯仲云去磐石县南满游击队。在约定的时间内，金景没按时到达，这引起冯仲云的警惕，他立即回到李维民家商量对策。不一会，一个姓袁的同志神态紧张地赶来报告：“金景昨晚撒传单，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在严刑拷打下叛变了……”冯仲云听后果断决定：立即转移李维民的家属，把金景叛变的事通知所有能找到的同志，告诉他们立即隐蔽起来。金景叛变后，供出了冯仲云的行踪和党、团组织。敌人立即在全城戒严，把金景带到车站捕捉冯仲云。冯仲云及时地改变了去磐石的路线，从吉林郊区黑牛圈上车，前往海龙县的草市站。到草市站后，为了避免敌人发现，冯仲云摘下眼镜，装扮成盲人，由傅天飞拉着他走。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忍

饥挨饿，爬山越岭，四处寻找，奔波了六七天，终于在群众的帮助下，找到了中共海龙县委。冯仲云向海龙县委传达了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紧接着他又去磐石游击根据地。途中，路遇伪军骑兵队，又逢山洪暴发，他长时间浸在水里隐藏，全身泡得肿胀，伪军人马赶到，搜查多时没发现他的踪迹，只好扫兴而去。之后，他机智地闯过伪军的几道关卡，同中共磐石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接上了关系。此时，杨靖宇去中共满洲省委开会，南满游击队政委李红光和全体队员热情欢迎冯仲云的到来。在游击队党委扩大会议上，冯仲云传达了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他强调指出："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不顾东北具体条件建立红军和苏维埃的脱离群众的作法；必须改变与一些抗日武装队伍闹磨擦的关门主义倾向；必须壮大我们自己的基干队伍，用来团结其它抗日武装队伍，结成反日统一战线。"

冯仲云在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艰险面前，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传达中共中央指示信的任务。他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安全回到哈尔滨，出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

日本侵略者为了消灭中共地下党组织，派特务头子土肥原亲自来哈尔滨坐镇指挥，日伪警察、宪兵、特务密布全市，活动十分猖獗。在这险恶的环境中，冯仲云依然来去从容，坦然自若。他有时打扮成西装革履的阔商人，有时化装成衣衫褴褛的穷工人，有时又成了衣冠楚楚的学

者、教授。为了保守党的机密，冯仲云的家要经常变动住宿地点，变换联络信号。他家的三个黄格面大沙发，背后藏着编好号码的文件。冯仲云嘱咐妻子说："从事地下工作，除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外，要防止思想上的麻痹，文件一定要保管好，沙发背要经常检查，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点破绽，这些文件比生命还重要。"

作为中共满洲省委的秘书长，冯仲云的工作十分繁忙。他要主管党内交通联络，要安排各县来哈尔滨的干部的调训，要负责省委领导同志的安全，还要领导省委机关的工作。和冯仲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每当回忆起这段生活，都敬佩不已。

一九三四年春，满洲团省委书记杨波被捕叛变，供出了冯仲云夫妇。于是，冯仲云夫妇便成为敌人悬赏通缉的要犯，他们的画像被贴在哈尔滨的街道上，敌人还派出军警，携带叛徒四处搜寻。中共满洲省委考虑到冯仲云夫妇的危险处境，决定派冯仲云到珠河游击区。临行前，他们夫妇依依话别，冯仲云对妻子说："这次离别，我想有三种可能，一是你回家安排好事情，两个月后又能见面；二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要等革命胜利后再相见；三是你或我或两人都为革命牺牲，这次就是我们的永别吧！但无论怎样，都要无愧于革命。"一席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就在同一天，他们得知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罗登贤壮烈牺牲的消息。为了永远怀念难

忘的领导和亲密的战友，他们在万分悲痛的心情下，把心爱的女儿的名字改为“忆罗”。

迅速发展的抗日浪潮，把冯仲云推到了抗战第一线。薛雯回到江苏武进县，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斗争。险恶的环境，使他们音讯断绝了十二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又重新团聚。

五

冯仲云从一九三四年秋进入游击区后，不断往来于珠河（现尚志县）、方正、木兰、汤原、同江等县，为扩大抗日队伍和开辟党的工作而奔波。

冯仲云来到珠河中心县委所在地三股流时，正值日伪军二千余人对珠河根据地进行“秋季大讨伐”。冯仲云和哈东支队司令赵尚志一起研究了粉碎日伪军秋季“讨伐”计划，决定以部分兵力留在根据地和游击区牵制、袭击敌人；赵尚志和冯仲云率骑兵主力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延寿、方正一带，实行内线、外线配合作战。由于根据地军民的英勇奋战，很快就粉碎了日伪军的“秋季大讨伐”，哈东支队主力也胜利地返回珠河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此时化名冯群）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团。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后，在赵尚志、冯仲云的率领下向双城以东挺进，他们在智取四道河子后，经过宾县八道河子、秋皮囤、二荒顶子，渡过蚂蚁河，连续攻下了延寿境内的花石砬子大排和乌拉草沟、姜家崴子等地警察所，然后又转入了方正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

在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冯仲云不仅注意部队党组织的威信，也十分重视从政治上、思想上提高部队的素质，加强部队的战斗力。他常常给部队上文化课和政治课，用通俗的语言讲解形势、任务和党的政策。他教育干部、战士遵守纪律，保护群众利益，搞好军民关系，实行官兵平等。他以身作则，和战士同甘苦，深得干部、战士的尊敬和信赖。

冯仲云很注重在反日斗争中的统战工作，他和赵尚志一起，对谢文东、李华堂等反日武装，进行了争取和联合工作。冯仲云对工人出身的山林队首领祁明山作了耐心说服工作，称赞祁明山有志抗日，致力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劝他放弃山林队绰号，改名祁致中。祁致中后来成为抗联第十一军军长，他的队伍成为活跃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一支抗日劲旅。

一九三五年四月，冯仲云兼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为使抗日武装有巩固的后方，他重视加强根据地建设。他和珠河中心县委的领导人一起，在珠河附近的广大农村，建立起抗日救国会、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儿

童团、妇女会等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具有政权性质的农民委员会。经过冯仲云和中心县委艰苦而有效的工作，游击区不断扩大，形成了包括珠河、延寿、方正、阿城、五常、双城等县在内，东西二百多里，南北三百五十里的广大地区。游击根据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农民自动地担负起侦察敌情、铲除密探、传送情报的任务，妇女为游击队补衣、做饭，儿童替游击队站岗、放哨。

珠河根据地的巩固和反日武装的发展，引起日伪统治者的极大恐惧。他们把哈东地区反日武装视为“满洲国治安的最大祸患”，惊呼这里“宛然有共产王国之感”。一九三五年八月，日军确定了军事“讨伐”，并配合“集团部落”的方针，对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和珠河根据地疯狂地进行“讨伐”。敌人采用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纵横数百里的游击区和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破坏。

九月十日，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召开执委会，分析和研究了哈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通过了《目前哈东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决定由赵尚志率领第三军主力向松花江下游一带转移，开辟新的游击区；由冯仲云率领第三军第二、三团和部分青年义勇军，在珠河、五常一带坚持斗争。

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冯仲云指挥部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依靠当地群众，同敌人周旋。一次，敌人

讨伐队从小路偷袭黑龙宫（现尚志县黑龙宫大队），被群众发现，群众连夜赶来报告。冯仲云立即带十几名青年义勇军战士，埋伏在黑瞎子沟附近，利用这里三面环山一面是谷口的有利地形，消灭了日军十几人，并缴获一些武器和物资，戳穿了日伪统治者散布的“珠河已无反日队伍，反日军已被全部消灭”的谎言。根据地军民坚持了几个月反“讨伐”斗争，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遭到挫折。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冯仲云仍深入红石砬子、十三堡、六道河子、密峰、三股流一带，组织干部、党团员和群众进行转移。冯仲云在同中心县委十余名同志转移中，途经芦家窝棚时，遭到敌人袭击，县委秘书金风笙等牺牲，冯仲云身负重伤。冯仲云伤愈后，带领一部分留守珠河、方正地区的部队，在宾县渡过松花江，到达汤原帽儿山一带，和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主力汇合。

六

一九三六年八月，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精神，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九月十八日，为了总结一九三五年以来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和游击区的统一领导，在汤原帽儿山召开了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联

席会议，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冯仲云当选为省委书记。在这段时间里，冯仲云和北满临时省委其它负责人一起，着重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在党的建设方面，省委在健全和加强桦川、依兰两县特支的同时，把延寿、通河、方正、巴彦、宾县、海伦、绥宾、同江等地的党组织相继恢复和发展起来。省委还向抗联第三、六军及其它抗日武装派去了一批党员干部，以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并在军领导机关建立了党支部。在部队建设方面，省委大力开展了军队的扩编工作，同“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等抗日武装建立了统一战线。在群众工作方面，省委把开展武装斗争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在松花江下游地区广泛建立了农民自卫军、青年义勇军，发展了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组织，在山区建立了后方根据地，开辟了包括方正、延寿、通河、宾县、巴彦、木兰、依兰、汤原、抚远等二十余县的广大游击区，为北满的抗日斗争，准备了广阔的阵地和群众基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八月二十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做出了在松花江下游地区举行“九·一八”雪耻大暴动的决议。会后，冯仲云会同中共下江特委书记白江绪和中共汤原县委负责人，共同制定了行动计划。九月十八日那天，在冯仲云等人领导下两千

多农民手持洋枪、土炮、锄头，在汤原县格区举行了血耻大暴动，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就连日伪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三江已成共党的乐土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动员了三个师团及大批伪军，对松花江下游地区的反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讨伐"，虽经抗日军民不断奋力反击，但也不断地遭到挫折，到一九三八年春，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极为艰苦的时期。

为了粉碎日军消灭或困死北满抗日联军的企图，保存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一九三八年六月，活动在北满的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的部分队伍，冲破敌人的包围，分三批向黑龙江、嫩江地区西征，开展了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

冯仲云为了配合抗联西征部队的作战行动，他率领留守部队坚持在下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他们除了要对付敌人的尾追、堵截和偷袭外，还要与可怕的严寒和饥饿作斗争。北满的寒冬，积雪没膝，冯仲云和战士们一样，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身着"开花"棉袄，脚穿靰鞡，白天行军打仗，晚间露宿在篝火旁。《露营之歌》所描述的"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风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情景，正是他们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最苦的是伤病员，没医没药，含苦忍痛坚持斗争，有的晚上睡下，第二天早晨就成了僵尸。对抗联战士来说，

饥饿是又一大威胁，没有粮食，杀战马，吃完马肉吃马皮，马吃完了吃草根，吃树皮，甚至吃靰鞡。虽然有些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在雪里埋些粮食和衣物，但在日伪反动统治的严密搜查下，多数到不了抗联战士手中。为了弄一点粮食，往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多少胸怀壮志、勇赴国难的抗联将士，默默死在饥寒病困之中。

在艰苦的岁月里，冯仲云深知一个党的领导者所肩负的革命重任。他关心每个战士和伤病员，每天睡到半夜，总先起来，把大家都叫醒，起来活动，以免冻坏了身体。他常常用少有的一点盐面，给伤员洗伤口，有时从褴褛的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帮助伤员包扎。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冯仲云身体很虚弱，他面容憔瘦，胡须很长，嘴唇常常起泡，溃烂出血。只有三十岁的冯仲云，常被人误以为老人。然而，他的革命意志却是旺盛的，他曾坚决向省委表示："以十三年之政治生命与光荣来担保我的行动，不离开组织，革命到底。"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和战士一样练刺杀、投弹。在这极端艰难的时期，他和东北抗联战士，通过《救国时报》和《新华日报》，得知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八路军抗战的消息。从这以后，他经常用毛泽东、朱德的革命事迹来教育鼓舞部队的士气。他反复向大家讲：黎明前是黑暗的，也是很冷的，但黎明过后，曙光就会到来。在熊熊的篝火旁，或是在沐浴着兴安岭的温煦阳光之日，冯仲云也曾无数次想念自己的妻子和

孩子，为彼此长期不知音讯而备受煎熬。一九四〇年初，冯仲云进入讷河县，看到街上的邮政信筒时，想到应给妻子写封信了。他写了，告诉她自己还活着，鼓励她要继续忠于党的事业。信寄走了，但他自己在戎马倥偬中自然无法得到回音。在抗日战争更艰苦的岁月里，他几乎忘掉了自己的亲人，偶尔想起，也好象她们留在那遥远的记忆中，一切都是那么模糊了，他所想的，更多的是美好的明天，他唯一的信念，是祖国会独立，唯一的的希望，是人民会解放。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二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执委会议，决定冯仲云以中共北满省委代表的身份，负责下江地区的领导工作。会后，冯仲云立刻赶赴下江的罗北一带，对在那里的抗联第六军进行整顿。在一九三八年日军大“讨伐”中，第六军受到损失，兵员锐减，人心浮动，纪律松弛。冯仲云经过调查研究认为：“下江的情况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人民是拥护我们的。只要有坚毅的精神，拿出勇气，找到方法，克服困难，下江的情势和工作定能好转。”

冯仲云在下江地区收拢了被日军打散的部队，整顿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各级领导力量。同时，他抓紧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抗战前途和革命纪律的教育。第六军一团原有一百二十三人，这时只剩二十七人，冯仲云先后逐个同他们谈话。有个连长感到抗日太艰苦，想离开

队伍。冯仲云找他一连谈了七次话，耐心教育，反复开导，对他说：革命熔炉，既能炼出钢，也能炼出渣，真正的革命者，是能够正确对待艰苦的，意志薄弱的人，会临阵脱逃，只有革命意志坚强的人，才能革命到底，成为人民英雄。从而坚定了这位连长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冯仲云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这支部队的干部和战士振奋了精神，成为具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

七

为了重整北满抗日的阵容，以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以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为基础，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并发表了成立宣言，向全国通电。抗联第三路军由张寿篯（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参谋长；下分为龙南、龙北两个部分，龙南部队活动在海伦、望奎、绥稜、庆安、绥化一带，龙北部队活动在嫩江、讷河、德都、通北、北安、克山等地。

冯仲云担任抗联第三路军政委之后，对于在游击活动中的军事和政治策略曾有过周密的考虑。他和总指挥张寿篯共同研究确定了行动计划和作战方针。他提出：队伍不能死守大山，必须吸收更多新的力量才能生存。应该发展脱离生产与不脱离生产的青年义勇军和游击队。他还提出：要保存实力，巩固队伍，培养新干部，以英勇的、有

限的活动来冲破敌人的讨伐。

一九三九年九月，冯仲云受苏联边防军的邀请过界入苏。与苏联边防军协商后，他请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周保中和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到苏联伯力会谈。在苏军帮助下，一九四〇年一月到三月间，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三人在伯力开会。会议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文件和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精神，总结了东北抗日斗争以来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确定了东北党的任务，制定了东北抗日斗争的策略，在此基础上共同制定了《东北抗日救国运动新提纲》，提出了东北抗联为保存实力，收缩编制，把抗联三个路军统一改编为十二个支队的方针。同时，与苏联远东军负责人协商，建立了双方相互支持与合作的关系。伯力会议是抗联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冯仲云在会议的召开和达成协议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四〇年三月，冯仲云率一支小部队离开伯力，返回抗联第三路军指挥部。他们跨越崇山峻岭，走过数百里人烟绝断的沼泽地，击退了日军的追击和土匪的偷袭，战胜了饥饿和疲劳，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在通北县南北河附近找到了抗联第三路军指挥部。

冯仲云和张寿篯见面时，两个亲密战友都十分激动。张寿篯说："老冯，好久不见了，没想到你我还活着，能在这里见面。这样说来，我们还能为祖国独立战斗若干年。不知你给我带来了什么？"冯仲云说："我带来了毛泽

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这是我们今后抗战的经典。”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志向，在烽火与血泊中凝成的战斗友谊，把两位战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为使抗联第三路军纵横驰骋于黑嫩平原，第三路军指挥部召开了党委会，由冯仲云传达了伯力会议精神，制定了第三路军的行动计划：“依托朝阳山区，开展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深入敌人心脏地带扰乱敌人。加强地下党的工作。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根据南满、北满、吉东三省委共同确定的“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一九四〇年六月，抗联第三路军指挥部决定，将全路军整编为三、六、九、十二四个支队。冯仲云离开指挥部，前往绥棱县老金沟，向第六支队传达了第三路军指挥部的决议。接着他又去铁力县，向第九支队传达了第三路军指挥部的决议。当时，第九支队的给养，特别是粮食十分困难，全靠野菜和野果充饥。为摆脱困境，冯仲云与九支队的领导干部共同研究，决意袭击圣浪站。

圣浪站是绥佳线上的一个小车站，街里有日伪军的“配给店”，存有大批粮食和物资，驻有日伪军六十余人负责警卫。一天夜晚，冯仲云率领四十多名战士，借着夜幕的掩护，袭击了日伪军的营房，将日伪军全部缴械，并从“配给店”里缴获大批粮食和物资，解决了九支队的困难。

七月，冯仲云来到安邦河沟的第十二支队，见到了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此时，恰逢“三肇（肇东、肇源、肇州）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徐泽民来北满省委汇报工作，从汇报中得知“三肇”地区党的工作和群众抗日斗争发展很快，迫切要求部队到那里开展游击战争。冯仲云和金策、许亨植研究了这一情况后，做出远征“三肇”的决策。不久，许亨植率第十二支队，向三肇平原进发，先后打下了丰乐镇、肇源等数座城市，歼灭了不少日伪军，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受到很大鼓舞，推动了哈西一带的抗日斗争。

一九四〇年秋，日军集中了大批兵力到讷河、德都、通北、海伦一带封锁山区，妄图一举围歼抗日联军。针对日伪军这一阴谋，冯仲云和第三路军领导人决定，在山区建立密营，同时也积极开展地方工作，依靠抗日群众的支持和利用青纱帐，开展松嫩平原的游击战争。这时，冯仲云带领第九支队和第三支队汇合。冯仲云和两个支队的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敌我态势，又根据多次侦察所掌握的情况，决定利用敌人注意力集中在山区、后方守备空虚的有利条件，奔袭克山县城，以解决部队急需的口粮、服装和枪支弹药等物资。

九月二十三日夜晚，冯仲云、王明贵、王钧、高禹民等率领二百多抗联战士，行进在北兴到克山的公路上。他们轻装疾驰，夜行晓宿，于二十六日晚逼近了克山县城。按照预定计划，王明贵指挥第三支队一部袭击日军西大

营，把日军守备队牵制在西门之外；高禹民率第九支队攻打西门警察派出所，占领伪军团部；冯仲云、王钧率第三支队主力，隐蔽接近伪县公署、伪警察局等处。第三支队主力发起攻击后，经过短促而激烈的战斗，占领了伪县公署和伪警察局。与此同时，王明贵、高禹民也指挥部队发起攻击。部队攻克了监狱，打开了牢房，释放了二百多名“囚犯”，砸开“囚犯”的手铐和脚镣，其中许多人当即加入了抗联队伍，投入战斗。日军守备队在抗联战士的猛烈打击下，很快土崩瓦解，伪军团部、银行、仓库等地相继被占领。正当抗联战士清扫战场收缴战利品时，日军援兵赶到，开动装甲车向抗联部队反扑。勇敢的抗联第三、九支队的战士们，用机枪和手榴弹打坏了日军的装甲车，并集中火力强夺东门。这时，冯仲云一面组织部分战士阻击敌人，一面指挥大部队撤退，经过几小时的战斗，终于摆脱了日军的围攻，杀出克山县城。这次战斗毙日军几十人，缴获长短枪数百支、子弹万余发及大批军需物资，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克山战斗是东北抗日联军后期进行的一次重要战斗，在东北抗联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张寿篯、冯仲云指挥的抗联第三路军，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活动在德都、龙江、木兰、绥化、呼兰、海伦、克山、“三肇”等三十余县，东拚西杀，南征北战，牵制了大量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各抗日战场的抗战。就连伪满洲国《治安小史》也曾作过这

样的记载："第三路军是行动中最活泼的匪团。"经过十几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冯仲云不仅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也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解除后顾之忧，屯兵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对抗日联军进行毁灭性的"扫荡"，对深山老林反复"网罗"，摧毁了山中密营，使抗日联军遭到空前的劫难。

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一九四二年七月，中共南满、吉东、北满三个省委合并，统一组成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崔石泉，委员有周保中、张寿篯、冯仲云等。中共东北委员会确定了"保存实力，培养干部"的方针，改变了过去的游击方式，抗联部队除一小部分就地坚持斗争外，主力转移到苏联境内隐蔽整训，成立了东北抗联教导旅。冯仲云按照组织的决定，初任教导旅连指导员，后任旅政治部情报科长兼政治教员。

在苏联境内进行的三年多野营整训期间，冯仲云除做好政治教育工作外，还自学了俄文，翻译了许多材料，供部队学习、使用。他自己还抓时间认真地学习了一些理论著作。他也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钻研过航空兵战术。他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军事科学知识都有很大的提高。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月，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坚持十四年游击战争的东北抗日联军积极配合苏军作战。为此，中共东北委员会发出了"配合苏军作战，消

灭日本关东军，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指示。八月二十二日，冯仲云带领部分抗联干部、战士从伯力飞到沈阳，他出任苏军驻沈阳市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在苏联的其他抗联干部，也分赴东北各城市，帮助苏军维持占领区的秩序，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和建立根据地的活动。

九月，冯仲云在沈阳见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和陈云等主要领导同志，彭真对冯仲云说：“我们共产党人二十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

东北人民的十四年抗日战争，确实是可歌可泣的，东北抗联将士坚持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全国抗日战争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抗日战争胜利后，冯仲云在给他的妻子薛雯的信中说：“在强敌入侵，山河破碎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抗日武装，在长白山的深谷密林中，在松花江两岸的原野上，为中华民族苦斗了十四年，身经百战，血染征袍。曾经弹尽粮绝，挨过长期的饥饿，用草根、树皮、马皮充饥；曾经在塞外零下四十度的朔风中露天度过漫长的冬夜，艰苦卓绝地奋斗，矢志忠贞祖国和人民。”这就是冯仲云抗敌经历的缩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产生了冯仲云，也造就

出千百万个冯仲云式的伟大的英雄。

八

冯仲云是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战场上的幸存者。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光复后，冯仲云又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忠心耿耿地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在他担任沈阳苏军警备副司令的时候，他遵照中央“肃清反动武装，发动群众收集武器资材，发展部队，接管城市”的指示，查封了一批反动报纸，解散了一批反动组织，收缴了许多武器，逮捕并镇压了一批汉奸、特务、流氓和土匪。针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冯仲云多次召开市民大会，亲自到街头讲演，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与此同时，他派唐万有等人到沈阳铁西区，动员了一万余名失业工人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冯仲云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期间，根据陈云的指示，撰写了东北抗联史和抗联回忆录，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滔天罪行，回顾了抗日联军走过的艰苦历程，颂扬了苦斗十四年取得的光辉战绩，讴歌了抗联将士无限忠于祖国，无限忠于中华民族，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伟大民族气节，给党和人民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

东北解放后，东北局曾决定调冯仲云去北平做外事工

作，他听说后亲自去找陈云同志，要求留在东北工作，要在他曾流洒鲜血、备受艰苦的地方，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松江省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冯仲云为松江省政府主席。在松江省政府成立典礼上，冯仲云代表省政府向全省同胞宣誓："为建设民主、繁荣的新松江省而努力奋斗。"

抗战胜利后的东北，条件比较艰苦，困难很多，为了开展新的局面，冯仲云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他领导松江省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肃霸"、"肃匪"斗争和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服从战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思想指导下，松江省政府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东北是全国的粮食基地，冯仲云领导全省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生产运动。他亲自组织十多名懂农业技术的干部，买来拖拉机，开荒生产。他经常去各县总结爱国丰产经验，通过组织农民改良农具、提高生产技术、推广良种、发放农业贷款、奖励劳模等办法，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一次，松花江洪水泛滥，人们赶来向冯仲云汇报。可是，冯仲云早已赶到现场，他正在指挥抢救良田和受灾的群众。

一九四九年五月，冯仲云怀着发展我国的文化、科学、技术事业，并把东北建成工业基地的抱负，兼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当时，东北的建设非常缺乏懂科学、

懂技术的人材，为此，冯仲云先后两次去关内招聘人才。在关内，冯仲云到处宣传，东北是个富饶、美丽的地方，那里有无数的宝藏正待开发利用，那里建设急需人材等等。在他的鼓动下，几百名专家、学者、教师被聘到松江省，充实到学校、工厂、企业和科研部门中去，从而推动了松江省建设事业的发展。冯仲云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他经常坚持给哈工大学生上政治课，他还要求学生讲卫生，懂礼貌，激励学生们学好科学文化知识。

新中国的诞生，人民的解放，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冯仲云无限怀念那些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英勇献身的死难烈士。为此，他和有关部门积极筹建东北烈士纪念馆，修建烈士纪念碑。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烈士子弟学校，尽管政务工作繁忙，他还要抽出时间去看望这些烈士的遗孤，祖国的后代。在冯仲云的关怀和爱护下，这些革命后代茁壮成长，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

一九五二年九月，冯仲云服从中共中央的调动，离别了二十二年共患难、同战斗的东北人民，来到首都，就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一九五四年九月他又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兼华东水利学院院长。一九五八年，水利、电力部合并，他担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直到一九六八年逝世。这期间，他还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抗日战场上，在对敌斗争中，冯仲云是冲锋陷阵的勇士，他勇敢、坚决，一往无前。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同样以极高的热情和开拓的精神，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精心创业，只要是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他都尽心尽力地干好。

冯仲云担任建国后北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后，对图书馆的工作充满了自豪感，他曾说："北图是个事业机构，是个学术单位，是社会大学，是亚洲的明珠。我领导的不是几百，几千，而是几百万大军，在这里大有作为。"他决心办好这个图书馆。

在工作千头万绪的情况下，他首先抓思想和业务建设。他集思广益，深入实践，调查研究，然后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他带领大家，对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进行改革，在北图实行了读者登记制度，开辟了机关团体借书和照像复制业务，还加强了参考咨询和专题书目的工作。还在市郊工厂、工地、部队、农业合作社建立了图书活动点，举办了各种主题的报告会、图书与图片展览以及作家与读者见面会等活动，这些活动既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也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情报，开创了图书馆面向社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代新风。

冯仲云工作起来，有魄力，有远见，他强调图书事业要广收博采，不搞自我封锁。在他领导下，北京图书馆和国内、国际图书单位建立了交换关系，打开了我国与世界

各国图书交流的渠道。

冯仲云在北图工作的二年期间，北图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把一个长年平静的藏书楼式的旧北图，建设成了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北图。

冯仲云在水电部主管科研和教育工作期间，勇于实践，大胆探索，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水、电事业上，为祖国水电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冯仲云一个很大的优点是一生尊重知识，重视技术，重视人材。他常说：没有一支宏大科学技术队伍，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一句空话。他重视水利科技队伍建设，也重视科研机构的设立。在科研工作中，他殚精竭虑，总是能抓住解决关键问题的重大科研课题，一抓到底，抓出成果。

人们回忆起冯仲云，都说他的工作热情象火一样，他走到哪里，哪里就被火一样的热情所感染。一九六〇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三门峡水电站工程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这困难的日子里，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冯仲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深入实际，广泛听取专家、工程师和工人的意见，帮助他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终于突破了这个工程焊接技术的难关，受到了周总理的赞扬。

冯仲云由于长期为革命奔波，积劳成疾。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他心脏病发作，经检查发现心肌梗死三分之一，心脏创伤很严重。

对待疾病，同对待革命和困难一样，冯仲云始终保持乐观主义精神。他病情稍一好转，就对家属和同志们说，你们不要为我担心，我还能为党工作十五年。强烈的革命事业心，使冯仲云学习成癖。病休期间，他仍坚持学习。别人看到他仍有那么大的学习劲头，很不理解，冯仲云则说，身体不好，我不能当部长了，但我可以搞点技术和科研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还要"做一个园丁或混凝土中的一颗石子"。

一九六八年一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罗织罪名，将身患重病的冯仲云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关押入狱。严重的身心摧残，使他陈旧性的心肌梗死的心脏创伤更加严重。他双脚浮肿，又患胃病，三月十六日下午，再次昏倒于批斗会上。在得不到抢救和治疗的情况下，第二天，冯仲云便含冤逝世，终年六十岁。

这位出生入死，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主义奋斗了四十多年的革命老战士、老共产党员，没有倒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也没有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却死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的"批斗会"上！他要带着病痛再为社会主义奋斗十五年的强烈愿望，却被那罪恶之手硬给扼杀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憾事，也是中华民族的憾事！他战斗过并为之洒过鲜血的松花江两岸的土地为之不平！凝结着他的心血的三门峡水坝也为之不平！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中共中央为冯仲云平反昭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为他的光辉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

冯仲云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忠心耿耿，历尽艰辛，无私地为东北人民的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祖国无畏地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祁 瑞 清）



李　涛



李　　涛

一

李涛（1905-1970），原名李毓英，曾用名李湘舲，一九〇五年九月八日出生于湖南省汝城县延寿乡新坡村一个耕读世家。

祖父李良德，清朝秀才，祖母操持家务，生五子。父亲李逢侍是长子，晚清秀才，一生教书，只有李涛一子。李逢侍知书达理，教子很严，一心指望儿子成才。李涛，奶名开源，自幼聪慧颖达，深得祖母钟爱。他七岁时，在本村族学“美富学堂”开蒙，取学号“盛才”。一年后，他随父到延寿达德小学上学。他的接受能力极强，喜好新鲜事物，讨厌死记硬背。有一次，父亲要他背书，手持戒尺，背不出就要打。他昂着头，噘着嘴说：“你打吧，打死了，你就没有儿子了！”

一九一七年的年底，学校考试时，县里督学前来视察。李涛最先交卷，名列全班第一。督学发现他有天资，指名要他到自己兼任校长的县立模范小学就读。李涛进入

模范小学读书三年，成绩优良，未经升学考试，就直接升入县濂溪高小。他在高小的三年中，五个学期的考试成绩均名列榜首。当时校方规定，如果连续六个学期考第一，就可以免费升学。由于学校有一个老师歧视延寿人，硬把李涛的分数给拉下来，致使他失去了免费升学的机会。

延寿是偏僻、落后的山区，能到县里读书的人，可谓凤毛鳞角。县里人常欺负延寿人，蔑视他们“山古佬”、“延寿佬”，他就叫他们“县里佬”。有一次，七八个纨绔子弟围着他厮打，还跑到校长那里恶人先告状。校长说：“你们天天骂人家‘延寿佬’，人家哪点比不上你们？你们学不长进，整天寻事打架，真是自贱！”从此，谁也不敢再欺负李涛了。

正当李涛发奋读书时，父亲不幸病逝。这时他才十三岁。父亲临终前惋惜地说：“开源这崽聪明用功，如果我不死，不吃不喝也要供他读书。”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祖母和叔叔们极力设法凑钱供他上学。父亲过早地离世，使他小小年纪懂得了人世的艰难，每逢假日回家，他都帮助母亲做家务，带族中弟妹，敬长爱幼。每逢开学，二叔给他学费时，都用红纸包着，上面写着“当用则用，切勿奢华”八个大字。他牢记嘱咐，省吃俭用，把节余下的零钱给族中弟妹买书本，给婶娘们买针线。这种廉洁的家风，对他后来一贯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民国初年，湘、粤、滇、桂四省军阀队伍先后经过汝城，敲诈地方，劫掠人民，老百姓在层层重压下艰难度日。地处湘粤边界的延寿人民更是食不果腹。目睹人民的苦难，少年时代的李涛，就对劳动人民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有一年秋天，因他有文化，族里派他到延寿镰塘坳收租谷，他看到佃农生活窘困，就对佃农们说："随交多少都做得！"

一九二三年，李涛考入湖南省立郴州第七联合中学。这一年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第二年，湘南区党组织正由衡阳向郴州发展，马列主义在这一地区迅速传播，思想解放的浪潮冲击着旧的陈腐观念。汝城共产党人朱青勋，在郴州开了一个名叫"永丰和"的客栈，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在这里聚集着汝城籍的进步学生，他们经常热烈讨论救国救民的道路。李涛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他在这里接受了马列主义学说，先后读了《新青年》、《黄埔潮》、《向导》、《共产主义问答》、《共产主义 ABC》及《三民主义演讲集》、《湖南民报》、《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为他后来成为汝城县早期革命领导人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的浪潮冲击到郴州。李涛满怀救国热情同朱青勋等一起参加了"雪耻会"，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当时，第七联合中学校长陈葆青极力反对学生的革命活动，多次进行干预。李涛

和进步同学抓住校长贪污学生膳费和贩卖鸦片的罪状，组织发动了规模较大的学生罢课运动。这一罢课运动唤起了广大学生的革命热情，给压制学生运动的那些人以沉重打击。当时，正值毕业考试，校方以挑动学生闹事为由，开除了李涛。消息传来，家族哗然，尤其是那些抱有“学而优则仕”的人们更是暴跳如雷，指责说：“大家省吃俭用供他读书，结果供出这号孽子！”李涛回到家中，毫不示弱地回敬他们，说他们是“臭豆腐”，“陈腐眼光”。他坚信自己是对的，任何压力都不能使他屈服。之后，他重返郴州，更加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这期间李涛住郴州“永丰和”客栈，朱青勋给予他很大帮助，在革命运动中，他们二人成为风雨同舟的亲密战友。

一九二六年春，李涛经孙开球和俞原极介绍在郴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五月，北伐军先遣支队叶挺率领的独立团经郴州北上。为了配合北伐军入湘，湘南地委派李涛和朱青勋一起返回汝城，发动群众。不久，党组织选派李涛到衡阳政治讲习所学习。三个月后，他又被派到湘西常德国民党左翼总指挥部政治宣传队当宣传员，队长是共产党人周逸群。八月，他又受湖南省总工会的派遣担任驻汝城工人运动特派员，于是，他回汝城开展工人运动。

汝城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中，封建势力十分猖獗。当时，被解散的县议会会长何朝钦等土豪劣绅，利用商会，假冒工会名义，企图阻挠群众的革命运

动。土豪何方涛甚至自封“县总工会委员长”。李涛回到汝城后，立即协助驻汝城农民运动特派员朱青勋，大力宣传革命，揭露土豪劣绅的阴谋。受骗的群众逐步识破了土豪劣绅的诡计，起来参加斗争，反动官绅和土豪何朝钦、何方涛等被迫逃离汝城。以后，李涛在中共汝城县特别支部领导下，为开展工人运动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后组织了店员、泥木、理发、缝纫、五金、教职员等行业工会，改组了由土豪劣绅把持的县总工会。

一九二六年秋，正式成立了汝城全县总工会筹备处。一九二七年二月，汝城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大会由朱青勋、李涛主持，通过了各种提案八十件。通过这次大会，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李涛被选为全县总工会委员长，并兼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大会之后，李涛带领工人纠察队日夜巡查，维持治安，禁烟、禁赌、禁娼，清查不法劣绅，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练，二十二岁的李涛，这时已成为汝城县革命群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在蒋介石的指使和军阀何键的阴谋策动下，长沙驻军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之后，湘南各县的革命运动相继遭到反动势力地摧残。而汝城县的革命运动，由于地处偏僻，在朱青勋、李涛的领导下，相对

地还出现了一个继续向前发展的时期。为了应付内外反动派的突然袭击，党支部及时地扩充了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商保队，举办了农军训练班，培训了军事干部。为提高农军干部的素质，李涛亲自任教。汝城的工农武装很快壮大起来，最多时达到三千多人。当时汝城享有"新湖南"之称。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在武汉向中共中央建议以"汝城为中心"开展湖南秋收暴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拂晓，国民党军阀范石生，勾结汝城土匪何其朗，以压倒的优势兵力袭击县城及农军驻地，中共汝城支部的第一位负责人朱青勋不幸牺牲。李涛带领部分农军冲出重围，到达濠头，与何举成带领的先期到濠头的人员汇合，共计人枪四五百，自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补充团，何举成为团长，李涛为第一营党代表。之后，全团开到江西边境上犹、崇义一带打游击。九月，接湖南省委组织秋收起义的紧急指示，刚刚编成的第四补充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仍以何举成为团长，就地举行秋收起义，然后向衡阳方向进发。这时李涛仍为第一营党代表。他们转战湘赣边境，夺桂东，战汝城，镇压了一大批反动官吏、土豪劣绅。以后由于战斗受挫，部队开到汝（城）、宜（章）交界的瑶岭附近。此时，闻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至湘南，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暂时在范石生部的掩护下休养生息，编为范部第一百四十团。在这种情况下，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应中共在范石

生部的秘密党员韦昌义的要求，把部队开到乐昌东头街，接受了范石生军部特务营的番号。特务营重建了中共支部，李涛任支部干事。不久，蒋介石发现了南昌起义军朱德部隐藏在范石生部，便密令范石生消灭这支革命武装。朱德获悉立即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离开范部，辗转至宜章地区，发动了湘南暴动。行前，朱德曾致函何举成火速设法脱离范部。李涛也曾多次向何举成建议，利用早操机会离开韶关脱离险境。中共广东省委所辖北江特委也多次指示特务营火速离开范部。可惜何举成此时对范石生抱有幻想，犹豫不决，以至失去良机。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凌晨，范部突然将特务营包围袭击，何举成及许多同志牺牲，部队被打散。李涛由群众掩护，化装脱险。他历尽艰险，找到广东省委，接上关系，被留在省委工作，负责广东省委与东江特委之间的交通，并一度被派往惠阳县二区任区委书记。从这时候起，他开始使用李湘舲这个名字，一直到西安事变前夕。

二

一九二九年春，李涛由广东省委介绍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四月，又由中共中央派到江西。李涛到江西后，赣西特委要他到赣西游击纵队第一大队工作，恰在这时，由国民党军金汉鼎部哗变出来的一个连投靠红军，被编为赣

西游击纵队第二大队，李涛被任命为该大队政治指导员。由于这个大队成份复杂，原来的头头都是土匪出身，他们投靠红军，只不过是找一个暂时的立足之地。到五、六月间，他们企图利用第一大队的内部分歧，阴谋袭击第一大队，尔后叛变投敌。他们的密谋被李涛等发觉后，李涛等立即采取了断然措施，将为首的十二人拘捕起来，然后将两个大队进行混编。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训练和整顿，这支部队后来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能打胜仗的过得硬的部队。这支部队在李涛等的率领下，活动于吉安北部，连续作战七八次，打了好几个胜仗。

一九三〇年春，李涛所在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三团归编为红六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柯武东，下分第二、三支队，李涛任第三支队（即原独立第三团）政委，支队长由柯武东兼。同年夏，红六军第一、三两个纵队会合后，李涛调任第三纵队第八支队任政委。入秋，红六军改为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后陈毅），李涛为该军第一纵队政委。不久，第一纵队改称第七师，师长陈伯钧，李涛仍任政委，并担任师党委书记和军党委委员。

一九三〇年冬，蒋介石以十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国民党军张辉瓒和谭道源两个师从十一月下旬起，侵入到富田、东固一带。李涛和刚到任的师长陈伯钧率第七师立即投入反“围剿”斗争。

张辉瓒师由东固进至南垄。针对敌主力孤军深入，毛

泽东、朱德提出："撤开两手，诱敌深入，坚壁清野，坚壁清城"的反"围剿"方针。根据这一方针，红一方面军主力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转移到黄陂西面君埠及其以北一带，隐蔽集结。奉命担任正面攻击的红三军，以红七师为先锋，拂晓前进占黄竹岭以北地区和亭子岭的主要阵地，迎击张辉瓒师；第八、九师紧接第七师向龙冈东北攻击。第二天拂晓，"雾满龙冈千嶂暗"，李涛、陈伯钧率领第七师进到居高临下的预定阵地，日出雾散后，看到敌军先头部队正在爬山，李涛、陈伯钧立即命令部队开火。第七师虽是红三军的主力，但实际上只有一个团的兵力。他们不畏敌军的强大火力，接连打退敌军的进攻。战至中午，敌人展开两个团的兵力，战斗更加激烈。方面军总部抽不出增援部队，派参谋处长前来查看，陈伯钧师长告诉他，前线已稳定，全师正在顽强作战。下午三时许，敌张辉瓒师四个团展开多路猛攻，第七师顽强坚守阵地。就在此时，红十二军向敌侧后攻击，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也从龙冈北面的高山上冲下来，敌军全线崩溃，一片混乱。第七师和兄弟部队一道，直捣张辉瓒师部。此役全歼张辉瓒师师部及其所辖的两个旅，敌师长以下九千余人全部俘获。

龙冈战斗的胜利，吓得敌谭道源师向东韶逃跑。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红一方面军分三路追击谭道源师至东韶，红三军担任右翼，以主力牵制洛口之敌许克祥师，另以一部迂回到东韶街南端，向东韶之敌攻击。

李涛、陈伯钧率领红七师和兄弟部队一起从东韶以南山中冲出，与敌谭道源师激战至中午，毙敌团长、团副各一名。又战至下午四时，敌人伤亡更大。敌师长谭道源带领残部向宜黄东南逃窜。东韶战斗歼敌谭道源师过半，缴获步枪四千支，机枪四十六挺。

东韶战斗后，李涛参加了毛泽东、朱德在渔子街召开的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经验的师以上干部会。会后，第七师随方面军活动于赣东南各县，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调兵二十万,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从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起，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东固地区迫敌而居达二十五天之久，诱使敌王金钰所部的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脱离富田阵地而歼灭之。

李涛、陈伯钧率领红七师先是单独执行任务，在东固以南牵制敌第十九路军，然后从兴国、龙冈快速向东固集中。这时，红军主力三面临敌，距离不过八十里，形如“钻牛角”。三万多红军云集东固一带，正值五月，粮食少，供应困难，只好挖竹笋，采野菜，拣田螺，捉泥鳅充饥。夜晚红七师师部只能点两盏灯，师长和政委一盏，作战科一盏。大家忍饥耐性，一直把敌人等出了富田工事。

五月十三日，红一方面军号令全军作好迎敌准备，在白云山区摆下了战场。敌上官云相师沿观音崖、九层岭向东固攻击，公秉藩师经中洞向东固进逼。红三军奉命为中路，沿东固通中洞大道迎击敌公秉藩师。

李涛、陈伯钧率领红七师和兄弟部队走小路到白云山区，在中洞南侧林中隐蔽，居高临下，监视敌人动向。待公秉藩师经过中洞时，红七师立即从山上横压下去，犹如高山滚石，势不可当。正在行动中的敌人摸不着头脑，乱跑乱钻。这时，红七师在敌前，第九师在敌后，象铁钳一样，紧紧咬住敌人，一直打到桥头冈敌司令部，俘虏敌师长公秉藩（后逃跑）在内的全体官兵。

白云山区首战告捷后，红七师随红军主力于五月十七日在富田胜利会合，乘胜追击敌第四十七师和第四十三师一部于水南。敌军背水而战，加之所架便桥又被当地群众拆毁，终被红军击溃。第二天，红军围攻白沙，截住逃敌，歼敌第四十三师大部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残部，接着又在浙江沙溪镇打击了敌郝梦龄师。继而，红军乘胜向东横扫，五月二十三日，攻击中村之敌高树勋师。李涛所在的红三军及红十二军为总预备队，分别把守濠源、木樟脑、桥下坑一带，防止敌人逃跑。高树勋师一个旅盘踞在中村西南的高湖瑙险峰负隅顽抗。红三军和红十二军改任右翼，攻南团，打得相当残酷，九次冲锋不克，与敌相持。这时，朱德、毛泽东来到前线指挥，调红四军第十二

师迂回到中村右翼，攻敌侧后，配合红三军再次发起冲锋，经两昼夜激战，敌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只好败退突围，向招携逃去。

中村战斗结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重新成立。五月二十五日，在洛口严坊召开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决定红军分三路向广昌进军，并派李涛所在的红三军到广昌甘竹阻击敌人，截断敌人的南援要道。

五月二十六日，红三军根据侦察的情况，向朱德、毛泽东报告：甘竹之敌不多，大约一个团的兵力，红七师已向甘竹派去游击队对付敌人。据此，总部决定派红三军追击敌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由于红三军向南丰方向追击朱绍良部第八师和第二十四师，截断了广昌守敌的退路，从而保证了红四军夺取广昌，击毙朱部第五师师长胡祖玉，全歼守敌；同时也保证了红三军和红十二军于五月三十一日奔袭建宁，歼敌朱部刘和鼎师三个多团，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李涛、陈伯钧奉命率红七师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筹集经费和给养，同时总结经验，训练部队。

六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亲任“围剿”军总司令，调兵三十万，采取“集中主力，长驱直入”的方针，于七月初开始了凶猛的第三次“围剿”。

七月十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人员从建宁出发，千里回师赣南。红七师和各兄弟部队从所在地出发，转移到于都银坑、琵琶垄山沟隐蔽，让出通向瑞金、于都和兴国的大路，诱敌南进。这时，李涛、陈伯钧奉命率红七师到兴国老营盘一带集结。黄昏时，发现敌军哨兵。接着，其他部队也相继发现敌人。原来敌军陈诚、罗卓英纵队已进驻富田一带，北边是蒋光鼐、蔡廷锴，南边是蒋鼎文，红军已三面受敌。毛泽东、朱德立即命令前哨后移，竭力隐蔽，决定红军主力乘夜向莲塘方向转移。红三军和兄弟部队一道，在四十里的敌人间隙中朝东突破。八月七日攻打莲塘，歼敌上官云相师一个多旅，接着又在良村歼敌郝梦龄师大部。八月十一日，红三军向龙冈佯动，保证了红军主力在黄陂歼敌毛炳文师四个多团。红军三战三捷，缴枪万余支。

黄陂战斗后，敌人发觉了红军主力，向东追来，李涛、陈伯钧率部随红三军和兄弟部队一道，共三万人马，在朱德、毛泽东指挥下，从南坑和君埠之间，在敌人不过十公里间隙的尖岭垴，巧妙地跳出了敌包围圈，返回兴国白石、枫边、查沿冈地区集结休整。等敌人发现时，红军主力已在外线休整半个月了。敌人被整得“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因两广发生反蒋事变，只好从兴国撤退。当地的老百姓向红七师报告，敌人要从老营盘方向逃跑。李涛等遂决定从七丰岭翻过去，攻打老营盘。九月七日早

晨，薄雾夹着毛毛雨，敌人因为要逃跑，撤了哨，红七师和兄弟部队一道冲到山脚，涉过一条小河，在敌人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将其封锁在三角地带，经奋力攻击，歼敌一个旅，还将敌军医院的药品、器材设备全部缴获。

老营盘战斗后，李涛、陈伯钧率红七师又随红三军回师向东北追击敌人。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歼灭韩德勤师和蒋光鼐师一部。敌师长韩德勤被俘后化装成伙夫逃跑。方石岭一仗，俘敌五千多人，缴获步枪四千五百多支，机关枪九十多挺，还有两百多匹骡马和一百多万发子弹。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李涛、陈伯钧奉命率红七师在赣南连续攻打“土围子”，进行革命政权建设。一九三二年一月，他们连续攻克骡子寨、蛇蝎、翰林头、汾坑等地“土围子”，二月随红三军开往信丰集中。

三月，红三军拨归红五军团，并由红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向闽西发展。毛泽东随军指挥，提出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打开局面，并要求在信丰的红五军团尽快开到龙岩。

李涛、陈伯钧率部于四月十四日赶到龙岩，十九日与红一军团协同进攻漳州。守敌是张贞的一个师，装备精良。红军抢渡龙江支流东溪后，与敌人打了一仗，在天宝大尖又打了一仗，敌人的防线即全面崩溃，红七师由石平北门进入漳州。此役敌张贞师主力大部被歼，俘虏一千六百多人，其残部逃到诏安，再也没有恢复起来。二十二日

下午，李涛在漳州城参加了红三、四军和方面军总部连以上干部会，听取毛泽东报告作战经验及布置今后任务。随后，红军在漳州附近筹款、宣传群众、维持社会秩序。红三军驻漳浦，李涛、陈伯钧率红七师驻石榴板。这期间，李涛、陈伯钧、邓子恢等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研究主力红军走后地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部署。当时，饶（平）、平（和）、（大）埔边界有支小游击队，和红七师接上了头。李涛、陈伯钧派干部到该部工作。后来，这支队伍发展成为东江纵队。

一九三二年六月，李涛调任红十三军第三十九师政委。这时，国民党军粤系部队的十二个团占据了赣南数县，有六个团盘踞南雄附近；蒋介石的中央军五个师驻赣州北；何键在湖南包围了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红一军团及独立三师奉命由信丰直取南雄，诱粤敌南援。

七月七日，粤敌第四师到达乌径，红五军团奉命歼灭该敌。八日凌晨，红五军团向乌径进发，发现该敌由浈水南岸向南雄逃窜，即改变行军方向，向水口堵击。当天下午，在水口以东的蒻角村，隔河与敌接火。李涛所在的红十三军担任正面攻击，红三军和红十五军为左右两翼，迅速击溃敌两个团。九日，粤敌令其第四师固守水口待援，又派第三师和独立二旅由南雄驰援水口，以优势兵力向红军猛扑。红五军团误将九个团的敌人当成三个团打，双方激烈拼杀。红五军团指战员非常英勇，许多战士手持大刀

与敌肉搏，敌我双方的伤亡都很大。红一军团和红十二军及时赶来增援，终将敌人击溃。水口战役后，粤敌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宁都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受到“左”倾领导人的指责和批判，接着被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因此部队中也撤换了一些领导干部。李涛因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此时也被免去了红三十九师政委职务，调总政治部，数月没有职务，直到一九三三年秋，才任命他担任总政治部敌工部（破坏部）部长。是年冬，他又改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旋即又调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长征前他被调回瑞金，准备派往上海做地下工作，因情况变化未能成行，乃随军长征。在长征期间，李涛曾任军委纵队先遣突击队队长，军委二局政委，军委纵队司令员，西北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一九三五年冬到达陕北。

三

一九三六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时，李涛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这年冬天，他被派往西安杨虎城部作统战工作。行前，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向他交代了任务，并要他将李湘舲改名李涛。因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名字曾被国民党收录在档案

中，改名为了掩护。李涛到西安后，正赶上张、杨两位爱国将领发动“西安事变”。周恩来又派李涛前往陕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郑位三、陈先瑞部，担任南路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当时该部驻蓝田县黑龙庙一带，与中共中央及红二十五军主力失去了联系，对外界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李涛只身来到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首先向郑位三、陈先瑞等介绍了“西安事变”情况，接着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联蒋抗日的方针政策。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李涛要第七十四师停止攻打蓝田，原地待命，接受新的任务。他还先后召开了团以上和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联蒋抗日的深入宣传，使干部战士提高了认识，经受了由内战过渡到抗日战争的考验。之后，第七十四师改名“陕南抗日联军”，挺进临（潼）、宝（丰）地区，配合友军，阻止亲日派向西安进攻。

一九三七年四月，李涛由第七十四师调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该联络处以后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驻西北办事处”，卢沟桥事变后又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即八路军办事处，由李涛任处长。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输送抗日爱国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领取、采购和运输抗战物资到前线或陕甘宁边区。

一九三七年九月，根据中央的决定，李涛随董必武到

武汉，建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并任处长。这期间，武汉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设法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军饷和其它军需物资；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接待各地前来要求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的同志和要求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群众；输送要求去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等等。此外，办事处还向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交涉，为战斗在鄂豫边区的高敬亭部和战斗在湘鄂赣边区的傅秋涛部争取到一定数量的俸饷和服装。在武汉办事处工作期间，李涛还受董必武委托，到湖南平江县属嘉义市傅秋涛部巡视工作约半月。上海、南京失守后，该两地八路军办事处一同撤到武汉，与武汉办事处合并。此时李涛改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名义，做东北军、西北军和一部川军的工作，并负责和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党组织的联系。

为了做好友军工作，李涛曾向长江局提过许多重要建议。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给长江局的报告中曾说："今天友军工作较之西安事变以前推动'停战抗日'的白军工作更为重要，进行工作的条件较之西安事变以前更为便利，但是，在工作方针上应该有更明确的决定……。中央军工作直到今天仍然是最薄弱的一环，恰恰是中央军又是今天抗日的最大力量，这种情形，无论在今天，在将来都是不利的。这一缺点，提议长江局有加以更高地注意的必要……。确定友工组注重友军中党的工作之建立，它

应该从多方面的普通的友谊关系进到建立党的工作的阶段。”他进而提出友工组分工的建议。为了寻找与国民党中央军的关系，他建议长江局给黄埔毕业的我们的同志以一种具体的任务，要他们自己去建立或找好了对象介绍给友工组去负责工作，以补救中央军工作最薄弱的缺陷。这个时期他在东北军、西北军和一部川军中的统战工作是搞得相当出色的。

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正式组成，周恩来为书记，李涛为南方局社会部委员，同时担任统战委员会军事组成员。当时军事组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在重庆的南方局机关工作的人员；另一部分是派到国民党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的人员，称中共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代表团。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曾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过第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决定在南岳衡阳举办一个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请派人去教游击战争课。中共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是有利于团结抗战的措施，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决定派人去。毛泽东主席说：“去吧，去讲我们的一篇道理。”具体人员由周恩来和南方局商定。周恩来决定派叶剑英带领李涛、边章五、薛子正、吴奚如、李崇等前往。李涛在游击干部训练班任政治教官，教授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思想、中共的抗日主张及如何做群众工作等课程。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开学，先后办了三期。第一期学员一千零四十六人，分八个队，学员为各战区军官，大部是黄埔及南京军校毕业生，也有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出来的。政工人员极少。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训练班第一期结业。

同年六月，周恩来回延安汇报工作，叶剑英调回南方局。李涛接任工作组组长和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留在南岳干部训练班工作。"游干班"第二期于六月中旬开学。随着国民党五中全会"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的确定和贯彻，开始了政策上的重大转变。此时，汤恩伯（系"游干班"教育长，当时比较进步）也已调赴前方，专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游干班"大部分人员跟着汤恩伯走了。班上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员由原来的一千多人减到四百六十多人，一半为现役军官，一半为党务政工人员。课目内容也有所调整，反共活动明显增加。对此，李涛及时电告叶剑英、南方局和中共中央，并据理和当局进行面对面地斗争。第二期于九月二十日结业。

第二期结业后，鉴于国民党在训练班中有排挤、限制共产党的反动行为，李涛等利用放假机会，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请示下一步怎么办。叶剑英当即请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估计，国民党虽然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但国共关系不致于一下子彻底破裂，故指示还要去。这样，又继续办了一期。第三期开学后，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

狂轰滥炸，在衡阳办不下去了，便迁到湖南零陵、祁阳等地。

在衡阳，中共派到训练班工作的同志住在“桔子园”，方圆一大片桔子树，从没有人摘过一个桔子吃，当地老百姓反映极好，说：“共产党就是不象刮民党！”

中国共产党派干部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扩大了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正规军中的影响，是成功之举。以前国民党军队中很多人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认为共产党是些青面獠牙的魔怪，杀人放火的野人。他们同中共派去的干部接触后，认识到共产党人是最文明、最讲道德、最有理想的革命者。通过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结识了许多朋友，并推动他们接受中共的主张，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反“磨擦”斗争中，多持消极态度，有些还向我们提供情况；在解放战争中，纷纷率部起义。

一九四〇年二月，李涛离开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他在桂林办事处工作近一年，积极协助李克农，密切注视国民党的动态，特别是桂系的动态，及时向南方局和中共中央汇报。四月，桂系军阀白崇禧及地方士绅，正在筹建中间集团。根据这一情况，李克农、李涛立即电告南方局和中共中央，提出“设法打入其内部，进行活动，争取他成为倾向我们的中间集团”的

建议。

皖南事变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人员有计划地逐步撤退。第一批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初，共百余人，主要是一批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人士及其家属、小孩，还有一些重要干部。带队的是边章五，他的公开身份是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参。为了顺利返回延安，周恩来指定李涛、边章五、蒋南翔、张月霞等组成领导小组，雷英夫为边、李的随从参谋。这次回延安本来没有李涛，但由于工作需要，临时决定他回延安，护照办不及就顶替了一个上尉副官的名字。车队行到陕西凤县双十里铺已是黄昏，这里是胡宗南的地盘。国民党的宪兵前来检查，虽未找出破绽，但仍纠缠不休。这时边章五机智地以长官的腔调大声吼道：勤务兵，打水来！”装扮勤务员的雷英夫立即打来两盆洗脚水，一盆给边，一盆给李。李涛也大声喊道：“床铺好了吗？”雷答：“好了！”国民党宪兵看到这种气派，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国民党宪兵走后，李涛马上打了一盆水给雷英夫，并说：“你刚才当了我们的勤务兵，现在我当你的勤务兵，还你一盆洗脚水。”说得大家都笑了。后来车到耀县，李涛等下车休息，恰好遇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学生在执行任务，认出了李涛，便叫：“李教官！”这样李涛就暴露了身份。二月九日行至中部（现黄陵），国民党军第一〇九师师长陈铁城，提出要见李涛和边章五。李涛

等到了第一〇九师，陈铁城说：奉上级指示，李高参系冒名顶替，不符合手续，要扣留审讯。李、边据理力争，对方只是说，这是奉上级命令，不便通融。后来领导小组研究如何办，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等；另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在这等着，搞不好大家都走不了。李涛主张大家先走，他一个人留下来。经反复商量，权衡利弊，终于同意了李涛的意见。留下一辆车，一个副官，一个勤务兵，照顾李涛，其他同志即刻出发。

当时大家都很担心李涛的安全，但他却表现得异常冷静沉着。车开动的时候，他大声说："同志们！你们回去后，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替我问好，向他们报告，李涛是他们的部下和学生，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绝不会辜负他们的教导的！"从这几句话中，显示出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后来李涛被送往西安行营，押在该行营副官室。被押期间，他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威武不屈的革命形象。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放人。几经周折，李涛终于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离开西安，胜利返回延安。

李涛回延安后，先被任命为军委后勤部经建部部长。秋天，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一九四二年五月他调任中央情报部第三室主任。同年十二月，他又调任军委作

战部副部长（当时作战部就是总参谋部，部长叶剑英兼）。一九四三年三月他又兼任军委二局局长。

当时，军委二局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由于政治工作薄弱，领导不团结，又加上生活很艰苦，大家意见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决定派胡耀邦、李涛等去二局检查整顿。嗣后，李涛即兼二局局长。

李涛到任后，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针对全局的组织形式，提出了调整建议。把过去的四个处、两个科，改编为五个系和一个处，人员也进行了合理调配。领导干部分工负责，业务领导干部以主要精力抓钻研技术，总结经验，训练干部。政治工作方面强调建立健全党委集体领导制，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凡重大问题均由党委集体研究决定，坚决纠正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的家长作风。为了加强各单位之间的联系，还成立了由各系主任参加的研究室，以便交流工作经验，互通情报，共同解决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此外，还建立了汇报制度，要求各单位定期汇报业务情况和思想情况。在同志之间又开展“互帮”活动，大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之风。这样，二局的民主气氛浓厚了，团结状况改善了，各项工作出现了新面貌。

李涛深入业务工作，听取汇报，常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如成立整编科，将各方面来的情况，整理汇编，去粗取精，然后上送中央首长。在他的亲自领导和具体帮助

下，这项工作搞得很好。

李涛在政治上关心爱护干部。当时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受牵连的干部较多，如何甄别这批干部，到底有无问题，工作量很大。李涛对此项工作抓得很紧，几乎被甄别同志的结论，他都亲自过目，交总支委员会逐个讨论，解决得较好。他经常组织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他给大家作政治报告，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国内外形势，讲党的历史，讲长征的体会等。对青年的恋爱、婚姻、家庭、孩子等问题，他也很关心。

李涛善于组织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一九四四年开展模范工作者运动时，二局搞得有声有色，热气腾腾，使全局呈现一派学先进、当模范的热潮。

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对军委二局的物质生活非常关心。毛主席在打给叶剑英参谋长的一次电话中说：“二局工作这么重要，他们的伙食怎么搞得这样坏？我有三个侄儿，每次来都是面黄饥瘦。剑英同志，你想办法帮他们改善一下嘛！”李涛来二局后，对二局的物质困难十分重视。一九四三年，他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全局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业务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坚持一手抓工作，一手抓生产，组织大家上山背柴，背米，开荒种地，纺线等。还开办了豆腐坊、磨坊、酱园、屠宰场、牧场、商店等。经过半年的努力，生产了大量的农副产品，生活得到了改善。过去一两个月吃

不上一次肉，后来每月每人可以吃到三斤肉，蔬菜也做到了自给。

李涛很关心青年的文化娱乐活动。他说青年人忙得闲不得，工作之余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搞得生龙活虎。在他的关心支持下，俱乐部工作很活跃，经常组织唱歌、跳舞和各种球类比赛，组织剧团演戏，还到地方给老乡演出。业余生活搞得很活跃。

一九四五年十月，李涛回作战部工作。临离开二局时，同志们都恋恋不舍。回顾他三年来领导二局工作的情形，正如叶剑英参谋长曾对二局介绍时所说：李涛同志水平很高，很有经验，既是一位好领导，又是一位好老师。

四

一九四五年十月，李涛被任命为军委作战部代理部长。一九四八年五月，他升任军委作战部部长兼一局（作战局）局长。当时作战部工作很繁重，不仅管作战，还要管情报、通讯、军务、装备、军训、测绘等。在军委副主席兼代理总参谋长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副书记杨尚昆的直接领导下，身为作战部部长的李涛，在解放战争中不仅是中央军委首长的高级参谋和得力助手，而且因为他狠抓作战部的业务建设、作风建设，使作战部真正成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得心应手的参谋工作机

关。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向解放区进行全面进攻，妄图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当时，形势相当紧张。根据任务需要，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枣林沟举行会议，决定把中央和军委两大机关分成三个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前方委员会，留在陕北指挥作战；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河北平山西柏坡，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李克农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同各解放区的联系，统筹后方工作。

一九四七年四月初，李涛随“后委”到山西临县三交镇双塔村。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委”汇集于河北平山西柏坡。李涛也到了西柏坡。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三月二十五日，李涛随毛泽东、周恩来到北平，并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北平入城仪式。

李涛担任中央军委作战部长期间，在解放战争中，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杨尚昆直接领导下，他作了许多具体的繁重的工作。他汇集战况，整理资料，了解和掌握各野战军和各解放区形势；起草文电，收集整理作战经验并向各野战军推荐交流。为使中央首长和有关部门及时了解战况，也为使有关同志及时听到中央首长指示，同时也为提高参谋人员的业务能力，作战部每周组织一次战况汇报会，新华社也派人参加。汇报会多数由李涛

主持。毛泽东、周恩来参加时，李涛就亲自汇报。在西柏坡时，随着战争形势发展，作战部的工作更细致了，按方向进行了分工，掌握情况，收集有关资料。在收到部队的电报和有关情报后，即将敌我态势及作战方案综合标在简明素图上，有关地名一概查实标上，附原电呈送毛泽东、周恩来。每天要送这种材料一份或多份。那时，全国各战场的情况发展很快，各野战军捷报频传，解放区的面积迅速扩大。李涛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具体部署参谋人员在每次重大战役之后和在每个月的月底，作出精确的战绩统计，包括毙伤俘敌的人数，毙伤敌师以上长官的名字，缴获各种武器的数字，解放土地的面积和县城的数字等。要求反复核对，准确无误，经他审批后，上报中央首长和送新华社发表。当时作战部的人数很少，直到进入北平时连勤杂人员在内只有四十多人。李涛要求各级领导和每个参谋人员发扬认真负责、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今日事今日毕”，每天的工作任务，必须保质保量地完成。因此，全部的同志每日都要加班加点，日夜苦干。李涛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他有一段时间病得很重，叶剑英要他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工作，照常参加工作会议，认真处理文电。由李涛培养起来的这种办事不过夜、高效率、高质量完成任务的工作作风，在作战部一直长期流传。

一九五〇年十月，志愿军出国作战，作战部的工作重点就转移到抗美援朝战争上了。为了更好地协助中央首长

处理作战行动，沟通军委各部门情况，建立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联系，李涛将掌管作战行动及研究敌情的十二人，迁入中南海居仁堂办公，组成总参谋部作战室，由他直接领导，开展工作。

李涛经常根据朝鲜前线的作战情况，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上报中央首长。同时，各方面的情况汇集作战部后，李涛又马上派人分析整理，立即通报远离祖国的前方。当时，毛泽东主席还委托李涛代拟各种作战电稿，这些电稿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往前方。李涛白天黑夜地忙工作，吃不好，睡不成，身体明显虚弱。当时作战局副局长张清化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觉得这样下去非把李涛累垮不可，于是他们商量，夜里轮流代班，才使李涛的紧张状况有所缓解。

李涛主持作战部工作期间，非常重视统帅机关及各级司令部的业务建设。他的指导思想是：机关要简练，人员要精干，办事效率要高。为了适应工作需要，作战部的作战局机构，曾三次发生较大的变化。第一次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前。那时候，作战局共辖六个科；第二次是一九四五年八月科改为组，一九四六年以后，辖两个科，科以下分设若干组；第三次是进城后，取消了局、科两级，作战部直辖处，由两个处逐渐扩编为六个处。李涛要求参谋人员必须掌握三条：一是要很好地领会首长意图，政策观念要强，要有很好的分析判断能力；二是要成为活字典、活

地图，掌握情况，心中有数，对自己掌管的工作要有问必答，对答如流，准确无误；三是要严守军事机密，守口如瓶，保持高度的组织纪律。为此，他非常重视参谋人员素质的培养，提高参谋人员业务能力，曾三次举办参谋培训班。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在延安举办的；第二次是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举办的；第三次是一九五〇年，在北京举办的。每期培训班，李涛都亲自授课。平时他也很注重参谋人员的业务学习。在西柏坡时，他请胡乔木等到作战室讲授如何写文章。他更注重参谋人员实战能力的提高，多次抽调参谋下部队锻炼。在西柏坡时，曾抽调张明、张一民、赵云慈等去作战部队锻炼。抗美援朝时期，他三次派参谋见习组到朝鲜战场见习。与此同时，为了提高参谋人员的知识水平，他在作战部还多次举办文化补习班或文化学校，取得很好效果。

李涛十分重视作战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他经常教育参谋人员在工作中要发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要谦虚谨慎保持内外团结，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他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和参谋人员的思想动向，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工作。在准备进入北平以前，他及时指出进城后要注意克服游击主义作风，加强组织纪律，加强正规化的培养，同时又要提高思想警惕，提防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他还生动地讲述了“闯王进京”的历史教训来告诫大家。进城后，他又针对业务部门和供给部门一时存在的矛

盾，组织大家看京剧《将相和》，回来后，他亲自主持开座谈会，号召大家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团结合作，共同搞好作战部的建设。

李涛还致力于统帅机关和全军各级司令部的建设。一九四九年二月，他就当时全军参谋工作的情况，向中央军委写了《参谋工作综合报告摘要》。报告中指出：就目前全军参谋工作的现状来看，还存在着不少的严重弱点，距离"更进一步正规化"的要求则更远。这些弱点主要表现在各级司令部机关普遍的组织不健全；参谋人员的素质太低，使参谋业务的提高发生极大困难；由于参谋人员素质差，没有完全起着司令部机关的作用，不能组织与保证首长的指挥决心贯彻下去，工作不能尽到应有的责任。根据参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各地区部队的报告和意见，他提出了具体建议：1.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加强司令部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认识加强司令部工作的重要性。2.建议军委立即着手收集资料，准备颁发暂行参谋工作条例及工作细则，确定各级司令部的编制，明确规定各部门的互相关系，统一各种制度，统一参谋作业中的各种规定。3.实行参谋人员与军事指挥员对流制。4.军委举办培养较高级参谋人员的学校，责成各军区组织在职干部短期轮训。5.明确参谋人员的待遇。6.召开一次全军参谋工作会议，交流各地经验。7.加强司令部的政治领导。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李涛就如何加强统帅部及各级司令部工作的几点

意见，向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写了报告。报告中说：自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强司令部工作”的指示后，全军各级司令部工作确实有了不少进步，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各级司令部的机构不健全，参谋缺额甚多，且质量又低。参谋人员的素质大致可分为“老机关”、“新成份”、“工农干部”三类。第一类人员中大致政治可靠，有一定文化，内勤参谋业务较熟练，但缺乏实战经验；第二类人员虽有工作热情和相当文化，但政治上还没有相当考验，参谋业务不熟练，实战经验更差；第三类人员中政治上虽可靠，且有实战经验，但文化及业务均应急需提高。为解决上述问题，李涛建议全军各级党委，宣传加强司令部工作的重要性，并在干部的配备和培养上予以支持；各级步兵学校增设参谋队，军事学院增设高级参谋班。对总参谋部本身的业务建设及干部配备问题也提了自己的意见。

为加速统帅机关和各级司令部的正规化建设，李涛多次主持召开全军业务性会议。一九五〇年二月，他主持召开了全军军事实力统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说：“统计工作，在参谋业务工作中，是重要的一门业务，不但不能轻视它，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又说：“统计工作，不单纯是技术问题，而且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参谋业务；如果我们对军队实力（人员、枪炮、装备）统计的不准确，就会发生严重的政治后果。”他把当

时军事实力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不准确，不及时，不统一。他分析了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编制不统一，统计内容复杂，人员流动性大。在谈到会议任务时，他说："我们这个会议，就是要解决前面所说的三个问题，把那三个'不'字取消，向那个'不'字作斗争，把不准确、不及时、不统一的'不'字斗掉，而变成准确、及时、统一。"他要求"把我们的统计分类，表格的数量，来一个精简工作"。同年五月，他又组织召开了全军参谋工作会议。上面这两个会议对统一全军制度，加强司令部建设，使之向正规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军队面临着新时期的各项建设工作。全军进行了精简整编，由五百四十万人缩减为四百万人，统一了全军的编制，开始了各军、兵种的建设，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和铁道兵等领导机关。在这些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李涛协助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为了使军队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在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委托下，李涛组织力量，先后编写了步兵操典，内务、队列、纪律等条令。这对军队建设均起了重要作用。

李涛在作战部工作期间，曾多次参加党的一些重要会议和活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他参加了中央"十二月会议"。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至十二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他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围绕毛泽东报告中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进行了讨论，检查了以前的工作，规定了会后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他列席了七届二中全会。他聆听了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对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两个“务必”和“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的告诫，有深刻的认识并付诸于自身的行动。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亲自委托李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的侵华暴行。一九五〇年十月初，他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策。十月八日，李涛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待命出动朝鲜的命令。

李涛关心军队院校建设。他对军委测绘学校的创建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全国刚刚解放，他就积极向军委首长建议，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校。他亲自修改建校报告，直报周恩来总理审批。测绘学校是在北京、沈阳旧测绘学校的基础上创立的。后来学校迁至北京，也是经他请示周总理批准的。当时，拨了大量建校经费，在李涛的关怀和指导下，经过有关人员的努力，一个设施齐全的新型测绘学校正式建成，后来发展成为测绘学院。

一九五〇年，李涛受命兼任军委工程学校校长、党委

书记职务。当时，学校刚刚迁至张家口，面临着经费、教学、师资等多方面困难。他多次亲自起草报告，如实地向军委首长反映情况，求得军委的支持和帮助，使工校逐步走上正轨。李涛多次亲临学校主持召开党委会，并定期召集学校有关负责人来北京汇报、研究、讨论学校中的有关重大问题。在教学中，他着重指出，教学一定要和将来的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为业务工作服务为目的。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亲自召开学校教员座谈会，充分肯定教员的工作成绩，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并邀请知名学者和领导人到校授课。他注重在职干部的培训，狠抓校风培养，强调有个好的校风是办好学校的基本问题之一。直至一九五二年夏，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军委工程学校按专业分建了几个学校，才免除了李涛兼校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

李涛对工作认真负责，对首长直接交办的事情，一丝不苟，都亲自去做。一次，搞一个统计表，他眼睛不好，很吃力，秘书说："参谋离这里很近，就叫他们去搞吧。"他说："那不行，这是周副主席（周恩来）让我搞的。"还有一次，毛泽东写信给李涛，要他报消灭敌军的数字。毛泽东的信是上午八时写的，要求当日下午四时送回。他接到信后，立即亲自去办，提前两小时完成了任务。

李涛善于处理和兄弟单位的关系。有时，周恩来、朱德或其他首长把不属于作战部管辖的事也交李涛办。在这种情况下，他按首长指示办妥后，签上应承办单位的名

称，再附上一张纸条，说明是某首长交办的，然后，转给该承办单位。

李涛政策水平很高，原则性很强。在创建测绘局时，他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对接收下来的国民党时期的测绘人员，采取团结、教育、改造方针，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这部分人员在测绘工作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人民解放军的测绘建设做出了贡献。

李涛在作战部工作十多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这期间，他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身体力行，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经常参加重大的军事决策和重要作战方案的制定，给军委提出过许多宝贵建议，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为中央军委的得力助手和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参谋工作的领导者。

五

全国胜利后，军委技术部（即总参三部）处于新的历史转变时期。一九五〇年春，毛主席为三部题词：“第一仗已经打胜了，应即整顿队伍打第二仗，争取全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也作了重要指示。如何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是对三部新的历史考验。正在这时，三部主要领导发生了问题，一时形势混乱，工作

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于一九五二年二月，任命李涛为三部部长兼政委，并担任党委第一书记。

李涛到任后，立即以毛主席题词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指示为指针，抓紧各项工作。他以很大精力组织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反复宣传中央指示的重要性，号召全体同志为实现"打第二仗，争取全胜"的战略目标而奋斗。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他抓了组织整编工作。在李涛领导下，部党委针对机构臃肿、成份复杂、工作重复、人浮于事的状况，提出了《组织整编》方案，并报中央军委批准，组织实施。经过这次整编，工作机构精干了，效能得到提高，更加适应发展业务的需要。

过去三部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不健全，缺乏民主作风。李涛主持工作后，一直以建立和健全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为中心，抓紧党委工作的整顿和建设。

一九五三年三月，李涛在三部第一届党代表大会上，做了《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争取打胜第二仗》的报告。他强调指出："贯彻党委制，加强党的领导，是毛主席的建党、建军原则之一。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支部，都必须建立健全集体领导制度，坚决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或支部集体讨论决定。

一九五四年六月，李涛向三部团以上干部做《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问题》报告时，把集体领导和团结之间

的辩证关系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党的集体领导，必须建立在党的团结的基础上，而党的集体领导也就是巩固党的团结的保证。"他联系本部实际指出："我们要努力克服组织涣散现象，使本部党组织的团结更增强起来，以保证完成'打胜第二仗'的任务。"为增进党内团结，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要求党员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为此，一九五五年一月，他撰写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武器》一文，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理，结合本部实际，深刻论述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生命力的源泉，不仅是一个政党对人民事业是否负责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党员是否具有忠诚品德的尺度之一。"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必须参加所属支部的组织生活，接受党组织监督，不能做特殊党员，并要求同志们有意见当面讲，及时讲，会上讲，反对自由主义。他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纠正了当时存在的一些影响团结的因素。在李涛、彭富九等领导下，经过几年努力，三部各级党组织的建设逐步走向正轨，毛泽东的建党原则和党的各种规章制度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领导明显加强。

一九五六年三月，李涛在三部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上，认真总结了几年来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他说："三年来的经验证明：党委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委统一领

导下首长分工负责制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委必须领导业务和负责保证业务进行的原则必须坚持；在各级党组织中和各项工作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必须坚持。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保证完成三年计划。”部党委根据这些经验起草了一个《三部党委工作细则》，其中规定了党委会的职责范围和主要工作以及工作关系和组织制度等内容。经第二届党代会讨论通过，并报上级批准执行。至此，从部党委到各级党委、支部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集体领导制度。

李涛领导总参三部工作期间，一直把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经常到各单位督促检查，把党的领导状况如何作为检查和衡量单位工作好坏的首要标准。对部党委抓得更紧。李涛本人既是党委集体领导制度的模范执行者，又是党委“一班人”坚持团结的好“班长”。他按规定，每星期五定期召开部常委会。会前，列出题目，出安民告示，并准备好文件。会上，发扬民主，让大家充分讨论，然后根据大家意见集中，写出纪要，发给下级党委，贯彻执行，同时报送上级党委审查备案。每三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每次大会前，他都认真调查研究，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找出主要问题，明确今后任务。因此，他的每次工作报告都实际而深刻，每次大会都开得很成功。他非常尊重其他部首长分管的工作，严格贯彻首长分工负责制原则。谁主管的工作，大胆地交给谁去办。如

果重大问题确实需要集体讨论决定，也要求由主管首长和主管部门首先提出解决方案，然后集体讨论决定，决不个人说了算。在李涛、彭富九等领导下，党内民主气氛很浓，党委的团结很好，集体领导力量得到充分发挥。

李涛从三部实际出发，提出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相结合的方针，明确指出政治工作的任务是思想领导、组织保证和关心群众生活。为了从组织上加强政治工作，他要求局级单位设立政治机关，处级单位编制政委，科级单位有专职政治指导员。为贯彻政治工作和业务相结合的方针，他严格要求政工干部，其中特别强调必须懂业务，深入到业务中去。

李涛对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问题一直抓得很紧，他经常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对带倾向性的问题，及时提出预防措施予以警惕。一九五八年他提出反对政治干部向党组织闹独立性的倾向。一九六〇年他又提出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和政治工作一般化的倾向。

在干部工作方面，一九五三年二月，李涛提出："干部工作一定要和业务工作相结合。"他说："三部的主要任务是技术业务。而我们干部工作的主要对象，就是做技术业务工作的干部，只有以主要精力了解他们的情况，从他们那里找出根据，干部工作才能做好。"他要求干部部门要密切和干部的联系，成为"干部之家"，无论了解干部、调配干部和任免干部，要首先掌握从技术业务需要出发这

个原则。

李涛从三部工作的保密性、技术性的特点出发，提出对技术干部要实行“高门槛”政策。凡调来三部工作的技术干部，在进入工作前，要经过严格审查和挑选。进入工作后，就不要轻易外调。他常以叶帅说的“桐油罐子装桐油”的思想教育干部，要求三部干部，要红在三部，专在三部，在三部干一辈子。李涛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他常说，除非在三种情况下，我决不离开三部：上级调不能不服从；犯了错误不能不离开；老死病死再也干不成。李涛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为党的三部事业鞠躬尽瘁，直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离开人世。李涛经常强调“桐油罐子装桐油”和“高门槛”的干部进出政策，对稳定三部干部，促进干部革命化、专业化和保守三部机密起了重要作用。

李涛很重视培养青年干部。一九五九年，他提议由第一副部长彭富九同志当部长，他任政委。在工作中，他尊重和积极支持年轻部长和其他几位副部长的工作。之后又提拔两位年轻局长当副部长，使三部领导班子后继有人。他一贯主张，要眼睛向下，干部从下边来，不能总向上级要。他对各级领导干部要求很严，不但抓思想带作风，而且教工作方法。他经常提醒领导干部，做计划要抓中心，做总结要抓典型，解决问题要抓关键。

李涛很关心高级知识分子。一九五六年，他提出要按党的高级知识分子政策规定，认真解决他们的待遇问题。

在他的建议下，三部党委常委专门研究了如何充分发挥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鼓励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等问题，使党的政策落到实处。

李涛对机关工作很重视，对机关工作人员抓得很紧。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部召开秘书工作会议，李涛做了《秘书人员应有的修养》的报告。他以自己切身体会教育秘书人员，要作首长亲密的助手，遇事要坚持原则，既不要对首长唯唯诺诺，也不要对群众盛气凌人。他注意发挥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经常听取他们的建议，并给他们以具体的指示，让他们放手工作，有了成绩充分予以肯定，有了缺点随时加以纠正。

李涛对发展技术业务极为重视，始终把它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来抓。他说："技术业务工作在三部不是唯一的，但它是中心。党中央所以用那么多钱，那么多人成立技术部，就是让我们拿出成果，这就是三部的实际。如果不以技术业务为中心，而以别的什么为中心，那就不叫技术部了，而改名为政治部、卫生部或什么部了。"

为从思想上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李涛在一九五三年三部第一次党代会所做的报告中，回顾了三部的历史，认真地总结了二十多年来如何克服困难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李涛把它归结为五大优良传统："埋头钻研；长期坚持；勇于创造；忘我工作；朴素生活。"同时，他还指出了有碍三部前进的五种不良倾向，即："个人主

义；骄傲情绪；单纯技术观点；自由主义；优越感。”李涛的总结给广大干部、群众以深刻教育，成为三部思想和作风建设的指导原则。

李涛站在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高度，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发展业务的指导思想。一九五四年二月，根据三部的业务工作需要和人员技术状况，他提出“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提高技术，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他说：“能否提高技术乃是关系到本部工作能否前进，三部事业能否存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大问题。”为了使这个口号变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实际行动，他撰写了《论本部当前的中心口号——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努力提高技术，技术决定一切》的论文。并报总政审批后，印成小册子，向全部同志进行广泛地宣传教育。这篇论文分析了三部的实际情况，从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深刻地论述了提高技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写道：“我们‘三反’后，工作有进步，但困难仍很严重。如果不集中力量提高技术，那么困难无法克服，工作无法前进，党与人民交予我们的任务无法完成，我们将犯历史性的错误。今天提出这个口号，不但从三部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必要的，同时从我们现在所处的新的情况来看也是必要的。”为了实现以技术为中心的口号，李涛还提出了十条具体办法，他要求全体同志深刻认识提高技术的决定意义，紧密团结在党委领导之下，自觉地为实现以技术为中心口号而努力。

一九五四年三月，李涛主持召开了三部党代表会议，动员全部同志为提高技术、战胜敌人而奋斗。随后，掀起了以业务为中心，包括政工、后勤等各项保障工作在内的“业务进军”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全部同志的积极性，学科学技术、练业务本领的气氛异常浓厚，各项工作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随着业务进军的深入，技术业务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有效地配合了我党我军重大军事、外交、政治斗争，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军委首长的表扬。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部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李涛代表三部党委做了工作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又强调：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技术业务工作和对各项保证工作的领导，确保三年计划的顺利进行。

为了实现三年工作计划，李涛花了很大精力考虑业务工作问题。凡是到他手的材料和有关文件，他都细心审阅。他经常和主管业务的领导同志商量业务工作，听取业务部门的汇报。他不但对三部整个工作的性质、特点了解得非常深刻，而且对三部各时期的业务工作的基本情况，业务思想方面的主要问题，也掌握得很清楚。因此，他在解决各时期业务工作方面的主要问题时，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解决办法。

一九五八年，部党委又制定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五年工作计划。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李涛强调，除要做好技术业务方面的充分准备外，还要提倡革新精神，

推行种"实验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李涛亲自到下边去蹲点，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并提出了"要抓主要矛盾，抓薄弱环节，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

李涛对教育训练工作一直很关心。他认为培养训练干部是保证工作发展，争取"打胜第二仗"的重要因素。一九五二年，他兼任三部干校校长，为干校规定了"从工作需要出发，需要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办学方针，并明确提出干校的三项基本任务："一是培养和审查新学员；二是负责技术干部的业务文化教育；三是轮训干部。"李涛还特别强调要培养与三部工作实际相联系的学风：即埋头苦干，朴素生活，团结友爱，相师互助，虚心学习，严守纪律。

李涛对领导干部的学习也很关心。他提出要用离职、带职、在职等各种方式进行轮训。在干校专门办了一个干训队，分批抽调干部去学习，李涛亲自教授党史。他还为干训队请了许多地方老首长和知名人士讲课。

五十年代初，三部有的领导同志轻视行政后勤工作，有些后勤干部也不安于位。李涛上任后，对后勤工作非常重视。一九五二年十月，在三部干部会上，他提出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口号。他说："三部的工作可分三类：一是技术业务工作；二是政治工作；三是行政后勤工作。这三类工作相互配合，相互保证，谁也离不开谁。行政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从物质上保证技术工作是后勤工作的基

本任务，而技术工作也离不开物质和政治的保证。从这个观点看，行政后勤工作所处的地位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在李涛领导下，部党委和各级领导把抓好行政后勤工作列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一九五六年九月，部党委以加强管理工作、关心群众生活为题，开会研究并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和有关部门，深入群众，听取意见，制定行政后勤工作计划，切实改善广大干部、群众的生活福利，以保证技术业务工作的顺利发展。一九五七年三月，部党委号召“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要求全部同志，特别是行政后勤工作的同志，要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搞好副业生产。

李涛对群众生活福利很关心。为了使长期工作在第一线的同志有一个疗养的场所，在他积极支持下，办起了三部北戴河疗养院。三年困难时期，他用更多的精力抓后勤工作。为了搞好各单位的农副业生产，总结并推广了直属单位在种菜、养猪方面的好经验。一九六一年，为解决三部物质困难，在李涛建议下，部党委决定到东北办农场，并从政治部、后勤部抽调得力干部去搞筹建工作。李涛亲自写信给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同志，请求帮助解决农场基地问题。农场建成以后，每年生产大量农产品，既支援了国家建设，又为解决三部的生活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

李涛为建设三部呕心沥血，历尽艰辛，立下卓越的功勋。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

害，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被迫离开北京。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因无及时有效地治疗，不幸逝世。

李涛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九月，李涛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李涛从大革命时期投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以来，几十年如一日地忘我工作，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敌人的巢穴里，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为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阅历丰富，学识渊博，才思敏捷，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妥善地处理问题，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才能。他勇于克服困难，开创新局面，团结干部和群众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他联系群众，作风民主，严于律已，宽厚待人，生活俭朴，为人师表。他的高尚情操和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李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不愧为人民解放军特殊岗位上杰出的领导者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季锡位　敬文有）



肖　华



肖　　华

一

肖华（1916—1985），原名肖以僔，一九一六年元月（旧历乙卯年腊月）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城内东街肖屋村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父亲肖能崍，建筑工人兼做画工，是兴国城内一位绘画、塑像能手。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进入江西后，兴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来，肖能崍被推举为泥水工会委员长、兴国县工会执行委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党的区委书记。肖华的母亲严招胜，是一位勤劳善良的雇农女儿，一九三〇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兴国县城区妇女主任。童年的肖华，就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中生活和成长。

肖华家中十分贫困，全家老少四口终年住在肖家祠堂里。一九二二年，六岁的肖华入本城赤塅小学读书。依靠祠堂资助，肖华读到小学毕业。他的各门功课都很优秀，许多作业常被老师选作示范，在课堂上张贴。

肖华就读的赤勘小学，校长肖以儒、教员肖以佐等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们经常给学生们讲什么是军阀，什么是帝国主义。后来肖华到了高年级，学校还油印了《共产主义ABC》等小册子，给进步学生阅读。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启迪了肖华的思想觉悟，使他逐步树立了献身革命的思想。一九二七年夏，肖华高小毕业时，老师出了一道作业题：未来的我。肖华看到试题，提笔写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数先烈曾为国家的兴亡以身报国，血沃中华。未来的我要以这些先烈为师，献身革命，为天下的劳苦大众奋斗一生。肖以儒老师拿着这份答卷反复阅读，激动不已，挥笔批了"奇志可佳，后生可畏"八个字，并向同事们称赞说："有了这样一代少年，何愁祖国不能振兴。"学校经常组织各种革命活动，肖华参加了学生会领导的打菩萨、打天主堂和查烧日货等斗争，还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街头演讲等活动。一九二七年春天，肖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青年干社"。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正在兴国县立文兰阁中学读初中的肖华，由肖芳全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入团不久，就参加了兴国县委在十二月二十日组织的一次武装暴动。在这次暴动中，肖华担负着两个任务：来往城乡之间送信联络；带领红军搜捕反动分子。暴动的那天，肖华先到城外把红军的便衣战士带进城里隐蔽起来，天黑以后，肖华和青年干社的同志们一起，在城内走街串巷，贴

标语，撒传单，用木炭在反动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门上划⊗作记号。深夜，参加暴动的红军部队五百多人顺利占领了兴国城，潜入城内的红军便衣战士和暴动群众，按照门上的记号，把反动分子一个个全部捉住，取得暴动胜利。

一九二九年二月，为迎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军，兴国共产党组织又举行了第二次武装暴动，占领了兴国城，为红军挺进赣南、闽西准备了有利条件。四月，正当漫山遍野杜鹃花盛开的时候，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并在兴国亲自主持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年仅十三岁的肖华作为青年团的干部被选送参加学习。在这次学习中，肖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聆听了毛泽东生动的讲课。这年春天，兴国建立了共青团县委，肖华任组织委员。年底，肖华被推选为兴国共青团县委书记。在这一年里，他肩负着在全县组建团组织的重担，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里，肖华跑遍了全县的十四个区、六十多个乡，在每个区建立了一个区团委，每乡建立一个团支部，团员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一千多人。他还以共青团为骨干组织起少年先锋队。全县绝大部分青少年都在革命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兴国团组织的顺利发展，显示了少年肖华组织领导才能并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

一九三〇年三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兴国。他听说兴国有个年岁很小的团县委书记，工作做得不错，就派警卫

员小王把肖华找来，毛泽东看到肖华，满面笑容地拉着他坐下，亲切地说："找你来，是要了解一下兴国共青团的工作。"肖华详细地讲了全县共青团工作的情况，两次武装暴动及兴国城两度得而复失的艰苦斗争过程，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的事迹。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连连点头称赞，并对共青团工作做了指示。这使肖华对共青团的工作更加充满了信心。谈完话，毛泽东热情地留下肖华一起吃饭。毛泽东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一直深深留在肖华的记忆里。

毛泽东离开兴国不久，肖华便接到调他去红军工作的通知。临行前夕，肖华彻夜难眠：想到自己马上要到红军主力部队工作，心里十分激动；想到就要离别生活了十几年的故乡，又非常留恋，特别是想到父母身体不好，弟弟年岁很小，这次离去，很难再有照顾亲人的机会。他不忍心看到亲人送别时的伤心情景，天不亮带双草鞋便悄悄离家上路。

二

一九三〇年六月，肖华赶到红军总前委报到。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肖华热情地进行了谈话，告诉肖华总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肖华告别毛泽东和总部领导，顶着酷暑，经过多日的艰苦路程，来到红四军军部所

在地樟树镇。

在这里，肖华初次见到了担任红四军政委的罗荣桓。罗荣桓向肖华谈了党组织关于在红四军组建共青团的决定，并要肖华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还不满十五岁的肖华，担心挑不起这副重担，就对罗荣桓说："我刚到部队，对情况不熟悉，还不晓得怎样开展工作……"罗荣桓鼓励他说："这次毛委员调你到红四军，相信你能完成好这个任务。"在罗荣桓的具体帮助和大力支持下，肖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红四军的青年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各级党委也都配齐了青年委员。就在这时，即一九三〇年七月，肖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一九三〇年十月，罗荣桓让肖华兼任特务营第三连政委。这个连队新建，基础较差，罗荣桓耐心地向他传授连队工作的经验。连长是从旧军队过来的，当时已近三十岁，大胆泼辣，作战勇敢，就是个性强，爱发脾气，和前几任政工干部的关系都不够好。肖华一到三连，就向他请教连队工作该怎么干。他不加思索地说："连队的事好办，以后我说怎么干，你就怎么干。"肖华听了笑着说："我是政委，是党的代表，怎么能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硬碰硬的几句话不仅没有使这位连长气恼，反而使他觉得这位政委小弟也有个性，以后凡事得让他三分。这样，他们后来在工作中都注意听取对方的意见，两人协作得很好，短短的几个月，就把一个新建连队搞得很有成绩。在

一九三〇年底第一次反“围剿”中，三连随特务营参加了活捉张辉瓒的龙冈战斗，后来又参加了歼灭谭道源半个师的东韶战斗。一九三一年四月，在第二次反“围剿”前，肖华被任命为特务营政委。不久，就带领部队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的主攻方向的战斗。特务营在战斗中得到锻炼，立了新功，肖华也在连续战斗中积累了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

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共青团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肖华做为红四军共青团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瑞金，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当时三十四岁的周恩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身穿粗布军装，蓄着胡子，热情洋溢，举止潇洒，讲话非常富有感染力。共青团中央的负责同志走过来，把肖华拉到周恩来面前介绍说：“这是肖华同志。”周恩来紧紧拉着肖华的手，亲切地说：“肖华，也是小华，年纪很轻！”开会了，周恩来把肖华拉在身边坐下，鼓励他说：“年轻好，青年工作就是要由你们年轻人做。”这次会后，肖华从特务营调到红十师三十团任政委。不到三个月，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长。

一九三三年初，蒋介石正加紧组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围剿”。红军的物质供应极为困难，粮食、衣服、油盐、医药都很短缺，指战员的体质普

遍下降，尤其是疥疮、疟疾等多发病，更严重地威胁着部队。刚从红一军团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青年部长的肖华，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组织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提出在全军青年中开展一个“四不、五要、三努力”的比赛活动。“四不”是：不抽烟、不喝酒、不怕苦、不掉队；“五要”是：要团结友爱，要遵守纪律，要讲究卫生，要搞好军民关系，要积极参加文体活动；“三努力”是：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努力提高军事本领，努力提高文化水平。由于部队各级领导的支持，政治动员的深入，广大青年战士积极参加这一比赛，从而进一步活跃了红军的生活，增强了青年们战胜困难的信心，鼓舞了指战员的革命意志和战斗热情。

一九三三年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为了庆祝胜利，总结经验，进一步鼓舞部队士气，总政治部在宜黄县召开了全军青年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做了报告。在报告进行中，突然有几架敌机在会场上空盘旋，寻找轰炸目标。肖华刚跑到门口，周恩来猛然看到当空堕下几颗炸弹，急忙把肖华拉进门槛，大喊一声：“卧倒！”随后把肖华按倒在身边。就在这时几颗炸弹在门口几步远的地方爆炸了，弹片呼啸着擦身而过。王稼祥主任的腰部被弹片炸伤。肖华以感激的目光看着周恩来说：“好危险啊！”要不是周恩来沉着果断地掩护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空袭过后，周恩来急忙派人把王稼祥主任送往医院，他自己拍打一下身上的尘土，用手帕揩了下脸，对大家诙谐地说："蒋介石知道我们在这里开会，派飞机来给我们放炮庆祝。"大家听了都笑起来，于是又在这个刚被敌机轰炸过的会场里继续开会。

一九三三年四月，蒋介石又亲自部署，调动了五十万大军，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为保卫革命根据地，激发广大青年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发挥青年在革命战争中的突击作用，时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的肖华，主持召开了全军青年工作会议，认真讨论了"扩红"问题，同时向中央提出建立"少共国际师"的建议。这个建议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共青团中央于五月二十日作出了"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少共国际师"组建时，肖华正在前线。有一天，周恩来总政委把肖华叫去，告诉他："你们青年部关于建立少共国际师的提议，已经得到党中央批准。经过军委研究，决定由你担任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对此重任，肖华既感到高兴，又有些顾虑。肖华还不满十八岁，缺乏独立带兵打仗的经验，怕不能胜任，便把自己的想法向周恩来如实做了汇报。周恩来听后爽朗地笑着说："正因为你年轻，才叫你去嘛！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这支部队就更有朝气么！"周恩来还勉励肖华："带兵的经验是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革命战士经过斗争磨炼就会逐步成熟。"听着周恩来的教导和鼓

励，肖华感到增添了一股无穷的力量，他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的这副重担。

“少共国际师”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在博生县（今宁都）跑马坊正式成立并举行出征誓师，肖华做了誓师讲话。所以选在九月三日，因为这一天当时规定为国际青年节。但是，在一个月前的八月五日，周恩来总政委就代表红军总部向“少共国际师”授了旗，并语重心长地勉励指战员：“要爱护你们光荣的战斗的军旗，英勇奋斗，把它插遍全中国！”从此，“少共国际师”的旗帜在红军战争的战场上高高飘扬，“少共国际师”的歌声在各处回荡：

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
“九三”在江西誓师出征去。
高举着少共国际光辉的旗帜，
坚决的果敢的武装上前线，
做一个英勇无敌的红色战斗员，
最后一滴血为着新中国。

“少共国际师”的建制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师，下辖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团。誓师后，即开赴广昌，进行训练。这个师在当时的红军中是一支最年轻的部队，战士的平均年龄只有十八岁左右，有不少是十四五岁的红小鬼，人还没枪高。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刚结束，便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少共国际师”奉命配合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东线抗击敌人。第一仗是在闽北拿口与国

民党军周志群部的遭遇战。发现敌情后，肖华和师长陈光决定，立即以一个营分兵迂回，布成一个口袋，将敌人团团围住。枪声一响，战士们勇猛地冲入敌阵，同敌人展开肉搏，不到两个钟头，就干净利落地全歼敌军一个连，随即挥师渡过闽江，击溃敌军二百多人，还在莲花山歼敌军一个排哨，前后共消灭敌人三百多，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初次遇敌，就打了漂亮仗，“少共国际师”的士气更加高昂。红一方面军总指挥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特地打电报给“少共国际师”，称赞他们这次战斗是“铁拳初试”，勉励他们在胜利中更要百倍提高军事技术，迎接更加艰巨的战斗，争取更大的光荣。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少共国际师”参加了黎川东南的团村战斗。敌人在兵力上比红军多几倍，借助优势的炮火，轮番向红军阵地组织集团冲锋。“少共国际师”的年轻战士，这时已是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老兵”了，他们打得英勇顽强，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肖华和师长吴高群冒着敌人的炮火，深入前沿指挥，哪里最危险，就出现在哪里。这一天，经过反复冲杀，红军将敌人三个主力师打垮，还歼灭了敌军一部，缴获了不少胜利品。傍晚，战斗将要结束时，师长吴高群不幸在敌机轰炸时身负重伤，因流血过多英勇牺牲。看到和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牺牲，肖华热泪盈眶，他向烈士宣誓：“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把少共国际师的光荣旗帜永远打下去！”

一九三四年春天，“少共国际师”在黎川附近参加了邱家隘战斗，敌人以七倍于我的兵力，向红军阵地猛攻，炮火纷飞，子弹呼啸，山头上的树木着了火，泥土被翻了过来，刚调到“少共国际师”任师长的曹里怀和肖华一起在前线并肩指挥，当敌人的炮弹在附近爆炸时，曹里怀几次要把肖华按倒，肖华都站立不动，曹里怀对这位青年政委沉着勇敢地指挥作战，心中暗暗敬佩。为了顶住敌人，肖华又组织各级政治干部，进行及时有力地战场鼓动，号召红军战士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这一仗，“少共国际师”打得十分顽强，给了进犯建宁之敌沉重打击。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少共国际师”还参加了一九三四年四月的广昌保卫战，七月的大脑寨战斗，八月的驿前防御战。在这些连续的战斗中，全师指战员打得英勇，守得顽强，坚决完成了上级给予的作战任务。一九三四年十月初，“少共国际师”奉命掩护红三军团主力转移，展开了石城保卫战，这是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的开始。这一仗打得很壮烈，部队损失也很大。一年来连续战斗的伤亡，使原来一万多人的“少共国际师”，到这时只剩下五千多人了。为了补充伤亡，根据地各县和共青团组织又陆续输送来两千多名新战士，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这支年轻部队，锻炼得更加坚强。

石城保卫战后，又经过一系列的转移作战，肖华和“少共国际师”于十月十六日夜晚，怀着沉重的心情，告别

了熟悉的山山水水，告别了根据地的父老乡亲，渡过了于都河，最后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长而艰险的征途。

长征开始时，“少共国际师”归红一军团建制，担负着掩护军委纵队的任务。从江西出发到贵州，要突破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在那些日子里，“少共国际师”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要打好几仗，部队极度疲劳，又由于缺乏给养而饿饭，但部队靠活跃的政治工作，不论是行军、打仗、饥饿和劳累，年轻的战士们总是乐观的，部队中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和战斗的欢乐。“少共国际师”掩护红军主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派出一个团直扑全州东南的鲁塘圩，配合红五军团以佯攻牵制全州敌人，另以两个团和尾追的敌人死打硬拚，保卫湘江界首地段渡口。这次掩护作战，极为残酷，“少共国际师”的战士们，用刺刀和手榴弹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十二月一日黄昏，自全州、桂林出动的两路敌军，沿湘桂公路向红军渡河地段猛攻，天黑时已相距红军渡口不过三公里，情况万分紧急，“少共国际师”有被敌人切断的危险，于是全师赶快收缩兵力，跑步渡河。肖华和师长彭绍辉率领师主力从咸水圩渡河以后，发现还有一个团没有过来，而敌人已逼近渡口。肖华、彭绍辉十分焦急，根据军团部的命令，不容许他们回头去接应这个团。当他们忍痛翻越了一座大山到达油榨坪集结时，这个团竟神奇地出现在面前。这件事证明了“少

共国际师”经过一年多战斗的锻炼，已经成长为一支能打善走、机动灵活的坚强部队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领导机关的统治，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关头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后不久，周恩来副主席把肖华找去，向他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肖华听了，心情非常兴奋。周恩来还告诉肖华，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使部队更加精干，便于作战指挥，军委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少共国际师”同红一军团主力合并，继续执行北上抗日的任务，并任命肖华为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少共国际师”一年半来的战斗业绩，指出它作为红军中最年轻的一支部队，经过同敌人反复较量，经过残酷的战争考验，广大指战员已经锻炼成为红军的一批骨干力量，中央军委对“少共国际师”的工作是满意的。肖华回到部队后迅速向全师指战员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指战员们听说毛主席又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无不欢欣鼓舞，热泪盈眶。但想到一起浴血奋战、甘苦与共的战友们马上就要分手，又都依依不舍，有些同志竟抱头大哭起来。

肖华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在整编前夕，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少共国际师的军旗是烈士们的鲜血染

红的，今天，我们英雄的少共国际师，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它的光荣战斗历程。但是，它的光辉名字和它的革命传统，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少共国际师所代表的中国青年的光荣战斗传统，必将为亿万青年继承和发扬，从而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肖华离开“少共国际师”，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在“四渡赤水”战役中，他随红二师四团等部队进行政治工作，参加战斗。之后，他率领工作团，协助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同彝民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使红军部队顺利通过大凉山。在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时，他在河岸边亲自吹起冲锋号鼓舞勇士们胜利地渡过天险。在飞夺泸定桥的著名战斗中，他随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向北疾进，并带领突击连，经过激烈战斗，攻下铁丝沟险关，有力地配合了左纵队胜利抢桥。随红二师翻过大雪山后，他和先头部队四团一起到了达维，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后，肖华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红一军团二师政委。八月，肖华和红二师师长陈光率领部队克服重重困难，走过茫无人烟的草地。九月，肖华和陈光率红二师，作为军团的前卫，攻克甘肃南部的天险腊子口，于十九日胜利到达甘南重镇哈达铺。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召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开会，并在会上作了政治报

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概述了长征以来经历的艰险和取得的胜利，批评了张国焘南下的错误，提出了继续贯彻北上抗日的方针，到陕北去同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会上还确定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全支队约七千多人，下编三个纵队，一纵队下属五个大队（相当团），肖华任第一大队政委，杨得志为大队长。部队整编后，继续北上，向陇东高原前进。九月底，肖华和杨得志带领第一大队急袭通渭城，消灭了守敌三百多人，占领了这个有万余人口的县城。在通渭休整了两天，部队继续向陕北前进。十月七日，肖华和杨得志率领第一大队，配合兄弟部队，在青石嘴歼灭了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缴获了一百多匹战马，一批弹药和军衣，不但充实了红军的装备，也增强了打敌骑兵的信心。青石嘴战斗后，陕甘支队出固原，过环县，进入陕北，十月十九日，到达吴旗镇，终于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实现了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同红十五军团会合。这时，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第一大队也恢复了红一团番号，杨得志为团长，肖华仍任政委。红一方面军刚刚到达陕北，蒋介石便胁迫东北军组织了五个师，向陕北根据地进攻。十一月十九日，红一方面军发起了直罗镇战役。

陕北高原的十一月，已是严寒天气。这时，正下着小

雪，而红一军团的指战员们，由于棉衣补给不足，许多人身上还穿着长征时的夹衣，他们靠着旺盛的士气，抵御寒冷。肖华和杨得志带领红一团爬上直罗镇北面的山峰，十一月二十日拂晓发起进攻。正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杨得志和肖华得到军团部的通知，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要亲临红一军团前沿指挥，并且再一次强调要打“歼灭战”。指战员们听说毛主席、周副主席要亲临前沿，都受到极大鼓舞，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上午十一点左右，身穿单衣的肖华，和杨得志一起，冒着隆冬的刺骨寒风，带领红一团和兄弟部队一起攻入了直罗镇，同敌人展开了激烈搏斗，临近中午一股敌人从红军阵地的空隙中冲出来，企图向西突围。毛主席就在附近的山头上，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红一军团部也只有一个警卫排，聂荣臻政委和左权参谋长，把所有机关人员组织起来，在阵地上死守。肖华看到这个危急情况，立即把团部警卫连和直属队的零散人员组织起来进行阻击。敌人来势很凶，肖华高声大喊：“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为了活捉牛元峰，我们要坚决把敌人压下去。”在肖华的鼓动下，冲上来的敌人一个个被打倒在红军阵地前。肖华看到时机成熟，带部队跃出战壕，一个反冲击把敌人打了下去，堵住了缺口，挽救了危局。当天中午，胜利结束战斗，全歼敌一〇九师，生俘敌师长牛元峰以下五千余人，红军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十二月中旬在

瓦窑堡召开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把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根据地作为重要任务。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决定进行东征，红军由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开辟根据地，扩大红军，筹粮筹款，发展抗日武装。东征军命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由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组成，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为总政委。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东征的抗日先锋军隐蔽集结在黄河西岸，紧张而秘密地进行着渡河准备。这时，肖华已调任红二师政委。二月二十日夜八时，部队在北起沟口，南到永和关，沿黄河一百里的渡口，用木船和羊皮筏子同时渡河。第二天凌晨，红军各路突击部队登上黄河东岸，阎锡山吹嘘为“固若金汤”的河防，被红军健儿们一夜突破。红二师迅速占领了三交镇，全歼敌人一个营，接着乘胜前进，二十二日占领了留誉镇。久已盼望红军的河东群众，纷纷奔走相告红军飞过黄河来了!

二月二十六日，红二师在关上村歼灭了阎锡山的“王牌”部队号称“满天飞”的独二旅第四团，打了东征以来的第一个胜仗。关上村战斗后，红二师经过短期休整继续东进，三月上旬越过吕梁山，进至孝义县兑久峪一带，逼近同蒲路。阎锡山调集部队，对东征红军发起反击。在兑久峪战斗中，肖华在前线指挥作战，左腿负了重伤。四月中

旬，肖华迫不及待地从野战医院返回红二师。这时，红二师正由临汾附近向西转移，撤到清水关附近，负责掩护军团部和红一、四师西渡黄河，返回陕北。

一九三六年五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之后，进行了短期休整。五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东征，动员西征。会后，红军开始西征，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从驻地出发，经吴旗镇向曲子、环县一带开进。

红二师是红一军团的前卫。这时，杨得志从红一师调任红二师师长，与肖华一起率部执行西征任务。西征途中，两个老战友共同指挥红二师歼灭了曲子镇的敌人，生俘马鸿逵部骑兵旅长冶成章（外号"野骡子"）等一百余人。曲子镇战斗后，红二师西进至七营川、清水河一线，大力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和开展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红二师忽然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贺电，当天又接到中央的指示，说红二方面军正由两当、成县一带向北转移，要红二师前去迎接。肖华亲自带领红二师五团和师政治部宣传队等工作人员携带慰问品，十月二十二日在界石铺东北的将台堡同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肖华在这里初次见到久已闻名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同他们紧紧地握手，热情地互致问候。甘肃的十月，已经降霜，天气很冷。肖华把带来的大批毛毡、羊皮等礼物送给红二

方面军，红二师的战士们也把自己烙的饼塞到红二方面军同志的口袋里。肖华还请红二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参观了红二师的连队俱乐部，看了宣传队的演出。在会师后的日子里，这两支红军部队都沉浸在亲如兄弟的情感之中。

一天晚上，肖华忽然接到从九十里外的会宁县城打来的电话。他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你是肖华同志吗？"这亲切而又熟悉的四川口音的问话，使肖华高兴得要跳起来。这问话正是全师指战员日夜思念的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首先关切地问道："毛主席好吗？周副主席好吗？"接着又问到彭德怀等许多领导同志，问到部队广大指战员，还询问了陕北根据地的情况，肖华都一一作了回答。朱德听了非常高兴。这次电话打了足有半个小时，朱总司令的深情问话，激起肖华的崇敬与思念之情，不禁流下热泪。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集中了三个方面军的部队，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进行了山城堡战斗，歼敌一个多旅，给了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从而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山城堡战斗后不久，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时，红二师正在陕北的井家沟一带进行休整。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十二月十四日和十九日，中共中央和军委先后两次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指出了事变的意义和可能发展的前途及必须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红二师在

部队中一经传达学习，便认识到中共中央的这一决策是英明正确的，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为确保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得以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主力开赴西安一线，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准备给兵临潼关、威逼西安的亲日派何应钦以必要的打击。红二师随即于十二月下旬在军团部指挥下开赴西安以北的三原地区待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进攻西安扩大内战的阴谋破产，仗没有打起来。但是，红二师在南下途中，却看到了中共中央正确处理“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出现的崭新局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肖华等领导红二师开展了形势、任务教育和军事训练，开展了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抓紧培养选拔干部，还进行了扩军和组织调整工作，使全师团结一致，斗志高昂，为出师抗日，作好了各种准备。

一九三七年八月，红军改编前，肖华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遇到了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宣传队工作的王新兰。王新兰是四川宣汉人，从小跟着叔叔王维舟当了红军，经过长征，年岁很轻，又聪明活泼，承罗荣桓的介绍，肖华和王新兰结为终生的革命伴侣。

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原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等部合编为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不久即恢复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肖华为副主任。一一五师在陕西三原县召开全师改编誓师大会后，立即出发，北上抗日。九月二十五日，在山西灵丘平型关战斗中，一一五师首战告捷，歼灭侵华日军精锐板垣师团一千余人。平型关战斗，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增强了抗战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

肖华参加了这次名扬中外的平型关战斗。此后不久，八路军恢复了在改编时一度取消了的政委制度，肖华被任命为三四三旅政委。肖华和旅长陈光率三四三旅于十一月四日进行了广阳伏击战，歼灭日军近千人。十一月下旬，三四三旅随一一五师师部在洪洞、赵城一带进行休整，招募新兵，补充部队。一九三八年三月，肖华又和代旅长李天佑率三四三旅在大宁县进行了午城、井沟战斗，共毙伤日军一千余人。四月，全旅进驻孝义县石相村一带休整。

一九三八年八月，中央军委和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发来电报，要肖华率领一批干部去冀鲁边。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为肖华出征调集干部，组织领导机构。临行前，罗主任同肖华进行了恳切的谈话，明确交代了到冀鲁边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开创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嘱他思想上要做好充分准备，到那里去打游击，过艰苦的斗争生活。

根据师部的指示，组建了东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克明任参谋长，符竹庭为政治部主任。由一百多名干部分别组成纵队的司、政、供、卫四个部门，纵队下辖教导队、通信连、骑兵连等单位，共约三百余人。八月中旬，这支新组建的挺进纵队出征，越过汾河，穿过同蒲路，经几日行军就到了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在这里，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接见了肖华等纵队领导同志，对开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作了重要指示。肖华把朱德、彭德怀的指示，迅速向东进纵队全体干部作了传达，进行了认真讨论，一致认识到执行这一任务的光荣，也深感这副担子的沉重。他们在太行山总部休息了几天后，继续向东挺进，越过平汉铁路，穿过冀南平原，直奔冀鲁边，九月二十七日进入冀鲁边中心区乐陵县城。肖华根据总部的指示，调整加强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并出任军政委员会书记。调整后的军政委员会，针对冀鲁边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巩固津南、发展鲁北”的方针，使冀鲁边根据地的建

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统一领导冀鲁边的抗日武装，将原在这一地区的三支部队编入挺进纵队，孙继先的津浦支队为第四支队，曾国华的永兴支队为第五支队，三十一游击支队编为第六支队。与此同时，还建立了运河、津南、商河、泰山等地区性的支队以及十几个县的县区武装。部队整编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经过短短几个月，到一九三八年底，冀鲁边的局面很快打开，边区武装部队，扩大到二万余人，根据地包括津南和山东省北部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十五个县的地区。

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与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密谋组织“冀鲁联防”，妄图以软硬兼施、南北夹攻的方式，把八路军赶出冀鲁边。

当时，乐陵县是冀鲁边领导机关所在地，也是沈鸿烈同八路军争夺的焦点。沈鸿烈委派的县长牟宜之，政治进步，思想开朗，倾向抗日，同沈鸿烈有很多矛盾。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瓦解“冀鲁联防”，尽量争取沈鸿烈共同抗日，肖华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决定亲自去见沈鸿烈。十月底，肖华带着一个骑兵班，偕同牟宜之，轻骑简从，直奔惠民县城。沈鸿烈是清末秀才，又在日本海军学校毕业，当过张作霖的舰队司令和国民党的青岛市长，阅历颇深，老奸巨猾，是有名的反共顽固派。他以为肖华不过是个二十二岁的“娃娃司令”，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肖华和牟宜之一到惠民，就被迎到省府的所在地文庙大厅里，厅

外的台阶上下，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戒备森严，沈鸿烈和他的秘书长走出大厅，迎接肖华。肖华步入大厅，同老于世故的沈鸿烈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肖华晓以大义，希望沈鸿烈走合作抗日的道路。沈鸿烈狼狈地败下阵来，于是摆出一副省主席的架势，蛮横地说："不管怎么说，乐陵是鄙人治下，还望肖司令不要染指乐陵政务，使省府为难。"

肖华笑道："我军为抗日进驻乐陵，同全县父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得到了各界民众的支持拥护。"他转头问牟宜之："牟县长，我们有什么使你感到为难和不便吗？"

牟宜之连连摆手说："肖司令，哪里话，哪里话。"

话不投机，这场两个多小时的"舌战"草草收场。

席散后，沈鸿烈又把牟宜之留下单独谈了一阵。在返回乐陵的路上，牟宜之对肖华说："沈鸿烈为了拉我，玩弄手腕，私下封我为专员，他这是明升暗降，要削掉我这个县长的实权嘛！我婉言辞谢了。"肖华说："沈鸿烈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他的真正意图，是想孤立、打击八路军，矛头是指向我们挺进纵队的。"牟宜之望着肖华点点头，对肖华的敏锐观察和正确判断深为钦佩。

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和沈鸿烈不同，他收买了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供给他枪支弹药，妄图用武力消灭八路军，杀害共产党，侵占盐山一带抗日根据地。肖华和纵队其他

领导人研究后，决定向盘踞在盐山大赵村的孙仲文部发动进攻，消灭了这伙反动民团。津南专员杨靖远不幸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战斗结束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全体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以高昂的士气迅速向北挺进，开辟了盐山、沧县、新海等新区，建立起抗日政权。

至此，沈鸿烈和鹿钟麟的“冀鲁联防”宣告破产。他们的“软硬兼施，南北夹攻”，被各个击破。后来，肖华又争取团结了国民党军吴化文、高树勋等部的合作，共同抗日。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和挺进纵队，在斗争中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军由沧州、德州、济南三地分别出动了二万多兵力，向盐山、庆云、乐陵一带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合击，企图与挺进纵队主力决战。在日军重兵压境的情况下，肖华召集边区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寻机给以打击。为了避敌锋芒，不上敌人决战的圈套，纵队机关于一月七日撤出乐陵城，肖华、邓克明、符竹庭等纵队领导人，分别带领机关及各支队在乐陵周围活动，以便分散敌之兵力，便于各个击破。

二月，肖华和邓克明带领纵队司令部和第五支队一个营，三次袭击东光城东面之灯明寺，共毙伤日伪军数百人，使日军不敢在灯明寺安据点。

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发出指示：肖华活动之冀鲁边地区粮食困难，敌人封锁严密，应

以一部转入鲁西。根据这一指示，挺进纵队机关和各支队于九月下旬分批进入鲁西地区。

肖华在冀鲁边虽然只战斗了一年，但这是他独当一面勇于开创的一年，也是他功绩卓著闪耀着青春光华的一年。肖华和他领导的挺进纵队，深深扎根在冀鲁边广大人民的心中。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肖华率挺进纵队机关和曾国华支队自冀鲁边南下，进入鲁西，对侵占茌平、博平等地的国民党顽固派保安第七旅齐子修部进行反击，歼其大部，恢复了这一地区。十二月，肖华又率部在东阿边缘，坚决镇压了陈玉怀为首的反动会道门。这年冬天，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肖华又率部在茌平以南摧毁了王家油房敌据点，歼其一个营。肖华率部进入鲁西后，加强了党在鲁西的军事力量，推动了鲁西地区抗敌斗争的开展。

一九四〇年三月，根据一一五师师部指示，将鲁西八路军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原在鲁西的独立旅和挺进纵队合并，恢复三四三旅番号并兼鲁西军区，肖华任三四三旅政委兼鲁西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杨勇任三四三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副司令员，何德全任参谋长，曾思玉任政治部主任。同年四月十五日，在东平县戴庙召开鲁西各界代表大会，决定将鲁西北、泰西两个行政委员会合并，成立鲁西行政主任公署，选举肖华为主任，段君毅为副主任，下辖泰西、运西、鲁西北、运东四个专署。由于统一了鲁西八

路军部队和政权的领导，对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鲁西行政公署在一九四〇年春天召开了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座谈会，肖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具体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结合大量事实，说明只要全国的各方面的力量团结一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会后，小吴庄的一位杨老先生伸出大拇指赞叹说：“共产党的主张好啊！共产党里有人才。肖华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好将领。”

肖华既抓政治斗争，又抓军事斗争。一九四〇年七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组成华北讨逆野战军，宋仁穷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在宋、肖的统一指挥下，对再犯鲁西抗日根据地的顽军石友三部，于七月十一日发起第二次反击作战，在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下，顽军石友三部全线向南溃逃，取得反击作战的胜利。从三月至八月，两次讨石战役，共歼灭顽军约两万人，粉碎了顽固派要挤走八路军的企图，控制了北起朝城、南至东明、西起卫河、东至运河的广大地区，使冀鲁豫和鲁西两个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命肖华为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九月中旬，一一五师在鲁南

费县的桃峪召开高干会议，肖华由鲁西前来赴会，会后正式就职。从这时起，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肖华在山东工作、战斗了整整五年，他作为罗荣桓政委的得力助手，还兼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忠于自己的岗位，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肖华重视政治机关本身的业务工作和思想作风的建设。他要求机关干部不要浮在上面，都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经常把机关干部组成巡视团、工作组，定期下部队去检查工作，亲自主持听取检查情况的汇报，从中总结经验，找出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指导部队的政治工作。他十分关心机关干部的政治和业务学习，亲自督促并带头参加师政治部机关干部坚持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认真学习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后，肖华立即主持研究落实，以师政治部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认真组织学习贯彻。为使中央决定的精神首先在领导机关落实，肖华亲自组织师政治部科以上干部进行学习和检查，并按照中央决定的要求，对每个科以上干部的党性状况作了具体的分析和鉴定，明确各自的努力方向。通过这次学习和鉴定，对每个干部都是终身难忘的深刻教育。

肖华十分重视部队同志的来信来访。他在一次师政治部的会议上提出：要把来信来访作为政治机关了解战士的心声、解答和处理部队提出的各种问题的一种方式，作为

政治机关为部队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要求对来信来访要做到“有信必回，有问必答”。肖华还要求政治部各部门，每月每周都要有工作计划，一周召开一次部务会议，讨论研究并及时解决政治工作中的问题。从而在战争环境中，建立了政治机关开展工作的良好秩序，提高了工作效率。

肖华始终把连队的建设当作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一九四二年三月，一一五师在莒县石板村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肖华作了《加强连队政治工作建设》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抗战四年多来全师连队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加强连队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办法。他强调抓连队工作一定要先抓好党支部建设，抓好连队指导员的挑选和培养，要求连队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他还要求把基层的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连队建设的各个方面，以保证训练、作战任务的完成和战斗力的提高。

肖华尤其重视战时政治工作。一九四一年“八一”建军节军政大检阅以后，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一一五师在临沭县蛟龙湾召开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政治工作会议，肖华作了《怎样进行战时政治工作》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的胜利。”他强调说：“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的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

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

一九四一年初，日伪军、国民党顽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三角斗争日益尖锐，敌后抗战日趋困难。在山东，有近四万日军和十八万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地“扫荡”和分割封锁。当时，只有滨海、鲁中、胶东三个地区还有比较集中的根据地；冀鲁边和清河地区已经被切割为小块，成为分散的根据地和游击区；鲁南山区则被压缩在“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穿”的狭窄地带。有的地区八路军主力部队只能换上便衣，分散活动。

为了扭转山东抗战的不利局面，渡过“黎明前的黑暗”这一最艰苦、困难的阶段，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向敌后八路军提出要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又给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来电指出：“山东、华中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性的……因此，你们的战略部署须适应上述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结合山东的具体情况，在罗荣桓的领导下，肖华组织师政治部和所属部队大力加强敌伪军工作，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在地方党委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深入、扎实的工作，争取了四大股伪军先后反正。这四大股反正的伪军共八千三百余人，先后编为山东军区的四个独立旅。此

外，尚有千人以下反正者一百五十余股，共七千余人。

肖华重视瓦解伪军工作的经验，在每一大股伪军反正后，他都组织军区政治部及时进行总结，向总政、野政发电报告，向部队传达，既巩固了伪军工作的成绩，又进一步推动了伪军工作的开展。

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肖华充分运用他在冀鲁边时智斗沈鸿烈、团结高树勋、争取吴化文的成功经验，协助罗荣桓正确处理了对国民党军于学忠部的争取团结，对李仙洲部的孤立打击，大大改善了山东敌顽我三角斗争的形势，挫败了蒋介石派遣其嫡系部队入鲁反共的企图。罗荣桓当时曾把这一斗争的胜利，看成是“山东军民的一项杰作”，肖华是这项“杰作”的一位主要领导者。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驻在滨海区日照、莒县一带的东北军一一一师，毅然脱离了国民党部队。经过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的争取工作，后来这支部队接受了八路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政治思想上的改造，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宣布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军。肖华来到日照县一一一师驻地，代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军区首长，向全师官兵庄严宣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体同志的艰苦努力，这支旧军队已经改造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为此，特授予这支部队以“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的番号。在这次隆重大会上，肖华还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六大特征：第一，人民军队有中国共产党的绝

对领导，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党的支部是连队的坚强堡垒；第二，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以此为宗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是人民的子弟兵；第三，人民军队建立了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工作是这支军队的生命线；第四，人民军队有良好的官兵关系，尊干爱兵是这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第五，人民军队有严格的纪律，这种铁的纪律性是建立在全体官兵高度自觉的基础上的；第六，人民军队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有勇敢不怕死的牺牲精神和顽强的战斗作风。

滨海支队就是按照这些要求，在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首长的关怀领导下，逐渐成长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滨海支队是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从山东渡海进入东北的第一支人民军队。

肖华一贯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使用。在一一五师聚集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由于肖华对他们的信任，放手把他们放到工作实践中去考验、锻炼，对他们的缺点又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因此，这批青年知识分子都把一一五师政治部当作培养锻炼自己成长的革命熔炉。

肖华也和罗荣桓一样，在十分艰难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处处表现着实事求是、联系群众、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他带动着、影响着身边的同志和部队的指战员，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中央军委提出的各项任务，使山东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与发展。

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的整风运动中，突出地表现了肖华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不是照搬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决定，而是结合山东敌后游击战争的实际情况，具体地贯彻执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山东的整风学习和反省坦白，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

肖华和罗荣桓政委还抵制了在整风和审干中搞“抢救运动”的作法，坚持了从山东和八路军部队实际出发的原则，稳步前进，防止了“左”的倾向，保证了整风和审干的顺利进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统一整编，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任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肖华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和罗荣桓一样，都很关怀山东纵队的干部，对他们一视同仁。在整编后的干部配备上，坚持五湖四海和任人唯贤的原则，充分发挥当地干部的积极作用，从而加强了部队的团结，统一了山东地区武装力量的指挥。

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渡过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山东分局和军区根据中共

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全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肖华很重视对部队生产运动的领导，他还带头参加政治部的开荒种菜和开盐田等生产劳动。一九四四年春节前，政治部的同志到赣榆县海边的柘汪一带修盐田，大家来到海边，面对一片汪洋，都不知道如何下手。这时候，肖华来了，只见他卷起裤腿，脱掉鞋袜，拿起铁锹，走到结着冰碴的海水里，一声不响地用铁锹挖泥筑埂。同志们一看，都不顾劲吹的海风和冬季的寒冷，也卷起裤腿，脱掉鞋袜，一个个走下冰水中去，跟着挖起来。肖华的行动，正是一道无声的命令，带动着鼓舞着政治部的同志们积极地、愉快地劳动起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山东八路军部队的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改善了部队生活，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早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肖华受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委托，前往太行山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汇报山东五年来的工作及对敌斗争情况。肖华于十二月到达太行山，在八路军总部见到了彭德怀、罗瑞卿，还在黎城一二九师师部见到刘伯承、邓小平。这些领导同志亲切地接待了肖华。一九四三年一月，在麻田召开的中共北方局会议上，肖华详细地汇报了山东的敌顽我斗争形势及根据地建设、群众工作、统一战线等情况，还汇报了刘少奇对山东工作的指示。会上进行了认真讨论，对山东的工作给予

了很高评价，并对山东分局以后的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

一九四三年三月，肖华由太行山返回山东，向山东分局传达了北方局对山东各项工作的指示及太行山根据地的工作经验，对推动山东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肖华正在胶济路前线指挥鲁中军区和渤海军区的反攻战斗。九月，肖华突然接到电报，要他火速赶回山东军区。肖华星夜兼程，赶到莒南县大店，罗荣桓把中共中央九月十一日给山东分局的电报交给他。电报说：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的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肖华看完电报，两位战友促膝长谈，他们谈论了抗战胜利后美蒋勾结内战迫在眉睫的形势和东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罗荣桓向肖华交代了任务：“中央决定派你到东北开展斗争，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部分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组织地方武装，建立长白

山及南满的根据地。”

肖华受命后，立即在两三天内组织了精干的指挥机构，清理了文件，换上便衣，九月下旬赶到胶东黄县，和刘居英、吕麟、赵杰，吴瑞林、刘西元等在滦家口上船，告别了为之战斗了八年的山东根据地，横跨渤海，向东北进军。经过一天一夜航行，于九月二十七日在大连登陆。当天，肖华同刘居英等赶往沈阳，向中共东北局汇报。彭真、陈云等领导同志听了肖华的汇报，向他介绍了当前的形势，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十九日《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接着指示肖华：中央决定把山东渡海来的主力留在南满，开辟南满根据地。当前，你们第一位的任务是站稳脚跟，控制海口，迎接大部队登陆。同时，要趁蒋军未到的机会剿灭土匪和日伪残余，放手发动群众，改造政权，建立根据地。并且利用一切可能，尽快整编军队，发展武装，扩大主力，形成拳头。为统一南满铁路以东调进部队的指挥，中共东北局决定建立东满人民自卫军，由肖华任东满临时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代表东北局领导该地区的工作。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建立南满根据地，在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肖华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结合南满的实际情况，下大力抓了几件主要工作：一是接送干部，输送了部队；二是坚决围剿南满敌伪残余势力，稳定了局势，站稳了脚跟；三是同苏联红军进行谈判，建

立了友好关系，同时接收了安东市铁路局，搞到了一大批武器、装备；四是发动群众，发展了武装力量，建立了民主政权。

一九四六年一月初，中共东北局决定，以东满人民自卫军为基础，成立辽东军区，肖华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组建了中共辽东省委，辖辽东、安东两分委，肖华为省委书记。经过三个多月艰苦的工作，到一九四六年初成立辽东军区时，已辖有三个军区，两个纵队、九个旅、三个炮兵团以及直属部队等，共计六万六千余人，为即将进行的东北解放战争，准备了有利条件。

在开辟南满的斗争中，肖华既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又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的指挥才能，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一九四六年辽东军区进行的保卫本溪、鞍海和新开岭三次战役中。这些战役的进行，也是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建设南满根据地的主要手段。

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国民党军在大举进攻四平的同时，又连续向本溪发起进攻。四月一日，国民党军集中三个师的兵力向本溪猛攻，肖华指挥辽东军区第三纵队奋起反击，激战两日，打败了敌人对本溪的第一次进攻。四月七日，国民党军又集中三个多师的兵力再次进攻本溪，肖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的指示，指挥第三纵队的七、九两个旅，向敌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亲自指挥的第

二十五师及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一部，发起坚决反击，在千户屯以北地区，歼敌一千八百余人，击伤敌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及二十五师师长刘世懋，敌军长赵公武仓皇脱逃。敌第十四师为解救二十五师，急速北转，企图向千户屯进攻，迂回第三纵队侧后，肖华急令第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率第十旅赶至千户屯，并统一指挥第三纵队八旅主力，在英守屯地区于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经四昼夜战斗，共歼敌四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对本溪的第二次进攻。这次胜利震惊了东北国民党军将领，挫伤了敌人的士气，增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胜利信心。为这一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四月十四日来电祝贺。

国民党军连遭惨败后，重新调整部署，于四月二十八日，又集中五个多师的兵力，八万之众，在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向本溪发起第三次猛烈进攻。这时，辽东军区第三纵队主力已经北调参加四平方面作战，所余主力部队凭险坚决阻击。四月三十日接到中央军委关于死守本溪的指示，肖华当即调整部署，进行动员，组织部队赶修工事，坚守阵地，同进攻的敌人浴血奋战。肖华和其他军区领导同志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战场形势，认为部队防御面太宽，兵力不足，敌我力量悬殊，不宜死守，五月三日发电向中央军委请示，为避免被动，保存军力，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议放弃本溪。中央军委接到请示电报后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肖华遂组织部队于五月四日凌晨有

秩序地撤出本溪，直到最后一个营过本溪大桥，他才率领指挥机关转移。第三次保卫本溪作战，共歼国民党军两千余人。五月六日中央军委来电指示：本溪虽失，你们牵制敌人甚多，这就是胜利，望鼓励各旅，继续于本溪周围阻击敌人。

从对本溪的死守到撤离，表现了肖华既有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对上级的指示坚决执行；又能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向上级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正是他做为一位高级指挥员的优秀品质。

国民党军占领本溪后，不久又攻占四平，接着调集大军猛攻长春，北线形势十分紧张。为了钳制和调动敌人，配合北满作战，肖华和军区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于五月十五日决定：发起鞍（山）海（城）战役。当时，国民党军一八四师守备鞍山、海城、大石桥和营口一线，兵力分散，防守薄弱，利于攻歼。五月二十四日，辽东军区部队攻克鞍山。五月二十六日，肖华和军区其他领导同志又果断决定：以一部兵力坚决阻击南援之敌，四纵主力继续南进夺取海城。二十八日黄昏，四纵十旅向海城发起攻击，经过一昼夜激战，二十九日傍晚突入东门，将守军彻底包围，在猛烈的军事打击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守军一八四师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宣布起义。这次鞍海战役，共毙伤国民党军一千二百余人，俘敌二千一百余人，两千七百多人参加起义，辽阳以南铁路线全部收复，直接

威胁沈阳，有力支援了北满作战，打乱了蒋介石进攻北满、夺取哈尔滨的部署，对东北战场以后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来电表扬“鞍山战斗打得好”。

鞍海战役后，迫使国民党军于六月七日在东北暂时休战。一九四六年十月中旬，国民党军又集中八个主力师十万人，采取“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向安东、通化地区进攻，妄图先占南满解放区，再进攻北满，进而抢占整个东北。这时，肖华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反复磋商，拟在通化前线永陵一带歼灭运动中之敌，后来该敌集中防守，不为佯动所诱。肖华审时度势，认为向宽甸进攻的敌人对我威胁最大。这路敌人是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号称“千里驹”，到过印、缅作战，装备精良，是国民党军的嫡系，杜聿明起家的老本。但该敌由于多次遭打击，新兵增多，战斗力降低，这次孤军冒进，突出于安沈线以东地区，处于运动之中，距南北两路援军较远，加上这一带地势险要，群众条件较好，便于我军隐蔽集结和实施围歼。鉴于情况紧急，肖华当机立断，在十月二十三日一面报告，一面决心放弃安东，组织新开岭战役，集中四纵全部兵力，歼敌二十五师。肖华率轻便指挥所赶赴宽甸前线，指挥第四纵队把敌二十五师调动至新开岭地区预设战场。三十一日晨，四纵队八个团的兵力发起总攻。十一月二日，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敌二十五师八千余

人全部被歼，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以下五千八百余人被俘，创造了东北民主联军首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先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十一月三日发来贺电："庆祝你们歼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新开岭战役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迟滞了其对临江的进攻，极大地鼓舞了民主联军辽东部队的士气，为坚持南满和保卫北满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新开岭战役中，作为战役指挥员的肖华，在作战指挥上，充分表现了他善于运用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以及他卓越的胆识，锐敏的判断，正确的决心，果敢的行动和善于捕捉战机的特点。由于他的正确指挥，保证了新开岭战役的胜利。

新开岭战役的胜利，未能改变在南满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这时，辽东军区被迫放弃了安东，国民党军又步步紧逼，攻占了通化、辑安等重要城镇，进而向长白山压缩。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为了加强南满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军区（亦称辽东军区），肖劲光任司令员，陈云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肖华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并任南满分局副书记。陈云、肖劲光于十一月底到达南满，十二月中旬在七道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了坚持南满斗争和作战问题。陈云在会上就必须坚持南满的问题作了重要讲话。肖华率先表示赞成坚持南满的决定，多数同志也表示赞成，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讨论制定了积极防御、粉碎敌人进攻的作战方案。七道江会议，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确定了坚持南满的基本方针，为保证南满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七道江会议一结束，就开始了四保临江的作战。从这时起，直至一九四七年四月初，在三个多月中，肖华积极协助肖劲光，指挥四次保卫临江的作战，在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下江南的配合下，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临江的四次进攻，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企图，坚持了南满，保卫了北满，巩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并迫使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而民主联军则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次战役之后，东北民主联军接连进行了夏季、秋季、冬季攻势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改变了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也为东北战场的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一九四七年八月到一九四八年二月，在这半年中，肖华以主要精力领导了南满的土地改革运动。一九四八年三月，肖华到哈尔滨参加中共东北局召开的省委联席会议和军事工作会议，和陈云、肖劲光共同汇报了南满的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南满（辽东）分局。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领导南满党政军民胜利完成了坚持南满斗争的历史任务。四月至五月，肖华又在哈尔滨参加东北军区召开的纵队和师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还正式宣布了辽东军区机关

改组为东北军区第一前线指挥所，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五月下旬，肖华和肖劲光率领东北军区第一前线指挥所，由通化市乘汽车北上，二十七日进到长春东南的李家屯，担任指挥解放长春的任务。

东北野战军（由东北民主联军改称）政委罗荣桓，于六月十五日在吉林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东北局的指示，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调整了部署，于六月二十二日，十万大军兵临城下，在长春城外方圆五十里周围，形成一个封锁区，使长春的国民党军成为“瓮中之鳖”。

长春是一个碉堡林立、沟壕纵横、有着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奉命来固守长春，提出“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刮粮食”的方针，其兵力有新七军、六十军两个军及地方游杂部队等共约十万人。

东北野战军的严密经济封锁和坚决的军事打击，使长春国民党守军内外交困，军心浮动。在这种情况下，又对长春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六月二十八日，围城指挥所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肖华在会上作了围困封锁长春的政治工作报告，阐明了发动群众封锁长春的重要性，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口号，要求“政治攻势的开展，必须与军事的围困、经济的

封锁密切结合”，号召发动群众，创造多种生动有力的形式瓦解敌军。报告还提出了围城的政治工作任务，以高度的战斗动员保证围城任务的完成，并在围城中贯彻攻打长春的战场练兵和开展驻地群众工作。会后，一个大规模的瓦解敌军的群众运动迅速在部队中展开，广大指战员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宣传攻势。强大的攻势，发挥了心战为上的巨大威力，长春国民党守军大量逃出城来向人民解放军投降。据不完全统计，从六月底至九月底，三个月内，共接收国民党军投诚官兵一万三千七百余人。

在对长春进行军事围困、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的同时，人民解放军派人在国民党守军内部加紧进行争取上层军官的工作，特别是对原属云南部队的六十军的争取。经过大量的艰苦的上层工作，为六十军的起义创造了条件。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九万余人。锦州大捷，引起东北战局的急剧变化。同一天，蒋介石在长春空投手令，严令郑洞国立即突围。十月十七日，经过积极争取的长春国民党守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毅然率部起义，国民党军新七军官兵也纷纷投诚。十月十九日，陷于绝境的长春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至此，被围困了五个月的长春，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大围城战役胜利结束。中共中央给东北野战军来电祝贺长春大捷。

长春解放后的第三天，肖华和肖劲光奉命率领围困长春的第一兵团（九月改此番号）日夜兼程南下，参加沈阳外围作战。十一月，肖华调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他又肩负起创建新兵种的艰巨任务。

五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辽沈战役结束后，肖华率东北野战军特种兵部队南下入关，参加平津战役。一九四九年三月至六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肖华在天津筹备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国事宜。七月，他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率领第一个友好使节团，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后来，他又应邀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回国。三月，中央军委任命肖华为空军政委。同年六月，肖华调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从此，他又开始了协助罗荣桓主任重建总政治部的使命。

建国初期，总政治部仅是一个适应战争环境的较小机构，只有两个研究室，一个秘书处，不到一百个干部，显然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总政治部是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为了发挥这一重大作用，首先要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肖华一到总政，就按照罗荣桓主任确

定的“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从全军各部队选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健全了部、处等领导机构。随后，又协同军委总干部部把各军种、兵种、院校的领导机构逐步建立起来。这时的总政主任罗荣桓，还兼任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等要职，他虽然身患重病，仍然主持总政的全盘工作，掌握大政方针，而日常工作由肖华负责处理。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实施对全军的政治工作领导，从一九五〇年下半年起，陆续召开了全军的宣教、文化、组织、青年、保卫等工作会议。为开好这些会议，肖华从每个会议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主要内容，直到会议的文件、报告，都是先同各有关部长初步议定后，经请示罗荣桓主任，再书面报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批准后，即由肖华负责主持具体实施。那时，许多会议都是请罗荣桓主任在开会或闭会时讲话，而会议的主要报告，多由肖华亲自来作。为了作好这些报告，肖华经常派工作组下部队进行专题调查，或约请部队有关领导同志开座谈会，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有时肖华亲自下部队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再查阅大量书籍、资料，形成报告提纲，而后写成初稿。

肖华一贯重视部队的文化、体育工作。一九五一年，总政治部文工团和八一体工队开始组建，肖华关怀备至。同年九月，在八一男女篮球队刚刚建立时，肖华亲自为他

们授旗，语重心长地说：“这面鲜艳的八一军旗，是我军千百万战士用鲜血染红的。今天把以八一命名的军旗授给你们，希望你们热爱这面旗帜，扛着这面光辉的旗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为祖国争光，为解放军争光。”在肖华的直接关怀下，总政文工团和八一体工队三十多年来，活跃在部队和祖国各地，并参加过多次国际上重大的演出和比赛，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了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赞扬，也为人民解放军赢得了国际声誉。

在一九五一年，由总政治部主办的《八一杂志》、《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歌曲》等也相继创刊。对于这些刊物的出版、发行，肖华十分重视。当时，他对《八一杂志》和《解放军画报》，几乎每期都要亲自审查，从中心内容、稿件编排、直至说明注释、封面图片，都看得很仔细，发现不妥之处，及时指出纠正。

一九五〇年十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陆续分批出国，开赴朝鲜战场。当时，总政治部重建不到半年，各项工作千头万绪，百端待举，十分繁忙。在此情况下，肖华对路过北京的志愿军各兵团和军的领导干部，都给予热情接待，亲切谈话，了解部队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陪同他们去见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一九五二年六月，肖华又亲临朝鲜前线，先在碧潼察看了战俘营，参加了志愿军第二届敌军工作会议，并在会

上作了报告。六月底，肖华到了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在这里他用了十天时间，分别邀集各兵团、各军的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汇报部队政治工作情况，并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归纳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的四个方面的胜利：把敌人打回三八线以南，取得了新的作战经验，教育了中国和世界人民，争取了和平的时间。还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肖华对志愿军政治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和新的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指出对政治工作经验总结不够的缺点。他还针对部队当时存在的思想问题，提出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和方法。肖华这次的朝鲜之行，及时地检查指导志愿军的政治工作，对保证志愿军对以美军为首的强大敌人进行相持作战的胜利，直至实现和平撤军，都起了积极作用。

肖华对于海防边防的建设也很重视。五十年代，肖华亲自率领工作组，多次深入到云南、福建、新疆等边海防的部队和前沿哨卡，检查工作，调查研究，及时准确地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渔民生产问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民族团结问题、以及加强和巩固海边防等问题的报告，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肯定和赞扬，并把肖华的建议批转有关部门和地区研究执行。

在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肖华还协助罗荣桓主任组织领导了全军的精简整编、向文化进军、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实行三大制度等重大工作，参与领导制定了一九

五四年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等重要规章制度。这一时期，他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等重要文章，为保持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五五年九月，肖华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身患重病又兼职较多的罗荣桓主任，向中共中央和军委请辞了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的职务，由谭政继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继任总干部部部长。肖华担任总干部部部长以后，正确地掌握党的干部政策，坚持“德才兼备”、“五湖四海”和“任人唯贤”的原则，努力识别干部，大胆使用干部，团结爱护干部，并从各方面关心干部。他在全国解放初期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并在一段时间兼任总政干部部部长期间，负责对全军重要领导班子的选配，他能很好地结合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情况，充分照顾到红军时期的三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各个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几个野战军。当时的总参、总政、总干及各军、兵种的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都是按照这个原则选调组成的。这就可以使他们从各方面了解情况，交流经验，听取意见，并且有助于增进部队的团结，提高领导机关的威信。

肖华非常重视对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尤其在建国之后，为了适应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五十年代初期，全军陆续兴办了一批院校，培养各类各级干部。一九五二年，肖华又协助罗荣桓主任筹建政治学院，从选定院址，修建营房，选调和集训教员，确定办院方针和教学主要内容等许多重大问题，都是根据罗荣桓的指示，由肖华亲自主持和具体领导进行的。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肖华兼任第一副院长，并在建院初期担任学院党委书记。肖华具体领导政治学院开展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为学院建设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肖华把院校看作军队培养干部、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基地，经常亲自到各院校检查工作，了解教学情况，随时发现和解决教学中的问题。一九五三年四月，肖华带领总政有关部门的同志，到汉口第一高级步校、石家庄第二高级步校和第六政治干部学校检查工作，对学校的各项工作，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在汉口第一高级步校的讲话中说："部队建设的关键问题在于干部，优秀的干部对部队建设来说，在过去、在今天、在以后都是决定一切的。而训练部队干部的担子，就担在军事学校的肩上；学校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学校的干部是培养干部的干部，同志们所担当的工作是非常值得骄傲、非常光荣、非常伟大的事业。"肖华的讲话，使该校全体教职学员受到很大

的鼓舞。

肖华对干部的关怀是多方面的，他亲切热情和善于联系群众是有口皆碑的。不论工作多么忙，凡有来要求谈话、见面的干部或群众，到办公室也好，到家里来也好，他都热情欢迎，而且他交代身边工作人都不要阻拦。那时，在北京的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外地各大军区的负责同志，经常有人到总政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为了减轻罗荣桓主任的负担，大多数干部都由肖华接待。

自从一九三〇年肖华调到红四军任青年委员，直到一九八五年不幸病逝，在五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他曾多次要求入学校进行系统地理论学习，但是，或因战争时期开创新局面的需要，或因建国以后领导工作的繁忙紧张，使他始终未能如愿。然而，他却有着广泛的知识，多方面的才华和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他留下不少有关军队政治工作的著述和一些诗词作品。他的知识、才华和令人瞩目的成就，除了长期革命实践的锻炼，主要来自对学习的重视，对知识的渴求和长期坚持刻苦自修。

全国解放后，肖华在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期间，肩负着协助罗荣桓主任领导全军政治思想工作的重任，因而他更加自觉地重视理论学习，并把理论学习和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工作，解决全军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具体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肖华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

又当选为中央监委副书记。此后，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委书记，一九五九年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这时的肖华，兼职愈多，责任愈重，愈加痛感从理论上系统学习提高的迫切需要。

一九六〇年春天，毛泽东号召中央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认真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着重学习下册社会主义部分。这年三月中旬，肖华在广州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后，即同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一路从广州到四川成都，住在金牛坝省委招待所，用了约二十天时间，认真学习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们每天上下午各学习三个小时，先各自看书，而后由理论教员对各章进行辅导，讲解要点、难点，并对每章进行有重点的座谈，无拘束地提问题，结合实际发议论，有些问题得到解答取得一致认识，有的问题认识不一致就先挂起来，再去读书、思考、讨论。这种方法生动活泼，没有顾虑，印象深刻，收获较大。这次学习，也为后来军队高级干部系统学理论摸索到一个较好的方法。

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对罗瑞卿说，军队的高级干部应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读几十本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并要罗瑞卿找人研究一下，提出一个阅读的书目来。四月三十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军编制装备会议结束时，罗瑞卿宣布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三十本理论书，并号

召全军高级干部（指军以上干部）认真学习。五月二日，肖华向总政做了布置，要求总政党委成员全部参加学习，并立即商定当年拟先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四本书。肖华说："高级干部就是要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政治部应该在学习中带头！"数日后，总政党委讨论通过了学习计划，五月中旬即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

这次学习理论中，每次辅导肖华都是准时到课，认真听讲解，做笔记，提问题。刘志坚、梁必业、徐立清各位副主任和全体参加学习的部长们，都自觉积极地参加学习，在总政党委中洋溢着浓厚的学理论的风气。七月份，又把高干理论学习扩大到副部长。总政治部高干学习理论的这一组织形式和学习制度，一直坚持了四年，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而中断。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在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上，肖华专门讲了军队高级干部学习理论的问题。他说："有些同志，革命二十几年，三十几年，跟着马克思走，但是没有见过马克思的面。经典著作，过去是担子挑着，后来是牲口驮着，现在是汽车上带、架子上摆，就是没有认真读过。当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到八宝山见了马克思不好交代。现在形势逼着我们读，开始和马克思见面，这很好。……高级干部认真读书，对部队好学上进之风有很大的推动。这样的学习风气一定要继

续发扬，坚持下去。”在讲到加强领导时，肖华说：“所谓领导，最好的办法就是首长自己积极参加，带头学习。自己学好就是最实际的领导，最具体的领导，最有效的领导。学习要放下架子，要有民主精神，老老实实地学，老老实实地当学生。”这些话既是他对全军高级干部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他自己带头学习理论的体会和总结。

一九六四年二月，肖华得了严重肝炎，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委托刘志坚副主任主持。肖华身在病床，心想革命，对有关全军的重大问题，他仍然及时提出意见。此外，他每天还读书、练字，并为部队写了几首歌词。九月，肖华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不到五十岁的肖华，肩负起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重任。

一九六四年十月，是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的三十周年。肖华是伟大长征的参加者，又是幸存者，他深感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把它写出来。为了歌颂长征的伟大胜利，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歌颂艰苦奋斗、英勇卓绝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了缅怀在长征途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教育人民和子孙后代，肖华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大的创作热情，以抱病之躯，毅然开始了以长征为主题的诗歌创作。

从一九六四年九月到十一月，肖华在杭州西湖之畔的一座小楼里，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长征组诗的创作之中。肖华把十二段组诗写成初稿后，把总题目定为“红军不怕

远征难”。经过多方面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直到十一月中旬，才基本定稿。组诗完稿后，肖华约请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同志进行谱曲。一九六五年四月下旬，肖华在杭州听了逐段试唱，认为谱得很好。战友文工团遂于五月份正式排练，七月下旬到天津预演，请肖华、杨勇、廖汉生等及部分文艺工作者审查。

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在北京正式演出。此后连演三十余场，观众之踊跃，反映之强烈，为建国以来音乐会演出所罕见。在那些日子里，长征组歌不胫而走，男女老少争相传唱，一时间，唱组歌，忆红军，学英雄，讲传统，在社会上蔚为风气。《长征组歌》成为宣传长征，向全国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舞斗志的形象教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起，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操纵和煽动下，肖华不断受到打击迫害，强加给他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这时，《长征组歌》也同样遭到厄运。就在这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挺身而出，保护了处于危难之中的肖华。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总政治部全体人员六千人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愤慨而激动地讲道：“肖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呢？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写不出来的。‘毛

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传神之笔么！《长征组歌》我都会唱，你们为什么不唱呢？”

周恩来总理在这次大会上义正辞严、苦口婆心的讲话，使肖华和总政治部党委，一度恢复了工作。但是不到半年，在林彪蓄意制造的砸烂“总政阎王殿”大冤案中，肖华终于被“彻底打倒”，并被非法关押达七年之久。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过问下，肖华获得解放，一九七五年七月恢复工作，任军事科学院政委。这年十月，又到了红军长征的四十周年。随着肖华的解放和恢复工作，《长征组歌》也摆脱了厄运，同时由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重新排练演出。根据邓小平和陈云的指示，肖华对歌词又作了精益求精的修改。肖华还象十年前那样，以极大的热情和认真精神，指导两个文工团的排练，为演员们多次讲述长征的伟大意义，提出演唱组歌的要求。他不顾“四人帮”的阻挠、威胁和监视，多次到剧场观看演出。在那段时间里，祖国大地上终于又重新响起了《长征组歌》雄壮的歌声。

香港的进步音乐家和合唱团，也曾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五年两度在香港演出《长征组歌》，赢得了港、澳各界人士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战友文工团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曾到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以及日本演出了《长征组歌》，同样受到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这战斗的昂扬歌声，不但在祖国大地上激荡，也在世界各地人

民的心中回响。

六

十年动乱中，肖华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纵有周恩来总理多方保护，毕竟难逃浩劫，身陷囹圄。在逆境中，他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当时有人曾劝他去找江青道歉，就可免于坐牢。肖华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错，我宁愿把牢底坐穿！"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崇高气节。

肖华从一九七五年恢复工作，到一九八五年不幸病逝，在这最后的十年中，他仍然以蓬勃的朝气，开拓的精神，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为振兴祖国的大西北，为开创政协工作的新局面，继续奋力拼搏，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一九七五年七月，肖华出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他一到职，就抓紧贯彻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号召全院同志认真学习叶剑英和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并带领机关的同志，深入学术研究部门和基层单位，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扎扎实实地工作，努力把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落到实处。

肖华重视在军事科学院进行政治工作建设。他明确提出，军事科学院的工作成绩好不好，主要是以学术研究工

作的成果多少、质量高低来衡量。因此，保证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顺利完成，是政治工作的总的方向。他还说，军事科学院的政治工作，就是要调动全院人员的革命积极性，帮助研究人员树立热爱研究工作、刻苦钻研军事学术的革命事业心，鼓舞大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努力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学术研究任务。他强调政治工作必须同学术研究相结合，要深入到学术研究工作中去。他要求政治工作人员要更多地接触研究工作的实际，学习军事，熟悉业务。他自己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到学术部、室，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摸索科研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帮助解决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认识问题，启发研究人员发挥创造性，着眼于我军的实际，着眼于未来，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肖华十分关心学术研究工作的进展，积极参加领导全院的重大学术活动。他思想敏锐，经验丰富，具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在学术讨论中，他非常重视发扬学术民主，善于启发大家动脑子，想问题，敞开思想，畅所欲言，通过讨论和争辩发展学术理论。在学术讨论中，他常提出自己的深刻见解和重要意见，但从不武断自恃，而是谦逊地说："我的意见也不一定正确，你们可以批评，可以否定，提出来以后还可以再研究。"他的学术民主作风，促进了学术研究的顺利开展和学术成品质量的提高。肖华在军事科学院工作不到两年，他在和同志们的朝夕相

处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九七七年四月，粉碎“四人帮”不久，肖华调任兰州军区政委，并兼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二书记。他到兰州以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不是下车伊始发指示，而是先做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找军区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到军区机关和省里了解情况，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各军和省军区检查了解揭、批、查工作，而后召开军区党委会，采取坚决措施，在全军区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各种阻力，扭转了运动的落后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种形势的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在广大农村普遍展开，农村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兼任甘肃省委书记的肖华，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这场农村大变革中去。改革初期，他在省委有关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首先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的社队，并且经常介绍外地农村改革的经验，来推动甘肃的改革。

肖华特别关注农村改革对部队的影响。他针对部队的干部战士大多数来自农村的现状，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一定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做这场农村大变革的促进派。肖华赞扬驻陕西某部队开展的一封家信的活动。他说，部队和农村互通革命家信，既向农村宣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支持了农村的改革；同时，农村的大好形势对部队又是生动的教育。

在兰州工作的七年中，从高原到草地，从沙漠到哨

卡，在陕、甘、宁、青的二百多个县中，他先后到过一百八十三个，大西北的广大土地上，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于一九八一年春天写出了关于在西北发展泡桐和骆驼的建议。他阐述了泡桐、骆驼和“站羊”的经济价值，指出在干旱严重的西北地区发展它们，是改变西北生态环境、发展多种经营、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这一建议在甘肃省和西北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受到了中央的重视，被刊登在《内部参考》上发至全国。

肖华在兰州军区任政委时，反复强调政治工作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他多次对干部们说：“部队的战斗力是由许多因素组成的，我们部队要有战斗力，首先就要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要有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有这样一种说法，好象现代化就可以放松政治工作，削弱政治工作，这是完全错误的，越是现代化就越要加强我们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总结新时期部队建设的经验，他撰写了《论人民解放军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文章。在兰州的七年中，他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为开发祖国的大西北，为巩固和保卫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八三年六月，肖华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全国政协提案等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我国现有科技力量的布局和使用方法很不合理，由于人事制度上的缺陷，形成了技术力量

积压，技术与生产脱节的状况。他向中共中央写信提出开发技术资源和开辟技术市场的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称赞。

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肖华认真学习了这一决定后，反复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同机构改革结合进行的问题。他翻阅了大量资料，并在一九八五年二月先后到山东、广东、湖南等地作了调查，准备向中共中央提出对机构改革的建议。他不知道，这时癌症正悄悄地吞噬着他的生命。家中亲人们看到他吃不下饭，脸色不好，日益消瘦，劝他赶快住院检查治疗。肖华却不顾劝阻忍着病痛，坚持参加了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直到四月十一日会议结束，四月十二日才住进医院。经检查确诊，癌症已到晚期，癌细胞已从胃部扩散到肝部。

肖华住院不久，由于病情发展很快，体重急剧下降，尽管医生和家里人没有把真实病情告诉他，他也逐渐觉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在生命之火即将燃尽的时刻，肖华显得异常镇静，他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脑海里不断翻腾着关于机构改革的设想，决心迸发出最后的光和热。疾病的折磨，使他已无力伏案执笔，就请身边工作人员记录，由他口述，把他的想法整理成信，向中央汇报。六月一日，肖华在这封长达六千余字的信上郑重地签上名，当天请人把信送交中共中央。六月七日，中共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认

真读了肖华的信，并批示：将这封信“印中央参阅文件，并请体改委认真加以研究”。当肖华得知他的信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时，瘦削的脸上泛起了兴奋的笑容。

八月十一日下午，弥留之际的肖华，仍然关心着党的事业，惦记着即将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一再嘱咐亲属转达他对这次会议的拥护和祝贺，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诚之心。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这么多年，是党把我培养大的，可我为党和人民做的事太少、太少了……我还有许多想做的事，来不及做了……我对改革是充满信心的……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的改革一定会成功，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二日上午八时十五分，肖华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肖华遗体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李先念等和各界人士一千余人参加了告别。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肖华的生前友好以及许多单位，献了花圈，沉痛悼念这位党的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领导人和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经中共中央审阅，由新华社发印的《肖华同志生平》，概括反映了肖华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奋斗不懈的一生。

（李　圭）



何 长 工



何　长　工

一

何长工（1900—1988），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八日出生在湖南省华容县南山乡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六岁时入私塾，后考取南山区公立高等小学。他发奋读书，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岳阳第三联合中学。在中学时，他受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思想影响，积极从事学生爱国运动，对旧的教育制度和陈腐的社会现象，勇敢地进行了斗争。由于他学习用功，成绩优良，何氏家族用学艺费送他考入湖南省较有名气的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系。这所学校是按美国学制办的，学校的主要课程均由美国人用英语讲授。由于何长工思想外向，接受新事物较快，更喜攻外语，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此时，由于外侮内患，军阀肆虐，一种发奋读书、实业救国的思想在他脑海里开始生成。他很信奉古人学者“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的格言，并将“任它年华似流水，豪情依旧红似火”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此，他珍惜年华，陶冶情操，勤攻好读，努

力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准备做新生活的挑战者。

一九一八年夏，何长工由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即从湖南到北京。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同年九月三日，他在北京大方家胡同参加蔡元培先生主持召开的恢复留法勤工俭学的会议后，被派到长辛店留法高等法文专修馆工业科。这是当时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之一，是勤工俭学总会在一部分社会进步力量的推动和支持下，通过蔡元培先生和长辛店铁路工厂接洽开办的。这个班一开始就是半工半读，一边紧张地进行出国前的学业上的准备，一边在铁路工厂做工自给。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毛泽东，在几次的直接接触中，受到了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影响。他还广泛接触《新青年》、《湘江评论》、《国民杂志》、《每周评论》等鼓吹革命的进步报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脱下知识分子的长衫，穿起工人的衣服，和工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朝夕相处，使他受到了近代工业的劳动锻炼和工人阶级思想感情的熏陶。

革命理论的启蒙和工人阶级的最初影响，何长工关心起国内外大事，他也逐渐明白了爱国反帝、劳工神圣的意义。他的思想逐渐激进，感情向工人阶级靠拢。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发了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出卖山东主权的反帝爱国运动。何长工怀着满腔热情参加了这个伟大的运动。他在长辛店参加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展开了救国的宣传活动。他到车间向工人宣传，到

车站向旅客宣传，到近郊向农民宣传。他还参加了惩罚反动厂长的斗争。在五四运动的暴风雨中，他同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开始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并逐步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二

一九一九年底，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学生，开始分批由上海出发，飘洋过海，前往法国。何长工乘法国"布尔列加"号邮船动身，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航程，抵达法国的马赛港，开始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活。开始，在巴黎近郊的比昂古尔区的"雷诺"汽车分厂做工。一边做工，还一边在节假日中参加勤工俭学生的集会，聆听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等著名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演讲以及他们同国家主义派的辩论演说。这使何长工和不少勤工俭学生一样，从"实业救国"的思想中解放出来，逐步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法国，他把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等看成是自己转变思想的老师。做了一段工，手头有了点积蓄，就开始上学了。他到了远离巴黎的圣雪尔旺学校读书。这是一所由教会办的综合性技术学校，校长、副校长是法国共产党员，学校里有共产党的组织。为照顾中国学生，学校专开了一个中国班，选最有经验的教员担任课程，还选了一些优秀的学生辅导中国学生。他感到在这样

一所学校学习是幸运的，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同时也推动着他思想的进步。

钱快用完了，暑假时他又回到了巴黎做工。为了多挣一点钱，他曾到战争创伤极重的北郊地区去清理现场，锯木桩，挖房基，运砖瓦，盖楼房。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和许多同学都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以求共同谋生，在政治上共求进步。一九二一年二月他再返抵巴黎，参加了二十八日由“工学励进会”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等组织的要“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请愿示威。这次示威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但是，它却震动了巴黎，吓坏了中国的反动政府，也唤起了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通过这场斗争，使他进一步看清了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推动着他积极参加更具有革命色彩的“拒款风潮”和“抢占里昂大学”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周恩来由巴黎前往柏林，在留德学生中首先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旅德支部。然后他又回到巴黎，与赵世炎等着手筹建旅欧总支部的工作。同年六月下旬，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当时，何长工正在圣雪尔旺技校学习。代表旅法支部参加成立旅欧总支部大会的高风、毛羽顺来信告诉何长工，何长工立即给旅法支部写信，表示愿意加入支部生活，参加新的斗争。不久，组织通知他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成员。从此，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为人民扛“长工”的生涯。

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合作，由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旅欧总支部的骨干和成员，先后奉调回国。何长工在组织的安排下，于一九二三年冬，由比利时劳动大学经法国回国。他在上海短暂停留期间，党组织派人和他谈话，征求他本人意见，向他交代了任务。一九二四年春天，他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湖南省华容县从事革命活动。

三

根据党的指示，何长工在洞庭湖西区建立党团组织，办教育，开展农民运动。在斗争中，他与其他十二位归国的同仁，立即投入了对旧教育界的斗争，他们占领教育阵地，兴办新式学校。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他们逐步取得了华容县学务委员会（教育会）以及各区学务委员会的领导地位。何长工亲自创办了新华中学，担任学校董事委员会主任。不久，他被选为华容县学务委员会主任，负责全县十个区的教育工作。他以新华中学为基础，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办学运动，与旧教育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全改造了华容的旧私塾，办起了近三百所新学校，为民主革命事业输送了大批的骨干力量。一九二五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选送了一批进步学生考入黄埔军校，还有二十多个进步学生考取了中央军事

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一期，同时还选送了一些进步学生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深造。

何长工在华容从办教育到建党，发展了华容的党团组织，并担任中共华（容）南（县）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长，成为中共华容县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北伐战争开始时，他奉党组织的指示，巧妙地接管了县团防局，掌握了这支武装力量，并在华容县组建了农民自卫军。此后，他的主要精力抓武装，成为华容县武装力量的统领者，为党掌握了枪杆子。

何长工在抓枪杆子的同时，积极开展农民运动，通过各种形式组织了秘密农民团，建立了农民协会。他领导广大农民，进行了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当北伐军来到湖南境地时，他所统辖的农民武装，配合北伐军在华容处决了三百多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一九二六年秋天，湖南省召开农民协会代表会议，省农协委员长（党内是农民部长）易礼容主持大会。会议决定将七十五县的民团一律改为农民自卫军，任命何长工为华（容）、南（县）地区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授权他主持以华容为重点包括江南公安、石首两县的联县治匪会议，统一指挥洞庭湖西和洞庭湖北区的清匪工作，支援北伐战争。何长工率领农民自卫军，在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开始了武装斗争的生涯。这期间，他主持办了十件大事：第一，肃清了湖匪，保障了北伐军战略地区的水陆交通。第二，农民自卫军用耐心说

服的方法，解决了农协、工会、渔柴协、盐协之间的各类矛盾，使广大农民、渔民、柴民、盐民各得其所，生活有着落，增强了团结，保障了对北伐军的粮草筹集和物资补充。第三，维持社会治安，保证各革命团体顺利进行工作。第四，配合农民协会，普遍调查土豪劣绅的罪行，对罪大恶极者进行惩治和镇压，并且发动群众分土豪劣绅的浮财，分船具，分田地，建立了各种革命团体。第五，组织县、区、乡调解仲裁委员会，解决了不少群众间的纠纷。第六，保证了春耕、夏收、秋收，发展了工农业生产。第七，督促全县修筑道路，设立水路交通站和陆路陆马站，改善邮局邮差成分，适时传递北伐军来往信电。第八，控制了警察局和电报局。第九，武力解散了敌人的一个别动队和与华容相邻的岳阳两个反动民团，保障了北伐军的后方安全。第十，率领农民自卫军一举击溃四川军阀杨森部一个旅的进攻。

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锻炼了何长工的领导能力，提高了农民自卫军的战斗力，人民武装也得到壮大。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前夕，自卫军从小到大，仅华容一县就发展到两千多人，八百多支枪，成为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

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处于低潮。何长工按党组织的指示，将农民自卫军等武装转入地下斗争。之后，为了尽快了解中共中央今后斗争方针，他同蔡协民、徐履仁、程

学敬、欧阳健等专程到武汉找到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的安排下，何长工同欧阳健、程学敬等被分配到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当时，敌人把何长工列为“大暴徒”出高价要买他的头。为避开敌人追捕，毛泽东提议要他改个名字。何长工原名叫何坤，毛泽东对他说：何坤同志，你一九一八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就叫长工吧！从此，何长工这个名字就一直伴随着他。

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也叫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是以叶挺独立团一个营为基础扩编的，有三千多人，团长是共产党员卢德铭。这支部队由于受大革命的影响较深，再加上党有意识地把骨干力量不断地输入进来，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掌握的一支较大的革命武装。何长工到警卫团后，被编在五连（干部连），这里的成员大部分是大革命时期的县委书记、农会干部和大学生。他在五连先后任班长、排长，不久，又调到团部当参谋。一九二七年七月底，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党的前敌委员会给警卫团发来指示电，令速去南昌，参加武装起义。同时，张发奎也发来电报，令警卫团去九江待命。卢德铭等警卫团的领导人，拒绝了张发奎电令，决意把部队开往南昌。向南昌进军途中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统一了思想，坚决执行南昌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何长工参加了这次会议。从此，武汉警卫团这支革命武装，完全站到了人民一边。何长工也从此进入了新的斗争生活。

四

一九二七年八月，为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此时，武汉警卫团同平江、浏阳农军的负责人在修水的山口镇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把这几支武装力量合组为一个师。到秋收起义时，就以这个师为基础，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四个团。由何长工负责设计并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鲜艳的红旗中间一枚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紧靠旗杆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上写“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分威武。这面旗就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发动之后，由于敌强我弱和缺乏经验，打了几个败仗，受到了挫折。挫折和暂时的失败启发了秋收起义的领导者。九月十四日晚，起义领导者毛泽东在上坪召集第三团负责人紧急会议，总结了起义的经验教训，改变了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决定了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第二天，毛泽东亲自率领部队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战略进

军，何长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为这次伟大的战略进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九月二十九日，起义军部队到达了永新县三湾村，这时已不足千人。毛泽东又一次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自此，确立了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制度和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整编中何长工被任命为团卫生队党代表。

毛泽东一直关心着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在他率部进军井冈山途中，决定派何长工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报告情况，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并相机和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何长工受领任务后，化装成一个"逃兵"模样，身着一套破旧衣裳，背着两只猪娃子，一双旧草鞋，两腿沾满了泥巴，就这样奔上了"逃亡之路"。刚走到酃县沔都，就被反动民团抓住，他机智灵活地应付了敌人，并巧妙地取得了由民团头子为他写的"通行证"，很快就到了长沙。他将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经过、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准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以及自己此行的任务，一一向中共湖南省委作了报告。省委领导人指示，衡阳特委由省委联系；何长工可以绕道粤北去联系革命力量，并给他安排乘坐日本轮船经武汉到广州。何长工遵照省委的指示，几经

周折，于十二月上旬辗转来到了广州，通过中共广东省委和他在广州的社会关系，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他根据得到的消息，决定自己去韶关寻找。这时，广州起义已失败，反动军阀到处抓人，他设法躲过了敌人的搜捕，于十二月十日乘火车直奔韶关，在韶关的犁铺头找到了朱德和陈毅。朱德为保存南昌起义幸存下来的这支部队，利用和范石生旧同学的特殊关系，借用范石生部队的番号作掩护，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何长工向朱德、陈毅报告了秋收起义的经过和起义后转移到井冈山的详细情况。朱德、陈毅也把南昌起义后部队的转战情况及眼下将进行的湘南暴动一事作了介绍，并告诉他已派毛泽覃去找毛润之（毛泽东）了。何长工的到来，使朱、毛两支部队取得了联系。

何长工从受命离开井冈山到在犁铺头找到南昌起义军余部后返回井冈山，历时近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他辗转于湖南、湖北、广东之间，历尽艰辛和惊险，终于完成了这个意义深远的历史使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足迹。

何长工返回井冈山不久，毛泽东又委派他一项新的任务，要他去改造王佐部队。王佐是井冈山上的一支农民武装的首领，如今虽然打着农民自卫军的旗号，反抗旧势力，倾向革命，但这支武装阶级观念模糊，成分复杂，流寇思想、游民习气浓厚，帮派和哥们意气很重。他和袁文

才，一文一武，袁在山下，他在山上，是土客籍的两个领袖人物。他们对工农革命军既拥护又有戒心。因此，工农革命军要想在井冈山站住脚，扎下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必须作好王佐等的工作。何长工就是肩负着这个重任上山去改造王佐领导的这支旧式农民武装的。他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和耐心地说服，反复晓以革命大义，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终于感动了王佐的亲属和部下，也深深地影响了王佐。特别是他亲自为王佐制定作战计划，和王佐部队一起消灭了王佐多年的死对头恶霸尹道一，使王佐大为开心，也消除了王佐对何长工的戒心。从此王佐信赖何长工，放心地让他开展工作，这就加快了改造王佐部队的进程。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改造，王佐部队的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时，毛泽东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建议王佐、袁文才两支部队合编成一个团。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在宁冈大陇举行了庆祝王、袁两支部队合编大会，正式命令他们的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该团党代表。袁、王二人带头举行了宣誓，决心拥护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王佐部队终于由一支旧式农民武装转变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里面包含着何长工的无数心血。

三月上旬，应湘南特委要求，以毛泽东为师长，率部队向湘南行动，支援湘南暴动。这时，湘南暴动给敌人以

沉重打击之后，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撤离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战。何长工奉命率领第二团南下资兴，策应并迎接湘南暴动农军上井冈山同毛泽东的部队会师。他在酃县的沔都会合了朱德、陈毅的部队。朱德、陈毅嘱托他先返回宁冈安排房子和给养。何长工率第二团星夜兼程，于四月二十四日回到砻市，将队伍布置在东边，向江西方向警戒，然后将宁冈附近的后方机关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为欢迎朱德部和湘南农军准备房子和给养。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率第一团回归井冈山，朱德部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来，宁静的山中平原顿时显得热闹起来。在何长工的引导下，毛泽东和朱德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会见了，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朱毛和朱毛两支部队的大会合。在这次会见中，决定在即将到来的"五四"纪念日，召开联欢大会庆祝朱毛会师。

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上午十点钟，两军胜利会师和红四军成立大会正式开始，部队和湘南农军约一万多人参加。何长工担任大会司仪，他首先高声宣布："大会开始！放鞭炮！"然后毛泽东、朱德等分别讲了话，陈毅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委的决定：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陈毅。何长工任红四军二十八团党代表。随后何长工又在湘赣边界第一次党代会上被选为特委委员。

同年五、六月，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所进行的攻打永

新城的战斗，新、老七溪岭的战斗和龙源口大捷，何长工和团长王尔琢指挥二十八团，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二八年九月，国民党军队一个营在毕占云带领下，举起义旗投奔红军。这支刚脱离国民党的部队，存在不少旧军队的恶习，特别是吸食鸦片成风，不少人成为"双枪兵"。何长工受命改造这支部队后，他作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使这个部队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成为真正的工农红军。改造毕占云部队的成功，为红军取得了改造旧军队的经验。随后，何长工又奉命率领部队北上莲花县，接应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红五军和红四军于十二月初在宁冈新城会师。

井冈山武装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国民党反动派坐卧不宁。一九二八年末，蒋桂战争爆发前夕，湘粤赣敌人对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会剿"，妄图一举歼灭井冈山上的红军。红四军前委对于粉碎敌人的"会剿"进行了多次研究。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于宁冈县柏露村一个书院里召开了由前委、四军军委、五军军委、边界特委及各县委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重要文件，通过了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尔后，着重研究了如何粉碎湘粤赣三省敌人"会剿"问题。经过讨论最后一致同意，以一部分部队守山，一部分部队转到赣南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会上决定红四军主力下

井冈山出击赣南敌后，调动敌人，实施"围魏救赵"的战略意图；红五军和红四军的三十二团（王佐部队）的一个营留守井冈山，共同完成粉碎敌人"会剿"、坚守根据地的任务。何长工参加了会议，他积极拥护前委的主张。一月十三日，前委在下庄文昌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如何坚守井冈山问题。会上，应彭德怀的要求，把原决定随红四军下山的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留下，担任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三十二团党代表，协助彭德怀坚守井冈山。原三十二团党代表何挺颖对调到二十八团。这就是当时传说的"两何对调"。

红四军主力下山的第三天，何长工参加了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彭德怀、滕代远、贺国中、王佐和各大队长都到了会，会议开到半夜，主要研究如何守山的问题。由于何长工对情况比较熟悉，他在会上发表了很重要的意见。他说：虽然这次三省敌人受蒋介石的重金收买，对根据地发动"会剿"，兵力装备对比，敌人占绝对优势，但敌人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较深，这一次三省敌人必然各保实力，互不协调，而我们红军在井冈山经过短期训练，军政素质比以前大有提高，更重要的是井冈山根据地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各县的农民武装已经组织起来，人民群众真心地支援红军，山上有王佐作向导，山下有我为你们设好营，我们是军民同心打击敌人。再说，敌人由远道而来，是疲劳之师，到根据地后必然交通补给困难，人地生疏，

就象盲人骑瞎马，一个个都变成了聋子瞎子，而我们养精蓄锐，人熟地熟，井冈山就象绿色的海洋，我们就好比潜艇，任我们自由地游弋，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敌人在明处，找我们找不到、打不着；我们在暗处，想在哪里打它，就可以在哪里打它，愿意怎么打它，就可以怎么打它，使他们处处挨打，日夜不宁。这样，敌人就是上了山，最多一个星期，也就不战而垮，主动撤退。我们一定要让敌人背着枪来，交了枪走，有来路，无去路，使井冈山这个革命根据地永远飘扬着革命的红旗。他的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称赞。会议确定的部署是：红五军李灿和张纯清率一大队坚守黄洋界；贺国中带领八、九大队坚守白泥湖；彭宝才、李克玉率十大队守八面山；黄龙带领十二大队守金狮面；王佐率三十二团一部守朱砂冲。

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齐集井冈山下，封锁了所有通往山上的道路。一月十七日战斗打响了，敌人分路向井冈山猛攻，湘敌以两个师的兵力猛攻黄洋界和八面山，坚守黄洋界和八面山的红军不超过两个连，凭险抵抗。敌人仗着人多势大，用猛烈的炮火轰击一阵后，便组织冲锋。红军战士则岿然不动，沉着应战。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敌人无力得逞，一筹莫展。那年的冬天，整天是大雾弥漫，五十多米以外就看不见人影。敌人在山下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迫使一个当地富农带路，趁大雾天气从捉“石拐”（一种小动物，能食用）的小路包抄黄洋界哨口的

后路，致使黄洋界阵地失陷。接着于一月二十八日早晨，八面山哨口的木排工事也被敌人用大炮轰塌，红五军十大队被压在下面，只有二三十人冲出。八面山也失守了。八面山是井冈山的门户，敌人占领了八面山，可直下大小五井，夺取井冈山的腹地茨坪。在这紧急情况下，彭德怀决定率红五军主力沿红四军下山路线撤离井冈山，向遂川方向突围。由于在大汾遇敌伏击，损失近半，以后边打边撤，艰难行军四十天，转战几千里，四月间终于到达了瑞金，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会合。

敌人调动湘粤赣三省大军“会剿”井冈山，满以为可消灭红军，哪知消耗了好几个团的兵力后，所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山。敌人计划失败了，于是便进行报复性的残酷屠杀。敌人象疯狗一样叫嚷：“石头过刀，茅草过火，人要换种。”他们见人就杀，小井红军医院来不及撤走的手无寸铁的一百多名红军重伤病员被集体屠杀了。老百姓的房子也被烧光了。敌人的残酷暴行，更加激起井冈山人民的仇恨，复仇的火焰在人们的心里燃烧。

撤到深山里的几支红军会合后，在宁冈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在何长工和李灿、王佐的带领下，就地坚持游击斗争。他们以班为单位，出没于森林峡谷，不断地打击敌人。山上的游击队、赤卫队、暴动队也配合行动。由于地形熟、动作快，整天在敌人的鼻子底下转来转去，一有机会，用闪电战、麻雀战的方法，突然袭击一下，给敌人以

杀伤后，马上转移到别的地方。他们看得见敌人每一个行动，敌人却摸不清他们的底细。他们机动灵活，避开敌人的主力，打击和消灭零散敌人，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以多胜少。对付三个一群、五个一股的敌人，就集中几个班的力量，选择有利条件，诱敌深入，象捉迷藏一样，弄得敌人晕头转向，最后将其消灭。敌人恼羞成怒，组织了几十个团的兵力大举搜山。岂知井冈山林海茫茫，无边无际，一两万军队就象大海里捞针，哪里找得到一个人影，拖得精疲力尽。对付敌人搜山，他们的办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绕，绕不赢就化（化装）"。山林里每一条小路，每一条山沟，他们都了如指掌，在绿色的海洋里，就象龙游大海，鱼入深潭，悠然自得，行动自如，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或浮或沉，时隐时现，打了不少小胜仗。

这年冬天，气候特别冷，整天浓雾弥漫，大雪纷飞，直下了四十多天雪，山上的柴草树木都裹上了厚厚的一层冰雪，整个大地都被冰雪封住了，井冈山变成了一个银色世界。在这冰天雪地里，飞鸟都找不到一点食物。红军指战员饿了没有粮食，敌人不断搜山，一天得打好几仗，转移好几个地方，身上没有棉衣，宿营没有房子，又饿又累又冷。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要熬过这漫长的冬天并战胜敌人的"会剿"，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部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天大的困难他们不怕。他们向

摆在面前的一切困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没有吃的就剥树皮，扒开厚雪挖竹笋。有时碰到被惊起的野猪、山羊，他们便有幸改善一下生活，而弄得不好，即使三五天或一个星期吃不饱肚子，还是照样坚持斗争。

占领井冈山的敌人被困在山上，孤立无援，又冷又饿，到处受到打击，更加惶惶不安，军心动摇，士气低落，盼望及早脱离井冈山，逃脱险境。

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桂军阀终于爆发战争。两派军阀慌忙调整各路军队，投入军阀混战。蒋系军队在樟树集结，桂系军队在萍乡集结。在井冈山上的反动军队听说下山，匆匆忙忙夹起尾巴就跑。何长工立即组织游击队，配合红军沿途追击。跑下山的敌人已失去战斗力，一触即溃，纷纷逃窜。这一次追击仗打得很漂亮，缴枪三千余支，缴获军用物资、医药、子弹无数，捉到很多俘虏。到红五军主力自赣南返回井冈山时，胜利的红旗已在井冈山到处飘扬了。

何长工在保卫井冈山斗争中，腿部负伤致残，但他仍坚持不下火线，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作战。他机动灵活地实施指挥，以及他果断刚毅的行动，受到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的好评。何长工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为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井冈山根据地全面恢复后，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上得到消息，他把报纸送给彭德怀看，并指着报纸说，敌人报

道"一股恶匪何长工又重新盘踞井冈"，这说明，井冈山还在我们手中，你们应赶快回去，发展井冈山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毛泽东还亲自给何长工写了一封信，指出：红五军撤离井冈山损失很大，现在红五军要回到井冈山根据地，你们应尽快把红五军补充起来。五月上旬，彭德怀、滕代远率部重上井冈山，沿途广大青年纷纷参加红军，使红五军的队伍又发展到七八百人。随后，把王佐部队改编为红五军第五纵队。这样红五军即有四、五两个纵队。何长工被任命为红五军五纵队政委。在斗争中，红五军虽然几经挫折，但何长工能与全军共同奋斗，对红五军的巩固和不断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二九年九月间，红五军四、五纵队，由井冈山地区重新返回湘鄂赣边，在铜鼓的一座古庙里举行了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充分利用军阀战争的有利时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扩大游击区域，会上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部回井冈山巩固、扩大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根据地；黄公略、吴溉之等仍带领一、二、三纵队留在平江、浏阳、铜鼓和修水一带进行游击活动；何长工和李灿率领第五纵队向北挺进，开辟鄂东南革命根据地。鄂东南包括通城、崇阳、蒲圻、嘉鱼、咸宁、通山、阳新、大冶、蕲春、黄梅和广济等湖北省东南部的十几个县份，周围七百余里。这里盛产粮、棉、煤、铁，物资较为丰富。从地理形势上看，长江天堑横贯于北，幕

阜山脉环绕于南，介乎罗霄山脉、大别山脉和洪湖地区之间，第五纵队控制了这一地区，不但可以扼制敌人东西和南北的交通要道，直接威胁九江、武汉，给湘、鄂、赣三省的政治形势以强烈的影响，同时，又可以成为联络各根据地的交通枢纽。因此，在这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经过崇阳城战斗，打响了开辟鄂东南的胜利号炮；消灭三个集镇的“常联队”之后，选定黄沙镇公开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协会，开始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旬，何长工主持召开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和第五纵队党委扩大联席会议。会议确定了红军在鄂东南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消灭本区的反革命武装，开辟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主力，发展农民自卫武装，以争取在鄂东南地区造成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会后，按预定计划攻取通山城，全歼守敌，俘敌三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接着，部队又攻下大冶城，消灭敌军百余人。之后又接连消灭了刘仁八、白沙铺等十几个城镇的“常联队”，乘胜攻克了阳新县城，消灭范石生部正规军两个营。一个月之间，红五军五纵队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大冶、阳新、通山三县，部队扩大到六千余人，鄂东南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初步形成，并同湘鄂西、鄂豫皖两根据地形成犄角之势。与此同时，奉中央军委之命，配合共产党人程子华等领导的大冶兵暴取得胜利。

开辟鄂东南的斗争，不仅增加了一块根据地，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壮大了队伍，同时也为当地各级党组织培养了一批干部，还为红军队伍的大发展准备了一批战斗骨干。

一九三○年四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何长工以鄂东南地区代表和红五军代表的双重身份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央提出把红五军五纵队扩建为红八军，由红五、八军合编组成红三军团，并决定了军以上干部的配备名单。这两个会议，还提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接近我们面前，迅速地准备我们的伟大的武装暴动力量，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的斗争。"这种论点，实际上是党内"左"倾思想开始抬头。一九三○年六月十六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何长工返回根据地，在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上，他传达了两个会议的精神。会议决定立即成立红八军和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任红三军团总指挥，滕代远任军团总政委，李灿任红八军军长，邓乾元为政委。不久，何长工接任红八军军长。红三军团成立后，第三次解放了大冶城并相继打开黄石港、石灰窑、鄂城、金牛、何安等大的城镇，筹得了大批军饷和装备，部队又进一步得到发展。

一九三○年七月，红三军团在通山县召开前委会议，研究了下一步军事行动问题。会议较客观的分析了敌情，决定两个军联合攻打岳州。红五军首先在城东占领阵地，

向城内发起进攻；何长工组织红八军一个小分队隐蔽地从北门爬上城墙，出其不意向城内守敌俯射，掩护红五军乘势攻进城。接着，何长工又指挥部队搞到一个火车头和几节车皮，于是部队乘火车向南追击敌人，经几小时争夺，消灭敌人一个多团，红军胜利攻占岳州。七月十五日前后，红三军团开到平江，进行短期休整。军团部在这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师以上干部参加，分析了敌情，决定乘湖南军阀何键主力调去广西攻打桂军、长沙城内兵力减少的有利时机攻打长沙，以战斗的胜利庆祝平江起义两周年。七月二十二日，敌人察觉了红军要攻打长沙，首先向平江发动进攻。红三军团奋力反击，晋坑一役，歼敌两个团，二战金井又消灭敌人一个团。在距长沙五十多里的永安市，军团召集各军负责人紧急会议，确定乘胜攻取长沙。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左右，彭德怀指挥红五军向长沙近郊渠梨市发起猛攻，很快占领该市，控制了浏阳河上的浮桥后，继续向敌之主阵地七里港、乌梅岭发起进攻。何长工指挥红八军担任侧后迂回任务，从侧翼架船强渡浏阳河，向敌主阵地发起攻击。敌人败退后，何长工率红八军攻入城内，彭德怀没有进城，率红五军继续追歼逃敌。何长工进城后，在肃清残敌的同时，迅速占领了省政府和荷兰池武器库，把缴获的武器运到城外。接着红八军又占领了发电厂、面粉厂、米厂，封闭了银行，打开了监狱，释放了狱中"囚犯"，并担负了维护全市的社会治安。军团

政治部很快发布了《告工农群众书》、《告小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和《告劳苦青年书》等布告，出版了红军日报。红八军也以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安民布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纪律。刚刚被红军解放的长沙，市内秩序井然，生意照常，群众欢欣鼓舞。七月二十九日，长沙市工农群众几万人召开了欢迎红军大会。七月三十日宣布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由李立三任主席，何长工、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王首道、杨幼麟、张启龙等为执行委员。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颁布了《政府组织法》、《暂行土地法》和《暂行劳动法》，举行了几十万人参加的“八一”大游行以示庆祝。当时，在长沙驻有不少外国的领事馆、教堂、商团、医院和外国记者，为了使他们了解红军的政策，不发生恐慌，由何长工召集三百多外国人开会，向他们宣传红军保护外国人的合法权益，要求他们执行苏维埃政府的法律、法令及红军的各项规定。因为没有翻译，何长工用外语直接宣布了红军的规定：外国兵舰必须迅速撤离湘江；外国记者要如实报道消息；教会、医院只能从事正当的传教行医，不准做危害红军的事情，否则红军将采取强硬措施。他还详细地向这些外国人阐明了红军的宗旨和纪律，并敦请他们监督。何长工流利的外语，清晰的讲述，使外国人十分震惊。事后，英国路透社报道了一个英国主教发表的目击谈话中称：“有一个红军青年军官用外语给外国人讲话。因此他

认定红军是一支有文化、守纪律的军队，而不象有人说的那样：‘红军粗暴，无组织，无文化’。”红军攻占长沙后，军阀何键施以残忍的反革命报复，把何长工的妻子和儿女全都杀害了。红三军团撤出长沙后，于八月下旬在浏阳文家市与红一军团汇合，组成红一方面军，何长工担任了方面军总前委委员。

一九三〇年九月。红一方面军二打长沙，久攻未克，毛泽东、朱德等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宜再强行攻取长沙，于是，方面军总部于九月十二日作出了将红军撤至萍乡、醴陵、株洲一线待命的决定。九月十三日，方面军总前委在株洲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强攻长沙的经验和教训，作出了回师江西、攻取吉安的决策。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为以后深入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迈出了第一步。何长工因在前线未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对会议的决定是坚决拥护的，并按会议决定的要求，带领部队沿着醴陵向萍乡进发了。

在反李立三“左”倾的斗争中，何长工在峡江、罗场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继续走农村武装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主张。峡江会议，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争论，第一，是不是继续攻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第二，过不过赣江，要不要诱敌深入？即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还是摆在赣江以西罗霄山区域。毛泽东、朱德主张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诱敌深入”，

以弱胜强，关门打狗。红三军团一些同志则不同意，他们主张不过赣江，而要打南昌、九江，同时又怕丢掉经营多年的湘鄂赣根据地。当时，一些头脑清醒的同志已经觉察到，攻取大城市，同敌人硬碰硬，是行不通的。当时在红三军团的何长工在会上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不同意，势必造成一、三军团的分离，一个河东，一个河西，这样就不能集中拳头砸向敌人。我们要权衡利弊，以大局为重。他和持相同看法的滕代远、邓萍、张纯清等做大家的工作，最后统一了认识，从而使十月罗坊会议对这个问题和其它悬而未决的问题都一一定了下来。这两次重要会议，实际上成了反对立三"左"倾的转折点，也使红一方面军避免了更大损失。毛泽东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主张，为广大的干部所接受和支持。

何长工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一九三一年秋，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减员很大，为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红军进行整编，将军部撤销，军团部直辖师。根据这一新形势，毛泽东、朱德决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创办一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抽调何长工、邓萍两位军长和十几名师、团干部来筹办这件事。毛泽东亲自找何长工、邓萍谈话，他说：我们决心下点本钱，"镀"这个红点子，调你们两位军长来办学校，搞

个培养干部的基地。北伐时有个黄埔，我们要办一个"红埔"。从此，何长工即由战场转入课堂，投身于红军军事教育的伟大事业中。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创立，比之过去红军教导队和随营学校在正规性和稳定性以及教学内容上，都大大的前进了一步。叶剑英、刘伯承、左权、黄火青、陈赓、伍修权等红军知名的领导干部都曾在这所学校工作过。周恩来视察时，曾赞誉这个学校比黄埔军校办得好。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建立了红五军团，辖三个军。为加强对这支部队的领导与改造工作，中央军委从红军老部队中抽调了一批干部到红五军团工作。一九三二年一月，何长工调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委。到十三军后，何长工领导了对这支部队的整顿和整编工作，率领这支部队在战争的烽火中锻炼，使这支起义部队逐渐成为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一九三二年春，组织决定何长工和十三军参谋长周子昆以及孙毅、苏进等二十多名有作战经验的干部重返红军学校工作。何长工回到红军学校工作一段之后，中央军委准备增设新的学校，把红军学校扩充成几个学校，即彭杨步校（第一步校）、公略学校（第二步校）、特科学校和红军大学，由何长工筹建红军大学。一九三三年冬，红军大学正式开学，中央军委任命何长工为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红军大学的创立，为巩固和扩大中央根据地和反"围

剿”斗争，培养了大批党政军人才。一九三四年的初春，何长工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第五次反“围剿”紧张时，他被调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粤赣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在粤赣军区，他和其他同志一道镇守红都瑞金的南门户——会昌。在“左”倾的“全面抵御”的方针下，在南方战线，红二十二师被迫在寻乌、安远地区与数倍之敌陈济棠部作战，分兵把口，以碉堡对碉堡。在地方工作中，又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限制中农发展的错误的土地政策，使群众发生动摇。此时，受到“左”倾排挤的毛泽东身体不好，来会昌养病和调查研究。何长工向毛泽东汇报了南线反“围剿”的情况及对堡垒政策的不同看法，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重新制定了南线反“围剿”作战计划和部署，停止了死打硬拚的作法。毛泽东还提议红军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及赤卫队，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一有机会就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一些小仗，消灭一些敌人，巩固自己的阵地，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南线战局出现了转机。

一九三四年九、十月间，为了联合反蒋，争取广东军阀陈济棠中立，何长工受周恩来、朱德的派遣，同潘汉年一起做为红军的代表，到陈济棠的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济棠的代表——（陈济棠的参谋长）杨幼敏及他的两个师长

举行秘密谈判。临行时，周恩来郑重指出：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并向他交代了联络密语等项事宜。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在旁插话，嘱咐何长工：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要沉着，要灵活。何长工带着朱德署名的一封介绍信上路了。信的内容是：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经过三天三夜的秘密谈判，终于达成五项协议：

1. 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 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 解除封锁；

4. 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 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退四十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何长工完成谈判使命之后，周恩来指示他不再回粤赣军区，而去教导师任政委。十月二日，中央军委在于都祁

绿山下达了突围命令。经过激战，红军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境内。十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下达了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陈济棠执行了秘密协议，没有堵截红军，故红军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通过了陈济棠的管区，跨过第二道封锁线。何长工为红一方面军实现战略转移做出了重大贡献。

长征开始后，何长工去新组建的中央军委教导师任政委不久，又担任了军委纵队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遵义会议以后，根据会议精神，将红九军团进行了整编，把军团原有的三、十四两个师缩编成三个团，军团机关也作了相应的精简。这时，红九军团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罗炳辉仍为军团长，何长工调任该军团政委，郭天民为参谋长，黄火青为政治部主任，赵镕为供给部长。

一九三五年春，红军四渡赤水之际，红九军团在罗炳辉、何长工的指挥下，参加了在土城打川军郭勋祺"模范师"的激烈战斗，击溃了敌人，直逼桐梓的娄山关、十八道水，接着担负了红一方面军二占遵义的后卫任务。直到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九军团一直担负着中央军委和方面军主力的后卫，深入敌后单独活动，执行牵制敌人的任务。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准备北上，红九军团编入左路军，改称红三十二军。张国焘违背中央北上的决定，擅自率军南下，红三十二军亦随之南下，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路线。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后，何长工

为此专门做过检查，承担了责任。

五

抗日战争开始后，何长工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出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黄河）司令员，担负保卫中共中央的任务。从一九三八年初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何长工一直致力于人民军队的教育事业，辛勤地办学。他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大队长、“抗大”总校教育长、副校长。后来，他率队东征深入敌后办学，创办抗大一分校，并出任校长。一九四三年何长工返回陕北绥德，在徐向前领导下，仍任抗大副校长。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何长工奉命带领“抗大”四千多名干部、学员，艰苦跋涉，跨越陕、晋、绥、察、热、辽六省区，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抵达吉林通化，创办了东北军政大学，并担任副校长、代校长。这时期，何长工还从军政大学派出骨干，组成了航空、工兵、坦克、医科等学校。他为东北解放战场培养了数万名干部人才，为东北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何长工办学校注重从实际出发。在中央军委领导下，他规定学制，设置课程，实施管理，都着眼于革命战争和部队建设的实际需要。他在谈到学校和部队的关系时作过一个生动的概括：“学校是部队的缩影，部队是学校的扩

大。”他把办学和部队的作战与建设紧密联系起来。他一贯主张，学校的课程设置要有利于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利于提高学员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员英勇善战、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牺牲精神。他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来编写教材。他还亲自到前线收集整理部队的作战经验，选拔有作战经验的干部到学校任教。他提倡教员要和部队打成一片，同时实行学校干部、教员经常同部队干部交流，使学校的领导和教工人员熟悉部队，了解下情，懂得教材该编什么，上课该讲什么，使教学更有针对性，把学校办得更好。

何长工治学严谨。在学校管理上，他推行“行（政）教（学）合一”，领导班子搞得十分精干，学员队不设专职队干部，队干部同时也是教员，党支部书记由学员担任。在抗日军政大学时期，他既是校领导，同时又是教员，担任讲授游击战争的战术课。他认真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办校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对学校管理十分严格，要求学员成为军人的楷模，成为“红色种子”，成为高质量的部队需要的合格人才。何长工重视人才，不拘一格地聘用人才。他办抗大，把留学归国的和部队中学有专长的人，请到学校授课，还请中央领导同志兼课。在东北军大时，他还从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军官中找了几位师长到学校任教，发挥其军事教育

的专长。他尊重知识，爱护知识分子，不摆架子。他在抗大担任教育长、副校长期间，不论是编写教材，还是实施教学，总是虚心听取教员和专家们的意见，从不主观武断，教员把他视为知己。何长工不愧为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的先驱者。

六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中共东北局经酝酿正式成立军工部。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找何长工谈话，让他担任军工部部长。李富春说：我们没有军事工业作后盾，想打大仗，解放东北、解放全国是不可能的。他愉快地接受了党的这一重托，走出军政大学，脱下军装，于一九四七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七日，在哈尔滨召开的东北军工会议上被任命为军工部部长，伍修权兼政委，韩振纪、王逢源为副部长。这次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明确必须把东北建设成为全国的军工基地，必须积极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在组织上，确定东北军工生产企业统归军工部领导，各军区、各纵队、各师所辖之修械所，都交军工部接收，统一制度，统一生产计划，统一分配产品。军工部隶属于东北军区后勤部。何长工担任军工部长不久，又兼任了军械部长。

何长工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在通化办军工厂已不可

能，他带领大家将物资从通化搬往晖春。在日本陆军医院仓库的废墟上，建起了炮弹厂、子弹厂、炼钢厂。以后又从晖春迁一部分工厂到佳木斯，建起了手榴弹厂、翻砂厂、子弹厂、小型炼钢厂。在哈尔滨市，先是利用日军遗留下来的火药、炸药，造出了反坦克燃烧瓶。尔后，又将市内几百家小工厂组织起来，采取加工订货等形式进行军工生产，造出了雷管、马刀、炮弹、宣传弹、爆破筒等，随后又建立了弹药装备厂。在西满，先后建起了子弹厂、小型手榴弹厂、六〇炮厂、修械厂等。在南满，先后建立了炮弹厂、手榴弹厂、掷弹筒弹厂等。大连是东北军区军工生产最重要的基地。那里有一个门类较多的综合性军火工厂。淮海战役胜利后，粟裕专门写信表扬这个厂，赞扬该厂生产的炮弹。他在信中说，淮海战役的胜利，一是山东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二是你们厂生产的炮弹打出来的。给予军工生产以高度评价。

军工生产的问题不少，一是组织分散，缺乏统一领导；二是技术力量薄弱，设备陈旧，生产方式落后；三是产品规格不统一，不标准，产量低，满足不了前线需要；四是缺乏原料；五是职工生活困难。面对这么多问题和困难，何长工、伍修权等，跑遍了各军工点，同大家研究搞好生产的办法。他们首先抓了组织领导，为集中机器、器材、人员和实行统一的计划生产、分工协作、提高产量和质量，提供了可靠保证。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底，东北军工

部已有大小工厂五十五个，工作母机二千零六十台，其它机器一千五百余台，电动机一千四百七十九台，军工干部和职工共二万零七百三十人。对军工生产的这些成就，中共东北局领导十分满意，李富春曾以赞扬的口气说："长工，把这支力量组织在一起，和你的威望分不开呀！你有两块让人信服的招牌，第一你是留学生；第二你当过军长。"

在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的同时，对一些工厂进行了调整、搬迁，又新建、扩建了一些工厂，并确定把鸡西、兴山、北安、东安等几处建成永久性军工基地。为了进一步提高军工队伍的技术水平，何长工建议罗荣桓，从尚未遣返的日本侨民的技术工人中选留一部分，充作技术骨干。他还着手开办了一些军工技术学校，在哈尔滨创办的工业学校，收生五百多人。沈阳解放后，何长工亲自勘察校址，筹建了高级职业学校，计划培训中、高级兵工技术干部。各地的军工办事处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培训班。为了保证生产，何长工亲自担负组织和筹集原料的工作。他还以很大的精力支援大连军工厂的生产。由于他致力于统一领导问题的解决和领导班子的建设，狠抓产品质量，不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从而使东北军工生产走向了正轨，并且很快实现了飞跃的发展。

在担任军工部领导职务期间，何长工还受命同苏军谈判，收回了苏军准备运走的日本侵略军遗留东北的大批武

器，枪炮和坦克，用几列火车拉了好几天。

七

新中国成立不久，恢复国民经济，搞经济建设，成为当务之急。何长工奉调来京，担任重工业部副部长（陈云同志兼部长和党组书记），同时兼任航空工业局局长。

何长工一上任就奔波在创建中国重工业的战线上。他首先抓航空工业的建立。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由何长工等组成赴苏谈判代表团，就发展中国的航空工业进行谈判。当时的设想是，先搞修理，后搞制造，再自行设计。经过与苏方谈判，达成了协议，包括修理、制造在内的全部工程由苏方包下来，并派出顾问八人，专家一百多人，赴中国帮助建立航空工业。而且双方议定，由苏方派出修理专列到中国，当年修理发动机一千五百台，飞机三百架。双方还议定，由苏联帮助在中国的哈尔滨、沈阳、南昌、株洲等地建立飞机厂。在抓航空工业的同时，何长工还重点抓了钢铁、造船、电机动力等工业的建设，为中国的重工业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地质部，何长工调任地质部副部长，后任部党组书记，同李四光部长一起，开创并领导了中国地质事业。何长工虽然对地质工作

生疏，自己过去腿部受伤行动不便，但他深知，当时国家正在制订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很多该上的项目上不了，原因就在于缺乏地质矿产资源的依据，拖了后腿。地质情况不明，矿产资源不清，就不能设计工程项目。于是，他欣然受命上任。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他在地质部工作了整整十五个年头。十五年里，在他和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已建立起了地质工作的扎实基础，查明的矿产资源基本上可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一个个新兴的矿山建立起来，一座座水坝修建起来，一条条新的铁路铺设起来，一个个油井喷出了原油和天然气。从而，一座座新兴的工业城市相继增添在祖国锦绣山河的国土上。

地质工业的起步是艰难的。因为旧中国留下的是一个乱摊子，专业人才不过二百，而且大部分是搞地层、古生物和一般地质构造，其中从事研究工作的又居多数，做过矿产勘察的只有少数人。机械设备少而差，一九五二年初在华北、东北地区只有旧钻机十八部，到六月才增加到四十部。为打开地质工业的局面，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何长工主持地质部党组抓了三条：一抓干部，二抓装备，三抓科学研究。在中央领导和中组部的关怀下，在江西袁州专署撤销时，将一百二十多名干部全部调给了地质部，在察哈尔省撤销时，又将省直五百多干部调给了地质部，从而加强了地质队伍。以后又从全国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

分配给地质部一百多人，增强了地质工业的技术力量。

大业初定，教育先行。何长工在北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成都地质学院。他十分重视这三个学院的建设。为了加快培养地质人才，他又在武汉、西安、宣化等地创办了六所地质学校。仅一九五三年，在地质部的投资总额中，用于院校建设的投资，就占总财务预算的四分之一。

进行地质资源调查，探明矿产储量，没有先进的机械仪器是不行的。可是，旧中国连最简单的地质罗盘都不能生产，更谈不上制造钻机和精密的物理探矿仪器。从外国进口也不是长远之计。必须抓“母鸡”，自己办厂，保证地质工作对机械、仪器的急需。在地质部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建立了张家口探矿机械厂、衡阳探矿机械厂、上海探矿机械厂、北京探矿机械厂、无锡钻探工具厂、天津探矿机械厂、重庆探矿机械厂等，形成了各种类型钻机和各种深度钻机配套系列的生产能力。经过努力，到一九五三年，中国开始生产自己设计的钻机，结束了仿制的历史。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做到了一百米、三百米、六百米、一千米钻机形成系列，并准备试制更深的钻机。与此同时，还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建立了地质仪器厂，从事地质仪器的制造。到一九六六年共创办部属工厂四个，各省局属厂三十六个。

地质工作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既具有地域性的特

点，又带很强的科研性。何长工在注重培养人才、抓生产装备的同时，注重科研队伍的建设和科研机构的建设。一九五七年，在原有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地质矿产研究所、矿物原料研究所、水文地质工程研究所、地球物理探矿研究所，以及地质学研究室等科研机构。一九五九年三月，部党组作出成立地质科学研究院的决定。一九六二年以后到一九六六年，地质研究所共发展到十六个，地质陈列馆十三所。

地质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深化了对中国基本地质特征和成矿规律的认识，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矿床类型，指导了各项地质找矿工作；同时也提高了对矿产评价和利用的认识，推动了地质历史研究工作向广度深度发展，也促进了工业部门对矿产的开发和利用。

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地质部党组共同努力下，经过全体地质工作者十余载的艰苦奋斗，中国地质工业成绩显著，硕果累累。到一九六六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二十五个地质局，拥有职工二十万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技术人员占四分之一以上。在能源矿产方面，煤田地质工作一直为地质部的重点，找到了大型（有的可露天开采）煤田，探明了一大批大中型炼焦煤基地的储量，保证了我国新建和扩建大型钢铁基地的需要。一九六五年以后，煤田逐渐交由煤炭工业部负责。

自一九五五年开始，地质部从主管普查各种固体矿产

逐步转向专门从事找油找气的工作。何长工以"打不出油来我去跳长江"的雄心大志，投入找油找气工作。他不顾脚残，在战略展开、全面侦察的方针指导下，深入基层，踏遍大江南北的青山沃野，终于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到一九六一年七至九月，在冀东、鲁北传来出油的消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在京津和下辽河的油田也喷出原油。从此，中国甩掉了贫油的帽子。对此地质部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做为地质部的领导者何长工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勋劳。

铀矿是一种新兴的能源。何长工早在五十年代就在广东和四川找到了较大规模的铀矿，不久就进行了开采，成为中国最早的铀矿基地之一，对中国一九六四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在金属探矿方面，何长工也倾注了心血。他组织力量探明了白云鄂博、大冶、庞家堡、攀枝花、海南岛石碌、甘肃镜铁以及长江中下游、冀东和邯邢等铁矿，为兴建武钢、包钢、攀钢、酒钢和扩建首钢、马钢等钢铁厂提供了资源保证。

何长工在水文地质工程和非金属矿藏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他在长江、黄河、淮河、黑龙江等流域的规划和中国东部地区河流规划的工作中，在各大著名水库、各江河大桥、重点铁路的选址工作中，在为河北平原、黄淮平原、黄土高原以及山区、牧区解决农、牧用水和城市供水

的工作中，都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何长工经历十五年的地质工作生涯，是中国地质工业的奠定人之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何长工与世隔绝数年之后，一九七五年十月，又重新恢复工作，回到部队，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他继承发扬了我军办院校的优良传统，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他不顾年迈体衰，亲自给学员讲党史、军史，传经验，带作风，为推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再立新功。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坚决拥护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积极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全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拥护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他热情地关心和支持年轻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主动请辞军事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务，退居三线。退到第三线后，他仍以顽强的毅力，悉心于党史、军史的研究和宣传，关心老区建设，热情接待来信来访。他病重住院期间，仍然关注党、军队和国家的建设，关心国家的安全。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红军将领和杰出的军事教育家何长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何长工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功勋卓著，德高望重。他一生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他的各项艰巨任务。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人正派，襟怀坦荡，豪爽刚正，豁达大度，有话敢于直言，从不阿谀奉承。他功高不自傲，委屈能求全，顾大局，不擅权，始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革命乐观主义，不怕困难，开拓前进，勇挑重担，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践了为拯救和振兴中华民族“扛一辈子长工”的夙愿，他的功绩将永垂青史。

（康景海　单继友）



何 正 文



何 正 文

一

何正文（1917－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出生于四川省通江县板桥乡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家祖祖辈辈靠打短工为生，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全家老小住的是一间勉强能够租得起的破烂瓦房，凄风苦雨，艰难度日。父亲何国斌，老实忠厚，为人正直，给富人当了大半辈子长工。母亲何肖氏，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农家女子，毕生辛劳地操持家务和养育子女。尽管父母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地干，但全家人只能过着大半糠菜少半粮的贫苦生活。

何正文是家中的长子，下有正武、正奎两个弟弟，他不满八岁就艰难地帮助父母亲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先是到镇上一个叫何文锐的地主家里打零工。一个弱小的少年，要为地主收割庄稼，到地里干繁重的活，还要挑水、砍柴、扫院子，侍候地主家的老小，稍不随主人的意，就要挨打受骂受凌辱，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常常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后来，何正文愤然离开了地主家，帮

着母亲炸麻花拿到镇子上去卖，帮着卖猪肉的父亲记账。父亲为了让何正文能念上书，饿着肚子干着两个壮劳力的活，全家人也忍饥挨饿，就这样，何正文断断续续勉强读了两个半年的私塾。家贫愈奋，何正文在苦难中读书十分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先生寄予他很大的希望。但是，终因家境贫寒，不得不辍学继续帮助父母维持全家生计，终年劳累，不得温饱。何正文参加红军后，两个弟弟和刚出生的一个妹妹都先后被饥饿和病魔夺去了生命。

一九三二年的深秋，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得不西进川陕，开辟新的根据地。在徐向前总指挥的率领下，红四方面军顶风冒雪，历尽艰辛，翻越了秦岭和大巴山，开路先锋团在红七十三师王树声师长的指挥下，十二月十八日一举攻占了通江北部边界的入川门户两河口。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夺取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二月中旬，红军来到距通江县城一百七十余里的板桥乡。红军的到来，使何正文感到十分新奇，他看到红军不打人，不骂人，一个个和蔼可亲，给穷人分发衣物和粮食，帮助穷人担水、劈柴和干一些杂活，在地主的墙院上还张贴着红军“打富济贫”的标语，短短两天时间，就使这个穷苦的山乡欢腾起来。何正文从来没有见到过红军，他过去所看到的是无恶不作的川军。“红军到底是什么队

伍？怎么对穷人这样好呢？"这使何正文感到不解，他思考着，寻求着解答心中疑问的答案。十二月中旬的一天，何正文看到板桥口一座土地庙门前的小平坝上站着四五个身背驳壳枪的红军，围着一个胸前挎望远镜的红军在那里东张西望，指指划划，何正文跑了过去，好奇地看着这几位红军。那个挎望远镜的红军发现了何正文，就主动走到他跟前，亲热地问："小兄弟，家住哪？今年多大了？"何正文见到这位红军面带笑容，说话和气，一开始的拘束感早就无影无踪了。他指了指身后的板桥口说："就住在小坝子的边头。我今年十五了。""喔，我比你大十二岁，该是你大哥了！"说完，这位红军就哈哈大笑起来。接着，这位红军大哥又与何正文拉开了家常，问他家里有几口人，念过书没有，还与他开了几句玩笑，真好象是何正文的亲近大哥似的。这时，何正文终于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红军是什么队伍？打不打有钱人？。"这位红军大哥听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凝视着眼前这位衣不遮体、面黄肌瘦的少年，拉着他冰冷的手深情地说："小兄弟，红军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在苦水中泡大的何正文听后，激动得眼里闪着泪花，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后来他才知道，这位红军大哥就是红七十三师王树声师长。

这天夜里，何正文失眠了。白天的情景使这位十五岁的少年激动不已，红军的所做所为，使他真正看到了自己

的队伍，使他早已埋藏在心底的革命种子发芽了，他决心跟着红军走，为受苦人谋一条生路。寒风透过破损的门窗阵阵袭来，热血在这位少年的周身沸腾。第二天，何正文毅然参加了红军在当地组织的游击队，不久就正式编入了王树声指挥的红七十三师独立营。

二

红军占领了板桥乡后，继而解放了通江县城。一九三三年一月，国民党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会同军阀杨森、刘存厚，以三十八个团、约六万人的兵力，对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三路围攻”。敌人的兵力是红军的三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坚决执行了徐向前总指挥提出的“收紧阵地，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在运动中逐步收紧阵地，步步诱敌深入，寻找有利时机进行阻击、袭击，适时反击敌人。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敌人的“三路围攻”节节受挫，连遭打击，伤亡逾万，士气十分低落。五月上旬，敌主力左路纵队由原二十五个团减少到十三个团，进至空山坝地区；右路纵队的八个团，于五月十四日抢占了竹峪关。五月十七日，红四方面军首长在空山坝的总部驻地召开军事会议，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举行反攻的时机已基本成熟，决定首先歼灭竹峪关之敌，以解除右翼威胁，尔后集中兵力歼灭进入空山

坝地区之敌。红七十三师的任务是坚守大、小骡马及小坎子阵地，抗敌攻击，伺机由正面发起进攻。

何正文经过几个月的大小战斗，已是一名较有作战经验的红军战士了，提升为师独立营班长。他们坚守的阵地与敌人的阵地只有一沟之隔。他和全班战士昼夜不停地挖战壕，修工事，并利用夜暗多次袭扰敌人，有时消灭敌人一个排，有时消灭敌人一个班。为了掌握敌情，有一次他同两名战士乘雨夜出袭，抓回了一名俘虏。

五月十八日，敌人发起猛攻。当时，红军物资、弹药奇缺，每人只有半斤炒面，大部分是用竹笋充饥，何正文手中仅有的三粒子弹还是他参加同当地国民党民团作战时缴获的。他在阵地上摆满了石头，战斗打响后，他先是用石头砸，敌人冲上来了，他跃出战壕，挥舞大刀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殊死的肉博战。由于他年小力弱，在拼杀中有好几次都是指导员邱立才和老红军战士从敌人的刺刀下把他救出来。仅有的三粒子弹，即使在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刻，他一粒也没有舍得打。真可谓爱弹如命，视死如归！就这样，何正文与战友们在战斗极其残酷的情况下，坚守阵地三天三夜，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攻击，没有丢失一寸阵地。

五月二十日，红七十三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冒雨穿过空山坝西北的深山密林，插入敌之左侧，歼敌一部，抢占了有利地形。翌日拂晓，师主力发起攻击，何正文与战友们

如同离弦的利箭向当面之敌扑去。他平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入敌人阵地，一连捅倒三名敌人，带领全班冲到了敌人一个连指挥所，对一名敌军官高声喊道："缴枪不杀！红军宽待俘虏！"这名敌军官还没有看清何正文，就扔下手里的武器，忙说："官长，请不要开枪，我们投降。"可他哪里知道，这位"官长"不过是一名十几岁的红军战士，身上只有三粒子弹。红七十三师在王树声师长的指挥下，激战至二十四日，全歼敌左路纵队的七个团，击溃其六个团，俘敌旅长杨选福以下官兵五千余人。经受战斗洗礼的何正文，越战越猛，饥渴、寒冷、劳累他全然不顾，随主力继续扩大战果，奔袭四十里山路，向逃往广元方向之敌追击。六月十日，红七十三师王树声师长指挥二一七团的两个连，仅以轻伤二人的代价，夜袭并攻占了地形险要的华盖山，歼敌百余人。六月十二日，红七十三师向旺苍坝发起攻击，歼敌二十九军的一个旅大部，一举攻占了旺苍坝。随后，又迅速向广元发展攻击。此次追击战斗，红七十三师俘敌六千余人。红四方面军历时四个月之久的反"三路围攻"作战胜利结束。由于何正文在战斗中机智勇敢，战绩显著，被提升为师独立营排长。

六月底，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在旺苍县木门场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停止由于张国焘造成的部队内部错误的"肃反"。会议还决定，将红四方面军的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何正文所在的七十三师，

扩编为第三十一军，王树声任军长，张广才为政委。何正文任该军九十二师二七六团排长。八月，何正文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一月，他光荣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转为党员的这一天，何正文心情十分激动，是党把他从一个穷孩子培养成为一名红军排长，是党教导他懂得了革命道理。他兴奋地举起左手向党旗庄严宣誓：永远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不回头。从此，鲜红的党旗下，又多了一名赤胆忠心的无畏战士。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八月，何正文参加了反击四川军阀刘湘组织的"六路围攻"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同何正文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指导员邱立才同志牺牲了，何正文也负了伤。那是六月下旬的一天夜里，红九十二师二七六团在师长陈友寿、政委叶成焕的指挥下，向敌二十九军的一个团占据的苍溪县境内的运陡山阵地发起了夜袭战。何正文所在连队担任了这次夜袭战斗的主攻连，战斗于午夜打响，他和连指导员邱立才带领两个排的兵力，在火力掩护下，从翼侧迅速向敌前沿阵地冲击，首先攻上了敌人阵地，打开了突破口。正当他们准备继续向纵深攻击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了何正文的右脚。由于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加之流血过多，再也支持不住而昏了过去。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身边的指导员邱立才同志已经牺牲了。邱立才是何正文的转党介绍人之一，是他领着何正文在党旗下宣誓，在艰苦的斗争岁

月里他与何正文结下了深厚的战友之情。何正文强忍悲痛，怀着满腔仇恨，挣扎着站起来向敌人冲去，可是没冲几步他又昏倒在地上。是战友们把他从阵地上救了下来。何正文的伤口染上了敌人洒下的毒剂，腿肿得很厉害，他被送进了木门镇红军医院治疗。红军的医疗条件很差，他的伤还没有得到痊愈就焦急地返回了部队，被留在军司令部手枪三连任排长。

这次反“六路围攻”战役，红四方面军付出了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但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先后共毙伤俘敌八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进一步巩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通过十个月的反击作战，使何正文懂得了红军之所以能够在十分艰难困苦中战胜强敌，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有一大批象邱立才同志那样的共产党员，也是因为有广大劳苦群众的支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穷人能过上好日子，就是死我也心甘情愿。”这个时期的何正文，并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的朴素的阶级觉悟和投身于革命的真挚感情，是他成为有崇高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基础。

一九三五年三月，任红三十一军司令部手枪营排长的何正文，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发起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在这次渡江战役中，他带着尚未痊愈的伤痛，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英勇顽强的精神，随三十一军主力从苍溪以北的鸳溪口强渡成功，迅速攻占了四川军阀刘汉雄的险要阵地火烧

寺。随即在王树声军长的指挥下，红三十一军一举抢占了四川另一军阀邓锡侯的江防要地剑门关。历时二十四天的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后，张国焘看不到这次战役的胜利给红军带来的新变化，借口与红一方面军在川西南会合，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带领红四方面军向川西北的中坝、江油、青川、平武等县转移。不久就开始了长征。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三日，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的懋功、达维胜利会师。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两军会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遵照这个决定，两军主力组成了左、右两路纵队，并肩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七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和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各一部兵力，攻占了毛儿盖。八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精神，决定红一方面军五军团、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及军委纵队一部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军及军委纵队一部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张国焘在毛儿盖会议上虽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会后却提出了与中央决定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边

的主张，致使左路军广大指战员三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挨饿受冻，吃尽了苦头。何正文经历了这次由于张国焘的错误给红军带来重大损失的全过程。

七月下旬，何正文所在的红三十一军司令部手枪营三连，在参谋主任陈增联的带领下攻占茂县后，突破岷江，经黑水、壤口、查理寺，向阿坝开进。从壤口到阿坝要经过茫茫的水草地，那里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更是变化无常，忽儿风雪冰雹，忽儿浓雾弥漫，忽儿狂风骤起，忽儿暴雨倾注。草丛下河沟交错，泥泞不堪，腐草结成的地表面十分松软，稍不小心，人和牲口陷进去，就再也起不来了。红军地形生疏，没有粮食，没有被服，没有药品，野菜、树皮、草根、皮带、皮包、枪背带等都成了红军战士充饥的食物，身患疟疾的何正文在跋涉途中，身上忽儿发冷，忽儿发热，阴沉沉的天空飘着雪花，寒风阵阵袭人，大粒大粒的虚汗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淌，浸透了他身上破旧的单衣和他那顶红军八角帽，他强忍着疾病带来的痛苦，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进着。他带领手枪营一个排，在军参谋主任陈增联同志的指挥下，担负着掩护军部机关安全转移和收容伤病员、掉队人员的任务。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红军进行前堵后追，当地少数民族的反动头人与国民党特务及散兵游勇相勾结，也不断地袭扰红军。何正文与战友们几乎每天都要与敌人的骑兵周旋，有时一天要与敌人交火三四次。在一次战斗中，参谋主任陈增联的警卫员

牺牲了，骑骡也被打死了，何正文就把排里的一匹马调给了陈增联骑用。红军精疲力竭，战斗力很弱，但是，一发现敌人，饥渴、寒冷、病痛都忘了，每个红军战士想的都是“引开敌人，保证军直机关的后方安全”。何正文就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率领全排对敌人的袭扰采取声东击西和麻雀战术，一次又一次地引开敌人，保证了军部机关的后方安全。

八月下旬，部队进至阿坝以北的噶曲河边。这时，张国焘为了达到反对中共中央北上方针、另立中央的目的，以河水上涨为由，命令左路军先头纵队和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何正文所在的红三十一军随左路军先头纵队，再次跋涉四野茫茫、渺无人烟的草地。广大指战员饥寒交迫。许多红军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下，却陷进了沼泽泥潭或倒在冰雹下。走过草地后，红三十一军南下松岗、达维，翻越夹金山，相继夺取了宝兴、芦山、天全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方向进攻，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参加了徐向前指挥的百丈关决战。这一仗，红四方面军苦战七个昼夜，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红军本身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战后，何正文调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军事指挥连学习，任排长。

经过磨难的左路军广大指战员，识破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中共中央的阴谋，纷纷要求执行中共中央确定的

北上方针。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红军大学在刘伯承的率领下，随红四方面军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再次翻越山高坡陡、气候寒冷、常年积雪的夹金山。夹金山，海拔四千五百米，地势复杂，气候变化无常，上午九时以后，狂风呼啸，有时冰雹倾注，有时大雪纷飞，红军战士为了赶在上午九时以前翻过隘口，不得不在夜晚顶着刺骨的寒风登山。由于红军物质条件菲薄，长期艰苦征战得不到补充和休整，指战员们的体力消耗过大，许多红军战士带着疾病、伤痛行军，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有的掉进了覆盖积雪的山沟，有的被冻死、饿死在雪山上。何正文身负重荷举步艰难，他强支撑着虚弱的身体，一步一步地攀登着，刚刚翻过隘口，他的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眼前一黑昏倒在雪坑里，当他苏醒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被指导员胥光义和几个战友抬着下山。阶级兄弟的心紧紧地与何正文的心贴在一起，战友的体温象一股暖流传遍了何正文的全身，使他禁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湿润了战友的肩头。何正文的体力稍微得到了恢复，在战友的搀扶下翻过了夹金山。部队于二月下旬进至丹巴。从丹巴至道孚，要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党岭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在当地藏族群众的心目中，党岭山就好象一道噬人生命的鬼门关。为了征服党岭山，何正文与战友们准备了两双草鞋和一副铁脚码子，每人还准备了三天的干粮和一些辣椒、生姜、绳索、铁锹

等。头天下午他们便出发了，顶着刺骨的寒风，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半山腰过了夜，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开始爬山了。越往山顶爬，越感到头重脚轻，呼吸困难，何正文与战友们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地往山顶挪，许多红军战士的衣服结了冰，眉毛、胡子也都结满了冰霜，又有的同志被冻僵在雪地里，长眠在党岭山上。在下山的途中，指导员胥光义由于过度疲劳，不慎陷进雪坑里，再也没有力量爬上来了。何正文带领几名学员从雪坑里救出胥光义，搀扶着他继续下山，阶级兄弟的心再一次紧紧地贴在一起了。这两位年轻的红军战士，在生与死的博斗中所迸发出的阶级情谊，不愧是人和人之间最真挚、最纯洁、最高尚的感情了。红军正是凭着这种感情，化作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闻的奇迹。

二月底，何正文随红大进至道孚，三月十五日攻占炉霍，进行了短期整训，四月初部队继续乘胜前进。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于六月底在甘孜与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同年七月，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第三次跋涉数百里茫茫草地。这次穿行草地，虽然准备比较充分，但比以往两次路程更远，时间更长，经历的困难更加严重。指战员们所带的干粮不足沿途食用，再次以野菜、草根以至皮带、牛皮来充饥，渴望着早日与中央红军会合，走上抗日前线。这一强大的精神支柱，鼓舞着何正文与他的战友们，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英雄气概，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病痛

的折磨，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大自然带来的重重困难，艰苦跋涉一个多月，经阿坝、班佑，于八月初到达包座。部队进行了短期休整后继续北进，经腊子口，翻越岷山，过哈达铺、岷县，于十月九日到达会宁，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至今，何正文与胥光义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心情仍然无比激动。有一次，何正文到某团视察工作，发现官兵关系存在着一些问题，他向这个团的领导讲述了这段历史故事，并嘱咐说："要用我军的光荣传统教育干部，教育部队，把干部战士拧成一股绳。"

在长征的路上，何正文领受了红大校长刘伯承的教诲。刘伯承专门听取了他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汇报，教导他要重视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跃党内的民主生活。他在担任红大军事指挥连党支部书记期间，工作开展得很有起色，刘伯承校长亲临他所在的连队检查工作，对于他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表扬。在阿坝，他还结识了红军总司令朱德，并和朱总司令一起打过篮球。朱总司令的艰苦生活、群众观点和民主作风，深深地留在了他的心中。他先后担任了红大指挥连排长、青年连连长。长征胜利后，红大的指挥连、政治连、青年连、特种连等，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与红大三分校在庆阳会合了，改为红军庆阳步兵学校，何正文担任了步校的连长兼军事教员。

作为红军长征战斗行列中的一员，何正文把长征看成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最有价值的一段战斗经历。他

从红军的长征中常常感受到，人的理想一旦确立，人的精神一旦唤起，将会产生无敌的威力。这也是他后来历尽千辛万苦而终身不悔的信念之源泉，力量之源泉！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一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红军庆阳步校改编为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因部队刚刚整编，红军的八角帽换成了佩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何正文同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新军帽已换了好几天，可何正文仍旧戴着红军的八角帽。庆阳步校政委袁国平知道何正文思想上不痛快，就耐心地开导他说："当前国家危难，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抗战，只要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换顶帽子又能算得上什么呢？"袁国平还给他讲了彭德怀带头换帽子的故事，这使何正文深受教育。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他从庆阳步校毕业后，留校编入干部队，从韩城渡过黄河，在侯马乘火车沿同蒲铁路到河边村下车，尔后徒步行至随营学校所在地五台县的苏子坡。不久，何正文奉调给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当参谋。当时，徐向前指挥阎锡山部的两个师抗击日军，保卫忻州、太原。但阎锡山抗日是假，保存实力是真，不久就将抗击日军的两个师撤回。何正文跟随徐向前回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在这

期间，他从徐向前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质，领受了徐向前高超的指挥艺术。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陷。根据毛泽东关于"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准备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刘伯承师长，张浩主任（政训处），在山西省和顺县石拐儿镇召集干部会议，决定抽调大批有指挥作战经验、能独当一面的干部和部分兵力，在晋东南各县建立游击纵队，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开创抗日根据地。何正文担任了榆社县自卫游击纵队大队长，在同蒲、正太铁路沿线的平遥、祁县、太谷、介休、榆次等县，与日军展开游击作战。榆社县各村的地主勾结起来，秘密组织反动武装，挑拨群众与八路军的关系，千方百计刁难和破坏八路军筹粮、筹款和扩兵工作，何正文带领游击大队深入群众，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宣传到哪里，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而对于那些与八路军作对的"维持会"和汉奸则给予了坚决地打击。群众看到了有八路军撑腰，打消了顾虑，积极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斗争。何正文还率领游击大队帮助各区乡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很快打开了榆社县的抗日局面。十二月上旬，正太路沿线的日军从平定、昔阳、榆次、太谷等地，出动二千余人，兵分六路，对一二九师主力实施围攻。何正文指挥游击大队寻找有利时机，采取避实击虚、出敌不意等战术，与敌周旋，抓住一小股敌人，就狠打一下，敌人来势凶猛，就骚扰、迟滞敌人，有力地

配合了正面作战的七七二团。由于游击队的不断袭扰，使日军捕捉不到一二九师主力，加之地形生疏，遂全部撤回。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一二九师政委，张浩回延安养病。从这时起，何正文就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和领导下，进行战斗和工作。

同年四月初，侵华日军华北第一军集中兵力三万余人，由同蒲、正太、平汉铁路线及长治、屯留等地出动，兵分九路向晋东南根据地大举进攻。在这次战役中，何正文指挥榆社游击大队，阻击由祁县、太谷出犯之敌。他积极寻找战机，利用有利地形伏击、侧击敌开进纵队，阻敌于东、西固城地区，为师主力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他带领游击大队配合师主力回转武乡以东长乐村一带，迷惑、钳制敌人，掩护主力歼灭长乐村以西被围之敌。整个战役历时二十三天，一二九师及各县游击大队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共歼敌四千余人，收复县城十八座，彻底粉粹了敌人的“九路围攻”，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在长乐村战斗中，何正文在红九十三师时的老政委、改编后任七七二团团长的叶成焕同志，不幸光荣牺牲。

同年七月，何正文奉命调回一二九师工作。他途经师部驻地黎城时，刘伯承师长知道了，找他去谈话。何正文指挥的榆社游击大队打了一些漂亮仗，刘师长已有所耳

闻，但何正文改名为“何化一”，刘师长却不知道。在谈话中，刘师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问他：“你不是叫何正文吗？怎么叫何化一呢？”何正文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当兵打仗嘛，要‘文’干什么，就改了。”刘师长先是风趣地说：“人的名字是个代号，便于记忆嘛！我叫刘伯承是个代号，你叫何正文也是个代号，你改它干啥子嘛！”几句话把比较紧张的何正文给逗笑了。接着，刘师长便十分认真地同何正文谈起了学习文化的问题。他说：“工农干部必须重视文化学习。没有文化怎么拟制战斗文书呀？怎么看地图呀？决不可轻视文化。军队如果没有文化那就是愚蠢的军队，干部如果没有文化那就是愚蠢的干部。没有文化是干不好革命的。”刘师长的一番话，说得何正文心里热乎乎的。刘师长告诉何正文：“掌握了文化知识，就等于掌握了一把钥匙，就可以打开军事、政治、科学知识的大门。”他要求何正文要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三本书。从此，何正文把学习文化与干革命紧密联系起来，不论战斗多么紧张，不论环境多么艰苦，他总要挤出时间学习文化。寒冬腊月，夜幕降临时，只要情况许可，他就借着炉火的亮光学习。刘师长要求的三本书，他都想办法找来读了。后来，刘师长多次找他谈话，每一次都要询问他学习文化的情况，还要求他“必须写毛笔字，而且要写正楷”。于是，何正文不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在战斗间隙，一有空就练习写毛笔字，有时没有

笔墨，他就在地上练习。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情凝笔端尽兴游。五十年来，何正文努力实践刘伯承师长的教导，从来没有停歇过，每当他拿起毛笔，刘伯承师长教导他学习文化的情景就萦绕在脑际，刘师长的音容笑貌镌刻在他的心中。

一九三八年七月至一九四一年一月，何正文先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连长、副营长兼军事主任教员、营长、师部骑兵团参谋长、随营学校训练科长、三八五旅司令部作训股长等职。这段时间，何正文在刻苦学习文化的基础上，努力钻研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尤其是他在随营学校党委和校首长的领导下，为一二九师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基层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参谋人员，他自己也在不断的教学和实践中，思想、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都得到了较大提高。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党委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何正文奉命调任一二九师骑兵团参谋长，当时他组织上服从了，可思想上还不太通。刘伯承师长察觉后，便找他去谈话。一见面，刘师长就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不愿做参谋工作，是不是？”何正文诚实地点了点头。刘师长用深沉的语调说：“参谋工作很重要，可不能轻视啊！轻视参谋工作是军阀思想在作怪。”刘师长又说：“参谋工作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专业知识，学问深得很呀！不懂得参谋工作，就不可能成为一名

优秀的指挥员。”这次，刘师长与何正文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既有严肃的批评，又有耐心的开导，使何正文的思想开窍了，他向刘师长表示，一定要把参谋工作做好。一九三九年一月，何正文随一二九师李达参谋长，参加了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在屯留县某村召开的八路军参谋长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左权副参谋长详细地论述了参谋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参谋人员要任劳任怨，要有甘当无名英雄的品德，有功归党委和军政首长，有过参谋人员要勇于承当。”左权还强调说：“参谋人员还要做活字典，要能参善谋，亲自动手。参谋人员应该具有本级首长的水平，或高一些的水平。”这是何正文第一次参加参谋长工作会议，对他的教育非常深刻。在他以后任各级参谋长期间，始终遵照刘伯承和左权两位首长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十分努力。他还经常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教育参谋人员，不断地把自己做参谋工作的经验传授给参谋人员，使司令部的工作就象一部机器，运转得很润滑，很灵敏。正如许多熟悉他的老首长、老战友所说：太行山区有四位出类拔萃的参谋，何正文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九四〇年八月至十一月，何正文参加了震撼中外战争史的“百团大战”。一九四一年五月，何正文调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参谋长。同年八月，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为了粉碎敌人的秋季大“扫荡”，打通太行山区与冀、鲁平原的交通，决定发起邢（台）、沙

（河）、永（年）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七六九团担负攻打伪"剿共第二路军"司令高德林的老巢公司窑。这是敌防御体系的中心，四周有三王村、申庄、秦庄、毛村等防御要点。任务明确后，何正文跟随团长郑国仲、政委漆远渥，带领参谋人员赴现地勘察地形，搜集兵要地志，及时地向团党委提出了作战决心的建议。在作战会议上，何正文详细地介绍了上级意图、敌我兵力对比和地形条件等，并就本团的决心方案作了说明。会后他又带领各营长到现地进一步明确任务，组织协同，并派遣侦察人员深入敌后进行侦察，掌握了大量的可靠情况，从而使本团的作战决心不断完善。战斗于三十一日午夜打响，何正文和营长张效义、教导员张天恕指挥第二营担任攻打公司窑外围的敌防御要点申庄。在部队向申庄逼近时，他随主攻连跟进，从敌人防御最强的申庄东北角突破，迅速占领了大半个村子，把敌人压缩到村西南的一个炮楼内。炮楼四周是一片开阔地，敌人设有铁丝网、壕沟、雷场等障碍，攻击分队很难接近，当时又没有重火器，一时拿不下来。何正文与营长张效义研究后，决定部队一面进行土工作业，一面向敌人发动政治攻势。在第二营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的瓦解下，炮楼里的守敌投降了。此时，攻打公司窑的第一、三营，攻占了高德林的一、二矿和兵工厂。经一天一夜激战，七六九团全歼了公司窑及其申庄要点的守敌。这一仗，对实现上级"中心开花，各个击破"的决心，取得了关

键性的胜利。

邢、沙、永战役胜利了，但何正文并没有感到轻松，他作为团参谋长，要把这次作战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写出来，这对于今后的作战很有指导意义。何正文由于平时就对学习文化和军事十分刻苦，这次他熬了两个通宵，写出了《攻坚作战的几点经验》一文，八路军《前线》杂志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这对第一次写文章的何正文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鼓舞。以后，他每打完一仗，都要把战斗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写出来，并认真组织参谋人员进行战斗总结和学习。

一九四二年春，何正文所在的七六九团参加了粉碎日军向太行根据地的“扫荡”后，于三、四月间，对占据翼城、浮山的国民党阎锡山部第六十一军的进攻，进行了自卫还击，经两天激战，击退了阎军进攻，收复了被其抢占的翼城、浮山地区。五月中旬，日军第一军为了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主力，并策应其方面军在冀中区的大“扫荡”，以三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术，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夏季大“扫荡”。在这次战役中，七六九团抽出一个营随一二九师师部向太行山南部转移，团长郑国仲、政委漆远渥、参谋长何正文带领两个营的兵力进至桐浴、南崖铺之间地区，这时正遇见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左权问道：“谁的部队？”团长郑国仲立即答道：“七六九团。”左权

说："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正在转移，你们要掩护。"这样，七六九团就留下来参加了十字岭、南崖铺战斗。二十四日，日军完成了对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武军寺、桐浴、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的合围。翌日，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以南艾铺和十字岭为目标发起围攻。七六九团营长李德生带领一个营的兵力于十字岭南侧掩护左权副参谋长在漳河指挥作战。这时，何正文在十字岭上，疟疾病又复发，总部保卫部长过来对他说：彭总在河边指挥作战，彭总不上来你不能走。为了确保彭总安全，何正文带领几名参谋人员到南艾铺，指挥部队抗击数十倍的敌人，并三次派人去催彭总转移到安全地带指挥。他的警卫员、马夫都先后牺牲了。在战斗异常艰苦、激烈的时刻，他到前沿阵地与战士们共同作战，他对战士们说："多顶住一分钟，总部转移就多一分保障。"南艾铺的坚守分队在他的带领下，打得十分顽强，战至下午四时许，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已基本上转移了，但彭德怀副总司令还在河滩指挥冀中部队作战。这时，何正文带领部分兵力开始同日军转山头，吸引日军火力，有时与日军只相距百米，甚至几十米，同日军周旋了十三个山头，又撤至十字岭阻击日军，掩护和接送彭德怀、罗瑞卿西撤以及最后一批总部人员转移。日军从两翼围攻十字岭，情况十分危急，何正文带领阻击分队，在左权副参谋长的指挥下，边打边撤，顽强抗击，经一个多小时激战，终于冲出

了日军的重围。但是，正当队伍冲破最后一道封锁线时，几发炮弹打来，落在了指挥所的位置，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参谋人员的光辉典范、何正文崇敬的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英勇牺牲了。当天夜晚，何正文的心情十分悲痛，他路过彭总住地时，彭总把他叫进屋里，对他说："我的心情和你一样，左权同志的牺牲对八路军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我们一定要为左权同志报仇。"这时彭总还没有吃饭，问到何正文也没有吃饭，就做了一碗面条叫他吃，可彭总自己却不吃。此时此刻，何正文怎么也吃不下，他眼含泪水告辞彭总回部队去了。在后来的艰苦征战中，左权那种"太行山压顶不动摇"的英雄气概，始终激励着何正文，是他全力效仿的楷模。为了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山西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在河北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建有左权墓和左权纪念馆。

冲出日军重围后，何正文带领七六九团三连，于五月三十一日，在民兵的配合下，设伏于辽县东南的苏亭镇，歼灭日军运输队一百四十余人，我仅亡一人、伤二人。伏击战的胜利受到了刘、邓首长的通报表扬。六月中旬，一二九师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巧妙地从敌间隙中跳出了合围圈。这次反"扫荡"作战共歼日军三千余人，打破了日军消灭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统率机关的企图，坚持和巩固了太行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三年一月，何正文调任太行军区二分区参谋

长。他认真贯彻中央军委规定的“敌进我进”的方针，积极组织武工队和游击队，深入边沿地区和敌占区，广泛宣传与动员群众，开展争取和瓦解伪军的斗争。他全力协助曾绍山司令员指挥所属部队在正太铁路沿线，伏击、阻击敌人，并袭入太谷县城，消灭守敌一百五十余人。九月，何正文调任太行五分区参谋长。分区司令员韦杰已去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作战和工作都落在了何正文一人身上。一九四四年四月，太行五分区、七分区发起了林县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何正文指挥五分区主力拔除了林县至水冶公路两侧的伪军据点，切断了林水交通要道，使城内伪军补给断绝。四月十四日，与七分区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占了林县城，共歼敌九百余人。九月，驻安阳日军向林县以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经三昼夜激战，五分区的部队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作战结束后，何正文写了《林北反“扫荡”经验总结》一文，太行《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十月二十五日，太行军区在黎城南温泉召开的杀敌庆功大会上，何正文同分区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受到了太行军区李达司令员、李雪峰政委的表彰。

一九四五年一月，何正文调任太行六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并代理司令员职务。侵华日军宣布投降后，何正文在分区政治部李震主任的有力配合下，组织指挥六分区部队，在没有兄弟部队配合的情况下，连续收复了武安、沙河等地，攻克敌据点十余处，歼敌五百余人，受到了太

行军区首长的通报表扬。

九月，为配合晋冀鲁豫军区主力进行上党战役，以及收复平汉铁路沿线县城和切断平汉线，奉晋冀鲁豫军区刘、邓首长命令，由太行一、六分区组成平汉支队，秦基伟任支队司令员，何正文任支队副司令员。他积极协助秦基伟司令员指挥部队，在晋南军区一部兵力的配合下，相继收复了邯郸、邢台、临洺关等重镇，并在乔河地域全歼以杨四麻子为首的国民党匪徒。随即，平汉支队在漳河以北的岳镇一线，抗击国民党第三十九军一个整编师的进攻，完成了掩护太行军区主力向作战地区集结的任务。尔后，他与司令员秦基伟指挥部队，与第一、二纵队和冀南军区部队一道，歼灭了漳河以北、邯郸以南的被围之敌。上党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集中七个师的兵力分两路自新秀沿同蒲、平汉线北进，企图与空运至北平的两个军南北会师，控制平汉铁路。这时，刘、邓首长根据中央军委意图，决心发起邯郸战役，以一部兵力截击沿同蒲路北进之敌，集中主力对付沿平汉路北进之敌，务求歼灭其一部或大部。何正文所在的平汉支队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王宏坤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委，王近山任副司令员，何正文任参谋长兼十八旅旅长。十月二十四日，敌渡过漳河，沿平汉路东侧推进至马头镇、磁县之间地域。这时，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迅速按预定部署将敌包围，同时控制了漳河渡口，二十八日黄昏，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何

正文在旅政委李震、副旅长向守志的配合下，指挥十八旅一举攻占了磁县以北的马头镇，接着向邯郸方向突袭。十一月二日邯郸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共毙伤国民党军三千余人，俘其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一万七千余人。战役胜利后，何正文调任太行军区参谋长，在秦基伟司令员、李雪峰政委的领导下，在司令部建设、战备训练以及部队整编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四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正值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何正文调任太行四分区司令员。开辟四分区的工作十分艰苦，县城、平原地区和交通大道均被国民党军占据，分区指挥机关驻在小岭底丰山坡下，部队的粮食、被服都供应不上。何正文深知，在艰苦的环境中，领导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的重要性。他要求全体干部以身作则，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战胜困难。他把警卫员给他找来的一块床板让给了有病的同志，自己睡在石板上；为了节约粮食，他带头挖野菜充饥。他常和战士们说："从红军长征到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战胜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当前是困难一些，但是只要我们发扬红军精神，我们就一定胜利。"他还制订了两条纪律："部队不许侵占群众利益，领导干部不许搞特殊。"在他的带动

下，部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群众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人民军队的本色，积极支援这支军队，四分区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在兼政委刘毅、副司令员安中原、副政委刘刚的积极配合下，何正文指挥并带领分区四十五、四十六两个团，实施远距离奔袭，一举攻克黄河北岸的温县城，全歼守敌五百余人，击毙国民党温县县长。此次作战，受到了刘、邓首长和邯郸军区的通令嘉奖。五月，何正文指挥四分区部队连续解放了博爱、武陟、修武等县，六月中旬，在友邻的配合下一举攻占沁阳城，共歼敌七百余人。至此，太行四分区地域除焦作外，全部解放，为军区主力部队渡黄河挺进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晋冀鲁豫军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决定由太行军区独立一、二旅及一、四、五分区基干团组成第九纵队，刘、邓首长任命秦基伟为司令员，黄镇为政治委员，何正文为参谋长。为了确保与扩大开始取得的战略主动权，中央军委决定，在山东等战场国民党军主力回援之前，强渡黄河先敌直插鄂豫皖边区实施展开。为了胜利渡过黄河，何正文象每次作战前一样，全力协助秦基伟司令员、黄镇政委，周密细致地组织部队进行渡河准备，他带领参谋人员亲临黄河渡口进行侦察，了解地形、敌情以及水位等情况。八月二十三日晨，他与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带领九纵队，从垣

曲、济源之间，采取偷渡与强渡相给合的手段，渡过黄河，乘胜向陇海路以南的伏牛山区挺进，至三十一日，配合第四纵队相继攻克会兴、新安、洛宁等城，共歼敌四千八百余人，并达成围攻横水态势，威逼洛阳。九日二日，又连克伊川、嵩县等城，牵制了国民党军第五兵团一个师的兵力，保障了军区主力完成潼陕间的作战。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底，九纵部队向伏牛山东麓挺进，何正文协助黄镇政委指挥二十六旅和四纵十三旅，向宝丰、内乡、西峡口等地区疾进，一举收复鲁山、宝丰两城，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两千余人。秦基伟司令员指挥二十四、二十五旅又相继收复了临汝、平顶山等地区。伏牛山东麓战役的胜利，有力地保障了刘、邓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向大别山挺进。至此，第九纵队转至宝丰、叶县一带进行短期整训。一九四八年元旦，何正文从部队检查工作返回宝丰城，他深感刘、邓首长决策的英明，即兴作诗一首《赞跃进大别山》：

东西防御屹如山，
刘邓反击出中原。
劲旅三支掏心脏，
行程千里逼江关。
连天鼓角红旗奋，
动地硝烟豺虎艰。
一役功成全局改，

深谋远虑有谁攀。

一九四八年四月初，九纵、四纵配合华东野战军攻克洛阳后，继而九纵又解放了登（封）、密（县）、荥（阳）地区，歼灭国民党青年军二〇六师一个整编团。九纵二十六旅在巩县地区阻敌作战中，歼灭郑州增援之敌五百余人，活捉了敌团长冉苍。四月二十日，为调动平汉路之敌，以利陈（毅）粟（裕）兵团南渡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邓首长发出了宛西战役部署。在宛西战役中，九纵担任牵制与打击郑州之敌的任务。五月初，驻郑州国民党军在孙元良的指挥下，出动正规军九个团及四个保安团，在骑兵、炮兵、装甲兵的配合下，向登、密、荥地区进攻。在强敌面前，何正文分析了敌我态势后，积极协助司令员秦基伟研究、策划作战方案，决定以智取胜，诱敌就范后，迅速采取迎头阻击、翼侧攻击、拦腰截击、后尾追击相结合的战术。战斗打响后，九纵部队采取了塔山坚守、杨寨奔袭、荥阳攻坚、登密公路侧击、郭店闻村阻击、芦店截击等战法，将敌围于观音堂地区全部歼灭。九纵巧战十四天，共毙伤国民党军一千八百余人，俘二千七百余人。这一光辉战绩，又一次受到了刘、邓首长的通令嘉奖。嘉奖令指出："九纵在郑州外围牵制敌人配合宛西战役中，十三日以奇兵出击荥阳，将守敌暂编二十六旅新一团（缺一个营）歼灭。十六日又协同地方武装予敌四十七军一二七旅大部以歼灭性打击，毙伤敌七百多人，俘

敌团长以下两千多人，收复登封。此种用歼灭战手段达成完满牵制任务，值得表扬。特电嘉奖。”

宛西战役的胜利，为全歼郑州地区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刘、邓首长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决定发起郑州战役。集中了一、三、四、九纵队和友邻军区部队及地方武装围歼郑州国民党守军。何正文积极为秦基伟司令员和李成芳政委当好参谋。九纵队在郑州以北地区担任断敌退路和阻敌增援的任务，于二十一日拂晓前进至城西北及其以西的须水镇、兰寨和大李寨地区。战役发起后，郑州国民党守军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向北逃窜，进入了九纵的伏击圈。二十二日十五时，九纵向被围之国民党军发起全面攻击，何正文一面协助秦基伟司令员指挥部队作战，一面组织司令部全面掌握战斗发展情况，及时调整部署，修正作战计划。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一小时后，国民党军全线撤退，九纵乘胜追击，迅猛实施分割包围，战至十七时三十分，全歼北逃之国民党军一万余人。在同年十一月至翌年一月的淮海战役中，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李成芳和参谋长何正文共同带领九纵，积极配合二野三纵等兄弟部队作战，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于十一月十五日，一举攻占了战略枢纽宿县，歼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交警总队共一万二千余人，切断了津浦铁路，将刘峙集团分割为南北两大股。

为了粉碎蒋介石“北上解围，拱卫徐州”的企图，彻底歼灭扼守徐州之国民党军，以邓小平政委为书记的总前委决定，以华东野战军主力挟住已被关在徐州的杜聿明集团，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各一部转向南线看住企图北进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集中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华东野战部队的配合下，先吃掉黄维兵团。经过七个昼夜激战，黄维兵团被人民解放军各路纵队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南北宽约七八里地，东西长约十来里地的区域内，南逃北去的道路均被封闭。但是，蜷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黄维兵团，毕竟是经过野战训练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凭借其装备的优势，依托居民地，连日来构筑起大量坚固的野战工事，密如蛛网的交通壕与地堡相联，环形堑壕四周突出部都修起了集团工事，工事前沿设置了大量的地雷、鹿砦、铁丝网等障碍，重要部位还修筑了前伸地堡，并以各种火炮、轻重机枪和步枪组成密集的火力地带。一个仅有七八户人家的小村庄也成了轮齿紧咬的坚固筑垒。善于山地运动战的人民解放军部队，突然转入平原野战攻坚，在战术上经验是不多的。加之，有些同志低估了敌人的防御能力，产生了急躁情绪，使突击部队的攻势一度受阻，阵地上出现了敌我对峙局面。这时，总前委及时发出指示，明确告诫部队：要克服急躁情绪，敌坚守待援，我不易一鼓攻歼，首先攻歼其外围，由外向里层层“剥皮”。为了贯彻总前委的决心，何正文全力配合秦基伟司令员和李

成芳政委。他深入第一线了解敌情，指导部队进行作战准备，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情况，为纵队党委制定决心提供了可靠依据。九纵首长决心先拿黄维兵团的防御要点小张庄开刀，再从小张庄逐步向双堆集层层剥皮。小张庄位于双堆集东北角约四公里处，全村仅七八户人家，却驻守着国民党军一个团，环村一百五十多米内，构筑了三层工事、障碍，地堡密集，沟壕交错，火力层层，犹如开阔地上的一只“火刺猬”。十一月二十九日，九纵二十七旅八十一团曾一度突破小张庄的外围防线，但终因守敌火力过猛，无法继续进攻。该团一连机枪班长牛孟连和两名战士冲到敌鹿砦前，既攻不上去，又撤不下来，在敌炮火下被迫进行土工作业。最初只是挖个卧射掩体，后又加工成跪射掩体，逐步又加工成了立射掩体，随之又把几个掩体联接起来，形成了隐蔽自己、消灭敌人的工事。何正文及时组织总结了这一成功经验，纵队首长决定在各攻击部队推广。战士们利用夜暗把堑壕一直挖到了敌工事前沿，与敌展开了“依沟夺沟，依堡夺堡”的战斗，有效地瓦解了敌人的防御力量。十二月一日黄昏，一声号令，九纵攻击部队群炮齐发，勇士们跃出堑壕向小张庄发起猛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小张庄这个“火刺猬”被消灭了，全歼守敌一千多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十二月三日，邓小平政委表扬了九纵创造的作战经验，指示九纵部队再接再厉，进一步活跃战场，坚决歼灭黄维兵团。从此，小张庄门庭若

市了。兄弟部队有的来取经，有的来交流作战经验，还有几个报社的记者也来采访。作为参谋长的何正文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每次他都对大家说：经验是我们的战士们创造的，但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我们坚决贯彻了总前委“防止急躁情绪”、由外向里层层“剥皮”的指示。十二月十五日当夜十二时，不可一世的黄维兵团彻底覆灭了。双堆集战役结束后，九纵又胜利地进行了陈官庄围歼战，为取得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四九年二月的一天，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来到了十一军三十二师，在全师营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大家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同志，这就是新任师长何正文同志。”三十二岁的何正文被任命为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一军三十二师师长。在四月的渡江战役中，他遵照上级首长的部署和决心，在师政委芦南樵、副师长兼参谋长史景班和政治部主任田维新等同志的积极配合下，指挥三十二师于四月二十二日从安庆胜利渡过长江，冒雨追击长江南岸国民党守军，急行军一百三十余里，奔袭三十里山路，翻越武夷山口畏岭，在林泽一带歼敌八百余人，缴轻重机枪三十余挺。五月九日，何正文带领部队乘胜前进，强渡衢江，一举攻占了交通重镇龙游城，毙伤俘国民党军二千余人，缴获汽车二十余辆，大车四千余辆，迫使该城国民党守军安徽军管区中将司令刘瞰率二千余人投降。至此，龙游城获得解放，浙赣铁路被三十二师斩

断。翌日，何正文顾不得征战的劳累，挥师南进，向遂昌城发起猛攻，全歼国民党守军三千五百余人，缴获汽车一百二十余辆，火炮十四门。五月十一日、十二日，又克大港头，解放丽水、云和等城，歼国民党军八百余人，缴获汽车四十余辆，击毙云和城警察局长。五月十三日，何正文率三十二师两个团，向龙泉、景宁追击前进一百三十余里，歼国民党军二〇三师二千余人，一举攻占龙泉、景宁两城。历时二十三天的渡江战役胜利结束了，三十二师北自长江、安庆，南迄浙南之龙泉、景宁，历经两省十三县，行程一千七百余里，主要战斗十五次，取得连克六座县城、俘国民党军安徽军管区中将司令刘瞰以下一万四千余人、缴获汽车二百余辆的辉煌战绩。

一九四九年九月，何正文率三十二师由皖南出发，经浙江、湖北、湖南三省，向大西南挺进。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指战员们的体力消耗很大，部队疲劳，粮弹匮乏，加之地形不熟，给行军带来重重困难。为了胜利完成向大西南进军的光荣任务，何正文号召全师指战员，发扬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困苦和连续作战的精神，提高斗志，增强团结，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消灭最后残存于祖国大陆的国民党军。九月五日，三十二师各部队在师长何正文、政委芦南樵的指挥下，由徽州地区出发，经过十一天六百余里的行军，于十六日胜利到达安庆地区大渡口南岸集结登船，溯江西进。由于乘船准备充分，计划周

密，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援下，顺利地完成了二千一百多里的船运任务。部队在沙市地区登陆后，步行四百余里进至湘西慈利、澧县地区进行战前练兵。十月一日，何正文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发出的响亮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无数革命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而奋斗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仿佛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那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在冉冉升起，仿佛看到威武雄壮的阅兵方队正在通过天安门广场，耳旁仿佛响起了全国人民的欢呼声，他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与全国人民共同分享这一美好的时刻。当天下午，何正文组织各部队举行了宏大的阅兵式。在阅兵式上，他激动地向全师指战员喊出了"打到重庆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部队群情激昂，斗志十分高涨，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打到重庆去！活捉蒋介石！"这声音震撼着大地，也振奋着每一个指战员的心。

十一月四日，何正文率三十二师由慈利地区出发，经大庸、永顺向龙山、来凤攻击前进，于十一日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一举击溃咸丰守军，二十日胜利渡过乌江，连克国民党军第二军、第一〇八军坚守的江口镇、白马场、长坝口等纵深要点，毙伤其官兵一千余人，俘虏一千五百余人。二十七日，何正文指挥三十二师，由南川出发，经观音桥、清和场、五市场等地，向重庆攻击前进。一路上，

三十二师攻击迅猛，国民党守军连连被歼，两天进击歼俘国民党军一一一师副师长林惠民以下四千余人。二十九日，三十二师攻占了长江南岸的海棠溪，俘国民党军四百余人，缴获汽车二百八十余辆。至此，二野三兵团主力控制了西起江津、东至木洞一百余里的长江南岸，威逼重庆。

十一月三十日黄昏，何正文指挥九十五、九十四两个团，冒着蒙蒙细雨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御，一举攻占了重庆西南的杨家坪、磁器口一带有利地形，迅速兵分两路向重庆市区攻击。何正文亲率九十五团猛追猛打直捣重庆市中心区，迫使走投无路的蒋介石于深夜在白市驿机场仓皇登上飞机逃往成都。重庆宣告解放。何正文奉十一军首长命令，带领九十五、九十六两个团担负重庆市的警备任务。这天，陈锡联司令员见到了何正文，他风趣地说："何正文，你到底是四川人啊！跑得可真快，我的汽车轮子都撵不上你。"

刚刚解放的重庆，社会政治情况十分复杂，需要保护的工厂、学校、仓库很多，何正文面临的任务更艰巨、更复杂，他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重要。在入城的当天，他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分析了重庆的形势，要求部队切不可放松警惕，积极协助地方政府和军管会粉碎敌特的破坏和捣乱。他一面组织部队清剿匪特，维护社会秩序，全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一面组织九十四团参加成都战

役。在地下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重庆市的社会秩序逐步走上了安定，市民们开始了正常的生活。十二月二十七日，成都战役也胜利结束了。

三十二师进军西南作战，由于上级的正确指挥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全师指战员克服困难，艰苦作战，翻越了地势险恶的巫山、梅子关、大小崖门等高山峻岭，渡过了水流湍急的乌江、长江等深涧大河，历时八十四天，追击五千余里，连续作战十二次，取得了歼国民党军三万四千余人的重大胜利。

五

一九五〇年二月初，何正文遵照兵团首长指示，率领三十二师赴大竹地区执行剿匪任务，同时兼任大竹军分区的工作，负责清剿大竹、渠县、广安、邻水、垫江、梁山（后改为梁平）六个县境内的土匪，并发动六个县的群众，建立和巩固农村革命政权。何正文出任大竹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高治国兼任分区政委，三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田维新兼任分区副政委。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何正文及三十二师其它领导人与高治国共同领导大竹地区的剿匪清霸斗争。何正文到大竹地区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地区和各县、区、乡建立了剿匪委员会，从三十二师抽调了部分干部战士并吸收地方民兵骨干共四千五百余人，组建

了六个县的独立营和七个公安队，在四十一个区建立起区的武装力量，从而使整个大竹地区的剿匪工作在组织上、军事上都得到了可靠保证。

剿匪斗争全面开始后，何正文指挥三十二师进剿匪患严重的地区。他采取分进合击、远距离奔袭、设伏诱敌、反复搜剿等战术，对匪情猖獗的华莹山、中华山、垫江南等地区的大小百余股土匪给予歼灭性打击，活捉了“六县人民救国军总司令”吕健康、国民党军十二军军长韩春祥和“川湘黔鄂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陈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歼匪三千五百余人。在实施强大军事打击的同时，何正文认真执行刘、邓首长关于要把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全面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组织部队向匪特开展了政治攻势，广泛进行宣传，并发动匪属，分化瓦解匪众，先后迫使匪首曹老儿、蒋忠孝、赵可法、谭其等缴械投降。三十二师经过紧张连续清剿，截止这年九月底，全歼了大竹地区的散匪、股匪共四万二千余人（含九十五团一个营驻酉阳分区的剿匪数）。整个大竹地区六县局势逐渐稳定，社会秩序亦趋正常。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何正文调任川东军区参谋长，在军区首长领导下，继续指挥部队肃清川东一带残匪。一九五二年十月，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军区和西康省军区合并为四川军区，何正文被任命为军区参谋长。

二十年来，何正文始终在前线部队参加作战。在炮火的硝烟中，在与敌人的拚杀中，他渡过了从少年到青年这一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他长大了，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在刘、邓首长的带领下，他从一个穷孩子，当年的“红小鬼”，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他开始成熟了。

一九五五年五月，何正文升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同年一月，他入南京高等军事学院高级系速成班学习，他的老首长刘伯承元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在学习期间，他仍象当年刘师长教导他学文化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每逢节假日，他总是要到学院的图书馆里看书和查找资料，潜心钻研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特点，认真理解教员讲的每一课。经过两年多的刻苦努力，学院党委授予他“优等生”称号，受到了刘伯承院长的嘉奖。

一九五七年七月，何正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继续担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主要负责军区部队的作战、行政管理和后勤工作。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和部队建设，特别是对边防部队的建设和战备工作尤为重视。他每年都要到驻守在川西北高原的康定、茂县、甘孜和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部队检查工作，勘察地形。他冒着高原的冰霜雪雨和风沙烈日，深入到每个分队的驻地问寒问暖，视察工作，有时还到藏族团、彝族团蹲点，实行“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同操作），与少数民族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对部队的战备、训练、行政

管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以及后方勤务保障等，他都给予明确的指导和具体的帮助，他的足迹踏遍了川西北高原的山山水水，对那里的地形、民情及社会等情况都非常熟悉。他常和参谋人员说："当参谋，最重要的是责任心，有了这一条，你就可以把你的大脑变成一张活地图。"何正文在工作中最大的特点是严格和细致。对部队的管理，他十分强调提高部队的内在素质，重视基础训练，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从军人的一举一动、连队的一日生活，到部队的工作、生活秩序和各项战备制度的落实，他都亲自组织司令部拟制落实细则和评定标准。他把部队的作风和纪律性建设看作是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条件，要求部队从一点一滴抓起，平时就要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在日常的生活中培养军人良好的素质和部队优良的战斗作风，在严格的养成教育和训练中，培养和保持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每年新兵补入后，他总要深入部队检查新兵的素质和基础训练以及生活保障等情况。有一次，他到一个团检查新兵训练情况，发现这个团有些连队的战士在训练中无精打采，有的战士体力跟不上。他就深入食堂和班排，了解到有的连队为了赶进度，增大了训练时间，有的食堂因管理不善，伙食搞得不好。他亲自把连队干部找来，耐心地开导他们说："我们教育训练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可不是为了争名得彩，要扎扎实实地按照条令条例管理连队，按大纲规定的内容和时间抓好连队的战备、训

练。”他要求加强食堂的科学管理，搞好连队的农副业生产，让战士们吃好吃饱。他这种深入实际的作风，使在场的几位连队干部很受教育。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三日，因成都军区参谋长茹夫一参加越南顾问团，国防部任命军区副司令员何正文兼任参谋长职务。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肩负两副重担，既要负责全区部队的作战、行管和后勤工作，又要对军区司令部的工作负全责，给军区党委当好参谋。何正文仍象战争年代那样，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待每一项工作，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一九五九年初，西藏地区发生叛乱，四月他陪同军委代表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到昌都地区看望参战部队和当地军民，并检查指导工作。他指挥部队圆满地完成了甘孜、阿坝、昭觉、西昌等地区清剿残匪的任务。

一九六〇年五月，成都军区决定组织检查团深入部队，检查贯彻全军在成都召开的平叛、边防现场会议所做决定的执行情况及上半年工作情况。检查团在军区副司令员何正文的带领下，分别到康定、茂县军分区及重庆等内地军分区检查指导工作。在检查工作的过程中，何正文始终把上级的指示精神与部队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认真了解和检查部队贯彻执行总部现场会议决定的情况。他每到一地，不但认真听取汇报，而且还同下面的同志一道研究分析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帮助部队研究制订贯彻上级指示的措施，解决部队中存在的实际困难。他教育检

查团的同志，要了解到真实情况，为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当“钦差大臣”，要把自己摆进去，要认真倾听下面反映的各种意见。检查团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开展得很活跃，很扎实，通过检查，及时纠正了部队在作战、训练和行政管理、基层建设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使全军平叛、边防现场会的决定在基层进一步得到了贯彻落实。一九六二年十月，何正文协助黄新廷司令员、郭林祥政委参加了指挥对印自卫还击作战。在作战指挥中，他作为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对部队的作战计划、协同动作、后方保障和装备、物资配调等，都做到了周密细致地组织，准确无误地掌握，为取得作战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障。

何正文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经常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教育干部、战士，不论是战争年代里行军打仗，还是和平时期部队的训练，他都特别强调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有一次，他观看部队的战术实兵演习，发现个别单位不注意保护群众的庄稼，他就找到这个单位的领导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要时时爱护群众的利益呀！”这个单位在以后的战术演练中，严守纪律，秋毫无犯，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赞扬。

何正文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十八年。在这十八年中，成都军区换过两任司令员和两任政治委员。不论是哪一任，他都全力配合，主动地向司令员、政委汇报和请示工

作，积极负责地抓好军区部队的全面建设。对军区党委赋予的任务，他十八年如一日，从来不打折扣，不讲价钱，每次都圆满完成，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强的组织性。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浩劫中，何正文蒙受了不白之冤。一小撮“四人帮”的黑干将，对他实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迫害，施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他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遵照刘伯承师长的教导学习文化留下的日记和作战总结，成为他是“知识分子，地主出身的罪证”。由于他长期跟随刘、邓首长南征北战，于是就成了“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黑干将”，是邓小平“太行帮”的“爪牙”。他从红军时期以来珍藏的资料和刘、邓首长的讲话记录，也成为他的“罪证”。他结合自己过去作战的亲身体会，两次给军区团以上干部集训班做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的辅导报告，他还受军区党委的委托到五十四军作报告，并与广大干部一起学习、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由于他没有突出林彪所谓的“政治挂帅”、“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观点，就被诬陷为反林彪的“黑干将”，毒害五十四军的“罪魁”。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来四川视察工作，何正文受军区党委指派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前往机场迎接。在罗瑞卿总长视察期间，何正文根据军区党委安排向罗总长详细汇报了部队平叛、训练和管理教育以及四川武器生产等情况。之后，他又遵照罗总长指示的精

神，结合部队平叛斗争实际，总结了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在解决昌都地区的问题上，他及时传达了新的中央军委的重要指示，强调要分清矛盾性质，告诫部队严格掌握斗争政策，不要出一点乱子就派部队，要求部队切忌动武，让群众真正了解解放军。这些，都使得何正文的“罪行”更加严重了。他被定为贺龙、罗瑞卿在成都军区安插的“钉子”，是受贺、罗旨意准备夺权的“副统帅”。由于他参加过几次总参召开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被诬陷为“要组织二百万民兵到北京去打毛主席”。由于这种种被强加的罪状，这位刚满十五岁就跟着共产党爬雪山过草地、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的党的忠诚战士，便成了“假党员”、“反党反毛主席的黑帮分子”。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一起向何正文袭来，军队的各种造反组织轮番对他进行批斗，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不下二百次。他的家被抄了，家属被赶出了军区大院。他的大女儿何伟还不满十五岁，由于受爸爸的株连而到处受歧视，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何正文被关押后，大女儿要去见爸爸，专案组不让她见，她就不走，整整等了一天一夜没吃没喝，才让她见到爸爸。何正文在关押中看到了这一切，他的心都碎了。他无时不在思考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对吗？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国家的真实情况吗？是不是中央里出了坏人？

何正文渡过了六年的“黑帮”生活。在此期间，他被送到了一个步兵团劳改，每天除了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外，还

要打扫厕所，清扫营院。战士们是理解将军的，在以往的日子里将军与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许多战士默默地帮助将军“劳动改造”，他们经常早早地就把厕所、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当何正文看到这些“见不着面”的战士，在他心底不由地升起了希望之光。何正文在“劳动改造”中，造反派们逼他写刘伯承、邓小平的“黑材料”，他刚正不阿，宁死不从。逼他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他咬牙挺住了。从参加红军的那天起，他就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几十年来，他对党、对毛主席忠贞不渝，为了解放全中国，他出生入死，为了党的事业，他忘我地工作。身处逆境的何正文，唯一的信念就是：“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解放我的。”粉碎“四人帮”后，成都军区为何正文彻底平了反。

六

一九七三年十月，何正文奉命到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帮助工作。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他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部队的作风和纪律严重地存在着松散问题。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在李达副总长的倡议下，总参谋部举办了由全军各大单位参谋长参加的教导队，何正文任队长，孙毅任顾问。在集训中，他认真贯彻邓小平从严治军的思想，一切

按条令办事，不论职务多高，都一律过严格的战士生活。他不仅亲自动员，亲自上课，还带头执行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带头以普遍一兵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这次集训，统一了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明确了全军部队、机关、院校的一日生活制度和作风纪律检查、考核标准，使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有了一个新的起色。一九七九年前，他主要负责全军的军事训练、防化部队建设和外事活动；一九八〇年后，他主要负责全军的体制编制、武器装备、正规化建设和民兵、预备役部队的建设。他认真领会和全面贯彻邓小平主席的建军思想，组织和领导了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工作，较好地完成了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并且，在他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组建了我国第一批预备役师。他根据新时期兵役工作的特点，组织领导了《兵役法》的修改工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四年的艰苦工作，完成了《兵役法》的修订工作，并上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正式颁发实行，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和军队的法制建设。

何正文认为，在工作中出现问题，作为领导者要主动承担责任，不能一味指责下面。他在担任川东军区参谋长不到半年时间，司令部机要处发现丢失电报一百余份。事发后，他深感问题严重，一方面认真组织调查、侦破，一

方面及时向西南军区党委写出检查，并主动承担领导责任。为引起高度重视，西南军区党委决定给予他行政警告处分，并通报全区部队。此案很快被侦破了，原来是机要处一名参谋因对处长有意见，蓄意报复，烧毁电报一百余份，这名参谋被依法惩处了。上级领导要撤销何正文的处分决定，但何正文却说："处分还是不撤的好，这样一来可以使我时时牢记要克尽职守，二来也可以使大家引以为戒。"于是，这一处分，就成了他参加革命军队以后唯一的一次处分。一九八〇年十一月，老兵退伍期间，由于少数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管理松懈，个别老兵在退伍途中违法违纪，有的打架斗殴，有的不守公德，甚至还有的殴打车站工作人员，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影响。问题反映到总参谋部后，负责全军管理教育工作的何正文，首先感到的是自己的工作没有作好，就主动到国务院民政部、铁道部等单位赔礼道歉，检讨自己工作的失误。他的这种不推诿责任、从自我做起的精神，使总参有关业务部门的同志深受教育。

一九八二年五月，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军管理教育工作会议。何正文作为主管全军管理教育工作的副总长，具体组织和领导了这次会议的全部筹备工作。会上，他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这个中心，作了《认真搞好管理教育工作，加速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

建设》的主报告。他在报告中，认真总结了建国以来军队管理教育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经验，分析了当前部队管理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部队管理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会议通过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颁发了《连队管理教育若干规定》。这次会议后，全军掀起了贯彻条令、加强正规化建设的高潮。

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进程中，何正文立足于军队建设实际，从未来战争特点出发，本着"勤俭建军，保障重点"的原则，把有限的军费用在刀刃上，使部队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为了加快军队建设步伐，他多次率领考察团、代表团，出访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十几个国家，引进了适应人民解放军建设特点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增进了我军与外军的了解和友谊。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何正文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巴基斯坦，齐亚·哈克总统授予他"卓越功勋"勋章。这枚象征勇敢和友谊的勋章，凝结着中巴两国人民和军队间的深厚情谊。

一九八五年六月，何正文退到了第二线。他从军队建设的全局出发，认真负责地帮助和带领新任职的同志，他把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经验传授给新任职的同志，充分体现了红军老战士的气度和负责精神。在五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他转战南北，历尽艰辛，跟随刘、邓首长解放了大

半个中国。他把共产主义作为唯一的信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甘为人民的孺子牛。

一九五五年，党和国家授予何正文少将军衔，他同时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当前，将军虽年过古稀，但仍然十分关心军队的建设和国家改革形势的发展，积极出主意，提建议。

何正文曾先后被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第七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白　路）



张　纯　清



张纯清

一

张纯清（1910–1944），又名张文彬，别名刘宗义、张南杰，一九一〇年七月五日（即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西乡梓江东港高基段一个半自耕农家庭。父亲张财裕是一位勤劳忠厚的农民，母亲朱蒲贞是一位善良贤慧的家庭妇女。张纯清兄姐五人，他最小。

张纯清五岁开始在家乡高基段小学念书。十岁进入平江县城基督教会创办的培元学校就读。在其嫡堂兄、平江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培元学校教师张子谋的关心和培育下，在五四爱国运动的熏陶下，他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查禁和烧毁英、日仇货，张贴"毋忘国耻"、"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遭到英国传教士兼培元学校校长贝永寿的威胁。张纯清不畏强暴，继续坚持反帝爱国活动。

一九二二年，张纯清在培元小学毕业。因家境贫穷，无力升学，只得辍学在家，帮助父兄做些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常到附近的小山洞放牧割草。翌年，在张子谋的帮

助下，张纯清进入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半工半读学校就读。这期间，张子谋常给张纯清灌输基督教教义，使张纯清在少年时期就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那时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也曾幻想过要使自己将来成为中国的马丁·路德，打算在中国造成一种基督教的复兴，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以恢复耶稣教的纯洁性。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纯清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罪行，他和修业中学的师生一道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开始接触共产党，阅读了共产党人毛泽东、陈独秀、恽代英等人的文章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他的思想开始从有神论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明白了那些教会都是骗人的，自己最大的遗憾是走上了信奉基督教的邪路。他认识到要解放自己，必须与自己的宗教思想彻底决裂，从宗教的枷锁中摆脱出来。由于他的思想进步，于同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一月，张纯清投入了长沙人民驱逐赵恒惕的斗争。七月，他遵照团组织的决定，组织学生宣传慰劳队，发动人民，欢迎北伐军进入长沙。八月，支援北伐军占领平江。

二

一九二七年春，张纯清被党组织选送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聆听了毛泽东、邓演达、恽代英等人

的亲切教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马日事变”后，党派张纯清回湖南平江组织工农武装。他回到平江后，参加了平江人民声讨许克祥大会，他亲自起草了“平江人民讨许大会敬告民众书”和“平江农民协会讨许宣言”。宣言指出：“我们反对背叛革命、扰乱后方的祸首罪魁许逆克祥。我们为拥护中央党部，拥护国民政府，巩固北伐后方，谋自身解放起见，即集中力量讨伐许逆，讨伐许逆即是我们自存的一条生路，革命前途的一线光明。”宣言号召：“从今后应扩大我们的联合战线，去肃清反动派，由破坏而达于建设，以期革命成功。”宣言还提出了以下响亮口号：“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许克祥！”“农民武装起来！”“肃清反革命派！”

九月，张纯清参加了中共平江县委在献钟罗家洞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平江暴动委员会”，由罗纳川任主任。会后，张纯清组织西乡人民投入县委组织的秋收暴动。他的未婚妻黄喜凤也一同参加了革命（后牺牲）。他们高唱着“梭镖亮光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战歌，于九月二十日进行了第一次攻打平江县城的战斗。这次扑城，因攻城信号失误，未能成功。这时反动的清乡队到西乡梓江一带进行搜捕，张纯清的家被清乡队围得水泄不通，团丁翻箱倒柜，四处搜查。张纯清沉着地把党的文件藏在茅屋内，但身上带的炸弹没

来得及藏，就被团丁给抓住了。张纯清呼叫着要去屙屎，趁机把炸弹扔在粪缸里，走出厕所时，他对哥哥张芷清做了一个手势，示意炸弹丢在粪缸里。敌人走后，张芷清赶紧把炸弹捞起，连同党的文件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当晚反动团丁又来张家搜查，没有查出什么，便将张纯清的哥哥抓去，同张纯清一并关在大段祠堂里，进行严刑拷打。张纯清坚强不屈，严词质问："凭什么毒打我弟兄？！"敌人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又见张纯清年仅十七岁，便从他家敲诈去两百块光洋，具保释放。

张纯清出狱后，与高咏生等以平江西乡杨梅山为据点，建立了一支三十多人枪的游击武装，袭击了驻在梓江的一个"清乡"连，击毙连长一名，缴获子弹两箱，救出了被捕的胞兄张芷清和群众十余人。当晚，张纯清对乡亲们说："敌人是不会甘心的，定会来反攻，愿意到游击队去的就跟我走，不到游击队的赶快躲避起来。不少青年当即参加了游击队。张纯清连夜率部转移到了杨梅山桃子洞。第二天，敌人复转到高基段张纯清家乡，结果扑了空。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共平江县委在嘉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成立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下分五个大队，分驻五个乡。为了加强党对武装暴动的领导，同时成立了五个党的乡特委。张纯清任西乡特委书记。他组织西乡五万农民投入了三月扑城之役。不久，他被委任为平江县委军事部长兼县工农赤卫队党代表。

三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共产党人，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张纯清率领平江县工农游击队的骨干参加了红五军，他任第一大队党代表。八月，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红五军冒着酷暑，从平江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转移。部队行至万载县大桥时，遭到反动军队朱耀华旅的伏击，伤亡很重，第一次上井冈山没有成功。经过整顿，部队编为五个纵队，张纯清任第四纵队党代表。他率部跟随彭德怀、滕代远，采取欲南先北的策略，经过辗转苦战，终于在十二月十一日到达了宁冈新城。这天傍晚时分，张纯清和彭德怀、滕代远、邓萍等红五军主要领导人，由何长工陪同前往红四军军部宁冈新城城隍庙会见了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伍中豪等人。第二天，在新城西门外的旱田里，举行了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的大会。

一九二九年初，湘赣反动派集结军队，“会剿”井冈山根据地。这时红四军主力已向赣南发展，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张纯清和李灿率部守黄洋界哨口。其时正值冰天雪地，张纯清冒着严寒亲临前沿指挥，与战士们一道坚守哨口。敌人几次从正面攻击都被打了下去。最后敌人收买了一个反水农民带路，从山后面的流水小沟摸了上来，切断

了黄洋界。在敌众我寡的严重时刻，张纯清和李灿组织部队解下绑腿，把同志们一个个吊下悬崖陡坡，有的连滚带溜地溜下去，有的不慎摔到深谷里了。张纯清和大家一道割藤编绳，把掉下去的同志抢救出来，一起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后来他们在山下打游击，还截击了敌人的运输队，缴获了汽车，因为没人会开，只好破坏掉。在战斗中，有不少人负了伤，张纯清就亲自给伤员找药、做饭、送茶、送水，还向大家讲述自己在平江暴动失败以后的艰苦战斗经历，鼓舞大家坚持战斗。同年三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回师井冈山，张纯清率部同红五军主力会合。

一九二九年八月，正当湘鄂赣边区群众处在十分困难的时刻，张纯清随彭德怀率部返回湘鄂赣边境。他们于八月八日从永新出发，十日到达莲花，十一日抵萍乡，十四日一举攻克万载县城，八月底，在平江黄金洞、桐木桥地区，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会合，红五军全军达三千多人。彭黄会合后，部队仍编为五个纵队，张纯清任第四纵队党代表。十月一日，红五军攻占平江长寿街。此后，张纯清率第四纵队到湘赣边莲花一带游击。

一九三〇年三月，张纯清随彭德怀率红五军一、三、四纵队从赣南来到湘鄂赣边区，于三月二十三日占领宜春县城，四月攻占万载县城，尔后抵达浏阳东门市。五月三日进驻平江县长寿街，与红五军二、五纵队会合。五月六日红五军五个纵队攻入平江县城，全歼守敌余贤立团。六

月初，红五军军委在大冶刘仁八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五军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共八千余人，由李灿任军长；红五军九千余人，由邓萍任军长，张纯清任党代表。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七月三日，红三军团一举攻克湘北重镇岳阳城，切断了长沙与武汉的水陆交通，敌人十分惊恐。国民党武汉行营忙调长沙的十五师一部、驻咸宁的罗霖部和驻浏阳的钱大钧部，向红三军团进攻。红三军团主动退出岳阳，重返平江。这时，红三军团遵照中共中央命令，决定攻打长沙。张纯清率领部队挥戈直扑晋坑，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招架不住，慌忙撤退，被压缩在古家洞至殷家洞一条狭长地带，经前后夹击，歼敌危宿钟师一个整团，俘敌团长侯鹏飞。危宿钟率残部退守距长沙城一百三十里的金井。红八军沿平（江）长（沙）大道直逼金井，张纯清和邓萍率红五军绕道从左后方包抄金井，对敌军实行夹击，从上午八点激战到中午，终于冲破了敌人在金井的防守阵地。

突破金井后，国民党军集中四个旅的兵力，防守在㮚梨市一带。七月二十七日，张纯清和邓萍率红五军向㮚梨市进发，在七里港与敌刘建绪等部展开激战。张纯清亲自上前线指挥，不幸左腿中弹负伤，警卫员要背他离开战场，他坚持不肯，带伤继续指挥战斗，广大指战员深受感动，冒敌枪弹冲锋，在红八军和湘鄂赣边区各县赤卫队的

全力配合下，二十八日胜利攻克长沙。入城后，张纯清拄着拐杖向被俘的国民军讲话，宣传共产党和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动员他们参加红军。他还深入到人民群众中，组织各种革命团体，并协助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创办了《苏维埃日报》，成立了肃反总司令部，处决了出卖郭亮的叛徒苏先骏，扩大红军四千余人。红三军团这次占领长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四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张纯清参加了毛泽东在袁州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会议批判了立三路线，确定了新的行动方针，决定不再去攻打长沙，也不打南昌，而攻打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吉安。张纯清坚决执行会议决议，跟随彭德怀率部攻下了吉安。

同年冬，张纯清率部进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他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为了消灭气势汹汹的张辉瓒师，张纯清到龙冈前线察看地形，了解敌情，布置埋伏。他把政治工作做到连队的士兵中去，和士兵谈心，跟士兵打成一片。他对干部战士体贴入微，宿营时，他见有的战士被子单薄，便叫这些战士搬到他的住房里去，几个人和他同睡在一张床上，他们有说有笑，胜似兄弟。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

金成立，张纯清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夏，张纯清调任红七军政委。由于红七军前政委葛耀山忠实地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把红七军看成是由军阀部队收编过来的军队，使红七军的许多干部蒙冤受屈，军长李明瑞也被误杀身死，因而部队思想波动很大。在这困难时刻，张纯清深入到干部和士兵中调查研究，果断地停止了逼供信的错误作法，使广大受冤屈的同志得以解脱。张纯清还用军团长彭德怀和红五军也是从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而受到党和人民器重的实际事例来教育大家，很快稳定了军心。

一九三二年，张纯清调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他从红七军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严重损失中得到教训，主张重证据，反对刑讯逼供。对一些重大案件，他总是亲自审理，并坚持向军团党委请示报告。据当时在他身边担任侦察处长的刘复之回忆，张纯清性格温和，处理问题头脑冷静，实事求是，作风民主，是一位很有才干，很受人尊重的领导干部。

一九三三年二月，红一方面军开始第四次反“围剿”。七月，红三军团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张纯清跟随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政委滕代远由广昌地区入闽。这期间，他特别加强了保卫工作，有效地保卫了军团首长的安全。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根据地主力红军开始进行长征。这时，张纯清仍任红三军团保卫局局长。长征中，他

常常自己步行，把马匹让给伤病员骑。他自己常吃草根，把干粮节省下来给伤病员吃。过草地时，一个个的泥潭，不少人倒下去了。张纯清去拉一个战士，自己也陷进泥潭，警卫员去拉他时，他却要警卫员先拉那位战士。

在困难面前，一些人脱离了队伍，被保卫部门抓回。有人主张把这些人一律处死，张纯清不同意这样作。他主张查明原因，分别处置。对为首叛逃分子就地处决；对确系伤、残、病者，或一时思想模糊掉了队的，立即释放归队。他向军团首长建议，在全军团开展坚持革命到底的前途教育。他用一九二八年平江起义后平浏游击队员中，有的经受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逃回家去，被反动派砍了脑袋的实例，教育大家要记取教训，在困难时要看到光明前途，要提高信心和勇气，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不久，张纯清调入红军大学学习。他联系实际，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段学习，使他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央决定组织渡河司令部，指挥渡河东征事宜，任命周士第为渡河司令员，张纯清任政委。二月二十日，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杨宁（朝鲜族）率队首先渡过黄河。杨宁渡河后，在攻打敌碉堡时牺牲。张纯清和周士第随即率领大队人马渡河，他们冲破敌人的碉堡封锁，渡过黄河后，在山西临汾河谷地区战胜了阎锡

山的军队，为促进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作出了贡献。

东渡黄河后不久，张纯清被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

五

一九三六年夏，党派张纯清到西安领导西北地区党组织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在杨虎城身边，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杨的宪兵营营长金闵生，副营长童陆生，都是中共西北特支的成员。张纯清秘密到西安后，由金闵生安排他住在参谋处长王根僧（也是特支成员）家里。王有汽车，出入方便，便于掩护。

张纯清持着毛泽东给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和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的亲笔信，对杨、杜进行统战工作。经过努力，中国共产党同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达成了合作协议，并在杨虎城军队里建立了秘密的红军联络站。这个联络站是红军和西北军之间的秘密通道。联络站设在国民党"剿共"军队军官家属住的一个大院子内。这个院子归西北军宪兵营管。联络站主要是接送干部，凡上海和天津来人到根据地去。都从这里过，陕北来人也从这里过。冯雪峰、丁玲等都是从这里进入根据地的。联络站也负责向瓦窑堡运送物资，起了很大作用。张

纯清经常在联络站工作到深夜，有时还亲自跟车去瓦窑堡护送。

张纯清在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统战工作的同时，他非常重视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救亡团体，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当时西安发生的许多群众性的抗日反蒋活动，都是张纯清亲自指挥或参与策划的。鲁迅逝世后，为了把西安的文化界发动起来，张纯清领导中共西北特支以救国会名义在民众教育馆开大会，悼念鲁迅。国民党省党部的宪兵团不让开追悼会，他就通过救国会联络西安有名望的"八大家"老先生中的四家出来主持此事，以这些老先生署名请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人送挽联，使国民党特务无可奈何。张纯清还亲自担任总指挥，领导西安人民为纪念北平"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这次请愿游行，对张学良、杨虎城决心发动西安事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游行的前一天，张纯清和中共西北特支的同志开会，研究了各路游行群众的集合地点，以及如何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第二天一早，他就到指挥部坐镇。当发生警察打伤小学生激起群众义愤时，他及时引导大家向蒋介石请愿。当时蒋介石正在临潼，一万多人，冲出城门步行往临潼而去。那次游行，规模之大，秩序之好，情绪之悲壮，场面之热烈，都是前所未有的。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和已在西安的张纯清为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

一行乘飞机到达西安时，张纯清早在机场等候迎接，他代表西安地下党组织向周恩来汇报了西安事变发生的情况。在谈判期间，他协助周恩来做了不少具体工作。此后，他在西北军杨虎城那里挂了一个少校秘书的职务，穿上西北军的军服，不仅在西北军中活动，也到东北军那边做工作。一九三七年五月，张纯清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为营救被关在兰州集中营的红军西路军指战员，他亲自到集中营去看望和慰问，还从自己的旅费中节余四十元钱交给他们。经过他的多方努力，终于使被关押的红军西路军指战员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六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张纯清奉中共中央之命，于九月间抵达广州，领导广东等地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不畏艰难险阻，往返广州、香港之间，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年十月，张纯清在香港召开了党的会议，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对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进行整顿，健全了南委各部委及其下属党组织，正式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由他担任南委书记。他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原南方临时工委和广州市临时工委领导人之间闹无原则纠纷。对此，张纯清除在会上严肃提出批评外，还找有关人员个别交谈，告诫他们以党的利益

为重，化除成见，增强团结。

一九三八年四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撤销“南委”，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张纯清被选为省委书记。

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后，张纯清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长江局《猛烈地十倍百倍地发展党组织》的指示，多次督促各地党组织积极贯彻上级决议，大力发展党员。他在基层组织中推行党以往通过知识分子作为桥梁发展党组织的成功经验，使广东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先后建立了中山中心县委、东莞中心县委、南顺工委以及南雄、韶关、惠阳等地中心支部，很多过去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县、市也相继恢复了党的组织。同年八月，张纯清主持召开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为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广东党而斗争”，“为全省发展一万党员而奋斗”的号召。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到同年十月，在广州地区（包括香港）党员人数骤增至二千五百余人，潮梅地区发展到二千余人，琼崖发展到五千人，其余地区也有较大发展。新发展的党员绝大多数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先进分子。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九月，县一级党的组织机构在全省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并分别建立了东南、粤中、东江、西江、北江和南路等特委。

张纯清利用经商谈生意等形式作掩护，在广州、香港等地举办党员训练班，他常到训练班讲课，作形势报告。

他的讲话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针对性强，很受学员欢迎。一九三九年六月，张纯清在对中共特支党员作报告时，了解到参加听报告的有一名女同志与烈士黄励同名。他感慨万千，含泪介绍了上海全国救济总会负责人黄励英勇就义的事迹。黄励因叛徒出卖，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他一字不说，保守了党的机密，临刑前还高呼"共产党万岁"。烈士的革命气节，使在座同志深受教育。

张纯清很重视也很善于做统战工作。他正确分析了当时广东地区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尤以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为首的地方势力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矛盾最为突出。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张纯清和省委同志一道制订了"切实做好建立党的基础工作，团结余（森文）湛（小岑）左（恭）钟（天心）等，并以公开合法名义积极开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方针。为此，他派石辟澜、叶兆南、司马文森、黄新波、郁风等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政治部第三组的上层机关开展工作，他还先后动员了八百多名青年（内有共产党员一百二十名）到该部的政工总队。他还在广大军民和青年中，在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和抗日救亡团体中，做了大量颇有成效的工作。

为了和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取得密切联系，张纯清胆大心细，常到国民党华南地区的高级军事机关中去，与党的地下工作者当时任张发奎机要秘书的左洪涛联系，多次

住在长官部里面。左洪涛担心张纯清的安全，但张纯清却说：“你这里警卫森严，又没有人认识我，反而保险，不会出什么事的。”

由于张纯清为首的广东省委正确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广东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不少群众抗日救亡团体都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广东抗日救亡先锋队、市学联、香港学生赈济会以及潮梅、惠阳、韶关、佛山、南路、西江等地大批群众救亡团体，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领导，实际上是跟着共产党走的。

一九三九年秋，韶关基督教青年会在进步人士李章达、张文的推动下，举办了一个时事讲座，张纯清要党的地下工作者左洪涛去作一次“民主与宪政”的讲演。其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颁布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制造平江惨案，为投降、分裂作准备的严重危急时刻。为了防备国民党反动派的攻击、破坏，张纯清利用张发奎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矛盾，让左洪涛先报告张发奎，取得张发奎的支持，采取先奏后斩的办法，使演讲得以顺利进行，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专制独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团结抗战、违背孙中山总理遗教的种种劣迹，呼吁各界爱国人士敦促国民党政府开放民主，实施宪政，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使讲演得到了广大听众的欢迎和拥护。事后，国民党反动分子攻击左洪涛，但由于事先得到了张发奎的支

持，这些反动分子反而受到张发奎的训斥。

张纯清在进行统战工作中，坚持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一九三八年五月，国民党顽固派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动论调。对此，以张纯清为首的广东省委决定，除在报刊上撰文公开批驳反击外，同时由廖承志出面，在广州永汉路哥伦布酒家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对国民党顽固派所鼓吹的谬论予以驳斥，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方针。事后，党内有些同志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国共团结抗战。张纯清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的错误思想。

一九三九年冬，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严重地危及广东。张纯清针对这股逆流，及时地制定了“政治上的进攻和组织上的保守（密）”的策略。他在省委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在这反共逆流翻滚而起的形势下，全党应“实行组织的转变、群众工作的转变和严密党的组织”，“既要坚持反逆流斗争，又要在斗争中积蓄（我们）力量”。针对当时已变化了的情况，张纯清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余汉谋的政治态度。他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三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对余汉谋不能有过分的幻想。”尔后，他赴重庆中共南方局汇报广东工作时，又再次谈了这个问题，他的这个正确观点得到了周恩来的赞扬。在他的建议下，党及时撤出了在四战区政治部工作的同志，保存了党的骨干力量。

七

张纯清很重视武装斗争。一九三八年四月，在中共广东省委成立时，他就把军事工作问题提到党委议事日程进行讨论，并决定各地党组织必须把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为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省委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张纯清还向党员提出“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号召党员学习《论持久战》和郭化若注释的《孙子兵法》，掌握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张纯清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一九三九年春，他从延安南返时，向中共中央请求并得到批准给广东派来了梁鸿钧、李振亚、谢立全、谢斌、庄田等红军干部。他还把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卢伟良、邬强、陈志强等调到东江纵队。他还派出刘向东、严尚民等党员干部到吴勤领导的“广游二支队”去，把该部改造为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张纯清自己则亲到游击区，详细了解部队和游击区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他对东江纵队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从海陆丰回师东宝，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名义，独立自主地在东、宝、惠敌后作战略展开，并且在太平洋战争一打响又能立即深入港九敌后的经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同时也指出了工作中所发生过的某些缺点，他要求战

术上不要打硬拚的消耗战，执行政策要十分严谨，要防止产生“左”的偏向，运用策略要灵活等。他在离开东江纵队之前再次向干部们指出：在坚持长期抗日自卫斗争中，都必须把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对敌伪，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应该主动地打击之；对顽固派来打“摩擦仗”，我们要坚决自卫反击，在军事上要后发制人，但是在政治上，我们要先声夺人，揭露顽军消极抗战积极内战的罪恶阴谋，大力宣传我军抗日自卫的主张，呼吁人民群众和社会中上层反对内战。为了开展政治攻势，当时印发了好些重要文告和函件。这些文告、函件都是由张纯清亲自主持制订的。他坚持原则，讲究策略，出题目，定主旨，草拟后，又同胡绳、黎澍、肖敏颂等字斟句酌，仔细推敲，然后他定稿发出。使党的正确主张遂为社会周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一九四〇年六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划分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张纯清任粤北省委书记。同年十月间，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直属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张纯清调任南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与南委书记方方一道领导粤北、粤南、闽西、闽南、潮梅、广西、江西、琼崖、湘南等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斗争。翌年一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各地逮捕、杀害中共干部和抗日群众。在此险恶的环境中，张纯清与方方等迅速组建南委领导机

关，建立南方电台中心，保持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同时，他们派出干部分别到闽南、闽西、潮梅、粤北、江西、桂林地区，加强党的领导。他对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提出要求，要他们坚决执行中共中央规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工作方针。他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把党的组织由原来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采取单线联系，党员实行社会职业化，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他深入到海南、东江抗日游击队，具体指导游击队的工作。为了统一东江、珠江敌后武装斗争的领导，他代表南委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并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同时对部队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整编。这时，日本侵略者施展一套狠毒狡猾的诡计，继续拼凑兵力对付八路军、新四军，疯狂“扫荡”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而对正面战场，则暂时停止对蒋介石的进攻，并且企图拉蒋、汪合流。国民党顽固派也纷纷卷土重来，调派一八七师到惠州，纠合保八团、挺六纵队和四个支队共约七八千人，准备向抗日根据地进攻。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又放出“收编”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和“反攻香港”烟幕。在这严重困难的关头，张纯清同部队领导一起召开了较大规模的干部会议，进行抗日反顽斗争的动员。他在动员会上号召大家一定要“紧握枪杆子，坚持抗日反顽斗争”。其时，有些好心的朋友，曾建议除了保留一支精干的队伍在战区内与敌

周旋外，可将大多数武装人员暂时疏散，把武器埋藏起来，待到形势好转时，再把队伍集结武装起来。张纯清批评了这个错误意见，同时他又耐心地解释中央一贯的指示，表示继续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紧握枪杆子，既要针锋相对，又要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告诫大家：干部要在武装斗争中保存和成长，形势要靠斗争胜利来转变，队伍要在战斗中锻炼和壮大，一定要从积极奋斗中去求得生存和发展。当时有人认为顽军强而我军弱，活动地区又狭小，难同顽军周旋。张纯清举出他在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东江情况时毛泽东主席曾说的一番话：惠东宝游击区的范围不能说小了，比井冈山开始时还要大。他分析了东江地区的有利条件后，断言：“熬过困难就是胜利”，“熬过困难就是大发展”。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军事斗争上要机动灵活，要“避其朝锐击其暮归”，要避免硬拚和打消耗战，要多用分散的小型战斗，搞麻雀战、袭扰战、伏击战，以达到扰敌、疲敌、迷敌、诱敌和挫敌的目的。要避开顽军强大进攻的锋芒，找寻其比较孤立和薄弱的部份，集结力量以“雷公打豆腐”的态势，给予严重的打击。

一八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沦陷。其时张纯清带领粤南

省委书记梁广、宣传部长石辟澜等人正在香港。他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同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等一起周密布置抢救知名人士和重要文化人的工作。他们先后在香港、惠阳等地召开香港、东江地方党组织和部队的负责人会议，精心部署，制定了具体可行的抢救方案和措施，经过努力，终于把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等七八百名知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从香港日军的严密控制下抢救出来，安全地护送到大后方，受到中共中央的通电表扬，蜚声海外。

一九四二年五月下旬，张纯清得悉中共江西省委遭破坏的消息，当即同南委书记方方等研究布置机关撤退工作，决定南委机关分头向闽西、东江等地转移。六月初，张纯清向东江方向撤退，途经高陂镇，遇上叛徒郭潜（原南委组织部长）及所带领的特务，张纯清极力反抗，终因寡不敌从，不幸被捕。为了保护其他同志，张纯清当即向周围旁观的同志高声呼叫："请大家注意，有汉奸！反革命逮捕爱国分子！"示意地下党同志迅速离开险境。六月二十日张纯清被特务解押囚禁于江西太和县国民党监狱。

张纯清在狱中立场坚定，严厉驳斥敌人诬蔑共产党的谰言，痛斥劝降的无耻叛徒，明确表示"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始终大义凛然。

张纯清身患肺病，入狱后，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下，病情日益严重。敌人以此要挟他，说什么只要他转变立场，

不但可以获得自由，还可给他治病。张纯清铮铮铁骨，对敌人的威胁和利诱嗤之以鼻，不予理睬。国民党中统局驻赣观察员、特种工作办事处总干事庄祖芳等特务头子挖空心思，多次找张纯清进行所谓谈话，攻心诱降，全都遭到张纯清的严词拒绝。敌人的如意算盘一个个落空了。

张纯清在生命垂危之际，还十分想念党，想念与自己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他与廖承志同关在一所监狱，最后与廖承志见面时，他挣扎着起来对廖说："我现在身体不行了，不能为党继续工作了，心里感到很难过。"又说："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快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将来你出去时，请你将我在狱中的表现转给党中央、毛主席。"他带着脚镣，用嘶哑的声音哼着《国际歌》同廖承志等诀别，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牺牲于狱中。时年仅三十四岁。

狱中人员在检查张纯清的遗物时，发现他生前留下的一封题为"我誓死不能转变"的信。信中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已有四十七岁了（实际年龄应是三十四岁），又犯（患）了严重的肺病，生的时期不多，吃苦也快到尽头，因而更是誓（视）死而（如）归，乐于就义，愿为江西人，尤其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些正气吧！"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五日，廖承志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张文彬同志同我关在一起，他牺牲我是亲眼看到的……广东党能够重新恢复和建立，张文彬同志的功劳很大。”

张纯清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子，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鞠躬尽瘁，功垂千古。他的光辉名字将永远记载在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之中。

（凌　辉）



徐　洪



徐　　洪

一

徐　洪（1904－1935），原名应生，一九〇四年元旦（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四）诞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大洛乡集阳村。家境贫苦，其父徐波连，有弹棉花的手艺，农忙时在地主家作雇工，农闲则走村串户揽活干。母亲陈伴莲操持家务，还纺土纱，织夏布。他们辛勤耕织，仍不得温饱。徐洪在兄妹四人中居长，全家六口，以村头两间茅屋栖身，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

徐洪八岁时，父母节衣缩食，送他入黄狮塘小学启蒙。不到两年，徐波连积劳成疾，一病经年，背着一身债务去世。为料理丧事，仅有的两间破房作了抵押，徐洪也辍学去做放牛娃。陈伴莲无力支撑家庭，五岁的小女儿死于饥饿，她忍痛将七岁的大女儿送人作童养媳，又将小儿子过继给人，自己则改嫁到社港周三贵家。徐洪自幼饱尝家破人亡之苦，从十三岁起，便离乡背井，到百里开外的山区白沙镇学造纸，开始独立谋生，一干就是十年。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攻占湖南，工农运动勃兴。白沙镇成立了纸业工会，徐洪这个在苦难中磨炼成长的硬汉子，参加了工会。由于他工作积极，斗争坚决，不久，经于生灵（纸业工会委员长）和邝昌元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徐洪被派往周洛发展工会组织，带领纸工与槽东进行斗争，迫使槽东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徐洪赢得了工人的信任，十月，他被推选为出席浏阳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参加了县工人纠察队。

一九二七年春，中共浏阳地方委员会书记潘心元领导“除唐驱肖”的斗争，一举收缴了县警备队和全县二十一个团防局的七百多支枪，创建了党领导下新型的武装—浏阳工农义勇队。为了提高这支工农武装的军事素质，徐洪被输送到县军事干部训练班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军训。干训班由黄埔军校毕业生苏先骏任教官，对学员每天施以“三操”、“两讲”的正规训练。时间虽短，但徐洪勤学苦练，掌握了基本的军事技能。五月二十一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浏阳农军奋起进攻长沙，徐洪等干训班学员由大队长彭兰征率领，以二百条枪打前锋，从东屯渡直扑小吴门，与守敌发生激战。因寡不敌众，农军撤回永安镇休整。干训班学员提前毕业，徐洪被调到工农义勇队第三大队（相当于营），担任排长。

九月间，浏阳工农义勇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

三团，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徐洪在白沙作战负伤，又染上山区流行的疟疾，行动十分不便。东门战役受挫，他不愿被战友们抬着撤退，便主动要求离队，寄居平江县庐洞的堂姐夫家休养。不久，他参加了罗纳川领导的平江游击总队，转战在连云山麓。这期间，徐洪曾指派女共产党员廖惠兰打入浏阳周洛联防队，替联防队长朱可奎做佣人，暗中收集情报，并在联防队中发展党员。廖惠兰发展联防队班长肖子桂、士兵戴仲宝入党后，曾多次向徐洪提供武器、药品，还协助游击队救出被捕的同志。

一九二八年三月，徐洪参加平江农军扑城斗争。他利用赶庙会之机，混入城内，与攻城农军里应外合，一度占领县城。不久，平江起义发生，成立了红五军，平江、浏阳两县游击队在北风洞编为红五军第二纵队（纵队长黄公略、党代表张启龙），徐洪担任第五大队（大队长李实行、党代表吴溉之）三中队的中队长。第二纵队活动在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中，开辟了浏东双洞（大光洞、仁和洞）根据地（刘建中任苏区主席）。

这时，国民党在根据地门户沿溪桥驻有周翰团一个连，连长姓侯，外号"猴子"，专门检查和封锁进出根据地的物资。十一月十五日，纵队首长把拔掉这颗"毒钉"的任务交给徐洪。徐洪率第三中队连夜下山，拂晓前趁大雾弥漫攻入肖家祠堂敌连部，毙敌三十余名，缴白马一匹、枪二十九支。当地群众放鞭炮祝捷，编歌谣唱道：

天光枪声响，猴子着了慌，

丢枪二十九，失了白绵羊。

为了扩大新区，黄公略派徐洪率一支武装，去他曾做工多年的白沙打游击。徐洪在黄经岭召集三十余名党员成立了湘赣边特别区委（戴炳生任书记），又组织纸工、农民恢复了工会和农会。徐洪积极贯彻县委关于“建立工农武装、实行抗租抗债”的指示，很快在大围山上燃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烽火。不久，县委调徐洪到地方做军事工作，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去浏北开展武装斗争。

一九二九年二月，徐洪与妻子李英（平江安定桥人，在平江游击队时结婚）化装成织袜工匠，挑着一副手艺担子，寻找失散的同志。当时，北区地主民团残酷“清乡”，留下坚持地下斗争的县委负责人郭起、邵振维、彭兰征等牺牲，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徐洪来到地处深山密林的向坪洞，吸收邢显吾等七人入党，建立了香谷党支部。接着，他又在砖门楼恢复了罗梓铭等二十余人的党籍，并发展王忠昌等入党，建立了淳口党支部。尔后，他还从人烟罕至的炉烟洞，找回失散的党员张正坤、苏劳、周基德、彭庚山等，恢复了北盛、蕉溪的赤色农会，重新播下革命的种子。随着北区革命力量的复兴，县委决定在砰山设立第十八区区委，由徐洪任书记（后罗梓铭接任），还派苏劳、彭庚山在芦渚湾开设“民生”药店，作为地下联络站。

五月下旬，浏阳县第二次党代会在平江小漕泥湾秘密

召开，黄公略、张启龙、刘建中等四十人与会，湘鄂赣特委派王首道出席指导，徐洪在这次会上当选为县委委员。县委把发展游击队作为工作重点，派徐洪组建浏北游击队。

区委没有武器，军用物资仅徐洪腰上的一条皮带。“没有枪怎么打仗？”有些人感到发愁，徐洪眨眨眼，笑着说：“还是老办法，向敌人要嘛！”隔了几天，易俊向徐洪报告，说路口易爱能饭店有四个逃兵，喝得酩酊大醉。徐洪立即带十几个人赶去，夺得四支步枪，武装了游击队。

接着，徐洪决定攻打淳口镇。淳口镇有数十户商家，是恶霸地主朱倜人的老窝，由联防队长陈怀中率一百多条枪守护。早在一九二八年，潘心元率游击队三打淳口镇，均未得手。这次，徐洪利用陈怀中宴请乡间豪绅的机会，带三十多名游击队员潜入地下党员家里，区委还动员了数百名农会骨干在镇外设伏。深夜，游击队员手操大刀杀出，火烧朱氏祠堂。镇外农民呐喊助威，往煤油桶里放鞭炮。敌人从梦中惊醒，争相逃命。游击队缴到三十六支步枪以及朱倜人商号的一些布匹、银元，迅速撤出战斗。不久，游击队又袭击蕉溪镇，击溃守敌一个排，缴枪十余支、子弹一担。接二连三的胜利，震动了北区。陈怀中向县团防总局告急求援，朱倜人远逃长沙惊魂不定。上层人士中，也有与游击队联合的，维新志士谭嗣同的堂侄谭襄泉，便主动将守家护院的九支步枪、一支手枪、一门铜炮

和一部印刷机送给了徐洪。

一九三〇年二月八日，浏阳游击总队第一支队在炉烟洞古桑成立，徐洪代表县委宣布：张正坤为支队长，苏劳为党代表，王震为党支部书记，三个排长分别由陈明堂、鲁保生、朱祝钦担任。这支游击队，后来一部分由王震带领参加主力红军，留下来的成为浏阳赤卫军骨干。

四月十日，徐洪参加了在豆田狮子山仙人庙召开的全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军事部长和赤卫委员会主任。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决定猛烈扩大赤卫军，规定每乡一个连，三乡一个营，每区一个团，全县二十四个区，组建六个赤卫师，担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和维护苏区治安的任务。徐洪任赤卫军副总指挥兼赤六师师长，不久即率部投入了两打长沙、三克浏阳的战斗。

当时，浏阳除县城及几个集镇外，广大农村均为革命武装收复，成为湘鄂赣根据地的主要县份。六月，红六军（后改红三军）在军长黄公略、政委潘心元指挥下，从江西过来攻打浏阳县城。张启龙、徐洪指挥赤卫军参战，一举破城，营救出二百多名被捕的同志，还将富商屯积的食盐，满载两船，运往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高坪。七月下旬，红三军团进攻长沙，徐洪带领数万浏阳农民支前。赤六师配合红八军作战，从东屯渡突破城防阵地，胜利攻占长沙。彭德怀、何长工等红军将领，都对浏阳农军高度赞扬。由于国民党省政府主席何键调兵遣将，拚死反攻，红

三军团撤往浏阳。徐洪率赤六师血战蕉溪岭，再克浏阳县城，为红一、三军团会师扫清了道路。八月中旬，徐洪所部配合红一军团作战，取得了文家市大捷，在高陛岭歼敌戴斗垣旅，缴枪逾两千、子弹十万发，乘胜第三次打下浏阳县城。红一、三军团在永和镇合编红一方面军时，徐洪从赤卫军中挑选了数千名精壮兵员，输入主力红军。

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返江西后，何键坐镇浏阳"督剿"，企图全歼徐洪所部，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徐洪骑着一匹小黄马，带领县总队和赤六师特务营（全师枪支都集中此营）四处转战。不久，敌主力去江西"围剿"红一方面军，守敌在淳口玉皇殿筑有一个大炮楼，扼守在平浏通道上。赤六师特务营三次攻击，前两次都没有成功。守敌居高临下，在炮楼里得意地叫着："有本事就打进来！"徐洪命战士们搬来百多担柴草，采用火攻，炮楼被烧塌了，两个排的守军全部葬身火海。

三打玉皇殿的胜利，吓坏了浏北民团头子张忍、周首生，他们赶紧去县城搬兵。徐洪得知此事，命特务营长张正坤率一个排，在蕉溪岭设伏，击毙了周首生，张忍绕道赶到县城，纠集了八个乡的联防队，会同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团，寻找徐洪决战。徐洪所部只有五百人枪，县委书记左之前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对策。徐洪说："敌人十倍于我，硬拚不行，必须避实就虚，我们要采用引母狼入陷阱的办法，单打张（忍）麻子一部。"十月五日，赤六

师特务营冒雨奔袭泮春，午夜包围了张忍民团。徐洪的三发信号枪响过，战士们杀入敌营，俘敌五十六名，仅张忍漏网。

消息传到长沙，何键大骂部下无用。何键的女婿、第十九师师长李觉不服气，说徐洪“既非讲武堂出身，也非黄埔系毕业，没有了不起的本领”，愿出兵将他“活捉到案”。徐洪侦知李觉派先头团从平江开赴周洛，决定趁其立足未稳，连夜偷袭。十月十四日晚，徐洪挑选了六十名精壮战士，手执大刀，腰揣炸弹，摸进敌团部。敌团长见营地着火，杀声震天，领少数人逃脱。当各营赶来援救团部时，徐洪已与战友们带着战利品远走高飞了。

李觉出师受挫，大失体面，将师部移至泮春，命先头团加紧推进。徐洪获悉敌人将从周洛开往关山，决定利用有利地形，沿途设伏。十二月三日，敌先头团的三个营陆续沿大路走来，特务营实力不够，只能断其一臂。可是，战士们吃干粮，喝凉水，苦苦等待了一昼夜，见敌先头部队出现，有些人急于要打。徐洪严厉下令：“没有命令不许开枪！”直至敌主力过完，他决定咬住敌人一个后卫营，并对准骑白马的军官发了第一枪。霎时，枪声大作，号音震荡，敌军丢盔弃甲，死伤惨重。待敌前卫部队掉头回援时，特务营又无影无踪了。

连战皆输，何键只得将李觉调回长沙，又派刘建绪任平（江）浏（阳）绥靖处主任，继续进剿。可是，刘建绪

对徐洪同样无可奈何。根据地群众高兴极了，都称徐洪为“齐天大圣”。

二

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中共湘鄂赣省委作出决定，将各县枪支集中起来，统一编为三个独立师。浏阳、宜春、万载、萍乡的警卫营和特务营合编为湘鄂赣独立第一师，辖两个团共一千人枪，师长邱金生，徐洪任政委。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徐洪向湘鄂赣省军区提出了“打到外线去，飞袭永安镇”的作战方案。永安距长沙仅六十里，驻有敌彭位仁师一个营，沿途设有重兵。徐洪率张正坤团轻装奔袭，从江西万载的高村出发，绕开大路，翻山越岭，两天赶到芦渚湾，隐蔽休息，五月二日拂晓发起攻击，部队从南北两端打进永安镇。敌营长没想到红军会象天兵天将一样降落在省城附近，慌忙打电话求援。可是，电线早被剪断，只得带着少数残兵突围。此役，独一师从敌人仓库里缴到万元军饷和大量军装，满载而归。撤退时，徐洪派一个营佯攻长沙，何键不知虚实，急忙调兵保长沙。徐洪却命令部队用战利品化装成国民党军，大摇大摆走大路返回根据地。独一师这个军事行动，震惊了长沙守敌，第二天，省城《国民日报》惊呼：“平浏赤匪昨由北盛仓窜入永安，省城戒严。”

湘鄂赣省军区举行了祝捷大会，军区首长表扬说："独一师象架飞机，一下飞到长沙城外，吓得何键丢魂落魄，害怕再次丢掉长沙。"

六月上旬，何键令陈光中师进剿浏阳，独一师又胜利地进行了官渡之战。官渡是浏东重镇，有一个营敌军驻守，士兵的枪托上都刻着："陈光中师长谕：消灭共匪，不成功则成仁！"入夜，独一师悄悄运动到官渡镇外，徐洪派人摸掉桥头敌哨兵，挥舞白毛巾招呼部队进镇。战斗打响后，敌军措手不及，顾不上穿衣服，满街乱跑，有的慌不择路，跳入浏阳河中。敌营长既没成功，也没成仁，而是乖乖做了俘虏。

九月初，徐洪率独一师参加黄坊战役。当时，驻修水之敌第三十二旅进犯查津，独一、二师设伏于黄坊山区，歼敌两个团及一个保安营，缴枪四百多支，俘虏三百余人。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为此印发了胜利捷报，徐洪及独一师指战员受到通令嘉奖。

九月二十三日，徐洪满载胜利硕果，赴平江长寿街参加湘鄂赣省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选出了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湘鄂赣苏区代表团，由刘建中任团长，徐洪任副团长。代表团由张正坤率武装护送至湘赣根据地，与湘赣代表团（袁德生任团长、王震任副团长）一道抵达红色首都瑞金。次年初返回，徐洪被增选为中共湘鄂赣省委委员。

一九三二年春，独一师在排埠作战，抓了几十个俘虏，其中有两个名叫李浩、陈琳，他们害怕被杀掉。徐洪和蔼地问了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当兵经历，要他们各领七块光洋回家去。李浩、陈琳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当徐洪把光洋放到他们手里时，都泪流满面。可是，事隔不久，他们又被俘虏，躲在俘虏群里不肯与徐洪见面。徐洪知道他们是开释后又被抓回来的，安慰他们说："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是红军的一贯政策，你们放下了武器，这次想回去照发路费。"过了一段时期，独一师与敌军接火，敌人阵营不战自乱，有十几个士兵拖枪投诚，为首的正是李浩、陈琳。他们当红军后，作战勇敢，先后提拔为连长。原来有些轻视俘虏政策的指战员，看到徐政委的"菩萨心肠"起作用了，也改变了自己的错误看法。后来，李浩在保卫浏东根据地的战斗中牺牲，徐洪命令抢回他的遗体，举行了葬礼。陈琳在江西奉新县作战阵亡，徐洪十分悲恸，派人给他的家属送去抚恤金。

三月上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来信，批评湘鄂赣省委右倾，并派林瑞笙率中央代表团来改造湘鄂赣省委。徐洪虽是临时省委成员，并不赞成"肃反"扩大化。当时，红十六军在排埠打了一个大胜仗（独一师参加），可是，军长孔荷宠却在河洲上集合队伍，拉出一批"AB 团"分子枪毙。徐洪劝阻无效，就对孔说："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生活这么苦，很少有怨言。部队日夜行军，一走就是几百

里，也很少有人开小差、当逃兵，打起仗来，个个冲锋向前，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照样冲，如果我们内部有这么多‘AB团’，能做得到吗？”由于徐洪的抵制，“肃反”期间，除省军区和保卫局指名要走了师政治部主任陶然、宣传部长陈韶两人外，独一师未杀一个官兵。当年独一师的干部李信、熊晃、黎东汉等忆及徐洪，都怀念地说：“我们的命是徐洪保出来的。”

徐洪十分重视军民关系，他常对指战员说：“红军脱离了群众，就寸步难行。”这年秋天，部队从江西返回，前卫在枫林铺打坏农民一口水缸，没有赔钱，他立即传令全师引以为戒。他发现这里被白军抢过，要求部队每日两粥一饭，节约粮食送给当地群众。徐洪对部属亦十分爱护，官兵关系融洽。师部传命兵陈鑫患病，徐洪给他买药，少年先锋营政委徐晃得了疟疾，徐洪为他请医生。这种新型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是独一师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

三

一九三三年初，湘鄂赣省为了配合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发出《关于成立红六军团告全省工农劳苦群众书》。浏阳县党团组织积极响应，也发出《为拥护红六军团庆祝成立十八军告全县工农劳苦群

众书》。告群众书明确提出："以独立一、二师编为十八军。"二月十日，湘鄂赣省在浏东小河乡田心圩，召开了红十八军成立大会。会场布置在清溪湾牛形下的山坳上，搭了一个台子，两边挂着"扩大百万铁的红军"和"庆祝红十八军成立"的大标语。台上坐着湘鄂赣省委和军区的负责人，三千名着灰布军衣的战士列在台下。当地群众敲锣打鼓，热烈祝贺。红十八军辖三个团，由湘鄂赣省军区副总指挥严图阁兼任军长，徐洪被任命为该军政委。因严图阁常在军区，徐洪随军亦代行军长之职。

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湘鄂赣军区集中红军主力打阵地战和攻坚战。三月十九日，红十六军、红十八军和鄂东南红三师汇集高村，开始四面出击。徐洪认为红十八军刚由地方武装升编，只擅长游击战，要求留在平浏边界活动，但遭到孔荷宠（军区司令员）的拒绝。徐洪率部进入江西后，避实就虚，打下上高县城，杀掉反动县长，又挥师攻破奉新县城，歼灭民团武装。可是，军区认为敌第七十七师罗霖部对根据地威胁大，调红十八军强攻宜丰县港口。守敌一个团，布防严密，使红十八军打得相当艰巨，发起总攻后，红一五四团团长潘益霜即阵亡。徐洪下令用机枪压住敌人火力，攻破敌阵地一角，厮杀到夜幕降临，敌军害怕短兵相接的夜战，被迫撤走。

红十八军在根据地的东南部虽然初有小胜，但并没有解除敌军对根据地腹地的威胁。当时，湘鄂赣省委和军区

都设在万载县小源，国民党军队向小源不断发动重点进攻。红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保卫着根据地的每一寸土地。四月间，敌第十六师彭位仁部一个旅（旅长陈铁侠）进至小源十五里外的株木桥构筑阵地，形势十分严重。红十六、十八军和红三师接到省军区命令，星夜驰援，会战于株木桥。敌我双方鏖战两天一夜，敌人援兵即至，红十八军奉命打援，阻挡住敌军进攻，使主力红军取得了歼敌千名的胜利。虽然拔除了敌军在株木桥的据点，但是，附近还有敌第六十二师陶广部一个营，控制着出入小源的交通要道小洞。于是，徐洪立即命令张正坤率红一五六团冒雨奔袭。完成包围部署后，徐洪挑选百名精壮战士，组成夜袭队，每人一把大刀一支枪，四个手榴弹，绕过碉堡，趁黑摸进敌营部。敌人没有料到红军来得这么快，很多敌人做了刀下之鬼，小洞敌据点被拔除。

小源的威胁暂时解除了，红军转入根据地东线作战。六月十二日，徐洪率红十八军协同红十六军作战，进攻铜鼓。这一带原是独一师的游击区，徐洪熟悉地形。他建议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先佯攻排埠，调动铜鼓援敌出城。军长严图阁出身行伍，自宁都起义以来一直担任红军军事指挥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极力支持徐洪的建议。军区前线指挥部决定红十六军打援，红十八军进攻排埠。徐洪率部先克守备较弱的丰田，歼敌一个营又一个连，接着又将兵力向排埠展开，终于调动了铜鼓之敌闯入红十六军

设伏的鹅公山阵地，受到痛歼。

此时，湘鄂赣省委正在小源召开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接受中央来电，改造省委领导。还决定遵照中革军委电令，分别将红十六、十八军改为红六军团的第十六、十八师，并将红十八师由湘鄂赣调湘赣，协同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十七师作战，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因严图阁留湘鄂赣省军区任参谋长，徐洪身兼师长、政委等职，于十月底率部抵井冈山麓，在永新县城与红十七师会合。

十一月初，湘敌刘建绪部大举进犯湘赣根据地，红十七、十八师迂回敌后，在茶陵梅花山歼敌千名，又趁隙赶到潞田地区，重创敌第七十七师罗霖部一个团，俘团长以下六百余人。从湘鄂赣到湘赣，红十八师作战经年，损耗很大，仅有兵员千人，压缩为第五十二团，此后，又在茶陵将地方武装升编，补充了第五十三团。湘赣省军区（当时未成立红六军团指挥机关）为加强红十八师的领导，调甘泗淇担任师政委，徐洪仍为师长。

一九三四年初，红十七师沿湘赣边北上，准备同红十六师一道，破坏南浔铁路，截断敌人对中央根据地“围剿”的运输线。红十八师奉命保卫湘赣根据地，与来犯永新（湘赣省委所在地）的敌第十五师王东原部展开激战，在柞源山和葡萄岭给敌以很大杀伤。由于敌众我寡，二月七日，永新县城失守，省委机关由红军学校和军区警卫部队

掩护，退入象形山区。徐洪率部继续与敌周旋，在花溪、黄江、龙源口等地打击敌人。

四月四日，红十八师在沙市、里田击溃敌一个团，追至永新城郊东瓜岭。敌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的悍将侯鹏飞，指挥一个旅突然杀出，将徐洪所部包围。敌我兵力悬殊，师政委甘泗淇又负重伤，形势十分严重。徐洪指挥部队相持到天黑，打算突围。恰逢红十七师返回根据地，两师配合，里外夹击，侯鹏飞压不住阵脚，混在溃军中准备逃走，但已来不及了，便跳下水塘，企图杀身“成仁”，被红军战士生俘。红军一鼓作气，乘胜收复永新。

四

永新战役后，党内某些“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丢失永新的主要原因，是徐洪的“游击习气”，违反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法，应送红军学校接受“正规训练”。实际上，这是将徐洪免职。一九三四年五月，徐洪独自背着背包，默默告别部队，东渡赣江。由于受到“左”倾路线排斥，他在瑞金红军学校，名为学习提高，实为反省检讨。尽管前方战事频繁，他要求重上战场，但被视为“思想右倾”，不予安排。十月上旬，红一方面红军准备突围长征，红军学校师生编为干部团随军出发。此时，徐洪才得以解脱，留在根据地降级使用。

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根据地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留下的部队是红二十四师及五个刚组建的独立团。徐洪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立即向中央分局报到，被分配去独三团担任团长。

蒋介石对江西根据地反复“清剿”，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杀光、抢光、烧光）政策。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的部队承受着数十倍于己的军事压力，打得异常艰苦。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分局要求各部分散突围，到粤赣、闽赣和湘赣边境开辟游击区。三月上旬，周建屏率红二十四师从于都向南突围，进入信丰、安远地区，沿途遭敌攻击，伤亡严重，随军行动的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中弹牺牲。徐洪接到中央分局的电令，与团政委张凯率独三团北上接应。行至赣江上游的信丰江口，独三团与敌遭遇，徐洪当机立断，与张凯分兵，自己率少量兵力留下来阻击敌军，掩护张凯等突围，去完成接应红二十四师的任务。

两军接火后，附近的国民党警备队、挨户团闻讯赶来。徐洪为了拖住敌人，没有立即组织突围，他且战且走，向相反的方向撤退。从早晨打到中午，徐洪等子弹耗尽，仍无法甩开追兵。身边的战士都倒下去了，徐洪已无法走脱，他不忍被俘受辱，用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的头部，壮烈牺牲。几天以后，张凯率独三团在安远与红二十四师余部会合，一起转移到粤赣边境，与广东兴宁特委书记罗屏汉领导的游击队取得联系，成立粤赣边区军政委员

会，统一领导武装斗争。徐洪未竟的重任，在他的战友们那里得到实现。

王震将军忆及徐洪，感慨地说："写红六军团战史，要把徐洪写进去。在湘鄂赣，他的威信很高。后来到湘赣，他仍是红十八师的师长，打侯鹏飞时还是师长，红十八师的领导人应该写徐洪。"徐洪牺牲时三十一岁，他为中华苏维埃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战争是要死人的，我们准备用千千万万个同志的生命去换取胜利。我们这一代人，就要随时准备牺牲。"他的一生，他的家庭，都无私地献出来了。徐洪的爱人李英，留在湘鄂赣根据地红军被服厂工作，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他们有三个孩子，因战斗繁忙无暇照看，留给老乡寄养，后因徐洪、李英牺牲，下落不明。解放初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晏福生派人四处查找，仍未找到。徐洪和他的一家，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了一切，将永远为人民所铭记。

（曾 长 秋）



高 厚 良



高　厚　良

一

高厚良（1915—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箭厂河乡肖家洼村（今属河南省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五口人，上有父母亲，下有弟弟妹妹，地无一亩，有房两间，自幼家境贫寒。父亲高仁德，忠厚老实，勤劳俭朴，以种田谋生，为了全家糊口，租祖田二斗，因收获微薄，去掉交租，家里经常缺食少衣，生活极端困难。母亲吴桂姐，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农家妇女，为了生活，她不仅下田能种地，而且还练就一双做针线活的巧手。高厚良六岁丧父后，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母亲的肩上，靠母亲种田和为别人家做针线活换些食物来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很艰难。母亲原本想节衣缩食，尽力多给别人作些针线活，好供高厚良上私塾念书，期望儿子能识几个字，会记账，好谋个职业。由于父亲的突然病逝，高厚良不仅读不成书，就连吃饭也上顿不接下顿，断炊之事经常发生。无奈，母亲只好改变主意，把他

送到生活也不宽裕的外祖母家寄养。他到外祖母家，放牛，锄草，拾粪，做家务活，样样都干，直到苏维埃政府给他家分了三斗田，他才回到家里，同母亲、弟弟一块下田干活，总算有饭吃了。父亲去世不久，他的三岁妹妹因出天花无钱医治也死去了。这种家庭的生活环境和父、母亲的恩育，特别是母亲的深情，在幼小的高厚良的心灵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从内心深深怀着对母亲的尊敬和爱戴。他也萌发了对苦难深重的劳动人民以极大的同情感。

高厚良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我国民主革命的高潮时期，他就是在这高潮中投身革命活动的。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风暴此起彼伏，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但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和农村。于是，高厚良的家乡湖北黄安檀树岗箭厂河及河南光山的柴山保地区，便成了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根据地。湖北是革命极为发达的省份之一，这里有最早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活动的董必武，一九二六年又有了曹学楷、吴焕先、戴克敏、戴季英、郑位三等领导的农民运动，而且又是黄麻暴动时的根据地，有一个非常好的群众基础。因此，这里的群众革命情绪很高，农民协会、赤卫队、农民自卫军相继应运而生，红军游击队不断袭击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杀反动官吏，打土豪，分田地，高厚良的家也分得了三斗田。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使高厚良和他的母亲认识到共产党好。共

产党的这种影响，在童年高厚良的脑海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高厚良从外祖母家回来不久，就参加了儿童团（亦称“童子团”），担任了中队长、大队长，经常开会，参加革命活动，扛着比他高出一大节的梭镖、红缨枪，带领童子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和参加斗争地主等活动。在叔父高明德（共产党员）和舅父吴维典（共产党员）的教育下，他进步很快，开始懂得了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地主阶级，才能翻身得解放的革命道理。由于他参加革命活动积极，在一九二八年冬，经高明德、汪世金介绍，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九年，高厚良在苏维埃政府办的杨家畈小学上了几个月的学。这年冬天，他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经姨父戴先棣介绍，到黄安县檀树岗戴先棣姐夫家开的中药铺当学徒，扫地、烧水、端茶、倒尿盆、碾药、早晚上下门板，侍候人的活样样都干。从那时起，高厚良就离开了他的母亲和弟弟，开始了独立生活，同时也是他开始接触社会，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当时，他认识了在檀树岗进行革命活动的程绍岳。一九三〇年夏，他即参加了由程绍岳在檀树岗办的鄂豫皖省苏维埃合作社，当学徒，除扫地、烧水、泡茶外，还跟着别人学站柜台。由于合作社是党领导的公办事业，所以他也不断地参加一些革命活动，直接受到中共黄安县紫云区区委书记袁克服的教育和影响。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日，红军攻克了反动地主武装盘踞的坚固据点光山县新集（今河南省新县），高厚良跟随程绍岳一起调到了新集，继续在鄂豫皖省苏维埃办的合作社工作

一九三二年二月到六月，高厚良被调到省财政部办的训练班学习业务。此时正值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围剿”，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提出了“扩大红军”的口号，动员群众参加红军。高厚良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保卫根据地，保卫分得的土地和胜利果实，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他在新集省财政部训练班学习未完，连自己的母亲也未来得及告别，就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实现了他早已深藏在心底的当一名红军战士的愿望。当时，只有十六岁的高厚良，即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二

高厚良参加红军后，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经理处交通排当传令兵，为领导同志站岗、放哨、送信、传达命令。当时总经理处主任是吴先保。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到了陕西子午镇，高厚良被调到七十三师二一九团二营，在营长汪乃贵身边当传令兵。部队到四川后又改编为十师二

十九团，他在团长徐士奎、政委杜义德的下属当兵。

刚刚参加红军不久的高厚良，参加了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四川的战略转移。这对他来说，首先是战胜家乡观念和家庭观念的束缚，同时也使他经受了第一次长途行军的疲劳、饥饿、寒冷和激烈战斗的严峻考验。部队从钟家沟出发，翻过终年积雪的大巴山到达了四川的两河口。大巴山，人烟稀少，山高林密，杂草丛生，尽是羊肠小道，时有风雪袭击。瘦小的高厚良除了要跟上队伍行军，他还要背上一捆草，用以睡觉铺垫，烧火取暖，遇上泥泞路也靠它垫路。历经长途跋涉之苦，他的脚打了血泡，脚后跟溃烂了，走不了路，班长姚保民就替他扛着枪，舅父吴维典背着他过汉水，营长汪乃贵把自己身上的一件大红袄脱下来给他穿上，他就是这样跟着红军老战士艰难地渡过汉水，翻越了大巴山，终于到达川陕根据地。后来，每当他回忆起这段艰难的历程时总说："我们这些红小鬼，是拽着首长的马尾巴走过来的，是靠战友帮助走过来的。"从那时起直至今日，他始终念念不忘营长汪乃贵、班长姚保民、舅父吴维典等一批红军老战士的的阶级友爱之情，正是有了这些人做榜样，才激励着他为革命忘我地战斗。

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到达四川后，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个县，很快创建了通南巴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三年二月至六月，高厚良参加了粉碎四川军阀、川陕边区

"剿匪"督办田颂尧等企图把红军赶出四川的"三路围攻"。敌人的"三路围攻"被粉碎后，红军迅速扩大，一个师扩为一个军。同年秋，高厚良所在的二十九团改为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在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的领导下行军作战。一九三三年九月，高厚良由营政委金本原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他头天晚上刚转为党员，第二天就被分配到二六五团二营担任连指导员。当时他去的那个连，除公务员比他年龄小外，其他干部战士都比他年纪大。他担任指导员三个多月后，被党组织送到红四方面军教导队学习了三个月，直接受到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兼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的教育和影响，由于他在教导队学习刻苦认真，又是从战斗部队来的，担任过指导员，学习期满后，就被留在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任党务委员，在傅钟副主任手下工作。

一九三四年，高厚良又被选送到红四方面军教导大队学习。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万源保卫战及反"六路围攻"，在坚守万源附近之毛儿顶阵地时，他担任了保卫总指挥部的任务。战后，他又到巴中清江渡红军大学学习了两个月。

一九三五年一月，高厚良在红军大学结业后，被调任川陕省少年先锋队总指挥部指导员，同时担任少共省委书记。六月，他又被调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交通队副队长。张国焘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交通队是担任张

国焘的通信、警卫任务的。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胜利会师后，在两河口高厚良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使他受到很大鼓舞。这时，张国焘出任红军总政委，担任警卫任务的交通队即改为军委通信营第二连，高厚良任二连指导员。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中旬，高厚良参加了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战役。第一次过草地到了阿坝，他染上了伤寒病，因部队缺医少药，还要整天行军、打仗，所以，部队南下时，只好把他留在阿坝。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的夫人曾广兰看到这位瘦弱的红小鬼，便伸出了阶级友爱之手，日夜守护着他，给他喂水、喂饭，照料他。一个多月过去了，高厚良的病痊愈了。他告别了曾广兰，南下追赶自己的部队，在丹巴找到了红军总司令部。从那时起，他就在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一科当参谋，经常出没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的面前。他在红军总司令部任参谋期间，一九三六年五月，又离职到炉霍红军大学学习，经常聆听朱德总司令讲课。当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北上同红一、二方面军大会师后，他又回到了红军总司令部当参谋。红军到了保安，总司令部与中央军委会合，高厚良调任中央军委一局一科参谋，直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他进延安抗大学习。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这五年间，是高厚良军事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他经历了许多战役战斗的考

验，经历了长征的考验，经历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考验，正是在这些严峻的考验中他坚定地跟着党，跟着红军走，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更使他感怀难忘的，是他在红军总司令部工作期间，直接受到了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培养和教育，他们的正派作风，俭朴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他参加延安抗大学习之后，不仅使他对张国焘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且还学到了许多党的基本原则和知识，他的马列主义思想觉悟有了提高，从而更加坚定了他跟着毛主席跟着党中央革命到底的决心。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努力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此时，刚从延安抗大学习结业回来的高厚良，于一九三七年八月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跟着部队奔赴抗日战场。初次作侦察参谋，他就大胆地深入日军占领区搞侦察工作，为团首长提供敌人的情报。他所在团，团长是徐深吉，政委是张南生，后任政委吴富善。他本是红军总司令部的参谋，经抗大学习后，分到团里当参谋，对此他毫不计较，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分配。

战争年代作一个侦察参谋，是要具备很多条件的，勇

敢，不怕死，机智灵活，有较强的侦察、分析和判断能力，侦察来的情况要迅速、准确，能为领导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正因为高厚良具备了这些条件，加之他当团侦察参谋时任务完成得好，于一九三八年三月被调任三八六旅司令部侦察股长，在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参谋长李聚奎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受到了他们的教育和影响。高厚良在担任三八六旅侦察股长期间，置生死于不顾，经常出没在日伪军占领区，沿着铁路线活动，在地方党组织的掩护下，进行侦察工作，为旅首长制定作战计划、实施正确指挥起了重要作用。陈赓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许多高厚良与同伴们侦察活动的情况，其中，多次提到高厚良。《陈赓日记》（1938）有几处是这样写的：

七月二日："派高厚良率便探数名进抵鹿楼集，与汤阴县府接洽，主要为侦察平汉线敌情。"

七月三日："高厚良忽然回部，据说经南桑鲁一带时，被伪军李福和部反正之一部（人枪百数十）将其扣留"，"高厚良因被扣而未完成其任务，在敌情了解上五号恐不能动作，决于六号晚袭击"（指"袭击汤阴城，破坏汤阴南北两铁桥，肃清其附近之伪军"），并令高仍率领便衣队赶到鹿楼集一带，继续侦察。他这次带便衣队侦察，摸清了汤阴、安阳之日伪军据点和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七月五日："接高厚良由汤阴县府送来之敌情报告及

路线图。”

七月十三日：“派侦察股长高厚良率便探一班，由赵支队（即赵基梅）掩护，前出新（乡）、辉（县）附近侦察，并限十六日汇报。”他领受任务后，冒着大雨，迅即前往新、辉进行侦察，如期向陈赓作了汇报。

七月二十一日，陈赓在袭击新、辉守敌的日记中又提到：“十九时开始接敌出发，我随先头连前进。高厚良事先已为各营选择好了有民族觉悟的向导。”

高厚良曾说过：“我对陈赓同志很佩服，在战争年代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能坚持写日记，真不容易。我写日记就是受陈赓同志的启发和影响。”此后数十年，高厚良一直效仿陈赓的作法，坚持写日记。在他离开陈赓身边到冀南第三军分区工作后，仍坚持写日记。虽然有些日记已找不到了，但一些重要的行动，战斗的零星记录，至今还保存着。他从一九四九年元旦起，到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一天不漏地坚持写下来的日记，至今保存完好。他写的这些日记，实际上是他自己革命斗争史的记录。这些第一手可贵的资料，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无疑是具有价值的。时至今日，经常有些领导同志，或是战友，或是部属，来函来人请他查证一些史实，特别是为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迫害的同志。他实事求是地为许多问题作证，使他们的问题得到了平反和澄清，为此，不少同志非常感激他。这些日记之所以能保存

到现在，还有他的夫人王文彦的一份功劳呢。高厚良转战南北，他调到那里工作，王文彦总是替他完好无损地带到那里。高厚良也多次说过，他的成就有一半是他夫人的。

高厚良到三八六旅当侦察股长，不仅机智勇敢地圆满完成了陈赓旅长和其他领导交给的任务，更主要的是在侦察活动中他得到了很好的实际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领导能力。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他被任命为一二九师三八六旅补充团参谋长。

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的一年半时间内，高厚良不仅经历了八路军一二九师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河北的行军和侦察活动，还参加大小战斗多次，其中较大的战斗有：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高厚良参加了七七一团在山西平定县测鱼镇第一次与日军作战的“七亘村战斗”。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高厚良参加了反“六路围攻”的战斗，粉碎了敌之围攻。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高厚良参加了陈赓亲自指挥的“神头岭伏击战”，经两小时激战，日军一千五百余人除百余人逃走外，其余均被歼灭。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高厚良参加了“响堂铺伏击战”。徐向前亲自指挥了这次战斗，激战两小时，全歼日军掩护部队四百余人，其一百八十辆汽车全部被焚毁，

给予日军以沉重地打击。

一九三八年四月，高厚良参加了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长乐村战斗”，打破了日军企图分进合击驱逐或消灭晋东南八路军的作战计划，歼日军四千余人，收复县城十八座，把敌人全部赶出了晋东南。

四

一九三九年十月，香城固战斗刚结束，上级决定派高厚良去冀南军区担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接替程启光的工作。这次调动与往常不同的是，他第一次离开主力部队，第一次独立担当一个军分区的领导工作。由野战军转为地方部队，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就任前，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找他谈话说：决定调你去冀南三分区当司令员，三分区是我旅的补充区，去了一定好好工作，任务很重，部队需要补充，要把那里的根据地建设好。他听了，深感担子重，责任大，担心搞不好，但又想到这是旅首长的信任，命令必须服从，只能好好工作。旅首长谈话后，他赶到师部，见到了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刘、邓首长当即签发了命令，任命他为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高厚良接过任命书，立即同迎接他的冀南第三专署专员唐哲明、第三地委书记张增敬一起，星夜兼程走马上任。他们经过大名县金滩镇，过卫河到达孩儿寨，第二天

下干到达三分区司令部所在地——肥乡县大移庄。这天正是农历的大年初一，他至今也没忘掉这个有意义的日子。从此，这位年方二十二岁的分区司令员高厚良，与分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并肩战斗，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纵横驰聘在平汉铁路以东冀南地区之邯郸、磁县、成安、临漳、大名、魏县、广平、肥乡、永年、曲周、鸡泽、南和、沙河以及山东之馆陶、邱县等十多个县，长期坚持了冀南平原游击战争，直到一九四七年十月永年解放，他奉命率部转战豫北，方才离开冀南。他，在这一地区忘我地艰苦战斗了十年之久。

冀南三分区所属各县，虽说是冀南地区较富裕的地方，但由于日军的“扫荡”，伪军的敲诈勒索，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很困苦。高厚良到三分区工作后，遇到的头一个困难就是日军不断地进行疯狂“扫荡”，汉奸、伪军、土匪到处作恶，而分区仅有一个独立营和一个骑兵连，再就是各县的县大队，少的几十人，多的几百人，武装少，兵力弱，而且群众对八路军认识也不一样，物资供给常常保证不了，冬夏季节不能按时换装，枪支弹药也十分缺乏。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打开工作的局面，使三分区真正成为三八六旅的补充区，高厚良除了团结同志，依靠和发动群众外，在一九三九年春，他率分区骑兵连配合永年县大队、鸡泽县大队开辟了永北（永年县北部）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同年八月二十三

日，在南和县东三召进行的伏击战，就是高厚良亲自指挥的。这一仗激战仅一小时，将鸡泽伪警备队全部歼灭，俘鸡泽伪县长赵天绪、接任鸡泽伪县长胡某、伪警备队队长贾本太以下四十余人，大大鼓舞了三分区军民的抗日士气。

一九四〇年，为了加强分区和地方武装的领导力量，更好地协同作战，六月下旬，上级决定新八旅由卫河以东冠县地区开到卫河以西冀南三分区，旅兼分区领导，由新八旅旅长张维翰兼任分区司令员，旅政委肖永智兼任分区政委，副旅长王近山为副司令员，高厚良由司令员改任副司令员。一九四一年五月，为了适应作战的需要，上级决定新八旅与三分区分开，旅不兼分区领导，高厚良仍任三分区司令员职务，李定灼为分区政委。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年代，环境十分艰苦，日军“扫荡”频繁，部队减员不断增多。为了坚持斗争，采取分散活动，深入到敌后和铁路沿线，加强游击战争。六月下旬，上级又决定新八旅与三分区合并，同时撤销新八旅的番号，由张维翰任三分区司令员，孔庆德任副司令员，肖永智任政委，高厚良热爱并熟悉参谋工作，主动要求作参谋长工作，上级批准了他的要求，任命他为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一个干部，不仅要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经得住严峻的考验，而且在职务升降面前同样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为

适应作战的需要，高厚良到冀南三分区工作后，职务几度升降，每次他都顾全大局，从未计较职务的高低，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优秀的品德。

高厚良在三分区工作期间，还参加了一九四〇年八月至十二月八路军在华北进行的举世瞩目的“百团大战”。使他难忘的是反“扫荡”斗争。特别是自一九四二年夏季以来，日军对晋冀鲁豫边区的“扫荡”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先后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推行“三光”政策，加上连年遭到水、旱、虫、雹等严重自然灾害的袭击，致使抗日军民的粮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高厚良同分区领导和地方党组织一起，就在这日伪军据点星罗棋布、碉堡林立、公路沟墙如网的艰苦环境下，不仅英勇地坚持了平原游击战争，与这一地区的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团结奋斗，粉碎了日军发动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而且还组织部队搞生产，打水井，种地，节粮，救灾，与群众共度难关，终于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和困难。与此同时，他还领导部队和群众取得了保卫一九四三年秋收和保卫一九四四年夏收斗争的胜利。

根据三分区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公布的一九四四年全年战果来看，分区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三百五十八次，攻克与迫退敌伪据点、碉堡五十二个，毙伤俘日伪军二千四百余人，缴获各种武器弹药及物资甚多，巩固与扩大了根据地。

一九四五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连吃败仗，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已处在夺取最后胜利的前夜。毛泽东主席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号召各根据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在这大好形势的推动下，在冀南军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高厚良与三分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向敌伪军发起了春、夏季攻势。他与分区副政委王贵德一起指挥二十三团，于一月十六日里应外合一举攻克了大名城，将日军混一旅团藤芬支队大部歼灭，摧毁了城内大部敌伪碉堡工事及一切伪组织，击毙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刘昆、军参谋长檀松甫、军参谋处长吴寿彭等死心塌地的汉奸多人，俘伪军四百余人，并迫使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突击团团长张履亭率全团官兵四百余人反正。从此之后，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方面发展，日伪军不断遭到打击，解放区逐步扩大，终于迫使日军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放弃了大名城，这座被日军占领了八年之久的县城得到解放。

从春季攻势到九月底，三分区连克敌据点，狠狠打击了日伪军，猛烈扩大了解放区。当时的《解放日报》（1945 年 8 月 30 日）曾作了如下报道：“冀南九分区（即三分区）我军连日以席卷之势，将广平西南之兰村、临漳东之康庄、鸡泽之善茶、军口，以及广（平）魏（县）成（安）地区之马臣头、回隆、张事庄、楚旺庄、李王营、

马虎庄、双庙、辛集等数十个据点一扫而光。现我军正围攻鸡泽、肥乡、成安等县城，并西向平汉路进击中。”这些战斗，高厚良都参与了组织与指挥。他为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厚良在三分区工作期间，严格贯彻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对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充当汉奸的伪军、伪组织的头头，坚决地给以打击，而对一些有民族感、但又不得已为敌人干事的人，则加以区别，通过内线作教育争取工作，使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并想方设法保护他们。永年县伪军第三大队大队长韩荫亭经三分区、三地委长期工作的争取，他秘密地为共产党八路军做了很多工作。他所管辖的永年县城南广大地区，是邯郸县抗日工作人员的秘密后方，是八路军进入邯郸境内开展工作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党我军向西发展，开辟邯郸、磁县铁路以东地区，建立磁县马头镇南北过往铁路的秘密交通线的可靠后方。刘志坚在韩部所在的永年县南沿村隐蔽养伤，也是得到他的保护的。日本投降后，他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率部四百余人反正。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至四日，在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指挥下，高厚良与分区副政委王贵德一起，指挥三分区部队参加了冀南、太行两支部队解放邯郸的战斗。战斗中，高厚良指挥三分区部队主攻邯郸城北门及敌指挥部所在地—丛台。丛台，相传是战国

时期赵武灵王为观看军事演习和歌舞而修建的，是邯郸的名胜古迹。他指挥部队既要坚决歼灭敌人，又要想方设法使这一雄伟壮丽的建筑物不受损害。当部队攻上丛台后，见敌人点燃木材企图烧掉这一古建筑时，他立即命令部队将大火扑灭，保护了这一名胜古迹。此次战斗，共毙伤伪“冀晋豫边区挺进军第三纵队”参谋长孙嗣同以下七百余人，俘伪“冀晋豫边区挺进军第三纵队”副司令王冠英、原日军委任的教导司令郭采芹以下一千七百余人，还俘虏了伪冀南道大、小伪首四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三十一挺，长短枪一千七百余支，食盐百万余斤，以及粮食、弹药、布匹、药品等物资甚多。邯郸的解放，使太行、冀南两大解放区第一次连成一片，为晋冀鲁豫军区首长指挥“邯郸战役”创造了条件。

邯郸解放后的第三天，十月七日，高厚良又奉冀南指挥部下达的“去肥乡指挥”作战的命令，参加了解放肥乡城的战斗。他到肥乡后，乘肥乡城守敌内部矛盾不断加深的机会，抓紧对伪军头子单桂廷进行争取工作。单表示“八路军攻城时，他可以下令部队不开枪，不抵抗”。这样，我围城部队便可集中力量打击肥乡保安联队长、死心塌地的汉奸程廷臣。当第二纵队在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的指挥下，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肥乡城时，在单桂廷的配合下，全歼守敌二千五百余人。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

阻止国民党军从郑州、新乡、安阳向北进攻解放区，时任第二纵队后方司令的高厚良，参加了组织军民肃清邯郸南北敌占各据点和破坏铁路、桥梁的战斗，这些战斗的胜利使邯郸南北一百五十公里以内的铁路沿线的城镇和村庄，全部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从而为同年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二日进行的邯郸战役（即“平汉战役”）做了战场准备。

五

解放战争时期，高厚良参与了组织指挥部队围困（河北省）永年城（河北省）的战斗。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三分区地域内的邯郸、肥乡等城先后解放，冀南地区只剩永年这座孤城。当时麇集在永年城内的伪军、汉奸、土匪共有三千余人，依仗坚固的城墙和又宽又深的水面进行固守，妄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拔除这个“钉子”，已成为冀南部队的一个重要任务。高厚良和分区其它领导人一起组织部队和民兵，在冀南军区党委的领导下，在地方党和群众的积极支援下，从一九四五年八月起至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对永年城守敌进行了长期围困，严密实行经济封锁，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积极贯彻军区首长确定的“困死敌人在城内，消灭敌人在城外”的方针，最后迫使守敌只好走突围的死路，在突围中被全部歼灭。十月五日，冀

南人民解放军部队解放了被日伪反动统治者蹂躏了八年，又为王泽民、许铁英二匪首盘踞了两年的冀南地区最后一个孤立据点永年城。

高厚良在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工作了十年之久，他所经历的全部过程是开辟、坚持、发展这一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直到这块土地的全部解放。他在冀南军区党委的领导下，在环境极为艰苦复杂的情况下，负责领导一个分区的工作，把他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撒在这块土地上。他冒着敌人的炮火，战斗在平汉路以东的十多个县，许多城镇和村庄都有他走过的足迹，他同那一地区的党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坚持了平原游击战争，为粉碎日伪军的多次大“扫荡”，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为解放被蹂躏的国土和被奴役的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出身贫苦，他对那里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怀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每到一个村庄，总要到农民家里坐一坐，看一看，与他们谈心，聊天，问长问短，农民也都喜欢同他交谈。也因此，他经常教育部属要关心群众，决不允许有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发生。因而，他得到了那里的广大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时至今日，在那一地区老年农民的心目中，仍然挂记着他们的“高司令”。

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永年解放后，冀南腹地已经没有敌人了。但是，作为战略要地的冀南地区，它的北面重镇

石家庄还未解放，西面的太原及晋中地区一些县城还被敌人所占领，它的南邻豫北地区，国民党四十军和地方反动团队，仍以安阳为据点，横行乡里，抓丁抢粮，鱼肉百姓。远的新乡、郑州，以及陇海铁路沿线，国民党军布重兵把守，不断向解放区进犯。在这种形势下，晋冀鲁豫军区首长确定，组织野战军分别向冀南以西的太原地区和以南的豫北地区出击，解放敌占之城镇。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高厚良和分区其他领导奉冀南军区的命令，率领围困永年的部队，迅即开赴安阳以东地区集结，一面整训，一面同安阳的敌人作斗争。从那时起，他即离开战斗了十年之久的冀南地区，担负起新的作战任务。在转战豫北的战斗中，他坚决执行晋冀鲁豫军区徐向前、滕代远副司令员的指示，采取"削萝卜"政策，压缩敌占区，消灭敌人，并坚持了长期的围困斗争。他还参加组织指挥了"屯庄合围"、"汤东扫荡"、"保卫麦收"、"奔袭封丘"、"激战牛市屯"等七十余次战斗。在刘邓大军发起解放郑州及进行淮海战役时，他与十四纵队领导奉命率部南下新乡至黄河铁桥间，担负堵截郑州残敌北窜和阻止新乡敌人南援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了中原野战军的郑州战役和淮海战役。一九四八年四月至五月初，他又与十四纵队领导率部配合第四野战军解放新乡、安阳的战斗。

在安阳地区作战期间，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决定组建第十四纵队。事先，徐向前副司令员

打电话给高厚良，说："军区决定将冀南的这支部队组成十四纵队，你任参谋长，有意见没有？"他听了倍感军区首长的信任，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随后，军区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下达了组建第十四纵队的命令，任命韦杰为纵队司令员，石志本为副司令员，高厚良为参谋长。当时，韦杰尚未到职，高厚良与石志本两人负责组建纵队的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纵队召开成立大会后，军区又陆续任命了甘渭汉为该纵队政委，甘思和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第十四纵队改番号为华北军区第七十军，高厚良任军参谋长。

解放豫北的任务完成后，新的征途又摆在了面前。七月十五日，华北军区命令第七十军北调河北涿县待命。高厚良协助军首长率部战胜了酷暑和多雨季节，于八月十八日到达了目的地涿县城。八月二十三日，甘渭汉和石志本、高厚良等在北平向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汇报了豫北战况得到称赞，并接受了改装特种兵的任务。根据军区首长的指示和甘政委、石副军长的意见，高厚良组织机关拟制了军缩编师的报告和团以上干部配备名单。军区从十月下旬起，先后批准了军缩编为师，六个团合并为三个团，二〇九师与二一〇师合并为一个师称二〇七师的命令。同年十二月六日，军区又决定全部改为特种部队，军机关同特司机关合并（到一九五七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时，这支部队的绝大部分同志都编到空军来了）。一九四八年，高

厚良的弟弟突然病逝，不久弟媳改嫁，丢下一个四岁的女孩，跟着高厚良的母亲艰难度日。当时，高厚良正戎马倥偬，与母亲无联系。一九五〇年，高厚良将母亲和侄女接到部队，他的夫人王文彦把侄女当亲生女儿对待，抚养成人，这就是他（她）们现在的大女儿高菊荣。

六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高厚良调任华北军区直属二〇九师师长。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又奉命率部在张家口至大同一线搞生产，建营房，挖水渠，他二话不说，坚决服从。同年九月，他又奉命率二〇九师团以上机关和直属分队由华北辗转到东北，在沈阳市听候改编。紧接着，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将他所领导的步兵第二〇九师改编为空军第三驱逐旅。十月五日，该旅在沈阳市正式组成，所属六二五、六二六、六二七团分别改为第七、八、九团。首任旅长方子翼，高厚良被任命为该旅政委。如此频繁的调动工作，他都是愉快地服从。从此，他由陆军转到了空军，开始了新的工作和新的战斗生活。他在刚到空军的日记中写道："从现在起，我们就进入空军的大门了，一切将都是新的，新的事情要用新的精神来办。"他不仅这样写了，而且是以新的姿态和面貌投入工作的。空军第三驱逐旅的组建，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个

国庆节前后，许多工作摆在面前，这对于刚从陆军来到空军的部队，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困难和问题成山。高厚良团结旅党委的一班人，积极支持旅长的工作，他们发扬了战争年代那种顽强的战斗作风，夜以继日地奋争，终于使第三驱逐旅训练出来的飞行员第一批驾驶米格十五飞机腾空而起飞上蓝天，于是他感慨地写下了诗一般的一段日记："仰望天空，形似燕飞，响声如雷，真是伟大！奇妙！"后来他又写下："人民空军的战士高高地飞翔在祖国的天空，我是多么的高兴啊！"十一月十七日，该旅奉军委空军命令改为空军第三驱逐师，夏伯勋、袁彬先后任代理师长、师长，高厚良任师政委。

正当第三驱逐师紧张地进行飞行训练的时候，朱德总司令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日，视察了该师，给了他们很多鼓励。为此，高厚良在日记中又感慨地写道："总司令是如何的关心年青的空军，怎不叫我们感到光荣！总司令说，把陆军里最好的干部、党员调来建设空军，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很好建设起空军来，以我们的飞机对付美国帝国主义的飞机，全国人民、全军对我们抱有很大希望。"朱总司令视察后，深受鼓舞的高厚良向空军刘亚楼司令员当即表示，要尽快完成训练，保证明年三月底能参战。

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谈何容易。高厚良与师长带领飞行员们迎难而上，毫不气馁，克服了器材缺、油料不

足、设备简陋、生活条件差、组织飞行训练没有经验的种种困难，在苏联空军顾问的指导下，飞行员由带飞到单飞，飞一次进一步，经过突击训练，基本上掌握了新式飞机的驾驶技术和作战本领。他自己也很快地由“保证训练”的外行角色，进入了“组织领导训练”的内行角色。他们师能在很短时间内训练出飞行员，参加战斗，也是付出一定代价的，突出的问题是训练中事故多。当接连发生事故时，身为师政委的高厚良，总是心情不能平静，彻夜不眠，从主观上查原因，找教训，他深感内疚。在一九五一年三月十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人民在望着我们，将士在望着我们，上级也天天在望着我们，希望我们能早日出去完成任务。但是，我们恰恰就是这样的不争气，我怎能对得起他们呢？我觉得，我粉身碎骨也弥补不了由于不断失事所造成的损失的万分之一，假若是牺牲了我，而能避免失事的话，我甘心情愿，挺身而出，丝毫也不犹豫。因为我了解，能够建设起一支空军来，那才是无尚的光荣。毛主席，党中央，重视我们，扶持我们，但是，我们就是搞不起来，怎么不叫人难过呢！”高度的责任感冲击着他的内心世界。

在志愿军空军第一批参战的就有空三师。他们师是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来到了安东的。从此，高厚良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吃过一顿舒心饭，战争年代积劳成疾的胃病不时地复发，但他毫不顾及，就象昔日在战场上那样

冲锋陷阵，毫不退却，他只有一个心眼，拚命也要把党和祖国人民交给的任务完成好。开始参战时，空三师与空军其他师一样，不仅数量上处于劣势，技术水平也很低，而且面对的敌人都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锻炼、具有作战经验的美国空军。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条件下，他依靠师党委一班人，团结并带领广大飞行员，吸取老大哥空四师的作战经验，坚决贯彻"边打边建"、"边打边训"的方针，终于使这支年轻的空军师，由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由打速度小的敌机到打 F-86 高速战斗截击机，由打小机群到打大机群、混合机群，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并完成了入朝作战的光荣任务。为保证空战的胜利，他还组织政治干部深入到机场，深入到群众中，积极钻研航空知识和技术，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全体人员中去，促进了战斗力的不断提高。第三空军师，在他和袁彬师长的率领下，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三日，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至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两次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取得击落击伤敌机一百一十四架的辉煌战果，并涌现出一批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一级战斗英雄王海、刘玉堤、赵宝桐、孙生禄，二级战斗英雄范万章、杨振玉、焦景文，二级模范钱良生、苏志明，特等功臣罗沧海，以及二十四名一等功臣，都为空三师增添了无尚光荣。有一次，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到空三师检查工作，询问该师入朝初战击落击伤美国飞机 9 比 0 的经验

时，担任师政委的高厚良当即回答说，要说经验，就是一条，我们，包括飞行员都是从陆军来的，都是打过仗的，有作战经验，飞行员驾驶新式飞机，如虎添翼，所以升空作战非常勇敢。刘司令员听了连连点头说："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十日，刘亚楼司令员将空三师八十六天的作战情况，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二月一日，毛主席看了该师抗美援朝作战八十六天击落击伤敌机六十四架的战报后，当即在这份报告上写下了"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这一光辉批示。毛主席的批示，很快传到空三师，他心情十分激动，更使全师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从此，他和指战员们更加斗志昂扬，越战越勇，越战越强，创造了一次空战击落击伤敌机八架、我仅轻伤一架的范例，涌现出击落击伤敌机十五架的"英雄的王海大队"。为了表彰空三师入朝英勇作战的突出事迹，中央军委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六日，特给空三师全体指战员发了贺电："庆祝你们参战十三个月来击落击伤敌机一百零二架的伟大胜利。你们的光辉战绩，证明了我人民空军的战斗力已大大提高，你们积极英勇机敏的作战行动，值得全军学习。望再接再厉，戒骄戒躁，进一步提高技术战术，为歼灭更多的美国空中强盗而奋斗！在抗美援朝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在中央和空军党委的关怀下，空

三师还为空军建设培养了不少人才，他们在空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七

一九五二年六月，高厚良还在率空三师指战员进行抗美援朝第二期实战锻炼时，中央军委任命他为空军第二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一九五三年二月，他又奉调到上海任空军第四军军长。其间，他于一九五六年离职到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高级速成班学习一年半，经刻苦学习，认真读书，取得了优异成绩。

高厚良于一九五五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二级国旗勋章。

一九五八年十月，高厚良调任空军第五军军长、军党委书记，并当选为空军党委委员。翌年四月，他升任为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一九六一年四月，他又兼任训练部部长。他无论是担任军的领导，还是到军区空军的领导岗位，对分管的工作，他总是一丝不苟，一抓到底，特别是在南京军区空军工作期间，对分管的训练工作，始终抓得很紧。当时，我国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单方撕毁合同，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的时候，直接影响到空军部队的军事训练。在这种形势下，他认真执行空

军领导机关提出的“地面多练，空中精飞”的方针和叶帅关于“地面苦练，空中精飞”的指示，经常深入到航空兵部队和训练现场，组织检查部队落实训练方针的情况，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一九六五年九月，高厚良又调任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党委书记。翌年五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对高厚良来说，“文化大革命”又是对他的一次严峻考验。“文革”中，由于他坚持党性原则，在一九六六年六月至九月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上，给林彪、吴法宪提了意见，吴法宪一伙即怀恨在心，便在成指一九六六年十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上和一九六七年十月空军党委三届十三次全会上，给高厚良强加上“参与空军搞罢官夺权”、“反对林副主席、攻击吴法宪”等罪名，受到了错误地批判和斗争，并在十三次全会上作出决定，撤销了高厚良担任的成指党委书记职务。一九六七年夏，吴法宪一伙又唆使一些人污蔑他是“罢官夺权的干将”、“走资派”，加强罪名，进行迫害。一九六八年三月至六月，林彪、吴法宪一伙，在北京举办“学习班”，把高厚良弄进了这个“学习班”，再次给他强加“参与空军罢官夺权的黑干将”的罪名，进行批斗、体罚、逼供等人身摧残。在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又乘机诬陷时已担任空军副政委的高厚良扣压、包庇、袒护揭发张春桥历史问题的信件，王洪文指令空军组织专案组追查，企图与

“天安门事件”挂联，继续对高厚良进行诬陷和打击。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折戟沉沙后，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被粉碎后，长达十年之久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空军党委对高厚良在“文革”中所谓的问题，进行了复查，证明都是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予以推倒。

“九·一三事件”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空军进行了批林整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空军党委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了四届五次全会（扩大），高厚良参加了这次会议，对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一伙的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会议结束时，五月十七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周恩来总理主持接见了参加空军这次全会的全体同志。会上，周总理对将要选进空军新领导班子的成员逐个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其中就有高厚良。五月二十日，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宣布了空军新的领导班子组成的命令，高厚良被任命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党委常委。从此，他即成为空军领导班子中的一名成员。全会结束后，他连成指也没回，立即走马上任，在新的领导岗位上拚命地工作，抓空军的批林整风和清查、复查，抓空军政治工作和空军政治部自身的建设，特别是对落实政策抓得很紧，积极向空军党委常委建议，使大批遭受林彪、吴法宪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安排了工作。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中央军委对空军领导班子作了调整，总政治部十月一日转发了军委的命令，任命副司令员张廷发为空军政委、空军党委第一书记，副司令员曹里怀为第三书记，高厚良免兼政治部主任职务，由刘世昌接任主任。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中央军委于一九七七年四月二日，对空军领导班子再次作了调整，任命张廷发为空军司令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高厚良为政委、空军党委第二书记，曹里怀仍为空军党委第三书记。一九七九年一月，空军纪委成立，高厚良还担任了空军纪委书记。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中央军委调整配备空军领导班子时，才免去他担任的空军政委职务。同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高厚良担任空军政委期间，十分注意领导班子的团结，工作更加任劳任怨，不辞辛苦，尽心尽责。他自觉地置身于党委集体领导之下，努力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战略方针，坚决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地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重视政治机关的建设，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在分管干部工作中，他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不搞亲疏厚薄。在清查、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严格掌握政策界线，为一大批受打击迫害的老同志平反，并建议安排了工作。

高厚良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在空军领导班子中，他遇大事讲原则，遇小事不计较，自觉维护领导班子的威信，从不看重个人的高低。他能严于责己，从不讲自己的功绩，工作有了成绩，总是说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其他同志及广大指战员努力的结果，而工作有了失误，他却主动承担责任。他忠厚朴实，尊重同志，特别是尊重老同志、老上级。他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在机关和部队中享有威信。

他一贯重视部队的军政素质的训练与提高，重视培养部队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尤其注重加强领导机关和基层的思想建设。他很关心边防部队的建设，曾多次深入高山及西藏、新疆等边远部队检查工作，特别是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到广西、云南边防前沿空军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和慰问，组织检查落实中央军委赋予空军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各项工作任务。

高厚良在担任空军领导职务期间，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第五届代表。现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八

一九八五年，为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高厚良主动写报告，要求上级批准他离休。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请求。他热爱空军，退居二线后，积极支持新的领导班子的工作，积极参加空军领导和机关邀请出席的一些会议和重大活动。

高厚良自一九八五年七月退居二线已经三年，他不顾个人患有颈椎病、心脏病的身体，与往日在工作岗位上一样，不干便罢，干就要干好的工作姿态，除参加审查修改红四方面军、冀南军区战史外，还用很大精力，花费很多时间，收集、整理历史资料，撰写革命史料。目前，已写出《冀南古城的新生》（编入《八路军》丛书回忆史料下册）、《围困永年》（刊登在《军史资料》1988 年第一期）、《转战豫北》和《在战斗中成长的空三师》，他目前正在撰写《从陆军到空军》等回忆史料。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中央军委授予高厚良“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高厚良经常说：“我从一个放牛娃到红军战士，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解放军一名高级干部，都离不开党和毛主席的培养教育，离不开上级的正确领导、教育和同志、群众的帮助。特别是对直接领导过我的上级，从班长到中央军委首长，我至今都很感激的。要永远不忘为革命牺牲

的无数先烈。”五十多年来，他把心血倾注在革命事业上，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人民空军的建设，做出了不朽的业绩。

（王 润 身）



曾　生



曾　　生

一

曾生（1910－　），原名曾振生，曾用名曾子屏、黄彬，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坪山乡（现属宝安县）一个华侨工人的家庭。父亲曾廷杰，是澳大利亚的华侨工人，母亲钟玉珍，是一位善良的农村妇女。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三年，曾生先后在坪山、龙岗和香港读小学。一九二三年秋，十三岁的曾生小学毕业，便随父亲去澳大利亚的悉尼半工半读，白天读书，晚上随父亲到一间经营海员日用品的商店做工。他在悉尼一所教会学校读了将近一年英文之后，即升入中学读书。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初，曾生进入悉尼的商业学院攻读。

曾生按父母的愿望攻读商业，是为了便于寻找一份职员的工作或从事经商。但是，随着见识的增长，善于独立思考的曾生，深感由于祖国的贫弱在国外被视为劣等侨民的耻辱，只有祖国富强，华侨的地位才能改善，祖国同胞

才能过好的日子。他逐渐认识到，学商业不能解决祖国的命运，要振兴中华才是根本的出路。于是，在一九二八年冬，为寻找振兴中华的道路，他毅然回国。

回国后，曾生在广州百粤补习学校补习了半年，一九二九年九月他考进中山大学附中读高中，在黄明堂办的学旅寄宿。同年秋，两广军阀混战，张发奎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进攻广东军阀陈济堂控制的广东。因为黄明堂与张发奎有关系，陈济棠在抄黄明棠的家时，把曾生等一批在黄明堂学旅寄宿的同学抓走，投进监狱。曾生在监狱的墙上看到了许多共产党人写的革命标语，才知道有一个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有为国为民而不怕牺牲的革命战士。这些革命道理，对曾生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有很大的影响。

出狱后，曾生又回到中大附中读书。由于他为人正直，又能团结同学，在班里很有威信，被同学们选为班主席。在高中一年级时，曾生组织了惠阳坪山同学会，并担任主席。该会组织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出版油印刊物《铁轮》，揭露坪山地区的地主豪绅们鱼肉农民的罪行。《铁轮》除在广州、惠阳、香港地区散发，还寄往美国，引起了坪山的封建地主对曾生的刻骨仇恨，更得到了惠阳的进步青年、香港的海员和海外华侨的支持。这是曾生组织和领导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在高中三年级时，中山大学的学生举行罢课，曾生等进步同

学，发动附中的学生响应罢课。曾生还以班主席的身份，和中大反动校长邹鲁进行复课谈判，迫使邹鲁接受了毕业班同学提出的“附中应届高中毕业生，可直升中山大学读书”的条件，罢课和谈判斗争取得了胜利，曾生在同学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

一九三三年七月，曾生高中毕业后，直升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读书。曾生在大学读书期间，努力学习进步书籍，广泛团结进步同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想方设法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争取早日参加中国共产党。由于他机智勇敢，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又善于团结同学，很快成为一位深受进步青年爱戴的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一九三四年初，曾生参加惠阳同乡会不久，即被选为该会主席。在他的主持下，该会设广州中山三路芳草街的会馆，成了进步同学组织读书会进行学习和活动的场所。曾生和钱兴等人，经常在这里讨论国内外形势，国家和个人的前途，以及争取参加中国共产党等问题。

一九三四年冬，曾生在中山大学附小举办中山大学贫民夜校，招学生二三百人，自任校长。他团结了黄焕秋、刘乘钧等一批进步同学担任教员。该校不仅为贫苦大众子弟提供了学习文化的机会，而且成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课堂。

同年底，曾生由中山大学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

负责人钱兴介绍，参加了中青。当时广州还未恢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青是中共的一个外围组织，成为领导广州“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力量。

曾生参加中青之后，把主要精力投入开展学生运动。为组织和领导中山大学乃至全广州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为有一个秘密的活动场所，为掌握运动的领导权，为解决开展活动的经费和交通联络，他奔走呼号。

曾生以夜校校长的名义，向学校当局要了几间木屋，作为中青秘密活动的场所。在这里油印宣传品，筹划学生运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的消息传来，中山大学的学生热烈响应，十二月十二日，举行了首次抗日示威游行，开始了广州一个多月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连续举行了四次抗日示威游行，曾生始终站在运动的最前列。

中大“一二·九”运动的领导机构，开始被陈济棠的爪牙林翼中领导的反动组织“抗声社”分子所把持。曾生和钱兴等中青成员，团结广大进步同学，经过艰苦的工作和激烈的斗争，在十二月三十日的中大抗日大会上，从“抗声社”分子手中夺回中大学生抗日会的领导权，曾生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第二天即领导中大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广州市的执信、广雅、女师等学校都有学生参加，总人数达四五千人。这次大游行，由曾生负责总领队，他率

领游行队伍在街头进行抗日宣传，向国民党政府的“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

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曾生等进步同学，利用校长邹鲁召集全校师生员工训话的机会，召开了中大的抗日大会，由曾生担任大会主席。在会上，曾生同反动校长邹鲁面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他的机智勇敢，领导全校进步同学，粉碎了邹鲁企图操纵会场、通过他的提案、达到控制中大抗日会从而压制和取消中大抗日运动的阴谋。大会在曾生的主持下，通过了三项重要决议：①正式成立中山大学抗日会执行委员会，曾生被选为执委会主席；②学校由学生的保证金中拨出三千元，作抗日会的活动经费；③决定一月九日，联合全市学生举行抗日游行，成立广州学生抗日联合会。当晚，曾生又主持召开了中大抗日会执委会全体会议，决定迅速扩大宣传，立即派人和全市各校联络，发动全市学生参加九日举行的抗日大会和示威游行；校车拨归抗日会调度使用，解决交通联络问题；由曾生负责向校长交涉，领取抗日会的经费。第二天，曾生代表抗日会向邹鲁交涉领款，他不惧邹鲁的恐吓和威胁，理直气壮地同邹鲁进行了说理斗争，迫使邹鲁不得不亲自批了一千毫洋，解决了抗日会开展活动的经费问题。

一月九日，由于中青的领导和广大进步同学的努力。广州全市学生的九日大会和示威游行，按计划举行，参加

的学生、工人、市民二万余人，由曾生担任总指挥。各路游行队伍来到长堤新填地（现在的广州文化公园旧址），举行了广州学生抗日大会，成立了广州学生抗日联合会，曾生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大会之后，曾生率领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继续游行。当游行队伍到省教育厅请愿时，省教育厅不见人影，同学们一怒之下，捣毁了压制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教育厅。中大附中的进步同学周伯时，拆下了广东省教育厅的牌子，当作胜利品扛回了中大附中。

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的广州“一二·九”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华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在“一二·九”运动中，由于曾生出色的才干和胆识，成了中山大学和广州地区学生运动中一位颇有威望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同学们都亲切地称他曾大哥！一九四八年，曾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时，毛主席对他说：“领导广州‘一二·九’运动的曾振生同志，你们打了不准抗日的教育厅，打得好！”热情赞扬了曾生和广州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爱国行动和革命精神。

曾生因领导两万多学生示威游行，并向省教育厅请愿和捣毁该厅之后，国民党政府当局通缉他，中山大学停止了他的学籍。一九三六年一月间，中山大学中青支部负责人钱兴决定，曾生到香港当海员，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曾生通过同乡的介绍，到英国的远洋客轮“日本皇后”号当工人，照料旅客洗澡。后来又兼做企台（照料旅客吃

饭）。“日本皇后”号是三万多吨的巨轮，有海员五百多人。曾生精明能干，善于开创新局面，他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很快被发动和组织起来，哪里的工作就很快出现新的局面。在曾生初到“日本皇后”轮的时候，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海员系统的党组织全遭破坏，党在海员中的工作完全停止。曾生下船不久，就组织了“惠坪乐善公所”，以同乡会慈善组织的形式，把海员组织起来，恢复了海员工作。他组织海员开展文体活动，给旅客演出文艺节目；他发动旅客捐款，购买书报供旅客和海员阅读；他购买药物，免费给海员和旅客治病，因而他深受海员和旅客的欢迎，很快在海员中树立起威信。

在“日本皇后”轮到上海时，曾生在上海找到了赤色海员总工会（简称海总）负责人邱金。当时，邱金本人没有党的组织关系，但他已了解曾生的历史和表现，便介绍曾生和香港的赤色工会联系。从此，曾生就负责香港海员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

一九三六年九月，钱兴通知曾生，已找到了党的组织，陈济棠已垮台，曾生的通缉令也已被解除，要曾生尽快回中大复学，并解决入党问题。曾生回中大复学不久，于同年十月，由林振华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曾生入党后，一边读书，一边继续搞海员工作。在这期间，他把邱金介绍给中共中央临时南方工作委员会，帮助邱金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接着又恢复了中共海员党委

会和香港海员工会，由邱金任中共海员党委会书记，曾生任中共海员党委会组织部长兼香港海员工会的组织部长。不久，邱金去延安学习，曾生任中共海员党委会书记。一九三七年七月，曾生在中大文学院教育系本科毕业，取得文学学士学位。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曾生领导中共海员党委会以“余闲乐社”、“惠坪乐善公所”、“香港惠阳青年会”、“海华学校”为阵地，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对推动香港、澳门和广东东江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曾生很注意在运动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海员党委会在香港的党员人数发展到二百人以上。在曾生领导下，中共海员党委会的工作和香港的海员工运，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二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侵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第二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在东江敌后开辟抗日游击区的指示，召集曾生和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研究回东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廖承志决定，由曾生负责组织工作组，回东江敌后，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曾生接受任务后，于十月二十四日，和中共香港市委干部周伯明、谢鹤筹，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惠阳县坪山。从此，曾生根据革命的需要，投笔从戎，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曾生回到家乡后，迅速恢复了党的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十月三十日，成立了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由曾生任工委书记。十二月二日，在惠阳县淡水区的周田村，成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郑晋（郑天保）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在曾生等率领下，游击总队一百余人，在惠阳、宝安沿海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此前后，王作尧等同志领导的抗日武装一百余人，亦在广（州）九（龙）铁路中段和宝（安）太（平）公路沿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全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同时，国民党开始走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曾生在远离中共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的祖国南疆，建立的这支孤悬敌后的抗日武装，不仅活动地区狭小，而且一开始就处于数十倍于己的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之中。在如此险恶的条件下，如何巩固和发展这支人民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夺取抗战

的胜利，成为曾生和他的战友们所面临的最严峻和最迫切的课题。

曾生不怕困难，知难而上。他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支持，率领指战员英勇奋斗，迅速打开了惠宝沿海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曾生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地域狭小，又处于敌强我弱的境地。为改变被包围的被动局面，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抗日武装；不能依靠国民党，只能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能靠山藏人，只能靠人藏人。因此，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指示，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组织抗日自卫队，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实行人民战争。与此同时，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争取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较好地解决了部队发展中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所遇到的困难。他不仅重视并亲自去做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统战工作，还派出副总队长兼参谋长郑晋到南洋进行华侨的统战工作，争取华侨的支持。他不仅争取了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在精神上、财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而且争得了一千多华侨子弟和港澳爱国青年回国参加游击队，使这支人民抗日武装初建时期带有浓厚的华侨色彩。这对部队的建立和早期部队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建立一支坚强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曾生非常重

视加强部队党的建设和干部的培养。他虚心请教老红军，尊重老同志，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依靠他们，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不断总结建军的经验，在大队设政委，中队设指导员，小队设政治服务员，班设政治战士，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曾生深知干部在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十分注意发现干部，培养和使用干部，并且大胆提拔了一批作战勇敢、作风好、觉悟高的工农干部，作为军事骨干，同时又大胆提拔了一批表现好经过考验的知识分子、华侨子弟和港澳青年，作为政治思想和群众工作的骨干。由于他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又善于发现、培养、团结和使用干部，使部队上下一致，团结战斗，成为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坚强革命队伍。到一九三九年底，部队发展到五百余人，成为东江敌后最强大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

一九四〇年初，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逆流来到广东的时候，曾生的部队遭到了二千余国民党顽军的围攻。他率部突围后，向海丰、陆丰和惠东转移时，在顽军的围追堵截下，损失严重，部队剩下不足一百人，处境非常困难，一些负责人也离开了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曾生坚定冷静，带领一部分同志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六月初，廖承志从香港转来中共中央五月八日的电报指示，曾生等坚决执行中央的电报指示，率部返回东宝惠前线的敌后地区，

又得到了迅速地发展。

同年八月，中共广东省委派省委常委、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尹林平）担任曾生、王作尧两部的政委。九月，林平在宝安县的上下坪村主持召开了两支部队的干部会议，决定将东江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由曾生、王作尧分别担任大队长，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委，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两个大队分别开进东莞县的大岭山区和宝安县的阳台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部队进入大岭山区和阳台山区之后，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正确指示，在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敌、伪军和顽军的多次进攻。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曾生领导的第三大队，在民兵的配合下，把进犯大岭山区的日军长濑大队和伪军六百余人，围困了两昼夜，并击毙日军大队长长濑以下五十余人，取得了百花洞战斗的胜利。对此，广州日军首脑哀鸣："这是进犯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曾生、王作尧两部，在与日、伪、顽的激烈斗争中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建立乡村抗日民主政权，到一九四一年秋，部队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武装民兵千余人，建立了大岭山区和阳台山区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时进攻香港。在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廖承志的领导下，

抢救出被困留在香港地区的重要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戈宝权等七八百人。被抢救出来的还有国民党官员和眷属，以及美、英、比、荷、印等国的国际友人近百人，连同港九同胞和侨商、侨眷，不下万余人，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中共中央的表扬。

一九四二年春，根据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指示，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梁鸿钧，政委林平，曾生担任副总队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领导根据地军民，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战胜了严重的灾荒，粉碎了日、伪、顽的进攻，从一九四三年春起，开始主动出击敌人，又在惠阳地区建立起一片抗日游击根据地。

惠东宝抗日根据地，处于广（州）九（龙）铁路南段的两侧，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冬，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陷入困境，急需以广州和香港为基地，支持太平洋战争。因此，惠东宝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卡住了广九铁路这条敌人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使之始终不能通车，破坏了日军的战略部署，支持了南洋各地人民和盟军的对日作战。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委任曾生为司令员，林平任政委，王作尧任副司令员，杨康华任政

治部主任。

东江纵队成立后，号召全军乘胜前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壮大军事力量，迎接大反攻的到来。为此全军开展了杀敌、扩军竞赛，部队得到了大发展，根据地和游击区也迅速扩大。在抗战七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全体指战员的电报中指出：“你们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的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一九四四年七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在博罗县的罗浮山召开干部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广东区党委，林平任区党委书记，曾生等十人为区党委委员。

一九四四年十月，曾生报请中共中央同意，并按中共中央的指示，同盟军人员欧戴义进行谈判，商定与盟军合作，共同设立情报站和电台，向盟军提供有关日军的情报。由于东江纵队情报工作人员的努力，向盟军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资料，帮助盟军对日作战。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美国海军上尉甘兹和情报站的美方代表欧戴义等盟军人员，一再致函曾生司令员，认为东江纵队提供的情况，“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贡献”，感谢东江纵队给予盟军对日作战的积极配合和支持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限令侵华日军军酋冈村宁次下令华南日军集中在东莞地区，由曾生将军代表华南抗日游击队受降。一九四五年冬，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调集七万余人的兵力围攻，妄图将东江纵队一举消灭。东江纵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分散坚持”的方针，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图谋。

一九四六年三月底，曾生以华南中共武装人员代表的身份，到广州参加同国民党广州行营当局进行关于中共华南抗日游击队北撤具体协议的谈判。中共方面参加谈判的人员有廖承志、方方、曾生和林平。经过五十天激烈的谈判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达成具体协议。六月二十三日，方方、曾生向中共中央报告：东江纵队已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东纵的阴谋，安全集中于大鹏半岛。同一天，成立了北撤部队党委会，由曾生司令员兼任党委书记。六月三十日，在北撤部队党委的领导下，二千五百八十三人的北撤部队，分乘三艘美国军舰撤离东江解放区，七月五日，安全抵达山东解放区烟台，胜利完成了组织部队北撤的任务。

在八年抗战中，东江纵队在中共中央和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一万一千余人的队伍，组织武装民兵一万二千余人。这支华南敌后抗日武装，转战东江两岸、港九敌后、粤赣湘边和

韩江地区的三十九个县市，并在大鹏湾、大亚湾海域英勇打击敌人，控制着数百里的海岸线和通往香港的交通要道，威胁着敌占大城市广州和香港，收复了大片国土。在东江和北江解放区，先后建立了东宝行政督导处、路东行政委员会、惠东行政督导处、博罗县人民政府、海丰民主政府以及北江东岸抗日动员委员会等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面积约六万余平方里，人口四百五十万以上。对日、伪军作战一千四百余次，毙伤日、伪军六千余人，俘虏和投诚者三千五百余人，与此同时反击顽军作战三百余次，共缴获各种武器六千五百余件，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破坏了日军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严重威胁着日军的南海防线，积极配合了全国抗日战场和盟军的反攻作战。东江纵队在抗日斗争中成为中外共知的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成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一支主要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东江纵队的主要创始人和司令员曾生，在八年抗战中，从一个大学生，锻炼成为代表华南人民抗日武装接受日军投降的中外知名的将军，成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一面旗帜。

三

曾生率领的北撤部队到达烟台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广东北撤部队要学习、锻炼、提高和为将来两广地区的武

装斗争发挥更大作用的指示精神，将东江纵队的战士编成一个团，少数搞过地方工作的干部到华东党校学习，大部分干部由曾生率领到华东军政大学学习。

一九四六年，曾生任华东军区党委委员、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他以身作则，带动广大干部努力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他虚心学习八路军的好传统、好作风，学习打运动战、攻坚战和各种军事技术，努力提高指挥作战的水平，为参加解放战争作准备。

一九四七年初，曾生奉命率领东江纵队北撤部队的指战员，开赴渤海地区。曾生出任渤海军区党委副书记兼副司令员。一九四七年三月，华东军区党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把莱芜战役中俘虏的国民党军广西部队的解放战士二千多人，由山东翻身农民组建的一个团，拨归曾生成立教导支队，由曾生任教导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五月，中央军委指示在教导支队的基础上，成立两广纵队，委任曾生为司令员兼纵队党委书记（后雷经天任党委书记，曾生任副书记）。八月一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委，全纵队四千余人，归华东野战军指挥。

在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的指挥下，曾生率领两广纵队转战华东战场，先后参加了著名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都胜利完成了战斗任务，多次得到华东野战军和淮海战役总前委的表扬。

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的睢杞战役中，两广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的第十纵队，担负西线的阻援任务，在杞县以南地区阻击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与区寿年兵团会合。六月三十日，蒋介石亲自乘飞机在杞县上空督战，以杀头威逼邱清泉迅速前进，预期与区寿年兵团会合。邱清泉倾其全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支援下，向阻击部队疯狂进攻。但任阻击的两广纵队，依托阵地，顽强抗击，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有力地配合了兄弟部队歼灭区寿年兵团及整编第七十五师等部，俘虏了兵团司令区寿年，为夺取睢杞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战功。

一九四八年九月，在济南战役中，两广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特务团，担负攻克外围据点长清城的任务。长清城在济南的西南面，城内守敌一千七百多人，周围筑有城墙和碉堡，并有十多米宽的城池，只有东、西、南、北各留一个城门，城门两旁筑有炮楼。攻占这样坚固的城镇，对两广纵队来说是一个考验。两广纵队的第一、二团负责攻击北门和西门，华野特务团佯攻南门。由于指挥正确和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发起总攻不到一小时，即攻破了西门和北门，经几小时战斗，全歼守敌一千七百多人，出色地完成了攻克长清城的任务。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两广纵队为配合兄弟部队在徐州以东围歼国民党军黄伯韬兵团，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一

起，在徐州西侧积极行动，佯攻敌人，钳制国民党军主力第二兵团不能东援，保证了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主力全歼黄伯韬兵团。在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两广纵队在津浦线上肖县的看将山、三堡、马路山、两面山、枰锤山、芦村寨一线，担负堵击国民党军孙元良兵团突围南援黄维兵团的任务，以确保在浍河以南的双堆集地区围歼黄维兵团主战场之侧后安全。

自十一月二十七日拂晓开始，孙元良兵团为突破人民解放军的防御阵地而与黄维兵团会合，以其四十一军一二一师，分兵三路合击白虎山、马路山、两面山、枰锤山、芦村寨一带阵地，遭两广纵队阻击部队的顽强抗击，尔后敌四十一军又集中火力对两广纵队第一团坚守的阵地芦村寨进行毁灭性打击，猛烈的炮火几乎把整个村庄给炸平了，又连续四次发起冲锋，但都被第一团的明暗火力所击溃。孙元良在蒋介石电令的催逼下，急于夺路突围，救援黄维兵团，于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猛烈炮火和飞机的支援下，再次疯狂地向两广纵队坚守的阵地进行轮番攻击。敌每突破一个村庄和一个阵地，两广纵队立即组织反击，同敌短兵相接，夺回阵地，终于挫败了敌之猖狂进攻。由于战斗激烈，两广纵队的伤亡甚大。只有三千人的两广纵队，要守住二十里的防线，兵力不敷分配。在数量占优势的国民党军的攻击下，曾生镇定地指挥部队，为确保淮海战役的胜利，他决心不惜任何牺牲，坚守阵地。在

战场危急时，他把纵队警卫连和侦察连都投入了战斗，终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在淮海战役中，曾生顾全大局，勇于承担和坚决完成艰巨任务。他指挥的两广纵队，不畏强敌，勇敢战斗，出色地完成了堵击孙元良兵团突围南援黄维兵团的任务，保证了人民解放军主力先歼黄维兵团，自东线回师，再歼孙元良兵团，得到了淮海战役总前委的表扬。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中央军委指示两广纵队归第四野战军统一指挥。三月上旬，曾生和雷经天到北京开会，中央军委决定把北平和平解放时起义的何宝松师归编两广纵队。会后，曾生、雷经天率领何宝松师六千人回河南许昌。这时，两广纵队有两个师，一个团，一个干部队，共一万三千余人，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副司令员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副主任刘田夫，参谋长姜茂生，参谋处长邬强。

同年九月初，组成新的中共华南分局，叶剑英、张云逸、方方为书记。曾生任华南分局委员。九月中旬，曾生参加了叶剑英在江西省赣州主持召开的中共华南分局第三次会议和高干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了解放华南的作战计划和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组成及干部配备等问题。根据会议的决定成立了广东省军区，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曾生任副司令员。这次会议之后，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按解放广州所作的具体部署胜利进军。第十五兵团负责中

路，以广州为目标向南进击，解放翁源、新丰、佛冈、花县、从化、增城，直抵广州北郊；第四兵团为右冀，入粤解放曲江后，接着解放源潭、清远，从右翼进逼广州；两广纵队与粤赣湘边纵队汇合，负责左翼，解放和平、连平、河源、龙川、惠阳、博罗、东莞、宝安、中山，迂回广州南面。三路大军形成对广州的全面包围。十月十四日，第十五兵团进入广州。广州宣告解放。

两广纵队在解放广东的战役中，十月十九日，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在博罗县的龙华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五四师。十一月初，又在中山县的翠微一带，展开追击战，击毙国民党军一部，俘三百余人。接着两广纵队配合粤赣湘边纵队，解放了三灶岛；又配合第十五兵团。解放了万山群岛。

曾生率领两广纵队，转战华东、华南战场，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的作战任务，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四

新中国成立后，曾生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一年五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曾生任第一副参谋长。一九五二年，曾生任中南赴朝鲜学习团团长，率领四百余人到朝

鲜学习。曾生从朝鲜回国后，深深感到要保卫祖国的安全，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海军，加强我国的海防建设，特别是身为一位保卫祖国南疆的指挥员，责任更加重大。这位四十二岁的战将，以强大祖国的利益为重，从革命需要出发，主动向组织申请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学习，决心从头学起，掌握建设和指挥人民海军的本领，立志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贡献力量。他的申请很快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一九五二年底，这位中山大学毕业生，转战沙场十五年之后，怀着激动的心情，又回到学校，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的一名学员。立志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贡献力量的曾生，入学后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第一届的学员，在学员中他虚心好学，和蔼可亲，与同学们打成一片，很有威信。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又担任社会工作，开会和其它活动占去了他不少学习时间，但由于他精力充沛，善于利用时间，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一九五六年八月，四年学习期满，他顺利地通过了各门学科的考试，毕业时获优等生。

军事学院毕业后，曾生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工作。一九五六年冬，他担任海军党委委员、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负责部队的作战训练和修造工作。他满腔热情地参加建设人民海军的工作，恨不得把自己学

到的知识，都用在祖国海防的建设上。他亲自主持制定训练计划，深入部队指导训练工作。他非常重视海军基地的建设，努力抓好舰艇和各种武器的制造和修理工作。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〇年冬，他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五五年，曾生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五

一九六六年底，由于工作需要，曾生由军队转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州市委第三书记、广州市市长兼广州警备区和广州军分区第一政委。

曾生担任广东省副省长期间，一直兼任国务院外办驻广东省外事办公室主任和广东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主持全省的外事工作和体委工作。任职期间，他不仅做了各方面外宾的接待工作，还先后以代表团团长、副团长身份，率领代表团到巴基斯坦、柬埔寨、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等国进行友好访问，为促进我国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广东的体育工作，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曾生是在一九六〇年冬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出任广

州市长的。由于中共中央、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经过一两年时间，广州各方面的工作就出现了新的局面。这是和曾生市长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主管财贸、城建、卫生和公安几个部门的工作，这些部门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关心群众，努力为群众办好事。为了改善广州市民的生活条件，他大抓环境卫生工作，几年间使广州的环境卫生面貌大为改观。为了改善水上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变广州珠江两岸破烂污臭的面貌，他亲自抓了建筑珠江两岸石堤和水上居民住宅的工作。在财政收入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他千方百计克服各种困难，几年间，使珠江两岸面貌一新，建起了一排排新的住宅，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大部分水上居民的住宿问题，深受市民的欢迎。

一九六七年初，林彪、江青、黄永胜一伙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势，以“国际间谍”的罪名，把曾生抓起来，关押了长达七年的时间。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后，一九七四年七月曾生才出狱。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八一年三月，曾生出任交通部副部长、部长，为整顿、恢复和发展我国的交通运输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九八一年四月，曾生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顾问。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中共“十二大”他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吴　明）



傅　连　暲



傅　连　暲

一

傅连暲（1894-1968），字日新，为党作秘密工作时化名郑爱群。一八九四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生于福建汀州（今长汀县），老家在河田镇伯公岭村。

父亲傅贵成是个勤劳笃实的贫苦农民，母亲官福娣也是个善良贤慧的农家妇女。他们一家祖辈耕种地主的田，因沙地贫瘠，田租沉重，收成不敷交租，屡遭地主逼债欺凌，傅连暲的大哥不满三岁，就被地主抢去拍卖抵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一八八九年秋，傅贵成举家离开伯公岭，流落汀州城谋生。傅贵成在码头当搬运工，官福娣帮人挑水、洗衣、剥花生、撕烟叶，赚点钱维持度日。

傅连暲的双亲生下十三个孩子，他排行第十一，由于家境贫寒，难于抚养，孩子生下后，送的送，死的死，最后只剩姐弟五人。

这时的中国正处于灾难深重之中。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于是帝国

主义进一步瓜分中国，不断向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以传教为名到处办教堂，建学校、医院。在汀州就有德国和意大利办的天主教堂，英国办的基督教堂。外国传教士伪装和善，宣扬自由、平等、博爱，以笼络人心。

傅连暲一家在汀州时，隔壁邻居见他家境贫困，便劝他的母亲加入基督教，说是有时可以得到一点救济，名谓“吃教”，小孩到教会学校念书也可以免费。一九〇五年，傅连暲因父母已加入基督教，他也加入了基督教。

傅连暲十二岁自崇正小学毕业，考入教会办的中西中学。当时，汀州流行肺痨、疟疾、伤寒等疾病，许多穷人一旦染上这些病，又拿不出钱医治，就只有等死。他的父亲傅贵成也害了一场伤寒病，无钱看病，熬了两个月，瘦成一把骨头，后来幸亏亲戚朋友凑了一点钱看病吃药，才保住一条命。这件事对傅连暲刺激很大，他立志长大了当个医生，要为穷苦百姓治病救人。

傅连暲聪明好学，爱踢足球，又怀有学医的强烈愿望，因而受到福音医院院长锡依布莱尔（中文名赖查理）的赏识，主动提出每月资助他大洋四元；另一位英籍加拿大医生米企尔（中文名李灼基）也常常资助他。由于他们的帮助，傅连暲念完中学，并考入教会办的“亚盛顿医馆”。赖查理给傅连暲的资助条件是为教会医院挤牛奶。为得到这笔资助金，傅连暲从中学开始直至进入医馆，每天一边学习，一边替英国医生挤牛奶、打扫牛棚，过着半

工半读的艰苦生活。由于他过度劳累，不幸染上了肺结核病。

“亚盛顿医馆”学制为五年，每次招收二至五名学生，主要学科有英语、内科学、外科学、眼科学、妇幼科学、体学、体功学、疗学、皮肤学等。傅连暲于一九一一年考入此馆，为该馆第二期学生。傅连暲的老师李灼基，精通内、外科，曾获英国内科和外科博士，很喜爱勤学苦练的傅连暲，除了热心帮助他学习外，临床和出诊都把他带在身边，这对傅连暲医术的长进起了很大的作用。傅连暲抓紧一切时间，把课堂上学到的东西，认真运用到实践中去，因而他的学业进步很快。

一九一四年，父亲傅贵成在贫病中去世。临死前，傅连暲的母亲执意要刚满二十岁的傅连暲与刘赐福举行了结婚仪式，名为“冲喜”。刘赐福也是贫民出身，出生后第七天就抱给官福娣做童养媳，未婚的婆婆用自己的奶水把她拉扯大。刘赐福十一岁时，汀州来了两个英国姑娘，在城里办起了华英女子学校，动员小姑娘、小媳妇上学，官福娣经不起再三动员，就让刘赐福进了女子学校。刘赐福在十七岁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每月薪水四块大洋，这样家境才稍有好转。傅连暲结婚以后，因为父亲去世，债台高筑，一度想停止学业，到上海做工。他的几个朋友在患难中给了他帮助。每月贴他一些钱，把他挽留在汀州继续上学。

一九一六年，傅连暲在汀州“亚盛顿医馆”经过五年攻读，以优异成绩毕业了。他被福音医院院长赖查理聘为汀州八县旅行医生。从此，他不辞辛劳，常年在闽西山区农村奔走行医。他医术高明，医德又好，在汀州颇负盛名，求医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此后，他的家境大大好转，所欠三百多元债务全部还清。

一九一八年，傅连暲被推举为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师。是年，他从汀州城到宁化巡回医疗。宁化北门林德贵之妻久病医治无效，正准备后事时，经傅连暲治愈。开明绅士伊山民患咯血病，雷子声患风湿症不能移步，也都经傅连暲治愈。有一位建筑工人从五米高屋架上摔下来，脑血管破裂，血流不止，也是经他做手术抢救脱险。傅连暲因而名声大振，重病求者络绎不绝。当时宁化还没有西医，许多常见病、多发病得不到诊治。傅连暲深感宁化迫切需要发展西医，出面向县长建议筹款办西医。为宁化发展西医事业，他当即在宁化招收了谢时丰、江大廉两人为“亚盛顿医馆”第五期学生。

一九二〇年，傅连暲被聘为教会医院医生，并担任“亚盛顿医馆”教员，同时他还兼任汀州省立七中与汀州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医。傅连暲主持了“亚盛顿医馆”第四、第五两期学生的各主要学科。他治学严谨，常教育学生要做到两心：“一是虚心，二是恒心。”他认为：“虚心是学好科学的先决条件，恒心是成功的必要因素。”在他的教育

下，陈炳辉、叶青山、黄成（又名黄深信）、曹国煌等学生，后来成为了杰出的医务工作者，走上了革命道路。

傅连暲在教会医院有月薪二百元，外诊还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大概每月收入一般在四百元左右。他积蓄了一笔款，在横岗岭上买了一幢房屋，自家设了诊所，日夜开诊。他没有忘记自己过去的苦难，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有的穷人请他看病不但不收钱，还慷慨给予资助。

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傅连暲因肺病严重，在家卧床养病。这期间，他经常到北山脚下漫步，作日光浴，辅助治疗结核病。他发现一个十二三岁的放牛娃，长得聪明伶俐，讨人喜欢。这孩子叫陈炳辉，是他的邻居，因家穷，父亲去世，失学去学刻字。傅连暲听他说有志学医，决定帮助他进“亚盛顿医馆”学习，他的生活及一切学习费用全部由傅连暲负责。后来，陈炳辉成了傅连暲的女婿和得力的助手。

二

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其时，傅连暲已回到福音医院当医生。他富于爱国热情，痛恨帝国主义，早在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时，他就非常愤慨。当“五卅”运动电讯传到汀州时，他毅然签名通电全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要他们赔

偿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他组织并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福音医院英国院长慑于汀州反帝运动日益高涨，惊慌地逃离汀州。于是，深孚众望的傅连暲被推举为福音医院院长。这时，他才三十岁。

一九二六年，傅连暲读了瞿秋白主编的《新社会观》旬刊。这份刊物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他的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后来他对记者谈话还深有感触地说："瞿秋白所著之《新社会观》，它给了我一极深刻的印象，使我更懂得革命的人生观，因此更加同情革命，并进而直接参加革命。"

一九二七年八月，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等率领下挥戈南下，在江西瑞金壬田和会昌接连打了两次大仗，歼灭国民党军钱大钧部四个团，俘获敌军官兵九百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在激烈的战斗中，起义军也有不少伤亡，大约有三百多名重伤病员，被送到汀州福音医院治疗。傅连暲不顾危险，立即发动汀州所有的医务人员，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临时"合组医院"，紧急抢救伤病员。他还以博爱和人道的名义，向商人募捐了一大笔钱作为伤病员的生活费，所需药品全部由福音医院无代价地供给。他还动员汀州女子师范和省立七中女生协助看护伤员。这时的福音医院，实际上成了南昌起义军的临时医院。

从会昌到汀州有一百八十里山路，加以天气炎热，许

多伤员送到医院时，伤口都化脓发炎，必须立刻手术。可是，当时汀州城里能胜任手术的医生连傅连暲在内只有三个人。他们要给二三百人作手术，还要治疗其他病人，忙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傅连暲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挺着患肺病刚愈不久的虚弱身子，日以继夜地为伤员施行手术，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医院人手不足，他把全家动员起来，他的母亲、妻子及十二岁的女儿都到医院看护伤病员。

年轻的起义军营长陈赓左腿两处中弹，膝盖筋被打断，腕骨骨折，伤势很重，身体非常虚弱，但他不叫一声疼，还兴致勃勃地给看护们讲革命斗争的道理，病房里充满着他爽朗的笑声。傅连暲敬佩陈赓，决心要保住陈赓的伤腿，对他采取了“保守疗法”。傅连暲每天用“由素”替他消毒，用板夹固定伤腿，还把自己喝的鲜奶留给陈赓，以增强他的身体抵抗力。经过傅连暲精心治疗，陈赓的伤腿保存下来了，避免了截肢之苦。陈赓深为感动，一九五二年他在回忆录《从南昌到汕头》一文中，谈到这段经历时写道：“他（指傅连暲）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同情我们的医生。承他尽心照护，使我直到现在都很感激。”陈赓大将到逝世前，一直与傅家保持通家之好。

起义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年纪五十岁了，患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发着高烧，昏迷不醒。在傅连暲的精心治疗下，徐特立的病情迅速好转。徐特立养病期

间，常跟傅连暲谈心。那年徐特立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傅连暲觉得很诧异，因为他自己三十三岁，就觉得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徐特立乐呵呵地说："五十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我起码还有三四十年好为党工作呢！"这使傅连暲的思想得到启发和鼓舞，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当医生治好了他们的病，他们治好了我的心，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心！"

起义军在汀州只有七八天时间，陈赓带着没有痊愈的伤腿，徐特立带着尚未复原的身体，都跟部队挺进东江了。他们那坚定乐观的革命精神，在傅连暲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还有一部分重伤病员，傅连暲把他们留在福音医院继续治疗，并千方百计保护他们，免遭敌人的迫害，直到一个多月后这批起义军伤病员痊愈出院，重新走上战斗岗位。

一九二八年春，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共产党员郭滴人、朱积垒、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后田、长乐、蛟洋、金砂等地农民举行了震动全省的闽西暴动。暴动的消息传来，中共长汀特支跃跃欲试，准备在汀州开办"训政人员养成所"，训练农运骨干。当时汀州驻扎着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为了使这个养成所合法化，特支委托傅连暲通过给郭凤鸣治病的机会，请求郭凤鸣予以支持。郭凤鸣并不了解这是中共的训练班，以为可利用青年知识分子替他训练训政干部，一口答应，并

指令由商会出钱。于是，中共长汀特支从长汀、清流、宁化、连城等县选拔了一批进步的青年农民参加培训，通过这个训练班培训了一百多名农民运动骨干。

同年十一月下旬，中共闽西特委、永定县委遭到破坏，敌人搜查到一份汀州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这份名单报送到郭凤鸣司令部，汀州地下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由于傅连暲医术高明，郭凤鸣对他的医术极为赏识，每次有病都请他诊治。当郭凤鸣收到那份汀州地下党员名单时，正好傅连暲被郭请去看病，郭凤鸣说他的家里有共产党。傅连暲听了大吃一惊，因为他有一个侄女傅维钰是共产党员，傅维钰的父亲去世后，从小靠傅连暲养大。一九二五年，傅连暲把侄女傅维钰送到南昌保灵女校念书。一九二七年初傅维钰到武汉参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在军校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她从上海回到汀州，以汀州省立七中英语教员的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如今她的身份暴露，傅连暲十分焦急。郭凤鸣是个“草包旅长”，他以为傅连暲只是一个医生，并不懂得政治，所以一面说着，一面得意地向傅连暲出示名单炫耀。傅连暲佯装若无其事地看了一看，默记了所有名字。一回家，傅连暲立即通知他的侄女傅维钰及上了那份名单的党员立即转移。当时，中共福建省委候补书记罗明正巧也在汀州传达中共“六大”精神，闻讯以后立即离开汀州返回厦门。由于傅连暲及时报告，中共汀州地下党员全部脱险，避免了一

次重大损失。

一九二九年三月，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首次入闽，消灭郭凤鸣旅二千余人，占领汀州城。毛泽东到达汀州以后，身体不大好，有人说他可能患了肺病。傅连暲给毛泽东检查身体，认为没有肺病。毛泽东很高兴。傅连暲还给朱德检查了身体，也很健康。这是傅连暲第一次给这两位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检查身体。当时，正当天花流行季节，红四军中发现有天花病人，为防止天花在军中蔓延，傅连暲向朱德建议赶紧给全军普种牛痘。朱德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傅连暲一方面为红军治疗伤病员，另一方面用了半个月时间，为红四军全体指战员种了牛痘。红四军离开汀州时，傅连暲介绍他身边两名得力的医生叶青山、黄成随军服务，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这两位医生很快成为红军中优秀的卫生工作领导者。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汀州还处于游击区，时红时白，斗争相当复杂激烈。这一时期，傅连暲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出于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为党做了不少秘密工作。

傅连暲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以福音医院的名义，订购了上海的《申报》、《新闻日报》、广州的《超然报》、《工商日报》等各种报纸。他化名郑爱群，通过汀州邮局的邮递员中共地下党员罗旭东，将报纸转送毛泽东参阅。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军旅途中，得到这些重要的参考资

料，非常高兴。毛泽东收到报纸以后往往亲笔给傅连暲写收条：“×月×日报纸收到，这样做很好。毛泽东。”

由于傅连暲经常热心地为红军和游击队治疗伤病员，而且在红军撤走后，仍继续设法掩护红军伤病员，因而引起了敌人注意。有一次，他把一个身受重伤的赤卫队员藏在他家医治。这位伤员的伤治好后，傅连暲又送给他大洋五十元，并把他护送离城。这件事，使得敌人更加怀疑他是共产党。当时占领汀州的国民党金汉鼎部包围搜查了他的家，指称他“通匪”，而且抢去他的钱和怀表，傅连暲强硬地抗议国民党军队的暴虐，声言要向蒋介石告状。敌人搜查不到所谓“通匪”证据，又怕惹怒了英国教会医院不好收场，第二天不得不到他家赔礼道歉，并送还被抢去的钱和怀表。

一九三〇年，傅连暲的住宅里有几个房间被一个国民党团长强占，据为“公馆”。不久，红军再次袭击汀州，敌军连夜撤防，但是敌团长堆放在傅连暲家里那一大堆金银绸缎无法带走，敌团长和姨太太急得直跺脚，傅连暲灵机一动，向敌团长建议把一箱军用地图腾出来，暂时留下来代他包管，用这个箱子把财物运走。敌团长接受了他的建议，赶紧腾出箱子装起金银绸缎逃跑了。第二天，红军入城，傅连暲将这一箱军用地图交中共长汀县委书记段奋夫转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郭化若再转送给毛泽东。

三

一九三一年，汀州已经成为中央根据地重要的经济中心。福音医院也成为了中央根据地最大的一所医院。许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前来这里治疗。但是，由于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药品十分紧缺。毛泽东指示傅连暲派人到上海买药，并在上杭、峰市、汕头、上海等地开设地下药店，建起了一条从根据地至上海的秘密购药品的运输线。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周恩来从上海经汀州前往瑞金时，又指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拨给傅连暲一笔重金，作为采购药品的资本。傅连暲接受这一任务以后，派他的学生、年轻的共产党员曹国煌，前往上杭和峰市开设地下药房，为根据地采办了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不幸的是，曹国煌第二次运药品的木船被驻上杭的国民党军陈济棠部发现，曹国煌被捕，不久壮烈牺牲。

一九三一年，伍修权在中央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左腮被敌人子弹击中，弹头滑落口腔后部，伤口感染化脓，在上杭才溪后方医院治疗未获痊愈，被转送到汀州福音医院医治。在傅连暲细心治疗下，伍修权的伤口迅速好转。八月中秋夜晚，傅连暲买了月饼和水果慰劳伍修权和伤病员，与他们一起赏月谈天。从那相识以后，伍修

权与傅连暲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根据毛泽东为适应战争需要和为红军培养医务人员的指示，傅连暲在福音医院创办了中央根据地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由傅连暲任校长。红军总部还给他派来了一位政委。这个学校的教员除了傅连暲兼任以外，还有陈炳辉、肖自高等。学时为两个月，第一期学员六十名，男女各半，都是从江西、福建挑选而来的优秀人才，但这些学员文化水平很低。为使他们在两个月内能掌握一般的医疗技术，傅连暲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实际，选择了部队中最常见的疾病和最常用的药物来编写课本，耐心细致地讲解、示范和指导。毕业时，学员们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大部分被分配到前方部队。毕业的那一天，红军总司令朱德专程从前线赶来参加毕业典礼，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勉励大家到前方去发挥重要的作用。

福音医院不但尽心竭力为红军伤病员治疗，而且也一贯地尽力给老百姓看病。一个寒冷的夜晚，傅连暲正在灯下编讲义，印刷工人毛焕章气喘吁吁闯进来，央求傅连暲救救他妻子的生命。原来他的妻子生头胎难产，请了个接生婆，经过一天婴儿还没生出来，大人小孩的生命均处于垂危之中。傅连暲立刻放下讲义，拿起药箱和接生工具，跟着毛焕章一口气跑到他家，很快检查出产妇的子宫破裂，情况很严重。傅连暲熟练地采取措施，不多久接出了

孩子，缝好了伤口，产妇婴儿都脱险了。

一九三二年春末夏初，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前来福音医院分娩，傅连暲为她安全接生一个小男婴，取名小毛。傅连暲的妻子刘赐福负责照看护理贺子珍，每天给她做营养菜，为小毛做衣服穿。

同年夏，毛泽东率东路军东征漳州，消灭国民党张贞一个师后胜利回到赣南。十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之后，由于长期的军旅生涯，劳累过度，来到福音医院老古井休养所养病。毛泽东在福音医院住院休养的三个月期间，坚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经常工作到深夜。傅连暲除了每天按时给毛泽东打针服药外，到下午五点钟，他总是准时邀请毛泽东到疗养所附近的北山散步。他邀请毛泽东散步，是为了让毛泽东借此得到一点休息。每次毛泽东都是非常乐意地接受邀请。每次散步，他都能从毛泽东那里听到许多他过去所不懂得的道理，使他深深了解到毛泽东所具备的渊博的政治军事知识以及多方面的才华，从而也更加敬佩毛泽东。

毛泽东特别嘱托傅连暲要注意培养医务干部，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他对傅连暲说："现在环境比以前稳定了，应该多训练些军医，我们很需要医生。"毛泽东还向他建议，让在东征漳州战斗中工作负责又能干的陈炳辉当福音医院的医务主任。

傅连暲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不久在福音医院内又开办

了中央红色医务学校。这个学校仍由傅连暲兼任校长，并由他主授药物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急救学等六门课程。他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课堂与临床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把学校办得很有成效。由于当时战争紧张，红军急需医生，因此还没等到这期学员毕业，各地就纷纷来要人。中央看护学校和中央医务学校，为红军培养造就了第一批医务工作者。这些医务人员在红军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在福音医院住院期间，傅连暲请毛泽东到他家作客。在谈话中，毛泽东对傅连暲的身世作了详细了解，热情地帮助他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毛泽东对傅连暲说："你能参加革命，和出身有关。你是被压迫阶级出身。"接着又说："要反对帝国主义，还要反对国内的统治阶级，我们才有出路。"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触动了傅连暲的心灵，使他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运动的认识。

此时的福音医院，实际上早已成为一座红色医院。只是为了到白区购买药品和订购报纸的便利，才保留着教会医院的名称。毛泽东将要离开福音医院的时候，对傅连暲说："我们要有个自己的医院，不要再叫福音医院了。福音医院是个基督教教会医院的名字，我们要把它改成中央红色医院，你看怎么样？"傅连暲很高兴地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又问："蒋介石的军队打来了，你怎么样？"傅

连暲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把医院搬到瑞金去。我们全家人也一起搬去！"

毛泽东在福音医院休养的三个月，是傅连暲深受教育和影响的三个月。他深深地感到，无论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毛泽东都给了他极深的影响。可以说，瞿秋白办的刊物使傅连暲从同情革命走上了革命道路，毛泽东的言语与行动则使傅连暲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和决心，使他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民族的希望，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光明的前途。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因为我深信毛泽东指示了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所以，自从结识了毛泽东，象是黑夜里见到了明灯，荒山中遇到了亲人一样，永远离不开毛泽东，永远离不开共产党。他暗自立下誓言："终有那么一天我能站在党旗下，向党交出一颗心，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一个共产党员。"这是一个信奉上帝的基督教徒，思想信念发生根本性的大转折时，发自心灵深处的心声和宏愿。

四

一九三三年初，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将汀州福音医院迁往瑞金叶坪杨岗下，正式创立了中央红色医院，任命傅连暲为院长，并兼任中央红色医务学

校校长。

傅连暲为了革命，不仅放弃了每月四百大洋的优厚收入，而且全家迁到瑞金，把整个医院和他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给了共产党和红军。一百七十个运输员，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医院搬完。仅傅连暲自家诊所捐献的药品就价值二千多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专门为此发表了题为《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称赞他是“苏区第一个模范”。

中央红色医院成立后，第一批接受了八十多个伤病员住院治疗。伤员中有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了重伤，炸弹片留在腹中，伤口化了脓。他被抬来住院时，情况很不好。傅连暲继续施以“保守疗法”，采取了排脓去毒、打针吃药、补助营养、保护伤口等措施，虽然因为伤势过于严重而未能治愈，但保全了他的生命。长征后，中央送王稼祥到苏联作手术，取出腹中弹片，伤口终得痊愈。还有红九军团政委蔡树藩，在福建沙县作战中，胳膊受了重伤，经傅连暲二三个月治疗，痊愈出院。伤病员中还有周以栗、伍中豪（红十二军军长）、方强等红军领导人。中央红色医院设有西医和中医，第一个中医师是从上海请来的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当时她年近六十岁，却竭力把自己的医术贡献给革命事业。杨振德老人与傅连暲都主张中西医结合，遇到疑难症，他们就一起会诊，确诊后中西药结合治疗，常常取得

显著疗效。他们的工作配合得很好，关系很融洽。傅连暲一家住在离杨岗下隔条小河的朱坊，那时邓颖超的身体不太好，傅连暲就请邓颖超和杨振德老人一起住到他家休养，生活上由刘赐福照顾。邓颖超和杨振德老人都非常和蔼可亲，傅连暲的孩子们都亲昵地称邓颖超为“满姑”。

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由兴国茶岭迁到瑞金叶坪，与傅连暲主持的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合并。中央红色医院即改为卫生学校的附属医院，傅连暲仍为该院院长。附属医院可收容三百多名病人，在中央根据地是设备条件最好、技术水平最高的医院，能施行比较复杂的手术，并拥有 X 光和比较先进的化验设备。

正当傅连暲满怀信心地为革命工作时，他受到了一次意外的严重的打击。当时，王明“左”倾路线盛极一时，闽西搞“肃社党”，江西抓“AB 团”。许多革命者无辜受害，傅连暲也成为“左”倾路线的迫害对象。有人说他这个基督教徒参加革命是假革命，还说他为郭凤鸣看病，当郭的“军医处长”，一定是敌人派到红军中来的内奸，逼着他承认给敌人做了内奸。傅连暲说：“我根本就没有做，承认什么呀！”于是，便说他是“反革命”、“AB 团”分子，要抄他的家，甚至威胁要枪毙他。以后又撤销了他的职务，剥夺了他的公民权利，准备把他送交司法部门审判。傅连暲有口难辩，处境十分险恶。后来他在回忆这件事情时说：“在危急之时，我到何叔衡那里去找，他只摇头；找毛主

席，因他本身已受打击也没办法；好在洛甫同志打电话救了我；又得王主任（即王稼祥——引者）的信才救了我的命。”

原来，张闻天（洛甫）听了傅连暲的申诉，立刻拿起电话筒，给当时卫生部的负责人打了电话。张闻天在电话上严肃批评了那位负责人说：“傅连暲的事你们不要再搞了，马上停止，要是不停止再搞下去的话，就处分你。”这样，傅连暲才得以解脱。可是，他的两个学生李主应、林雪庭医生，却因受他的株连无辜地当成“AB团”分子给杀害了。傅连暲为此苦闷过。但是，党对他的关怀和信任，温暖了他的心。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傅连暲被派担任大会医务工作。同年四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家医院，傅连暲被任命为院长。他又一如既往积极愉快地投入了工作。

九月，正当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在于都突然病倒了，高烧到四十一度，一连三天不吃不喝，肚胀，头痛，咳嗽不止。中共中央接到报告后，马上派傅连暲前往治疗。瑞金到于都一百八十华里，傅连暲骑了一匹骡子星夜赶路，第二天傍晚赶到了于都。他详细了解了毛泽东患病后几天来的情况，接着检查了毛泽东的身体，确诊为患了恶性疟疾。于是给毛泽东吃了奎宁片，注射奎宁和咖啡因。翌日，毛泽东的病情转危为安，体温开始下降，并能安稳入睡。到了第四天，毛泽东就恢复健康，又

开始工作了。毛泽东当时正在调查红军突围路线，他的健康和红军的存亡紧紧相关。所以，毛泽东及时得到治愈，人们都认为傅连暲在关键时刻为党立了一大功。

五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所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组织上考虑傅连暲的肺病还没有完全好，并且患有胃病和痔疮，担心他经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提议送他回汀州。对于一个基督教徒，有名望的医生，国民党不致对他怎么样，他仍可以继续办医院，过富裕舒适的生活。留在根据地主持工作的项英也劝他留在游击区。但傅连暲决心参加长征，他的要求得到了组织批准。

长征出发的时间非常匆促，傅连暲因忙于整理行军药品，来不及回家与亲人告别，只派一个人到他家，将他需要的药品和器械取来。刘赐福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脱不开身。他们的长子傅维光和女婿陈炳辉前往送行。傅连暲坚定地对儿子和女婿说：“我们一定要打回来的，毛主席一定会领导我们胜利的！”

长征队伍出发时，组织上知道傅连暲既不善骑马，又不会走长路，就照顾他坐轿，他很不愿意，因此每到一地，他除了看病，就练习骑马，部队进入广东境内后，他

就不再坐轿，开始骑马行军了。但他毕竟是新骑手，骑马并不安全，部队到达湘南南部的一条狭窄山路上，一边靠山，一边靠河，他骑着马想给后面的部队让路，哪知马一失蹄，连人带马掉下河里，马被急流冲走，傅连暲幸被救起。到了宿营地，毛泽东将自己盖的被子派警卫员送给他，蔡畅派人给他送来一匹骡子。党的领导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深深感到革命队伍里伟大的阶级友爱是无比深厚和温暖的。

长征途中，傅连暲仍担任医疗保健工作。敌人妄图阻止红军前进，沿途不断派出飞机向红军进行狂轰滥炸，傅连暲与医务人员一起冒着敌人的弹雨，为负伤的战友进行急救包扎。为了躲避敌机，部队改为日宿夜行了，到达宿营地时，大多是黎明的时候，傅连暲常常放弃休息，一到宿营地就背上药箱给战友们看病，看完了病，再回住地吃饭、睡觉。

在长途行军中，很多同志的脚走坏了，又因为常常挨饿，吃冷饭，各方面卫生条件都很差，红军中流行痢疾、疥疮、疟疾和腿部溃疡四大病症，药品奇缺，傅连暲就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强调部队注意饮食卫生，不许喝生水，不许吃不干净的食物。过雪山时，天寒地冻，奇冷异常，傅连暲建议每个指战员都吃一点辣椒，借助辣椒御寒。这些措施在部队进入草地之前都是很有效果的。

在漫长而艰苦的跋涉中，傅连暲克服重重困难，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上。当时担任军委卫生部长的贺诚在后来回忆傅连暲时说："傅连暲在长征途中继续为中央领导同志和战友治病。周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患重病，他参加过治疗。在草地上，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伪中央，我们一起被裹挟到四方面军去，当时我受到严密监视，无法工作，他就拖着瘦弱的身子，设法为朱德、刘伯承等治病，照料他们的身体。任弼时同志的爱人陈琮英在阿坝生小孩，他为之接生，还把自己的面粉送给她补养身体。康克清同志患伤寒病，也是他治疗直至痊愈。"过草地时，王树声、邵式平患严重肠伤寒，一边治疗，一边坐着担架走，也是傅连暲给治好了。

红军女干部有好几位在长征途中分娩，都是傅连暲为他们接生。刚过赤水河以后，悲惨的遭遇再次降临到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身上来了。一天晚上九时，在傅连暲医生的看护下，她生下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在甘肃岷州三十里铺，红二方面军保卫局长吴德峰的妻子生了一个女孩，也是傅连暲给接生的。在会宁，他为电台台长罗岳霞的妻子接生了一个小男孩。傅连暲还救过一个"特殊连队"的女红军，帮她把小孩接生后，她无法带养，他就留下一些钱，把婴儿送给藏民收养。

红四方面军在藏族地区，曾受到伤寒病的严重威胁，直到红四方面军离开西康，这种病魔老是与四方面军为伍。傅连暲对于这次防御和医治伤寒症，有过极大的贡

献。在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又缺乏燃料，烧煮食水，往往不易达到摄氏一百度，因而不能将水中的细菌全部消灭。傅连暲认为，食水不洁是引起伤寒及其病症的主要原因。根据他的建议，在火炉旁安置一个牛皮箱，增加火力，使食水能煮达一百度。这样，不仅可减少伤寒症的蔓延，同时也减少了其它的疾病。当时非常缺乏药品，对于伤寒病无能为力，傅连暲便采用中医的医治方法，救活了不少人。

由于傅连暲的卓越贡献，张国焘想拉他当卫生部长，但他没有答应，并拒绝说："给你们当医生不是很好吗？"不久，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得了感冒，扁桃腺发炎，没有甘油，傅连暲就改用自制的杏仁水，药量开大了点，他的这番好意却被人暗中向张国焘告了一状，说这个药方是毒害人的分量，从而引起了张国焘的怀疑。张国焘把傅连暲找去当面质问，好在傅连暲一路上背了一本《贺氏疗学》，其中说明医生开药，有可能开得过量时，药剂员可给医生看后修改处方。这样，傅连暲才又一次避过了灾祸。

一九三六年六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部队里流行红眼病。傅连暲到粮食总局运输连给同志们检查身体，详细讲解了防治红眼病和其它疾病的办法。之后，经粮食总局局长何长工同意，从运输二连挑选了林月琴、陈真仁等四位女战士，加上原有的四女、六男，一共十四

位男、女同志，组成一个医疗培训班。这时，红四方面军开始第三次过草地，傅连暲既是医疗培训班的领导，又是教员，白天带领他们行军，晚上给他们上课，讲解药物知识，教他们如何治疗、护理。他采用实物教学，拿出一种药品，从药名、功能，一直讲到用法和用量，还让每一个人闻一闻气息，尝一尝滋味，辨别颜色和形状。一次讲一种药，或讲一种病。采用这种教学方法，大家都觉得易学、易记，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一边过草地，一边学医，还要为战友们治病，长征结束时，这个医疗培训班也结业了。这些同志立即走上了工作岗位，为红军的壮大准备了医务人员。

自从长征后，傅连暲与家里完全失去了联系。红一方面军进军遵义，城里有一家药铺，傅连暲曾通过这家药铺给刘赐福写过一封信，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的回信。在途中，他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他的消息，还听说刘赐福已被敌人杀害，孩子们下落不明。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十一月，红军总部来到宁夏的同心城，这时，傅连暲与陈真仁在共同战斗生活中，逐渐产生了感情。

陈真仁，原名陈锦云，一九一九年生于陕西宁强县烈金坝一个革命家庭。她排行第九，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她一家除了母亲有病和几个姐姐出嫁外，三个哥哥，三个嫂嫂，三个侄女，加上父亲和她本人，全家十一口人参加了

红军。她的大哥陈锦章一九二四年在上海艺术大学教育系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汉中地区早期的优秀党员，曾任中共陕南特委委员；二哥陈春舫，一九三〇年就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陈真仁在大哥和二哥的教育和影响下，从小就开始参与地下活动，她虽然年纪小，办事却很机灵，成了地下党的一个可靠的小交通员。一九三五年，十六岁的陈真仁随全家参加红四方面军，不久便踏上了红军长征的道路。她的父亲、哥哥、嫂嫂相继光荣牺牲在长征途中，她也经受了千难万险，一年以后，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粮食总局运输二连当文书，不久又被调去跟傅连暲学医。陈真仁敬重傅连暲，觉得象他这样的名医，放弃优越的生活，毅然参加长征，很不简单。傅连暲也喜欢陈真仁学习认真，工作勤快。因此，他俩愿结伉俪的要求，得到了党组织批准，同意他（她）们结为夫妻。朱德听说到这个消息就对傅连暲说："同心城这个名字很好，你们就在同心城举行婚礼吧！"举行婚礼那天，朱德特地买了两只羊送给他们。红军其他领导人也都来参加。美国医生马海德因事路过同心城，也前来祝贺。在长征胜利时刻举行的这个婚礼，充满了喜庆的气氛。晚上，婚礼刚结束，胡宗南的部队从南面追上来，红军连夜紧急出发。这对新婚夫妻随部队接连几天几夜急行军，直到红军在山城堡打了一个大胜仗，才住了下来。

同年底，傅连暲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县。他自从

在毛儿盖与毛泽东分别后，一年多没有见面了。他一直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一到保安就去看望毛泽东。原来有不少同志以为傅连暲身体虚弱多病，难以爬过雪山草地，还有人传说他牺牲在草地上了。乍一相见，毛泽东高兴得连声道："哎呀，傅医生，你还活着，活着！"是的，他不仅活着，还奇迹般三过雪山草地，这一切都是因为党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当然也是他自己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革命意志的结果。当晚，毛泽东挽留傅连暲夫妻吃饭，毛泽东热情地说："我今天请客，慰劳傅医生夫妻，还有大家。"周恩来、朱德、邓颖超也来了。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谈笑风生。邓颖超风趣地对陈真仁说："朱毛可不是猪身上的毛。"她指着毛泽东和朱德说，"朱毛就是他俩。"说得大家开怀大笑。

这天晚上，毛泽东留傅连暲夫妻住在他们那里，陈真仁和刚生孩子的贺子珍同住一孔窑洞。毛泽东和傅连暲一直谈到深夜。

第二天，毛泽东看到傅连暲夫妻没有穿棉衣，便叫总务科长黄祖炎派人赶做了两套灰大衣和两套棉衣送给他们。

中共中央从保安迁到延安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医院，傅连暲任院长，并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一度，毛泽东眼睛有病，还得常常熬夜，眼病很不容易好，傅连暲每天早上给毛泽东精心治疗，终于把毛泽东的

眼病治好了。

一九三七年，有一位法国记者在延安获悉傅连暲曾是一个基督教徒时，感到十分惊讶，特地请他发表谈话。傅连暲以亲身经历，介绍他如何从一个基督教徒走上革命道路，即使是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也从未动摇过。法国记者非常感兴趣地连连问他为什么呢？傅连暲回答说："我留在红军中这么多年（十年）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第一，我感觉我是属于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阶级；第二，我受了共产党教育家瞿秋白氏的感动；第三，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因为红军在最初时虽然有许多伤病员，然而没有医生，我就感觉到我应当去做这个工作。红军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真正人民军队——这个事实我从多年经验中认识清楚了，它是一个保护祖国和人民群众的最有纪律的军队。……还有，我之所以留于红军中，则是因为我深信它指示了我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

这次谈话，被法国记者整理成文，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发表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上，还印成了小册子发行。一九四九年七月，《人民日报》曾以《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医生傅连暲氏在中国红军内十年的经验》为题，并加了编者按后重新发表。这篇谈话，对于不同信仰的人，对广大知识分子都有强烈而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六

傅连暲参加革命后，曾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起初，有的同志认为他暂不入党对革命更为有利，更便于为党工作，后来毛泽民要介绍他入党时，又因肃反扩大化，他蒙受诬陷而未能实现。

在延安，傅连暲患有痔疮，白求恩大夫给他开了刀。在他休养期间，张国焘作为边区政府主席来看望他。为了表示感谢，他给张国焘写了一封信。就在这几天中，张国焘逃跑了。这样，有人怀疑他与张国焘有瓜葛。他因此再次蒙受不白之冤，被审查三个月之久。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因牙齿不好，派傅连暲到西安去买药，并请一位牙科医师来医治。那时西安是反共中心，情况很复杂。傅连暲离开延安前，他向党组织送交了入党申请书，并表示要很好完成这次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他到了西安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帮助下，采购到一批延安紧缺的药品，也请到一位牙医。之后，他与吴玉章一同乘汽车回到延安。任务完成得很圆满很成功。毛泽东高兴地对傅连暲说："你可以入党了。"嗣后，毛泽东和陈云亲自介绍傅连暲参加了中央党训班学习，然后由党训班班主任王德和胡嘉宾作介绍人，傅连暲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七日被正式批准入党。一个基督教徒经过血与火的战斗洗礼，在完成了世界观的巨大转变之后，终于成

为了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就在这时期，傅连暲获得消息，他的母亲早已离开人世，刘赐福和孩子们经过一番浩劫后活了下来。他的女婿陈炳辉（共产党员、中央红色医院医务主任）和女儿傅维莲，长征时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也都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

一天，毛泽东对傅连暲说："请周恩来在西安给你家里寄点钱，先试试，能收到以后再多寄些。"毛泽东说过之后，还就此事给有关负责人写了批条。

长征前夕，组织上曾将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人和毛泽东的孩子小毛交给刘赐福照顾抚养。刘赐福深感这是党对她最大的信任，不管今后将遇到多大的艰难困苦，她勇敢地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她向组织上保证："有我在，就有邓妈妈和小毛的安全。"

这时的小毛有两岁多了，已学会自己走路，他长得很象毛泽东，活泼可爱。刘赐福有维清、维光、维康三个小孩，小毛跟着他们一同叫刘赐福"妈妈"！这样，在别人看来，还以为四个都是她的孩子呢！

长征队伍出发后，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过了十多天，邓妈妈由组织派人接送到长汀四都去了。傅连暲的母亲也回长汀与傅连暲的四姐、六姐一起生活。接着，刘赐福领着四个孩子转移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上堡。就在这时，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妻子贺怡也来到上堡，她

把小毛给抱走了。贺怡说她是小毛姨妈，又是婶婶，请刘赐福放心。

贺怡把小毛抱走以后，又把小毛托给了一个农民家里抚养。一晃就过了十五年，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派人和贺怡一起到江西、福建找小毛，结果贺怡所乘的汽车在途中翻车，她和司机都死于车祸，小毛也就至今下落不明。

一九三五年夏初，刘赐福带着三个孩子几经磨难，最后回到了长汀老家。回长汀后，她才知道婆婆已经去世，四姐、六姐的生活都非常困苦。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刘赐福每年都能收到二三次从西安（后重庆）汇来的钱，一直到一九四六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才停止汇钱。

一九三八年以后，傅连暲一直担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同时兼任中央医院院长等领导职务，并继续负责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他每天骑着一匹骡子，在延安山沟里转来转去，除了给领导同志看病，还抽空给学校、保育院和附近老百姓看病。他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和尊敬。

当时边区的医药卫生状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群众。""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边区政府为迅速发展边区卫生事业，改变卫生落后的面貌，于一九三七年十月筹建边区医院，委

任傅连暲为第一任院长。傅连暲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积极组织力量在嘉岭山挖出一排新窑洞，创建了能收容一百余个病人的边区医院。边区医院对群众看病，全部实行免费，病人住院只须自带伙食。

一九三九年，傅连暲又在延安李家湾创建了中央医院。参加筹建的同志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挖掘建筑了九座窑洞，作为病房、办公室和生活用房。医院内设有妇产科和内外科，划分了病室，妇产科有五个病室，是该院主要的部分，一般可容纳产妇二十五人。还有内科五个病室，外科七个病室，可容一百个病人住院。这个新办的医院在同年九月六日开始收容病人，十一月七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幕仪式。新四军代表张鼎丞和边区政府领导人出席并发表讲话。《新中华报》专门为此发了报道。该院为团结边区医务人员，研究医药理论与交流经验，造就卫生人才，还成立了医药讨论会及护理训练班。该院热情为群众服务，头五个月就接受住院群众占全院住院病人的15%。傅连暲经常亲自为群众看病，打预防针，下厨房和炊事员一起劳动，一起想方设法“粗粮粗菜细做”，共同研究调剂食谱，尽量使伤病员吃得可口，得到较好的营养。此外，傅连暲领导的中央总卫生处，四月份至六月份三个月中，替群众治病就用去医药费达七十万元。

傅连暲十分重视中医中药工作，在兰家坪设的中医门诊部，是延安第一个中医门诊部。在延安石圪垯中央疗养

院，集中了瞿宪文、唐继宗等著名中医，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对名医朱琏、鲁之俊等的针灸工作，到处宣传和大力支持，使曾奄奄一息的中医事业，又逐渐发展起来。

傅连暲还非常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善于团结帮助和积极争取他们走向抗日救国的康庄大道。在国统区的何穆、李志中、李得奇、周泽昭等著名医师，在他的影响下，克服千难万险，不远万里奔向了延安。对已经到达延安的一些中国红十字会的专家如魏一斋、金茂岳、侯健存等，傅连暲都很重视，非常关心他们，后来当红十字会奉命调离边区时，怎么说他们也不肯走了。

在此前后，许多外国医务工作者，也不辞辛劳和危险纷纷远道而来帮助中国抗战，进行医疗救护工作。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苏联的阿洛夫，美国的马海德，印度的爱德华、柯棣华，印尼的毕道夫，奥国的傅莱，德国的米勒，捷克的罗别愁等，世界上著名的医生，先后来到延安。傅连暲热情积极地支持他们工作。白求恩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后，傅连暲写了《学习白求恩同志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一文，要求自己和广大医务工作者都向白求恩学习。

为推动边区的防疫卫生运动，一九四〇年四月，由李富春、傅连暲、李景林、饶正锡等发起，在延安各界组织了延安防疫委员会，掀起了群众性的防疫卫生运动。同时，傅连暲还十分重视边区的妇幼保健工作。因此，他被

授予模范妇孺工作者的称号。一九四一年，傅连暲等二十七人再次荣获模范妇孺工作者的称号。

一九四〇年冬，延安出现了罕见的寒冷天气，很多人得了伤风感冒。傅连暲积极组织前线各战区卫生医疗单位投入防疫工作。他还以高度的热情，带领卫生工作人员，奔赴各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一天，他冒着严寒，到陕北公学给师生们看病并宣传防疫常识，在操场上做了卫生防疫报告。一场报告刚结束，住在山上的其它几个班的学员又赶来了，要求他再作一次报告。傅连暲继续讲起来，他说："伤风、感冒虽不算大病，但它能诱发许多疾病。所以，同志们千万别小看它，得了病应该好好休息和治疗。"接着他给大家介绍了不少防治感冒的小办法。比如用淡盐水漱喉咙，自我按摩风池、迎香等穴位，喝些辣椒汤、姜汤等。最后他还风趣地说："我治感冒的方法还有一条，叫多喝开水，有人不信，还送给我一个绰号'开水医生'（会场大笑）。同志们不要笑，喝开水不仅有益于防治感冒，还能防止其它一些疾病呢。比如不好喝开水的人就容易发生便秘。"傅连暲作完报告，天全黑了，同学们怀着感激的心情，不愿离开会场。有人带头高呼："感谢傅处长，欢迎常来作报告！"

这年，傅连暲因疲劳过度，身体十分虚弱。他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为了表示自己对党对革命的坚决和忠诚，向中共中央写了遗嘱和要求，其中有非常感人的一段话：

“我不但生前坚决于革命，即死后亦要为人民服务，我死后把我的骨头作标本教医学生之用，更可以看出我的骨头之坚固，亦就答复了有人怀疑我政治动摇无稽了。所以要求中央把我的骨头留下，并命名为‘傅连暲的骨骼’。”

一九四二年，中央总卫生处在杨家湾建立卫生点，傅连暲派防疫专家马兴惠去抓点。他说：“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一切都是为人民的。再说这个村距杨家岭二里路，就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身边，也应首先搞好。”傅连暲还亲自到杨家湾召开卫生动员大会，他要求大家齐动手，把各家窑里和院外打扫干净，家家建立厕所、猪圈、鸡圈，干干净净过个春节。他还说：“有了病要找医生，不要求神信鬼。讲迷信会上当的、误事的。据我们调查，好多病都是不讲卫生引起的，而靠迷信鬼神治病就越治越糟。我们要相信科学，靠讲卫生来防病。眼下大家还很穷，看病买药有困难，就是将来富了，也要讲卫生，才能少生病。用我们的行话说，这叫‘预防第一’。”通过动员大会，杨家湾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开展起来了，经过两年多时间，杨家湾的卫生面貌有了很大改观，被边区政府评为“卫生模范乡”。他们的先进事迹登上了《解放日报》，新华社也发表广播，轰动了整个解放区。

一九四四年春节，中央总卫生处自编自演了《护士拜年》和《全家欢喜》两个宣传卫生的小型秧歌剧。傅连暲从节目编写、排练到演出都亲自参加讨论研究。演出后，

军民反映都很好。因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李富春、邓发、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都曾出席观看。接着，傅连暲领导总卫生处在延安南门外，举办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卫生展览会，用实物、图表、漫画等形式展出了正反两方面的卫生典型事例。展出前，毛泽东在百忙中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参观检查了展览内容，毛泽东还为展览会亲笔题了“为全体军民服务”七个大字。开展后，连续几个月，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各县参观后，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卫生科，召开了反巫神大会，开办了“老婆娘”（助产老太太）训练班，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群众性卫生运动。

不料，这期间因为一件意外事故，又牵连了傅连暲。就是王明因病住在中央医院，主任医师金茂岳开的药，用量大了一些，王明服药后身体不适。王明有一颗快要掉的牙齿，偏偏在这时候脱落了。于是，王明的妻子孟庆树硬说傅连暲想通过金茂岳要害死王明。中央派王首道主持开会调解。孟庆树在会上大发雷霆，甚至企图嫁祸于中央领导，硬要傅连暲承认中央指使谋害王明。傅连暲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孟庆树听后就象泼妇一样，抓起椅子要砸傅连暲。傅连暲见她蛮不讲理，就不理她走了。后来，事情总算弄清楚了，这完全是一件偶然的小事，更说不上与傅连暲有什么关系，一场风波总算平息。

雾消云散之后，迎来了明媚灿烂的金秋。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正值傅连暲五十诞辰，中共中央破格为他举

行祝寿会，《新华日报》还专门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延安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和许多同志都参加了祝寿会。外国医师马海德等也高兴地到会贺寿。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十位中央领导人联名给他送了“治病救人，长命百岁”的贺词。徐特立、谢觉哉等送了他们的亲笔赋词。还有许多同志和单位送了贺词、贺幛。

周恩来在代表中央的讲话中指出：“傅连暲参加革命队伍，加入共产党，这是党的胜利。我们之所以给他祝寿，是因为他是有功之人，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感谢他。”

毛泽东虽然那天因为工作忙未能参加，第二天看到傅连暲时，紧紧握住傅连暲的手说：“祝贺你五十大寿！”在延安，毛泽东还曾赞扬过傅连暲，说他一下了革命的决心，就再不动摇。

祝寿会上，徐特立也赋有一首长诗，其中一段这样写道：“今日寿连暲，所寿也在此，南昌暴动时，连暲工作始，至今十八年，服务未终止，当时非党员，工作不懈弛，党外拥护党，连暲是典型。入党十年来，前后等殷勤，精神在实际，作风师列宁，虽无赫赫功，积累等长城……”

一九四五年，中央军委总卫生部成立，傅连暲任副部长，同时还兼任中央卫生处处长，党内又任命他为军委总

卫生部总支书记。

傅连暲向来诚实待人，刚正不阿。但是，他也常常因此多次吃过亏，蒙受冤屈。在延安，傅连暲也曾对江青影响毛泽东健康的行为，提出过批评。为此，江青对他一直记恨在心。

一九四六年，傅连暲跟随中央工作委员会迁到了河北省西柏坡。傅连暲到达西柏坡以后，筹划建立了建屏医院。因医院建在建屏的朱壕村，所以惯称朱壕医院。它的前身也就是中央医院。医生、护士大部分是从中央医院调来，工作任务性质也跟过去一样，照样给附近老百姓免费看病。

同年冬，康生在晋绥边区的土改中推行极左路线，许多党员、干部惨遭迫害。昔日有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刘少白，也未能幸免，身陷囹圄，遭受残酷斗争，就连家属也被扫地出门。傅连暲对此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写信给毛泽东，坦率地谈了这些意见和看法。他写道："去年土地改革方针是正确的而且有成绩的，但某些地方，某些干部，执行时又犯了'左'的错误，伤人不少，死人亦不少。真正恶霸死伤个把情有可原，若侵犯了中农甚至伤害了贫农，以及少数的干部，那就不应该的。尤其是一脚踢开更要不得。比如某某（指刘少白——傅连暲另有说明）在三三制时代对我有功，其子女又是党员，应该当作别论，决不能'过河抽板'"。

当时，中共中央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口号，解放大军在全国发起了大举反攻。这时，傅连暲的身体很不好，日见衰弱，但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因此他在信中还向毛泽东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建议“全国胜利时是否建都北平”；第二，他再次恳切要求，“若活不了的话请批准将我的骨骼留交医大（或将来我们的中央医学院）学生学习之用。因我这副骨头在医生中有革命意义的，经过了革命严格考验的。……较之买一副普遍骨骼作标本，其价值不可同日语，此种要求如蒙批准，请命名‘傅连暲之骨骼’，那么感激万分了！”

毛泽东收到傅连暲的信后，很快就给他写了回信。回信说：“连暲同志：来文悉，很感谢！我身体近来更好些。你身体有病望于工作中保重。此祝健康！毛泽东，十一月十日”。当时，毛泽东还在陕北杨家沟指挥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同时指挥第二、三、四野战军各个歼灭国民党军，正处于紧张繁忙的战争时期，能在日理万机之中及时给傅连暲回信，说明毛泽东对傅连暲所提问题的重视，以及对他身体的关怀。毛泽东如此关心他人，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其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使傅连暲万分鼓舞和深受教育。他表示：“不愿随便死去，活一天做一天”，“把自己完全贡献给革命”。

一九四八年中秋节，傅连暲五十五岁生日时，谢觉哉

书赠一首长诗赞道：“寿人寿国功在党，傅公名应列首榜……”

傅连暲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又一次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七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傅连暲随中央和毛主席进入北平城，朱壕医院也随迁北平并接收了北平医院（原为德国人开办）。这样，保健医疗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和提高。一九四九年下半年，经中央批准，傅连暲建立了中央保健办公室，他亲自主持办公室工作，负责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和中央直属机关的卫生工作，以及北平医院的工作。傅连暲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特别是对中央保健工作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亲手制订了一整套中央保健工作制度。他对保健工作的管理很认真，很具体，医生们定期向他汇报，遇事可以随时向他报告，甚至医生开的处方他也要亲自过目。建国初期，不象现在有科学的化验方法，一种新药开用之前，傅连暲都要亲自尝尝，扎针也要先给他扎，经过试验观察，他认为确实无副作用，才给中央领导人使用。由于他的工作一丝不苟，所以中央保健办公室建立以后，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医疗事故。中央领导人对他也非常信任，只要是傅连暲给的药，

没有谁不放心的。

傅连暲的身体很瘦弱，早年得过肺结核，以后又患胃病，每日吃得很少，吃什么都要煮得很烂，连苹果也要蒸熟了吃，吃点硬的东西胃就受不了。他长期抱病坚持工作，他的卧室也就是办公室，坐着办公时间久了，身体支持不住时，他就半卧着办公。他对工作不分昼夜，既没有上下班时间，也没有星期天、节假日，几十年如一日，就象一个长期站岗的“哨兵”。他及时听取同志们的工作汇报，不厌其详地提出防止任何差错的意见和措施。送给他的工作报告，他都要逐字逐句地详阅，对问题及时答复，是就是，否就否，从不拖延，也不模棱两可。他布置一件工作之后，总要不断督促检查，直到落实为止。他每天晚上必做的一件工作，是把明天需要办的事，用毛笔大字简单地记在一张纸上，以免忘记。他说：“周总理的工作精神，我们一时学不到，可是总要一步一步地学啊。”傅连暲身体力行，言行一致，真正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上。他时时不能忘怀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健康，他多次给他们写报告，请他们注意劳逸结合，也常常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而食不甘味，寝不安枕。

几年后，傅连暲年过六旬，有些工作自己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使中央保健工作后继有人，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他让计苏华担任他的助手，毫不保留地把保健工作

的经验体会传授给他，支持他做好中央保健工作。计苏华一九三八年入党，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后来留学美国胸外科，一九四九年回国，在山东白求恩医院工作。傅连暲发现计苏华党性好，医务水平高，经向周恩来建议，将他调到北京医院任副院长、中央保健局副局长。计苏华工作作风也真象傅连暲，几十年如一日，不管什么时候，一心扑在工作上，被人称为“第二个傅连暲”。可惜这样一个好同志，在“文革”中也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

此外，傅连暲为把自己从事三十多年中央保健工作的经验体会总结出来，他根据一九四五年陈云同志在延安七里铺病中曾指示，把参加保健工作的经验总结一下，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彭真同志的同样指示，于一九六〇年“七一”党的三十九周年纪念日，在病休中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如何加强保健工作，保护中央和各级领导同志的健康》的书面总结和建议，他写道：基于“我们党的领导同志都经历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活，在那些年月里不少同志的健康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损害，到了老年，在少数同志之间，就可能发生某种慢性病”。所以他提出：一、加强预防措施和战胜某些慢性疾病的问题；二、健全各级保健工作的组织和培养扩大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保健队伍；三、加强对于……有关疾病防治方法和抗衰弱老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另外，为使未患病者得以有效预防，已患病者获得积极地治疗，适宜地调护，以达到祛病延年的

效果，他提议：1、贯彻“劳逸结合”的精神，建议中央订立一种休假制度；2、建立健康检查制度；3、日常生活方面要“三注意”。他的报告通篇倾注着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和热爱，对进一步做好保健工作，健全保健制度，都起了十分宝贵和重要的作用。

一九五〇年一月，傅连暲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八月，他当选为中央医学会理事长。一九五二年他出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主要分管中央保健工作和中华医学会的工作。

中华医学会于一九一五年在上海成立，傅连暲在一九二五年前曾是该会会员，一九三一年八月，他还热心为中华医学会购置上海池浜路会所，捐助购置费大洋一百元。解放前，中华医学会不受重视，会员很少，活动很难开展。傅连暲当选为理事长以后，中华医学会成为中央卫生部指导下的医药卫生界的学术性组织，又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中西医广大知识分子的组织。傅连暲对中华医学会的工作十分重视，为有利于工作，他将中华医学会从上海迁至北京东单，因为房子不够用，他又出面申请拨款，为中华医学会盖了一座五层办公大楼和一座大礼堂，设立了“会员之家”，建立了图书馆。

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傅连暲发动中华医学会会员组成首都志愿手术队奔赴朝鲜战场，在首都志愿手术队的带动下，各地

志愿手术队、医疗队、医防队、公共卫生队纷纷奔赴朝鲜前线。

一九五二年一月，美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在朝鲜战场上的惨败，竟不顾人道，违犯公约，在朝鲜北部和我国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撒布大量带有细菌的昆虫、毒物，向中朝人民发动罪恶的细菌战。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激起了中朝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无比义愤，周恩来总理为此发出严正声明和抗议，毛主席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伟大号召。三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周恩来亲自担任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傅连暲担任防疫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傅连暲主要负责反细菌战的科研工作和宣传工作。为此，他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优秀的细菌专家、昆虫专家、植物专家、病理专家、临床专家、流行病学专家，组成防疫检验队，前往疫区考察，一方面以科学的证据揭露美帝细菌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对反细菌战进行卫生防疫指导。美帝国主义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企图抵赖细菌战的罪行时，傅连暲立即组织二十余位专家参加抗美援朝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确凿的细菌实证；之后，派出代表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特别会议，在大会上作了揭发和谴责美帝国主义发动细菌战罪行的报告。由六国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

会”来到我国后，傅连暲大力协助他们进行工作，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科学的证据、确凿的材料，使调查委员会及时写出了调查报告书，公诸于世。傅连暲在这些繁忙的日子里，废寝忘食地认真审查有关反细菌战的电影、幻灯、书报、画册等宣传品，领导和布置举办“反细菌战展览会”，后来又将此展览送到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展出。所有这些，对粉碎美帝细菌战，对保卫世界和平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八

团结中西医，发展和实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指导卫生工作的一贯方针。傅连暲深刻认识到这一方针的重要性。一九五四年，他在《人民日报》、《中华医学杂志》发表《关健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的文章，把团结中西医，提高到“是关系到人民健康的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医学发展的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对全世界人民的科学贡献的问题”的高度来认识。

医药卫生界知识分子很多，他在工作中注意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信任和爱护知识分子，尤其注意团结中西医老专家，常跟他们谈心，交朋友，帮助他们了解党的政策。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为人正直，但从不过问政治，对共产党缺乏认识，后来她在傅连

暲的真诚帮助下，逐渐靠近党，对党建立了正确的认识和深厚的感情。内科专家，协和医院院长钟惠澜，一九五八年在医药卫生界开展所谓“拔白旗”期间，中央派他到四川，那里有四个专区出现了大面积的一种流行瘟病，来势迅猛，死亡者甚多。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均认为这是鼠疫合并亚洲型流感，封锁了疫区，断绝了成都市内外及川藏公路的交通。钟惠澜前往现场调查后，很快判明该流行病实为钩端螺旋体病，因而两天后即解除封锁，恢复交通，并采取了相应的预防和医疗措施，制止了该病的流行。可是，钟惠澜在四川辛勤工作期间，北京却把他当成了“拔白旗”的对象，受到大字报的讨伐。傅连暲从南方养病回到北京知道此事后，及时进行纠正，并亲自带人到钟惠澜家中，代表组织向他赔礼道歉。对此钟惠澜深为感动。他从傅连暲正确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温暖。对内科专家张孝骞、外科专家周译昭、研究鼠疫的老专家方石珊等，傅连暲都能从政治上关心他们，充分信任和支持他们的工作，从而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傅连暲还与北京中医界四大名医肖龙友、施今墨、孔伯华、蒲辅周结为好友，常来常往。专家们都把傅连暲当作自己的好领导，又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他们心里有什么话，都愿意跟傅连暲说；傅连暲对专家们有什么的看法，总是当面指出，诚恳帮助，从不背后议论。因而他深受中西医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和爱戴。

傅连暲强调西医学习中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中医西医的互相贯通，最后发展为一个医。这一个医就是具有现代化自然科学基础，吸收了中外一切医学成果的中国新医学。”他自己是个西医，为了带头学好中医，他虚心拜中医为师。一九五三年，他积极指导成立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支持老中医彭泽民当主任，自己当副主任。他给中央领导人看病，也请中医一道参加会诊。只要有空，他就抓紧学习中医书籍，用自己的行动来积极推动中西医结合。

傅连暲十分重视医学学术的发展及科普工作，在他的领导和努力下，中华医学会自一九五〇年开始，除原有的《中华医学杂志》外，又陆续增办了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十六种医学杂志，这些杂志成为我国医务工作者重要的学术交流园地，也是医学学术界的高级理论刊物。

但是这些杂志的问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了办办停停的曲折过程。一九五三年，在一次学会全体理事会议上，有人提出《中华医学杂志》不应出外文版（英文版），并说英文是敌人的语文，出英文杂志是放毒。这种荒谬的极左言论吓得当时的外文版总编也坚决不当总编了。然而傅连暲却不以为然，他鼓励说：这个杂志我们很重视，要通过它来对外宣传新中国医药卫生方面的成就，这也是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有力工具。同时，通过

发行杂志，我们不用外汇可换世界各国的医学杂志，得到很多科学情报。在傅连暲的支持和关怀下，才一次次把遭遇责难的杂志恢复起来。

为了提高我国医疗水平，促进学术交流，一九五三年，中华医学会开始举办综合选题学术讨论会。这年的四月至六月，傅连暲发起并主持举办了四次高血压症的学术座谈会。继而，又于七月至八月，他主持举办了五次糖尿病专题学术座谈会。

一九五三年四月，人民卫生出版社收集了傅连暲近二三年在《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编为一集，取他的第一篇文章《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作为书名出版。全书共十九篇文章。每篇文章都充满傅连暲强烈热爱自己职业的高尚思想。他写道："我在革命队伍里做医生，将近三十年了。我热爱自己的职业，在任何困难情况下从未想过改行。我最喜欢人家称呼我傅医生，这使我特别感觉到我对人民健康所负的责任。"接着，他深有体会地写道："当我置身于病床之侧，面对病人的时候，我会感觉我责任的重大和我所从事的业务的神圣。帮助病人战胜死亡的威力，帮助病人解除痛苦，使倒下的病人重新起来，……这不是很神圣的业务吗？"此书发行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先后再版四次。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傅连暲选择他过去积累的二十七篇医学科普文章，集为一书，以《养身之道》为书名交

付出版。这本书中的《如何用脑》、《工作与休息》等篇详细阐述了养身之道，在《蔬菜的营养》、《谈谈吃辣椒》中就烟酒嗜好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一些较为复杂的疾病也有论及，如《谈癌》、《高血压》、《动脉硬化和心肌梗死》、《什么是糖尿病》等篇，对这些常见病介绍了防治的常识。

傅连暲这些文章的动机，他在前言里写得很清楚："我经常收到许多同志从祖国各地寄来的信件，向我询问关于一些疾病的发生、预防和治疗的道理，我很感谢这些同志们对我这个老医生的信任，同时我也感觉到，如果用一种通俗的语言，介绍些保健与疾病作斗争的常识，对于广大的群众来说也许是有益的事，因此我连续在《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写了一些短文。"

《养身之道》一文，以饱满的革命热情，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富有科学性，又洋溢着诗情画意，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宣传"活着是为了革命，为了劳动，决不苟且偷安"的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生观。提出防衰老和对付老年性疾病要有革命的斗志和乐观主义的精神，要参加劳动锻炼，要搞好卫生保健。这本书使广大读者从中吸取到许多宝贵的医学知识和精神力量，受到广泛的欢迎，先后再版了六次。第五次再版时，书名改为《健康漫谈》。"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把这本好书诬蔑为"大毒草"，肆意攻击和歪曲。但是，这

本书由于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和赞扬，在林彪垮台后又于一九七五年五月第六次再版。一九八〇年，此书荣获全国首届医药卫生科普创作一等奖。

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华医学会与中央广播事业局联合成立医学广播委员会，傅连暲任主任委员，由他主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辟了“卫生知识讲座”，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卫生科学知识。

傅连暲在这个委员会任职期间，进一步领导开展了医学科学的普及工作，使更多的人获得了卫生知识。

一九五五年，傅连暲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解放军总后勤部机关“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林彪死党邱会作秉承林彪旨意，在总后党委会议上首先发难，说：“卫生部不烧傅连暲就是没有党性。”诬蔑傅连暲“反对毛主席”。邱还指令一位常委：“卫生部一定要烧透傅连暲，对傅连暲烧不透，由你负责。”九月二日，邱会作又在总后党委会议上煽动说：“你们揭出傅连暲是最大的成绩，他是个好大的毒蛇，他放过毒，林总一九五一年病很重，他说林总娇生惯养，把林总气坏了。”一语道破天机，原来傅连暲没有什么错误，而

是得罪了林彪，所以林彪要趁“文革”之机，非置傅连暲于死地而后快。

早在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时，中共中央本拟委派林彪为志愿军司令员。但是，林彪称病拒不出任，自称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已经到了“见风感冒，见水拉稀”的地步。鉴于林彪长期称病，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指示傅连暲组织专家对林彪会诊。傅连暲组织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名医，肖华代表中共中央一起参加了会诊小组。会诊前，叶群在林彪授意下，暗示傅连暲给林彪开个有病的证明。傅连暲没有听从他们的摆布。他根据医生们全面检查的结果，也出于好意告诉叶群，林彪没有什么大病，劝林彪要改变生活方式，屋里要通空气，要见阳光，要多喝水，要多吃青菜、水果，并要散步。然后，傅连暲如实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汇报会诊情况。毛泽东对林彪装病早有察觉，于是手书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赠给林彪。毛泽东书赠这首诗的用意，既有对林彪的鼓励，也有对他的批评。从此，林彪、叶群对傅连暲恨之入骨。叶群说：“傅连暲很坏”，“陷害首长”。林彪说：“等我好了，撤他的职，算他的帐。”

一九五八年，林彪、叶群在广州休养，当时傅连暲也在广州休养，他去看林彪，林彪不见，叶群也不见，他感到很奇怪，不知为什么。这件事他向陈云谈了。陈云就让于若木向叶群了解一下。结果叶群大骂傅连暲，说他如何

残酷，林彪生病要药，他不给等等。傅连暲感到很冤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完全是叶群捏造的。此后，他才知道林彪对他怀恨在心，但又无法解释。

一九六〇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曾经想把傅连暲赶回老家长汀"休养"。一九六四年取消军衔制时，又在级别上低套一级打击他。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邱会作就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傅连暲采取突然袭击。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在林彪死党邱会作的亲自策划和导演下，先后两次查抄傅连暲的家，总后卫生部贴出了傅连暲是"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诬陷"傅连暲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林副统帅病危时，不给药吃，陷害林副统帅"。八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天，他们强迫傅连暲去看大字报，并在总后大院内对他进行游斗，还举办了"傅连暲罪行展览"。傅连暲觉察出林彪在搞他，二十八日晚，他向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求救信。他写道：主席，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人跟我谈过，现在这样突如其来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清楚。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一九三四年你在雩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的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毛泽东对傅连暲的信作了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可是，林彪及其死党公然对抗毛泽东对傅连暲“似应予以保护”的指示。九月五日，邱会作又煽动中华医学会将傅连暲拉去批斗。由于无辜遭受折磨迫害，傅连暲不堪如此遭受凌辱，当晚留下两封遗书，一封给毛泽东，一封给总后党委，之后他服了过量安眠药，准备离开这人妖颠倒的人世。第二天一早幸被陈真仁及时发现，送到北京医院抢救脱险。就在住院时，傅连暲发现胸部疼痛，头上被打破结有血疤，经医院拍片证实，傅连暲的肋骨断了三根。陈真仁忍无可忍，将此事写信报告了周恩来总理。

毛泽东对傅连暲的信批示后，林彪一伙严加封锁，不让傅连暲知道。过了半年，陈真仁才得到消息，几经交涉才看到批示。这样，林彪一伙不得不表面有所收敛。一九六七年十月，他们让傅连暲一家搬到香山居住，名为“保护”，暗中却严密监视，加紧罗织罪名，成立“傅连暲专案组”，炮制了《关于批判傅连暲三反言行的请求报告》和所谓《罪行材料》，给傅连暲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尔后，邱会作以总后党委名义向军委办事组写了《关于彻底批判傅连暲三反言行的报告》。十二月十八日，邱会作以军委办事组领导成员的身份，在报告上批示：“军委办事组同意批斗傅连暲，望即组织这一工作。”专案组犹如接到圣旨，立即起草了批斗方案和罗织了四百多条罪状，并和中华医学会等单位串连策划对他进行批斗。

与此同时，康生、江青等人也积极配合，利用他们控

制的部门，凭空诬陷傅连暲是“特务”，说他于一九五〇年把毛主席、林彪的健康、治病情况报告了安子文，安子文通过所谓“特务电台”，当作重要情报发给香港特务机关了。香山电压不稳，常坏灯泡，恰好总后变电所派了一名电工来香山检查线路，抽空也检查了傅连暲家的电线。事后这个电工被抓了起来。他们捏造说：傅连暲家有电台，逼电工供认帮傅连暲修理了电台。于是，这个假供成了傅连暲向敌台发报、里通外国的所谓“特务”的铁证。这样，便把参与安子文“特务电台通敌”案的罪名，无中生有地强加给安子文和傅连暲。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晚，江青在听取八个专案组汇报时，恶狠狠地说：“傅连暲是个坏家伙，他怎么随便把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向外扩散，把他抓起来！”

一九六八三月十四日凌晨，邱会作在京西宾馆亲自坐镇，指挥北京卫戍区将傅连暲、陈真仁逮捕。离家前，傅连暲深知此去凶多吉少，郑重地对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妻子说：“告诉党，我傅连暲决无二心，告诉孩子们，我不是坏人。”

傅连暲夫妇被捕后，被分开投入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傅连暲被单独关押在二〇一监区第十六室，代号6847（即1968年第47个高级干部）。入狱后，傅连暲义正辞严质问审判人员，我犯了什么罪？他要向毛主席申诉。他有胃病，拖着断了三根肋骨的伤躯感到头晕目眩，不能吃

窝头，要求吃点稀饭，监管人不给。根据秦城监狱“看守日记”记载：三月十五、十六日，一连两天没有吃饭，吃点也很少，他一再要求吃稀的，医生开了病号饭，监狱管理处不批，并说：“叫他隔一时期饿饿看，吃点苦是应该的。”傅连暲还要求“出去打电话，要去给毛主席、杨代总长写信。”三月十八日，他敲门要求出去，遭到看守人员训斥，晚上被调到三十三室看押。三月十九日，“一天吃饭很少。”二十日“全天没有吃饭”，二十一日“吃饭很少，吃了一点饭都吐出来了，并睡在床上起不来，报告处里，又叫医生来给他看了，并给打了针”。三月二十二日，“已四天不大吃东西，确定吃病号饭”。三月二十三日，又“两顿未吃饭”，被调二十七室关押。三月二十四日，“身体看来很弱，表情很低，吃饭还是很少”。三月二十五日，“一天吃饭很少”。三月二十六日，“没有吃饭”，“一夜未睡觉”。三月二十七日，“吃饭很少一点”。“晚上躺下了，但一夜似未入睡”。此后他的神经显然开始错乱。三月二十八日，“吃饭很少，还不吃药。晚上一夜没有睡觉，在地板上反（翻）来复去，到处占（钻），一会把头钻在铺板底下不出来。看来活不了几天时间了”。三月二十九日早晨七点，有人从监视孔里看见，傅连暲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纹丝不动，告诉看守看一下。看守竟说：“我还要打我的饭，没工夫管他，回来再说。”等他们八点多钟打开牢房门时，傅连暲早已含恨死去，浑身冰冷了。他死时，手

上还戴着手铐，两腕部及肘部表皮脱落，结着黑紫的血疤。

傅连暲从入狱到死，只有短短的半个月时间。他本是七十四岁高龄的人，身体十分虚弱，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半个月中没有吃过一顿好饭，没睡过一次好觉，有病不给治疗，连一碗稀饭都不给吃。傅连暲的死，是死于身心遭受严重摧残、饥饿、疾病和非人的折磨。

傅连暲被迫害致死后，林彪一伙还不放过，进行焚尸灭迹。

傅连暲早从一九四〇年就向中共中央、毛主席提出将他死后的骨骼留给医学解剖与实习之用，以后他还多次提出过这个要求。一九五六年，傅连暲和黄树则去看望毛泽东，谈到由于习俗的关系，死后病理解剖的工作还有很大困难时，毛泽东说："一个革命者生前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到他死的时候，再不能做出更多的贡献了。唯一可做到的就是把自己的身体贡献给医学。这有什么不好呢？"傅连暲听了毛泽东这番话，他的决心更坚定了。他于一九五七年春节，十分恳切地托咐黄树则道："我死之后，把我的尸体送给医学院解剖学教室，供学生实习用，我的骨骼架子上可以写上'傅连暲之骨'，留做实习标本。你我是战友，又是同行，希望你到时候帮助我完成我这个心愿。"

傅连暲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他还想在生命结束

之后再作一次贡献，然而，这一可贵的心愿，却被林彪一伙抛之九霄云外，对其焚尸灭迹。傅连暲死于三月二十八日夜间，但火化证书上的死亡日期却被胡填乱写为四月二十日，而火化日期竟又被胡写为四月十八日。

这样还不算，邱会作控制的“傅连暲专案组”，又继续搞了三个月，整了近两万字的黑材料。同时，叶群从广州调人进京捏造假证，授意其编写《揭发老爷卫生部的黑干将傅连暲在对林×××病情处理上的滔天罪行》的诬陷文章，妄图“盖棺定论”，置傅连暲“永世不得翻身”。

傅连暲死时，他的夫人陈真仁还关在秦城监狱。她病倒后，在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禁闭了四个月，之后被关进了总后大院。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发出所谓一号战备命令后，陈真仁被送山西省闻喜县监督劳动，直到一九七一年林彪可耻地自我爆炸后，陈真仁才获释回到北京。这时，陈真仁才得知傅连暲三年前就被林彪迫害致死。陈真仁悲痛欲绝，多次上书中共中央、毛主席，控诉林彪一伙迫害傅连暲的罪行，要求为傅连暲平反昭雪。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追认傅连暲为革命烈士。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沉痛地批示：“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七月十七日，中央军委第十六号文件转发了经毛主席圈阅的总后勤部党委《关于傅连暲同

志恢复名誉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也曾指示要为傅连暲和陈真仁恢复名誉。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为傅连暲举行了安灵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王震、余秋里等出席了安灵仪式并赠送花圈。但是"四人帮"在当时仍控制着一切舆论工具，不让消息公诸于世。

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华医学会举行常务理事会，与会者深切怀念前会长傅连暲。许多老专家、教授们提到他时，无不潸然泪下，纷纷要求中共中央在报刊上为傅连暲公开平反，恢复名誉。经中共中央批准后，新华社于八月十三日向全国发布为傅连暲平反昭雪的消息。十一月二十二日，总后勤部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公开为傅连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这次大会上对傅连暲革命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傅连暲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参加革命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艰苦朴素，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一贯坚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坚强的党性；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面对林彪、"四人帮"、康生的诬陷和迫害，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斗争；他对党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我党我军的卫生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傅连暲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

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为表彰傅连暲长期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医疗保健工作的重大而特殊的贡献，中央保健委员会于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五日，特向傅连暲家属颁发了傅连暲的荣誉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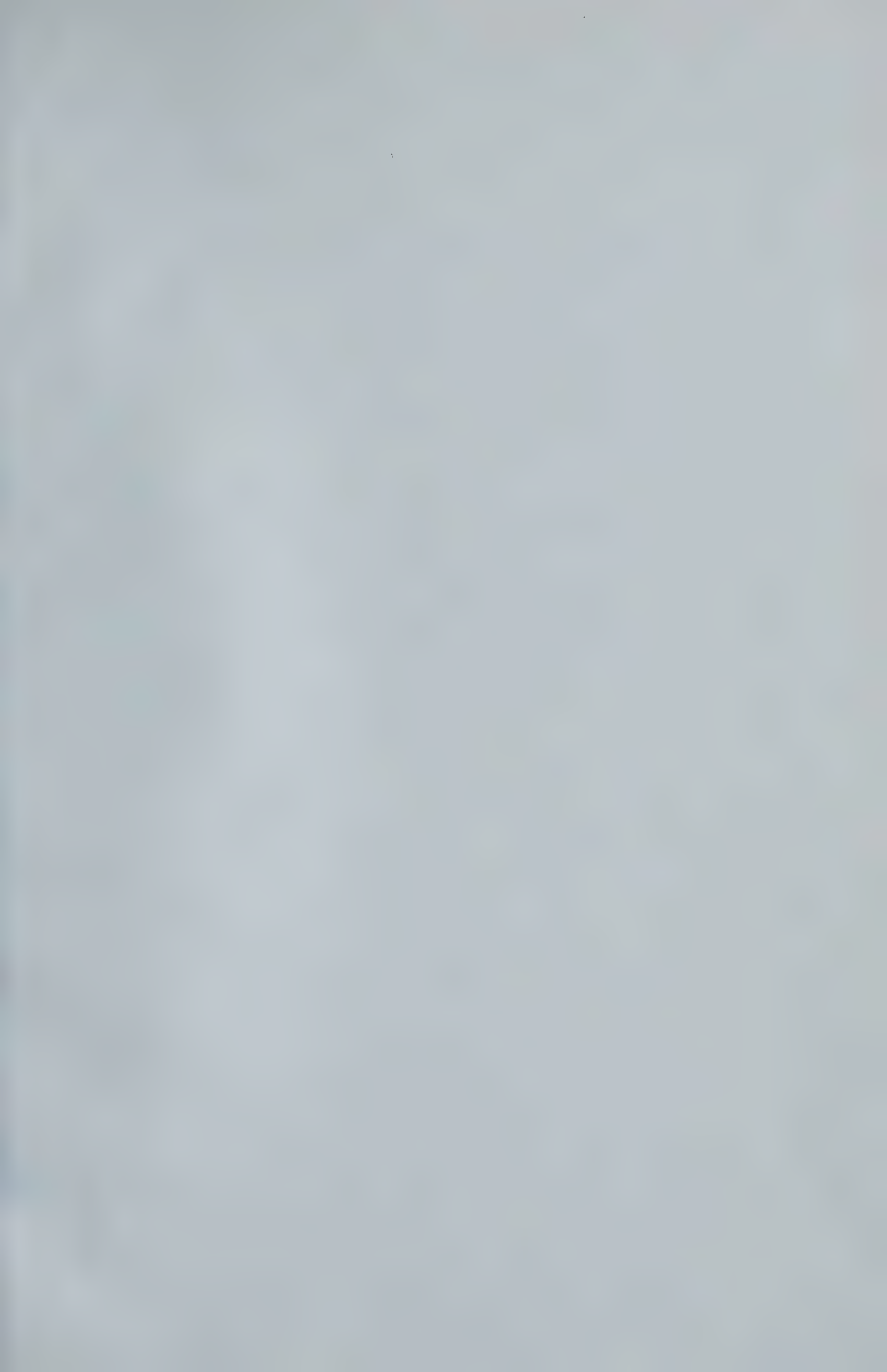
傅连暲兢兢业业、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崇高思想和品德，将永远受到人民高度的赞扬和怀念。

（康 模 生）

编　　后

《解放军将领传》，是一部大型系列丛书，着重介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长过程中有影响的高级将领的生平及主要军事活动。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全，加之撰写人文笔各异，尽管我们尽了很大努力，仍难免有错漏和不足之处。考虑到许多读者盼望早日出书的强烈愿望，我们还是将书付印了。希望了解情况的同志读后提出宝贵意见，共同将这部书修订好。

本书每集人物的排列，均以姓氏笔划为序。











责任编辑：王　伟　　周国栋
封面设计：姜学亮

ISBN 7-5065-1032-4/E·53
定价：7.00元



